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

LENGZHAN SHIQI DE ZHONGGUO DUIWAI GUANXI



本书着重讲述冷战背景下中国对外政策形成和变动的情况，涉及冷战的起源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朝鲜战争与冷战在亚洲的兴起，台海危机与中美之间的冲突，中国外交的革命化进程，中国联美反苏的战略出台，建立反对苏联霸权的国际统一战线，80年代中国外交的变化。



杨奎松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

LENGZHAN SHIQI DE ZHONGGUO DUIWAI GUANXI

国际冷战史专题讲义之三



杨奎松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杨奎松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国际冷战史专题讲义)
ISBN 7-301-09586-4

Ⅰ.冷… Ⅱ.杨… Ⅲ.中外关系—研究 Ⅳ.D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8302 号

书　　　名: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
著作责任者:杨奎松　主编
责 任 编 辑:刘　方
标 准 书 号:ISBN 7-301-09586-4/K·0421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北京原创阳光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6.25 印张　26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2.00 元

前　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以挑战资本主义为使命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由于孤悬于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它并没有真正动摇国际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但是，它的存在，特别是集合在其周围的各国共产党，却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经常感受到威胁，以至于苏联也常常自陷于战争的恐惧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并没有成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共同讨伐目标。恰恰相反，由于共同抵抗法西斯主义，苏联不仅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支持，而且通过战争成了世界上除美国之外的第二强国。不仅如此，战后的欧洲边界大踏步地向西推进，在它的占领或支持下，世界上更接连出现了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面对欧洲老牌西方列强战后一蹶不振，世界上一下子出现如此多与苏联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共产党国家，世界第一强国美国领导西方各国，为捍卫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转而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相抗衡，几乎不可避免。

战后，美苏冷战爆发的原因多多，但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制度的截然对立，至为关键。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为共产党国家，其形成及其最初的成长得益于这两种意识形态和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对抗与冲突，也至为明显。而容易令人费解的是，何以在受益于苏联的援助十年之后，中国与苏联这两个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相同，有着共同的政治理想的共产党国家之间，却相互指责、分道扬镳，不仅渐走渐远，甚至于走到势不两立，兵戎相见的地步？最后，一贯积极坚持反美反帝的毛泽东，还不得不在外交上打起了“美国牌”，与新中国的宿敌——美国联起手来，用以遏制苏联的威胁。

离开冷战的国际大背景来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直到冷战结束前夕的外交政策，何以会从“一边倒”，转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再转向反帝（美）反修（苏），进而又转到“联美抗苏”；就如同离开意识形态和国内政

治的种种因素，来了解毛泽东的国际战略一样，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情况，研究国际冷战史，不了解新中国在美苏冷战形成过程，特别是在美苏冷战政策调整变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仅仅着眼于美苏之间的对抗与缓和，其结论也必定是片面的和难以令人信服的。

基于上述种种考虑，本专题讲义力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形成及其发展变化的原因和过程，放在国际冷战史的大背景下，结合冷战所带来的国际国内政治的复杂变化，重加梳理分析。近十年来，中国有关方面以及相关学者先后出版了一批相当有分量的研究中国外交史的专著。这些专著对于人们比较系统和全面地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50年间对外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情况，无疑有很大的助益。与此同时，随着在中国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迅速展开，有不少学者也开始着手从国际冷战史的角度，来具体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形成与变化的过程，及对美苏冷战格局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一些很有价值和新意的专题性的论文集。这些无疑都是本讲义必须借重的参考文献。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目前所见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著作，由于缺少对国际冷战史这一国际政治大格局的深入探讨和具体把握，对中外关系以及中国对外政策变动的复杂情形，明显认识不足。着手从国际冷战史角度深入探讨中国对外政策变动的相关论文，在具体事件和个别时段的研究上深入细致，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变动的宏观把握和系统研究，亦明显欠缺。本讲义固然试图弥补上述缺憾，然而，限于目前国内的研究现状和研究人力的情况，这一工作完成得尚不尽如人愿。除了讲义的编写不得不群策群力外，各章在研究的深度，以至叙说的体例上，也还多少有些不大一致的地方。

但是，作为第一部从国际冷战史的角度，来讲授中国对外政策及其对外关系形成和变动的历史专题讲义，本讲义毕竟代表了目前国内国际冷战史研究在中国外交史问题上现阶段的研究水平。相信随着这一研究的日渐深入和整体水平的提升，目前所有的不足将会逐步得到弥补和解决。

本讲义分别由下列学者撰写：

第一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杨奎松。

第二章：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沈志华。

第三章：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中美研究中心教授蔡佳禾。

第四章：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兼。

第五章: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

第六章: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李丹慧。

第七章: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翟强。

第八章: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

为了本讲义各章体例及容量上的大体统一,主编除了进行必要的协调和统稿工作以外,还不得不对个别章节在内容或文字上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和补充。本讲义还附录有较为详细的大事记,以弥补相关内容的不足,并便利学生学习时参考。在此,本人对各位合作者的配合与宽容,表示由衷的感谢。至于因此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自然也应当由本人负责。

编　者

2005年2月初于香港

目录

前　言/1

第一章　美苏冷战的起源及其对战后东亚的影响
　　杨奎松/1
　第一节　有关冷战发生原因的探讨/1
　第二节　美苏冷战的意识形态根源/4
　第三节　美苏冷战之欧洲起源/7
　第四节　美苏冷战之亚洲起源/11
　第五节　雅尔塔会议与苏联的有限目标/14
　第六节　美苏关系的恶化及对战后东亚的影响/19

第二章　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冷战在亚洲的兴起
　　沈志华/30
　第一节　中苏结盟的背景及谈判结果/30
　第二节　朝鲜战争的爆发与美国的大举介入/34
　第三节　中国被迫出兵朝鲜作战/38
　第四节　前苏联航空兵与中朝联军并肩作战/40
　第五节　中苏同盟的经济基础与前苏联对华援助/43
　第六节　结束战争：中国站在亚洲冷战的最前沿/48

第三章　缓和亚洲局势的“窗口时间”　蔡佳禾/54
　第一节　走向和平共处的尝试/54
　第二节　日内瓦会议与中国的和平努力/62
　第三节　台海危机与中美关系的再度紧张/67
　第四节　万隆会议与中国重塑和平形象/72
　第五节　苏共二十大与波匈事件的冲击/77

第六节　莫斯科会议与中苏分歧的隐现/83

第四章　革命与危机的年代　陈兼/89
第一节　大跃进兴起与中国内外政策的转变/89
第二节　中苏同盟关系的逆转/92
第三节　第二次台海危机与中美对抗的继续/98
第四节　西藏叛乱与中印关系恶化/106
第五节　中苏分歧深化与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起始/110

第五章　中国外交的革命化进程　牛军/118
第一节　50年代后期中国对外关系动荡的起因及影响/118
第二节　1960年的对外政策调整/122
第三节　1962年对外政策的再度转向/129
第四节　中苏论战及其后果/139
第五节　援越抗美政策的形成/143
第六节　中国安全战略的调整/148

第六章　中国联美反苏的战略出台　李丹慧/153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工作的严重干扰/153
第二节　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苏联因素/157
第三节　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64
第四节　中苏越盟友关系的转变/174

第七章　建立反对苏联霸权的国际统一战线　翟强/180
第一节　"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180
第二节　中美建交的曲折过程/184
第三节　推动建立世界反霸统一战线/191
第四节　冷战背景下东亚的最后一战/194

第八章　冷战与80年代的中国外交　牛军/197
第一节　“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197
第二节　构筑中美关系的新基础/202
第三节　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及其意义/207

附录：　大事记/213

第一章
美苏冷战的起源及其对战后东亚的影响

杨奎松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第一节　有关冷战发生原因的探讨

自战后美苏冷战爆发以来,西方学术界就始终在探讨冷战爆发的真正原因。冷战爆发之初,鉴于美苏激烈的对抗,被后人称之为"正统派"的学者众口一词地相信,是前苏联在战后寻求世界霸权,才导致了冷战的爆发。而50年代中期以后,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上台,前苏联开始主动采取缓和政策,"修正派"的学者在60年代逐渐成了主流。他们相信,是美国当年对前苏联采取了过于强硬的政策,才迫使斯大林(J. V. Stalin)转取敌对的态度,从而诱发了冷战。然而,随着勃列日涅夫(L. I. Brezhnev)取代了赫鲁晓夫,与美国在世界范围争夺霸权,"后修正派"的观点于是开始流行,他们相信,美苏两国领导人都应为冷战的发生负责,是他们政策上的种种错误和对对方的误解,才导致了冷战的发生。

随着冷战结束,各国档案大量解密,冷战史的研究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成为主流的,则是以美国加迪斯(John L. Gaddis)教授为代表的"新后修正学派"的观点。他们相信,斯大林在战后扩张其势力范围的政策,理应对冷战的发生负主要责任。

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学术界已经逐渐不再重视冷战起源问题上美苏两国的责任大小问题了。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冷战的发生,既不能仅仅看成是前苏联领导人的问题,也不能仅仅看成是美国政府的问题;甚至只是从美苏两国当时的政策出发来探讨其根源,也有些过于简单化。美国梅尔文·莱夫勒(Melvyn P. Leffler)教授就相信,至少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走向冷战的历史背景。

第一,国际体系及与之相关的大国间均势问题的发展变化。

第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这又主要表现为:在如何管理社会,如何

驾驭现代化的经济，如何达到工业化、城市化这些问题上，民主资本主义和统制性共产主义之间有着根本不同的两套观念形态，互相敌对，并展开竞争。

第三，原子能革命和核武器的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国对于“权力”这一概念的界定，并使得技术性因素获得了对于国际关系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第四，全球范围内非殖民化的发展，以及因此而引起的革命民族主义对于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在这方面，中国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值得特别研究)。

第五，作为国际行为“机制”构成因素之一的领导人的个人作用问题。

其实，如果具体地来讨论莱夫勒教授的看法，也还是不无可商榷之处的。

比如，大国间的均势固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促成冷战，但是，它显然不是美苏冷战发生的主要原因。因为，无论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交战的两大对立集团如果仅仅从实力的角度来观察的话，都称得上势均力敌，却并没有能够阻止战争的爆发。[1]

意识形态的对立，早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就已经成为西方国家与前苏联关系的最大障碍，但无论是前苏联在力量对比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还是当前苏联具有了一定的实力之后，它也都没有能够促成前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冷战局面。

核武器固然可以算得上是对美苏两国走向战争的一种重要制约手段，但它对于解释两国何以会从战时同盟转向全球对抗，却并无帮助。至于非殖民地化和革命民族主义的挑战，更多地只是削弱或牵制了西方阵营，它究竟是刺激了前苏联向美国挑战的欲望，还是美国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进而秧及前苏联，也颇难说得明白。

美苏冷战的起因何在，根本的问题在于“战”，而不在于“冷”。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在两国实力相差并不十分悬殊的情况下，美苏不热战只冷战，关键的原因无非有二，其一是在20世纪前半期经历了两次动辄卷入数十个国家，死亡数千万人的世界大战之后，尽管再度出现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敌对集团，但是无论美苏，都深知大战爆发的可怕，故不能不极力避免之。

---

① 事实上，如果从综合国力来看，像二战爆发时德国、意大利两国的实力，远不如英、美、法等国的力量强。

其二是双方都拥有了核武器，且都清楚核武器的使用，无论对敌人，还是对自己，都将会造成毁灭性的灾难。有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再加上都拥有了足以毁灭人类的核武器，战后历届美苏领导人都不能不小心谨慎，极力遏制双方间的冲突升级成为可怕的战争。

但是，相对于战后的各国研究者而言，研究冷战的起源，更重要的显然不是研究其何以会“冷”。在经历了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在出现了极其危险，可能导致人类毁灭的核武器之后，人们更重视的是，美苏两国政府何以仍会各自纠集自己的集团，在全球范围开“战”。特别是战后人们大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苏两国在同一条战壕里抗击法西斯的情况印象深刻，对美、英、苏三国领导人战时密切的合作关系和通过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共同协商安排战后世界命运的情况记忆犹新。战后世人几乎无不对世界走向和平、民主及民族解放的前景，抱以强烈的期望。因此，美苏之间再度爆发冲突，进而形成两大对立集团，迅速走向冷战局面，自然让世界上一切盼望大国间能够实现和平与妥协的人民备感遗憾与失望。人们之所以会长时间反复研究和争论究竟谁是冷战爆发的责任者，其原因即在于此。

任何一种对抗或是战争的爆发，都毫无疑问与对抗或战争双方难以解决的利益冲突是分不开的。那么，美苏之间根本的利益冲突又是什么呢？在考察国家关系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把相关国家的国家利益作为这种考察的一项最重要的指标。在通常的情况下，相关国家国家利益趋于一致或比较接近的时候，国家关系就会较好；而它们各自的国家利益相互抵触，甚至冲突时，国家关系就较差。美苏从长期没有外交关系，到法西斯主义兴起，两国逐渐从建交到结为战时同盟，一同肩起反法西斯战争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种情况。但是，为什么战后世界各国需要和平发展的时候，美苏两国却会反目成仇呢？

一般谈论战后美苏冷战的起源时，通常都会提到斯大林 1946 年 2 月 9 日的严厉指责资本主义是新的世界大战根源的演讲、丘吉尔（Winston S. Churchill）3 月 5 日在杜鲁门的故乡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的“铁幕演说”、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S. Truman）1947 年 3 月 12 日关于美国决心支持和援助一切反抗共产主义的国家的公开宣言、同年 6 月美国开始在欧洲推行的“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计划”。正是它们促成了美苏两个阵营的迅速形成。

究竟是美英带有明显敌对态度的强硬言词，加强了前苏联的不安全感，

从而刺激了前苏联全面控制东欧各国以及向土耳其要求黑海的出海口,和试图染指伊朗阿塞拜疆地区,还是前苏联战后试图控制东欧,以及向土耳其要求共管黑海海峡和极力影响伊朗阿塞拜疆事务之类的做法,刺激了丘吉尔和杜鲁门,迫使美国人开始形成主张积极干涉全球事务的"杜鲁门主义"?十分明显,无论是在缺少文献档案的 1950 年代,还是在美国和前苏联的相关档案均已开放的今天,人们要想准确无误地分清美苏两国在促成战后冷战爆发这一点上,谁的责任大些,谁的责任小些,几乎就像是要想说清楚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一样困难。

要弄清楚战后冷战爆发的原因,绝不能被战时美苏之间的同盟关系所迷惑。换言之,要了解战后美苏之间发生的问题,必须要回过头去了解美苏关系的历史。这既包括美苏战时关系的历史,更包括美苏战前关系的历史。如果我们不能历史地认识问题,不了解美苏两国关系在二战爆发之前的历史状况,以及在作为战时同盟期间两国间依旧存在的问题,我们恐怕永远也无法厘清作为战时同盟的美苏两国,战后何以竟会迅速走向全面冷战。

第二节　美苏冷战的意识形态根源

要回答冷战何以发生,首先应当了解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何以冷战会在美苏两国之间发生,而不是在英苏之间或其他资本主义大国与前苏联之间发生? 从表面上看,这当然是由美苏两国当时在世界上的实力和地位,特别是战后美国不可一世的地位和国力所决定的。比如美国在经济上仅黄金储备就几乎占到世界总量 330 亿美元的 2/3,各种产品占到世界总量的1/3,船舶总吨位占到世界的一半。而军事上武装部队的人数高达 1200 多万,国防预算超过 800 亿美元,陆军数量仅次于前苏联,海军和空军则在全球无人匹敌。它不仅在海外遍布军事基地,还是战后初期唯一掌握着核武器的国家。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设想一下,如果战后是英国而不是美国如此强大,它是否也会像美国一样,与前苏联爆发全面对抗呢? 显然,任何人要想对此轻易地得出完全肯定的答案,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无论如何不能回避战后客观存在的英国政治的现实。即战后在英国执政的不是以丘吉尔为代表的反共的保守党,而是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色彩的英国工党。以工党所代表的英国社会群体和它与欧洲各国社会党大同小异的政策主张,要指望它自主地采取和美国完全一样的全面对抗前

苏联的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前苏联在战后的全面扩张就不会对英国构成严重威胁从而导致英国也像美国一样转向强硬吗？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注意到在其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下，历史上英国历届政府对前苏联态度的摇摆不定，我们也就大致能够了解英国政府会不会像美国那样行事了。

历史上，布尔什维克刚一夺取政权，就极大地刺激了英国，它之积极参与欧洲列强对俄国革命的武装干涉，其原因也正在于此。但是，不过两三年之后，眼见共产党政权在俄国已经占据了稳固的地位，这个最反对共产主义的老牌殖民主义帝国，也是最先承认前苏联，并与之建交的欧洲列强国家。

在整个30年代中期以前，前苏联共产党及其主导下的共产国际，要远较战后的前苏联党更显得激进和暴力。因为，那个时候它们几乎是公开支持世界革命，号召推翻各国资本主义政府的。为此，英国与前苏联间难免时常会发生严重的摩擦与冲突。英国政府对前苏联的戒备与敌视自然也一以贯之。但是，尽管如此，英国政府对苏政策依旧时左时右。当双方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暂时过去之后，它还是会在一些场合下，主动推动前苏联融入国际社会，并希望前苏联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

了解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会发现，战后英国的政策也并没有两样。它在一些情况下支持美国采取对抗的政策，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却并不按照美国的愿望行事。这不仅说明英国在对前苏联的问题上有自己的政策着眼点，而且说明，英国的对外政策是与其国内政治的状况密切相关的。只要英国国内政治的分野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它在对苏问题上的做法也难有本质的不同。

由英国的例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美国之所以会和前苏联爆发冷战，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其国力的强大，也不能仅仅看成是由于前苏联在战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扩张行动所促成。美国战后转向强硬的对苏政策，是有其强有力的国内政治的支持为其根源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就是在美国从不存在一个对资本主义弊端持强烈批判态度，因而对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抱有某种程度的同情心态的强大的社会政治群体。因此，美国对前苏联，亦即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态度，不会受到国内其他力量的牵制。

换言之，美国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利益，是与其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当美国人发现自己强大到可以影响全世界的时候，它会毫不犹豫地想要把整个西欧，乃至于把世界所有地区都置于它的保护和控制之下，并渴望按照美国的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而前苏联的存在，特

别是前苏联的扩张，之所以会被美国看成是对自己国家利益的严重威胁，以至不惜在二战后迅速采取与之全面对抗的极端政策，也正是因为它相信，前苏联不仅严重地阻碍着世界各国按照美国所希望的自由、民主的方向前进，而且是可能根本毁灭整个自由民主社会的最可怕的敌人。

美国在意识形态上与前苏联之间的对立，远超过英国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典型的例证，就表现在美国对前苏联的外交承认问题上。俄国1917年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政权。欧洲各国政府虽然都一度采取了敌视和孤立苏俄（1922年底以后改称前苏联）政府的政策，但是，随着前苏联政府的日渐巩固，包括英国在内，欧洲各国政府都逐渐采取了承认前苏联，并与之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行动。然而，作为对欧洲事务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美国政府，却长期拒不承认前苏联。他们公开宣称："今日世界上有两大害正在作祟，一是专制主义，其力量正在衰落；一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其力量正在上升。我们已经看到了布尔什维克统治在俄国的骇人后果，我们也知道这一主义正在往西方传播。想到在中欧实行无产阶级专制统治的可能性，就令人害怕。"

在这方面，美国战前战后的意识形态是一以贯之的。战后对苏冷战思想的最早提出者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这时就明确告诫过政府："无论布尔什维克做什么，无论他们对我们的最后态度是什么，我们都应该毫不迟疑地站在反对他们的一边。"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13—1921年在任）总统除了鼓励、赞同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以外，还在国内采取了强硬的镇压措施，以压制同情前苏联的倾向的抬头，同时公开宣布要扶助中欧地区的民主力量，以抵制布尔什维克的传播。

从威尔逊开始，美国历任总统基本上都沿袭了对前苏联政府的不承认政策。尽管美国政府并不反对美国商人在前苏联投资，以及保持与前苏联的贸易往来，但所有这些商业行动，却也都被赋予了某种政治目的。这也即是说，美国政府寄希望于通过这种投资和贸易，能使前苏联人接触到美国的政治文化及其生活方式，从而有助于最终瓦解前苏联的共产党政权。

众所周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受到孤立主义的思想支配的。其对外政策，更多地倾向于在国际事务中保持某种中立的色彩，以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为基本前提。美国的国会几乎在所有可能促使美国卷入到境外事务的政治军事的决策中，总是强有力地制约着政府的行动。在这一点上，最突出的，也是最惹人非议的，就是对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扩张，美国同样抱以一种近乎绥靖主义的态度。但即便是在这样

一种情况下，美国从国会到政府，依旧从思想上强烈地抵制和反对共产党的政权及其制度。在众多美国人看来，德国和日本至少不会剥夺私人的财产，而共产主义是一种不合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更不道德的社会制度和统治形式。因为，像前苏联共产党政权那样，打着阶级的名义，剥夺私人财产，压制言论自由，废除民主选举，奉行一党独裁和暴力统治，更是一种罪恶。

美国政府一直拖到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执政以后才最终放弃了不承认主义，在西方国家中，它几乎是最后一个与前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但即便如此，它也并不是在思想上认可了前苏联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独裁统治，而是因为大势所趋和当时法西斯主义猖獗造成的一种国际政治上的需要。

由此不难看出，美国承认前苏联，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包括战时与前苏联结盟，严格说来并不是美国政府改变了敌视前苏联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一贯立场，而仅仅是因为它们当时面对着更加危险的共同的敌人——法西斯主义。换言之，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一般的美国人，即使在与前苏联人处在同一战线的时候，其在意识形态上也依旧保持着对前苏联的反感和高度的警惕。其战后所以会迅速转向与前苏联的全面对抗，正如一些美国学者所认识到的那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实际上正是与威尔逊的对苏政策一脉相承的。“冷战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根据威尔逊的术语所解释和描述的。我们是‘自由世界’的领袖，是旨在‘遏制’的反共国际联盟的领袖。”

第三节　美苏冷战之欧洲起源

美国人基于意识形态防范和戒备前苏联战后扩张的心态，在二战期间，甚至在欧洲战场上，就已经表现得十分突出和明显了。这里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前苏联在战争期间的势力扩展。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前苏联只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但这已经足以让美英两国领导人强烈不满和高度戒备的了。

早在1942—1943年，也就是距离战争的最后胜利还有两三年时间的时候，美英和前苏联之间就已经围绕着何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产生重要的分歧了。莫斯科怀疑美英有意坐山观虎斗，部分美国将领也毫不掩饰他们就是希望看到法西斯德国与专制制度的前苏联两败俱伤。出于对长期受到资本主义各国的孤立和战争威胁的担忧，斯大林一心希望利用这场战

争把前苏联的安全疆界推到尽可能远的地区。为此,前苏联在战争期间就开始推动欧洲部分国家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南斯拉夫、波兰、阿尔巴尼亚、希腊等国 1943 年底和 1944 年初相继开始出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组织。苏军并利用反击德军的机会,大举越过边界攻入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及保加利亚等国,也极力扶持共产党成为统治的力量。

面对东欧以及巴尔干等国共产党政权的崛起,英美政府十分紧张和不安。它们明确强调:“我们决不能为了迎合那些野心勃勃的、下流的无名之辈的一时高涨的欲望”而抛弃这些国家的流亡政府,因为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只会毒化一个国家的政治空气,他们绝不可能体现出立宪精神,建立民主政治。在这里,人们事实上已很难区分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在双方政治和战略考虑中究竟有什么不同。无论美英还是前苏联,他们在考虑战后世界的安排时,显而易见都是把意识形态的选择与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可能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各自的国家利益,包括自身制度的巩固和势力范围的设定,说到底其实都是建立在严格排斥对方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

主要依据意识形态,而不是主要依据国家强弱和历史传统来划分势力范围,正是这场战争区别于以往历次欧洲战争的一个最明显的后果。

对欧洲战略地位重要的一些小国的争夺,最先触发了美英和前苏联之间一度被战争掩盖了的意识形态对立。

1944 年 2 月,前苏联在与波兰流亡政府代表的接触中,注意到其强烈的反苏态度,并获悉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下的“国家军”准备在苏军进入波兰时抢先建立行政机关。有鉴于此,前苏联迅速决定援助波兰工人党大量发展“人民军”,并随着苏军进入波兰境内,宣告支持波兰人民代表会议组成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波兰行政机关。此举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英美两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在这种情况下,波兰流亡政府乘苏军进抵华沙城外之机,于 8—9 月间在华沙发动的起义,很自然地被斯大林视为是波兰流亡政府企图排斥前苏联支持的卢布林委员会[①] 的重大阴谋。有关波兰流亡政府反苏反共的敌对态度,只要从他们当时散发的传单中,就可以看得很明白。其在传单中宣称:

波兰同胞们,在我们英勇斗争的紧要关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拥有

---

① 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因设在卢布林而得名。

对胜利坚定不移的信念，服从领导，准备为民族作出牺牲。我发布如下命令：

布尔什维克兵临华沙，他们宣称自己是波兰人的朋友，这是阴险的谎言。我们的边境地区，维尔纽斯和卢布林都在疾呼复仇。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会遇到无情的打击，这种打击已使德国占领者摇摇欲坠。有利于俄国的行为是对祖国的背叛。波兰起义的时刻还未到来。我废除前苏联走狗颁布的命令。国家军司令有权镇压一切支持苏维埃的企图。

德国人在仓皇逃窜。起来同苏维埃斗争。

自由波兰万岁。

面对波兰流亡政府的态度，可想而知前苏联方面会采取怎样的做法。于是，美英和前苏联之间围绕着应否援助华沙起义问题发生了自战争开始以来最激烈的争执。

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名致电斯大林，呼吁前苏联"立即向华沙波兰爱国者空投物资和军火"，"不然，你是否同意火速帮助我们的飞机来进行此事?"斯大林对此断然回绝。他得到的情报使他有理由宣称波兰国家军的领导人完全是"一小撮权欲熏心的罪犯"，这个时候发动起义是别有用心，因此他不仅坚决拒绝"同华沙冒险发生关系"，而且也不同意帮助英美空军实施空投行动。可想而知，前苏联的态度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批评。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指责前苏联"基于残酷无情的政治考虑"，置抵抗战士于死地，丘吉尔则主张通过舆论揭露俄国人的这种"古怪而阴险的行径"。

在华沙起义问题上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实际上已经点燃了战后美苏冷战的导火索。只不过，这个时候不仅盟军在欧洲作战离不开前苏联人，就是美国在远东战场上也还要指望前苏联人帮忙，再加上盟军进展缓慢，苏军已进入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眼看就要染指巴尔干半岛，希腊、南斯拉夫又都出现了共产党同流亡政府争夺权力的斗争，整个形势对英美明显不利。因此，无论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都不能不一面要求盟军指挥官尽可能抢占欧洲地盘，一面对斯大林做出某些妥协。华沙的起义者刚刚放下武器，丘吉尔就压抑住强烈的愤慨，与外相艾登 (Anthony Eden)急匆匆飞到莫斯科，去与斯大林讨论希腊的命运问题了。

丘吉尔之所以如此重视希腊问题，是因为希腊卡在英国通过地中海接通其东方殖民地的咽喉处，对英国极具战略意义。而强大的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却突然间否认流亡政府，准备独立掌权，这等于说将来地中海的通道很

可能会处于俄国人的炮口之下，丘吉尔当然要坐卧不安了。他这时在考虑用武力来对付希腊共产党了。他一面要求英军总参谋长准备紧急调动一万或一万二千军队进入雅典，呼吁美军协助英军行动，一面强硬地表示，万一事态恶化，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乘战争混乱之际使希腊共产主义化”，“建立一个专横的共产党政府”，英美必须准备鼓动和援助希腊人民反对布尔什维主义。

要对希腊共产党动武，丘吉尔不能不考虑到前苏联的反应。因为，如果不能取得前苏联的谅解，英军即使能够占领首都雅典，以后也未必能够真正取得对整个希腊半岛的控制权。早就熟悉了殖民主义那一套强强交易的丘吉尔，于万般无奈之中，不得不主动提议前苏联战后可以取得对罗马尼亚的控制权，在保加利亚也可占有主要的优势，包括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也可以占有相当的优势，以此来换取斯大林承诺希腊为英美的势力范围。反正苏军已经大举进入罗马尼亚，并逼近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边境，南斯拉夫共产党又势力强大，英美事实上对这些国家最多也只能争取到如此程度。

考虑到前苏联在经济上和军备上还不得不依靠美国，在波兰以及以后占领德国等问题上也还必须设法取得英美的合作，斯大林很痛快地答应了丘吉尔的提议。据此，双方于10月9日商定，罗马尼亚，前苏联占90%；希腊，英美占90%；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各占50%；保加利亚，前苏联占75%，英美占25%。这就是著名的“百分比协定”。

不论后人对“百分比协定”有何种批评，这一协定无疑是对这个时期美英与前苏联在欧洲军力对比的一个清晰的写照。希腊共产党从此成为英军干涉的牺牲品，但美英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罗马尼亚成为共产党人的囊中物。甚至不只是罗马尼亚，就连75%的保加利亚、50%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也一个接一个地落入共产党之手。因此，当希腊共产党的反抗遭到英军镇压时，斯大林显然并不感到内疚。① 相反，当时，特别是英美在力量对比上明显变强以后，对与前苏联的这一交易始终有些耿耿于怀的，却是始作俑的丘吉尔本人。

很明显，如果说斯大林从来都是拿阶级划线，坚持无产阶级必须依靠共

---

① 由于英军开进雅典，支持保皇派的希腊军队和流亡政府回国，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一度在前苏联的要求下与流亡政府妥协，参加了联合政府。但随后英军司令斯科比下令民族解放阵线交出武器，后者举行抗议遭到镇压，民族解放阵线发动了起义。起义从12月一直持续到1945年2月，由于民族解放阵线起义之初采取了扣压人质等一些丧失人心的做法，再加上希腊面积有限，军事上回旋余地过小，又得不到前苏联的赞同，因此在英军的强大攻势下最终归于失败。

产党专政的话，丘吉尔则从来都是拿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衡量是非黑白的政治标准，对强调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主张深恶痛绝。

还在华沙起义过程中，丘吉尔就曾与罗马教皇大谈“共产主义的危险”，他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让前苏联人把他们的那一套推行到这么多国家中来呢？他这时曾公开发表文告，不指名地告诫欧洲人民不要接受前苏联向欧洲推行的苏维埃制度。他宣称：

在当今世界，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唯一正确的选择。要检验各国人民是否享有自由与民主，丘吉尔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考察：“有自由发表意见以及反对和批评现政府的权利吗？人民对政府不满时有权把它赶下台吗？是否存在着人民可用来表达自由的意志的立法途径？司法部门是否超脱于行政暴力之外不屈从于暴民威胁？是否摆脱同某些政党的联系？法庭是否将行使公开的、公认的法律，而这些法律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同合乎情理与正义的准则联系在一起的吗？是否对穷人与富人、平民与政府官员做到一视同仁呢？除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之外，个人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维护与尊重？为了生计而日夜操劳、为了养活一家人而疲于奔命的普通工人或农民，是否有免于恐怖的权利？”

毫无疑问，这决不仅仅是丘吉尔个人的看法，它同时也是欧美大多数国家政治家，尤其是美国人的看法。因此，丘吉尔的讲话当时就得到不少美国官员的支持。美国驻前苏联大使哈里曼甚至已经开始担心前苏联会把它在东欧的这一套照搬到远东去。他为此曾接连提醒华盛顿说：前苏联正在通过暴力手段向东欧国家推行其“秘密警察（这就取消了个人自由）、新闻检查、奴化教育等”的做法，“当他们能够向中国和太平洋方向觊觎时，这种政策就会伸展到那里”，美国决不应该让前苏联为所欲为。

第四节　美苏冷战之亚洲起源

自20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建交以来，许多关注中美关系历史的人都喜欢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即美国在中国的机会是怎样失去的？那意思是说，本来战时来到中国的相当一批美国年轻外交官早就认识到国共两党力量此消彼长的大趋势，提出了发展同中共关系的积极设想，仅仅是因为美国政府随后采取了扶蒋抑共的错误政策，导致美国与中共关系逐渐恶化，从而使美国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失去了与新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机会。

真的存在另外一种政策选择吗？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年轻外交官当年

对中共的好感是建立在怎样一种基础之上，也许会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谈论这个问题。

我们通常所说的那几位年轻的职业外交官，主要指当时在中国的约翰·S. 谢伟思(John S. Service)、约翰·P. 戴维斯(John P. Davis)和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等人。范宣德大概是最早尖锐批评国民党，主张给八路军以必要援助，并相信中共战后必然要在中国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的人。以后，谢伟思和戴维斯就此做了更多的调查，提交了更多的报告。

综观谢伟思等人的报告，核心内容不外以下几点：第一，中国无论在抗战中，还是在战后太平洋的战略格局中，都与美国利益攸关；第二，国民党腐败无能又一味反苏反共，而中共日益强大深得民心，与其一味支持蒋介石，迫使中共战后投入前苏联怀抱，使中国华北和东北落入前苏联之手，不如通过援共抑蒋争取中共倒向美国，从而抵制前苏联向远东扩张；第三，中共并非正统意义上的共产党，他们的政策实际上更接近于美国人的观念，与前苏联的模式相差甚远。

在这里，不难看出这些美国年轻外交官们对中共的重视，是建立在怎样一种考虑之上的，这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的利益，不使前苏联战后染指中国。由此不难看出，这些看起来相当开明的年轻外交官们，在美国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其思想深处根深蒂固的戒备和敌视前苏联的心理。与其说他们关于国共优劣的看法是在关心中国战后的前途，不如说他们是在考虑战后美苏冲突的情况下，美国如何更好地遏制前苏联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甚至，还在 1942 年和 1943 年，当这些美国外交官还不那么信任中共时，他们就已经在高度关注战后在远东可能出现的美苏利益冲突了。谢伟思当时的警告是：延安的共产党政府可能不会实行美国意义上的民主。而且即使美国为避免共产党的敌意不再给国民党以物资和外交的援助，这个共产党政府还是可能会更倾向于与俄国而不是与英美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戴维斯与谢伟思一样，他怀疑中共的领导人骨子里仍旧是亲苏的，甚至还可能在接受莫斯科的指示。问题是，蒋介石并没有力量消灭中共却一味地指望用武力解决问题，这样难免会把美国卷入到与前苏联的冲突当中去。换言之，这些美国外交官这时重视中共、力图接近中共的一个主要目的，正如他们反复强调的，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想要由此“获知俄国在亚洲的目标何在”，并采取一切努力避免战后中国落入前苏联的怀抱。

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严重问题恰恰在于，腐败专制的国民党难于指望，

它不仅“不可能成为对抗俄国的力量”，而且其对中共的态度以及背离民众的种种作法，“不知不觉助成了俄国在东亚的优势”，最终不单是中共可能依据天时地利夺取华北和满洲，造成前苏联的卫星国，就连朝鲜、台湾都可能被驱入前苏联的怀抱之中。正是注意到前苏联战后可能染指亚洲事务，当他们看到延安的新民主主义体制的成功尝试，发现中共与前苏联几乎没有多少联系之后，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把抵制前苏联向远东扩张的希望，寄托到加强美国与中共关系的前景上来。他们正是为此而大声呼吁：“把共产党人拉到我们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投入俄国人的怀抱”。

以分化中共与前苏联的关系作为美国对中共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中共不能是正统意义上的共产党。而正是在这个问题，美国人当时抱有相当多的幻想。最早也是最具权威性的评价大概要算是罗斯福 1941 年皖南事变之后委托特使居里(Lauchlin Currie)和联邦准备银行调查统计部主任戴普莱(Despres)向蒋介石转达的那个口信了。

罗斯福明确讲：“予自万里之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戴普莱对此更进一步解释称：“罗斯福之意见以为中国之有共产党，并不能认为中国有共产主义之实行，只能视作民主政治之实习。”罗斯福的这一看法，显然也是那个时候众多外国人的普遍认识。据外交官们报告：“访问过共产党地区的外国观察家们(包括美国人在内)一致认为，共产党政权的当前政策与正统共产主义相去甚远。它为政异常清廉；已经举行了普遍选举；个人的经济自由相对而言未受限制，这一政权看来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与其说它是共产主义的政权不如说它是农业民主的政权更为准确。”

在随着美军观察组进入延安实地观察，看到种种带有民主改良色彩的新鲜事物，如统一战线、土地改革、民主选举等深得民心的政策实践，听到毛泽东的种种许诺和保证之后，原本就对中共有些好感的美国年轻外交官们，开始把这些明显代表着中国大众和未来，又格外注重中国实际的生气勃勃的共产党人，同美国人的民主理想联系起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谢伟思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兴奋地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宣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他们深知中国不能从目前的农业社会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后，社会主义才能到来。因此，他们“希望不通过暴力革命，而是通过长期的、有秩序的民主过程和受控制的经济发展来达到目的。”作为真诚的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他们相信：“在民主制度下，经

济可能有秩序地增长,通过私有企业阶段最终进到社会主义,而无需经过剧烈的社会动乱和革命。"他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不会违反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共产党应该尽可能受到我们的同情和友好对待。"

如果说谢伟思对中共未来究竟是更重视理论,还是更重视实际这一点还有些不十分自信的话,那么戴维斯的看法更加直率。

他说:中共只是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罢了,他们其实与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一样,不过是些主张渐进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的圣徒和先知们住在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里,过着俭朴的生活,幻想着奇怪的阶级妥协和政党联合之神降临,面带羞色地拜倒在外国投资的金犊之下,并且渴望自己能按世界标准受到尊重。"他们现在追求的只是土地改革和政治民主。正因为如此,他们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唯一一个受到人民广泛支持的政党组织,也是腐败堕落的国民党所无法战胜的。中共命中注定将会控制中国,承认中共并与他们合作,他们就会保持其民主的一面而与美国友善。坚持援蒋,美国就会成为他们的敌人,并迫使中共变成俄国的附庸。何去何从,关系重大。

十分明显,谢伟思、戴维斯等人寄希望于加强与中共的联系来拒止前苏联的想法,是建立在对中共性质和未来发展前景的上述判断上的。这一判断准确与否,已无须讨论。但由此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从美国总统到美国普通的外交官们,在内心里对作为盟友的前苏联抱着怎样一种态度,他们又是如何严守着那条划分美苏的意识形态的界限的。

由此不难看出,美英与前苏联在战时的欧洲所发生的龃龉与冲突并不是偶然的。在亚洲,仅仅是因为前苏联尚未介入到战争当中来。即便如此,在亚洲的美国人就已经在未雨绸缪了。一旦前苏联向东对日作战,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毫无疑问地会迅速凸显出来。抵制前苏联的东扩,以至选择一切反共的亚洲国家的政治家作为自己的盟友,将是战后美国亚洲政策发展的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第五节 雅尔塔会议与前苏联的有限目标

到了 1944 年底和 1945 年初,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经不容置疑了,但是,越是接近胜利,美国人就越是关心这最后的代价问题。为取得对日本作战的绝对优势,减少美国人的牺牲,罗斯福也不得不采取丘吉尔"百分比协

定"的办法,通过与前苏联交换某些利益,来取得前苏联的合作。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协定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达成的。

有一种看法认为,雅尔塔协定实际上划定了战后美苏各自在远东的势力范围,比如在中国,长城以外归前苏联,长城以内归美国。但是从英美苏三国领导人签过字的秘密协定条文中可以看出,美苏两国并没有就此达成明确的协议。

从斯大林在会议前后再三提到其目的之一是要恢复沙俄因 1904 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丢失的权益,明确要求租借大连、旅顺两港和中东及南满铁路的要求,可知斯大林是有把中国东北划入其势力范围的某种打算的。但是,罗斯福并没有全盘接受。

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苏三方最后达成的条文规定:"1. 维持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2. 恢复 1904 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利,即(甲)将库页岛南部及其全部毗连岛屿归还前苏联;(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前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前苏联海军基地;(丙)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前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3. 千岛群岛交给前苏联。"在这里,一个"大连商港国际化",一个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中苏合营,再加上"中国保持在东北的全部主权",清楚地表明了美国不同意把东北划入前苏联势力范围和坚持东北要门户开放的态度。

很难认为斯大林不清楚美国人的这种态度。问题仅仅在于,雅尔塔协定签字之日,欧洲战争尚未结束,莫斯科与英美间在欧洲还有许多麻烦要解决,况且前苏联在太平洋战争中从无建树,只凭一纸出兵许诺,就得到沙俄当年丢掉的在中国东北的主要优惠权益,不仅被美国拉入大国行列的中国因此无法就外蒙归属问题提出异议,而且可以在太平洋得到对自己极具战略意义的不冻港,可以取得逼近日本列岛的千岛群岛,这已经是不小的收获。提出更多的要求,斯大林这时还缺少足够的筹码。

随着红军在欧洲的节节推进和前苏联在东欧诸国扶植共产党上台的步步成功,斯大林已经形成了一种凭实力讲话的坚定信念。他对此有过明白的表述,那就是:这场战争和过去不同,谁占领了地方,谁就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制度。军队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只能是这样。

雅尔塔会议刚刚结束,前苏联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遭到英美抗议的行动。包括逼迫罗马尼亚国王解散联合政府,在苏军的支持下成立以共产党为首的新政府;不允许英美派观察员或代表团访问波兰,不允许其代表前往

波兰处理苏军在波兰解救的英美战俘问题，等等。当丘吉尔和罗斯福就此提出交涉时，斯大林的回答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你们在你们的占领地享有优先权，我们在我们的占领地享有优先权，我们怎么做自有我们的道理，别人无权干涉。

既然凭实力讲话，斯大林对自己势力范围的可能界限自然也看得十分清楚。前苏联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可以为所欲为，但对于英美盟军占领下的国家和地区，则明显地采取了旁观的姿态。斯大林对"百分比协定"的严格遵守，就连丘吉尔也无话可说。正因为如此，莫斯科对处于英美占领区内的各国共产党，无论其在民众中是否占据优势，都一概要求其与英美支持的当局合作。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抵抗力量最终解除武装，党的领导人加入政府，走上议会道路，就是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

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及其以后明白承诺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并再三表态支持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政府，自然也是这一政策在远东的延伸。希腊共产党的遭遇，似乎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斯大林的观点，即二战后一个国家的政治前途，只能而且应该由前苏联或者英美的军队来决定。共产党发动的在英美势力范围内的革命，都必然会遭到英美军队的武装干涉，最终归于失败。

熟悉列宁著作的读者都会了解，斯大林的这一观点与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得出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列宁的观点是，世界已经进入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战争必然导致革命，也只有革命才能制止战争。为此，列宁当时不仅坚决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而且还采取了积极推动欧洲革命的方针。

不过，斯大林有斯大林的道理，而且依据斯大林的逻辑，也并非违背了列宁主义的上述立场。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斯大林在回答有关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时就曾清楚地表达过他的看法。他当时写道："一个已经取得胜利而又处在许多资本主义强国包围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认为自己有充分的保证来摆脱武装侵犯(武装干涉)的危险，因而防止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的企图呢？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大力援助，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农民能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像已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那样战胜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呢？""列宁主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这一观点，斯大林特别引用了两段列宁的话。其一是说："就完全保证防止资产阶级关系的复辟而言，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只有

在国际范围内才是可能的。"这就是说，国际无产阶级的大力援助，特别是无产阶级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是完全保证前苏联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企图、保证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其二是说："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只要愿意统治并继续统治下去，就应当也用自己的军事组织来证明这一点。"

不难看出，争取无产阶级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和通过强大的军队来实现保护前苏联的目的，始终是斯大林的基本战略考虑。斯大林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把强大军队和在几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的胜利联系起来，并突出强调其意义，更多的只是因为历史给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机遇，而这与列宁通过推动欧洲革命来巩固本国社会主义的目的，并没有丝毫的不同。

显然，对斯大林来说，这场战争提供的机会实在是太宝贵了。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战争给红军提供了大举进入东欧各国的机会，依照这些国家内部的革命条件，要建立起共产党的政权，尚不知何年何月。因此，斯大林非常看重这一机会，也生怕任何无序的革命会毁坏了共产党人盼望了 20 多年才得来的这一系列胜利成果。更何况，要医治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创伤，使前苏联迅速成为世界最强国，以追求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化，在完全有可能利用战时与英美达成的谅解，争取到几十年和平发展时期的条件下，他也绝不愿意把前苏联拖入到新的军事对抗和战争危险当中去。

相信前苏联社会主义的利益，代表了人类最根本的利益，不仅要求前苏联共产党及其无产阶级，而且也要求世界各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无条件服从它的一切需要，这是生活在共产党意识形态观念之中的斯大林认识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不论斯大林多少遍地把俄罗斯的昨天和今天联系起来，也不论斯大林多少次地把自己说成是俄罗斯（或者说是前苏联）国家利益的代言人，我们都很难把他简单地等同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或民族扩张主义者，很难简单地说他这时只是在谋求俄国的民族利益。

必须看到，斯大林维护的首先是一个共产党政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前苏联。所谓前苏联国家的利益和安全，首先是与共产党的地位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俄国的民族利益是在其次的。因此，斯大林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从来没有忘记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认识世界和决定政策；从来没有忘记前苏联根本上不同于现在世界上一切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从来没有忘记他和大大小小的丘吉尔、罗

斯福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不是你战胜我，就是我战胜你的根本利益冲突。

而这种情况实际上也就决定了二战后前苏联的走向，不管斯大林是否打算鼓励其他国家革命，它都不可避免会逐渐与资本主义的英美两国，特别是与一心想要在全世界充当自由民主的守护神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陷入到新的军事对抗和战争危险之中。

雅尔塔会议之后前苏联与英美之间的摩擦可谓层出不穷。这边围绕着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争执尚难平息，那边前苏联又向土耳其提出了领土和海军基地的要求，力图控制达达尼尔海峡，以拥有黑海的出海口；向伊朗提出了获得其北部的石油租让权的要求，以确保前苏联对伊朗的影响。为达到目的，前苏联甚至不惜在沿土耳其边境的伊朗和保加利亚一侧调兵遣将对土耳其示以武力威胁，在伊朗则采取拖延撤军和扶植亲苏的分裂政权的办法以相要挟。

不仅如此，前苏联在远东也开始提出新的要求。当5月8日德国宣告无条件投降，大批苏军如约开始向前苏联远东地区集结，准备投入对日作战之后，斯大林对占领中国东北较前也更加充满了信心。既然苏军将要占领中国东北，依照“军队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的逻辑，前苏联完全有理由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共产党政权。当然，从前苏联长远的战略利益考虑，斯大林不会为此去违反与英美达成的协议。

毕竟，雅尔塔协定涉及不少与前苏联利益攸关的重要问题，包括需要美国政府遵守协定才可能落实的有关南库页岛以及千岛群岛等领土的重新归属等问题，前苏联方面对协定的任何变更都可能造成不利的后果。但是，轻易地根据协定中的主权规定就把东北交还给国民党，斯大林也心有不甘。因为国民党过于亲美，而美国一旦根据门户开放原则进入东北，对前苏联的安全不能不是一种威胁。这也就是为什么，斯大林在7月与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的谈判中，利用雅尔塔秘密协定措辞不严密的空子，提出了许多大大超出协定规定的具体条款的要求，并且以中共即将进入东北相威胁。斯大林新要求的实质，说到底，其实就是想要逼迫国民政府在实际上承认，中国东北主要是前苏联的势力范围。

围绕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具体条款的谈判，引起了美国的高度重视，并公开出面加以干预，这使中苏谈判多少有些起伏。但斯大林最终还是相当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不仅如此，斯大林很清楚，一旦百万苏军跨过中苏边界，到时候前苏联还可以有所作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美国，都没有多少回旋余地。

当然，基于雅尔塔协定的约定，斯大林也做出了今后一切道义的和物质上的援助只提供给国民政府的承诺。并且在签订了条约之后，斯大林还专门致电毛泽东，要求后者立即到重庆去与蒋介石谈判和平统一问题。

斯大林这时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很清楚，只要东北能够基本控制在前苏联的手里，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中国，与在英美势力范围内的欧洲一样，都不应该爆发革命，因为这不仅可能引起美国的武装干涉，而且可能破坏美苏之间的合作，影响前苏联的长远战略利益。为此，毛泽东完全可以向法国共产党学习，而没有必要像希腊共产党那样自讨苦吃。当然，斯大林没有想到，美国人并没有按照他的想法行事，好在毛泽东也是自行其是。结果，斯大林不能不感谢毛泽东，因为他纯粹是意外地获得了牵制美国的重要筹码。

第六节　美苏关系的恶化及对战后东亚的影响

还在德国刚刚投降之后不久，美国政府内部围绕着要不要重新修订对苏政策和重新讨论雅尔塔协定的问题，就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助理国务卿格鲁(Joseph C. Green)、前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等人坚决反对为争取前苏联早日参加太平洋战争而牺牲美国在远东必须达到的各种政治目标。他们明确认为，斯大林与希特勒没有什么两样，一旦前苏联进入太平洋，它定会取代日本在东亚和太平洋的地位，不仅外蒙、满洲、朝鲜都将逐渐纳入其轨道，整个中国，甚至日本，最终也将受其控制。

随着斯大林在此后的中苏谈判中坚持要控制东北铁路和大连主要行政权，并且要依照沙俄的旧例划定军事区，不可避免地使美国政府内部对前苏联的敌意进一步加强。正在莫斯科的戴维斯和已经调赴华盛顿担任国务院中国司司长的范宣德，都明显地改变了过去的观点。

戴维斯多少有些悲观地预言：中共看来必定会在前苏联的轨道上运行。而有了中共的支持，前苏联无疑会在远东，特别是会对满洲、华北和朝鲜采取行动。范宣德则提议，美国必须支持国民政府采取坚定立场，反对蒋介石对前苏联做出超越雅尔塔协定的让步。即使因此达不成协议，最终在解决满洲问题时，我们也会处于比现在更有力的地位。

此前始终主张争取前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美国军方，这时的态度也明显地开始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命令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务必独占日本和朝鲜南部，以闪电动作阻止苏军进入，而且主动制定了一个帮助蒋介石占领包括上海、烟台、秦皇岛在内的几个重要港口的计划。在决定投掷

原子弹之后，国务卿贝尔纳斯(Byrnes, James F.)甚至明确表示，十分希望能在俄国人介入之前结束对日战争，特别是在他们进入大连和旅顺港之前。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后来更是声称：原子弹其实是炸给前苏联人看的，为的就是可以使民主国家在外交上获得一种急需的均势，以对抗共产国家战后的庞大势力。

1945年8月9日，苏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一、第二方面军总共150万人，从东西北三面向满洲日军发动了进攻，很快就攻入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第二天，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美英中三国发出的最后通牒，但要求不损害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眼见俄国人已经大举攻入满洲，一直没有就此松过口的杜鲁门这时改了口，说是由于俄国人正在深入满洲，有可能乘势占据中国领土，并支持中共，因此批准就此做出妥协，以限制苏军南进。

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部紧急向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Albert C. Wedemyer)发出指示，要求美军除了要迅速占领中国各重要港口和交通中心以外，还应该迅速运送国民党军队到关键地区。强调美军占领区只能转交给国民政府的机构和军队。而为了避免远在西南的国民党军队赶不及调运华北、华中和华东的各个战略要地及主要交通线，杜鲁门还特别批准了“利用日本人阻挡共产党的行动”。

据此，美蒋与日军开始联手阻止中共军队进占各战略要点。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甚至要麦克阿瑟转告日本人，威胁说，任何向中共交枪的日军部队将来都得不到遣返。

美国对苏态度转为强硬，还进一步直接反映在9月11日开始在伦敦召开的五大国外长会议上。美英与前苏联外长发生尖锐冲突，争吵不断。美英指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没有个人自由，苏方反唇相讥英国在希腊搞法西斯；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要求讨论前苏联在达达尼尔海峡建立海军基地的问题，英国外相贝文(Bevin, Ernest)和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坚决拒绝。

而最让苏方感到不满的，是美方一开始就反对讨论对日本的共同管制问题，不允许前苏联插手削弱美国对日本的独占权。即使在莫洛托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援引盟国共同占领德国的例子，于24、25日两度坚决提出要求，主张将美、英、苏、中四国共同管制日本问题列入议程，贝尔纳斯也依旧置之不理，只同意在华盛顿搞一个远东顾问委员会，让前苏联去“顾问”。贝尔纳斯的态度使莫洛托夫极为恼火，严厉斥责美国要当“世界独裁者”。结果，二战刚刚结束，几大国外长会就开成了“现代最不幸的国际会议之一”。

拒绝前苏联参加对日本的管制和占领,这或多或少损害了斯大林作为世界第二大强国领袖的自尊心。但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历来是前苏联的一大威胁,斯大林下决心对日作战,本身就含有要彻底削弱日本的意图,战后参加占领和管制日本对前苏联未来安全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

为了取得美国对苏军占领日本北海道地区的同意,斯大林甚至还在苏军完全可以单独占据整个朝鲜半岛的情况下,就接受了美国关于苏美两军以三八线为界分别占领朝鲜的提议。想不到如今美国却必欲排斥前苏联,独占日本。考虑到美苏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斯大林基于对防止日后美国扶助日本再度威胁前苏联远东的强烈担心,迅速开始调整了其对中国东北的政策。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开始鼓励中共武装大举进入东北。

还在8月苏军出兵东北之后,中共中央就急于派兵进入东北,但始终无法与前苏联取得协商,不清楚苏方态度,因此只能派临近东北的地方部队就近与苏军接触。苏军当时对中共部队的态度,因无莫斯科的明确指示,虽一般表示友好,并明显同情中共而厌恶国民党,但碍于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条约,尚不敢公开承认和帮助中共武装。

9月中旬,这一情况开始发生改变。苏军开始要求已经进入东北的部分中共地方武装改换名义,协助维持地方秩序。苏军代表并亲飞延安说明苏军希望中共中央派负责同志前往东北,以便就近具体协商双方行动。

考虑到前苏联在外交上的承诺,苏方强调原则上中共的八路军和国民党的军队一样,都不应进入东北。但私下应允,如果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将取放任态度。而这时进入到察哈尔、绥远地区的苏军,更是主动派出代表与八路军接洽,要求八路军准备接防苏军即将撤出的地区,并全力加以控制,战略中心千万不要南移,以免国民党占领这些地区后再度割断双方联系。如果八路军需要,他们可以秘密提供武器援助,即使将来八路军在抵抗国民党进攻时受挫,也可以靠近外蒙边界,甚至撤到外蒙去。

前苏联驻重庆大使彼得洛夫(A. A. Petrov)也向还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明确提出:中共当前战略重心,应当是集中兵力,“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之线,防蒋进攻”。很显然,这一系列变动都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莫斯科虽然未必愿意让中共大举开入东北,但至少是希望中共军队能够沿着前苏联自认为的东北势力范围之外的长城一线,构筑起一道防波堤,从而便利前苏联,牵制国民党。

正是基于这一重要的情况变化,中共中央才得以在9月中旬提出和制

定了对中共此后军事发展极具战略意义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决心放弃南方的部分根据地，将兵力北移，努力控制热河、察哈尔及河北东部，同时在东北沿海配置数万兵力，争取占据东北。国共争夺东北的斗争由此揭开序幕。

就在莫斯科对东北政策发生变动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更加严重的情况。这就是：美军在既无条约依据，又没有与前苏联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开始在中国华北沿海港口大举登陆。9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在青岛登陆，第一加强陆战师也开进了天津，设立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两栖作战军司令部，并北上秦皇岛，迅速沿铁路线展开，协助国民党军抢修通往山海关的铁路交通，甚至亲自担负护路任务，掩护国民党军向东北推进。美军的这一系列举动，更直接地对东北苏军形成了严重威胁，这不能不进一步刺激了斯大林，支持中共武装阻止美蒋势力占据东北的意图更加明确。

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外贝加尔方面军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克拉夫钦科大将（Kravchenko）、图马尼扬（Tymanian）中将等多名将领的陪同下，专门招待了刚刚到达东北不久的中共东北局负责人。他不仅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而且高度赞赏中共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鉴于东北局对控制全东北把握不大，强调要做背靠苏蒙朝三国边界的军事部署，他明确表示反对，主张应该在山海关方面部署15万主力部队，在沈阳周围部署10万部队，全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他声称：“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长春路是商办，谁若运兵需要交涉），北面自然是你们的。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

为了增强中共方面的信心，4日苏方就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悉数转交给中共接收，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

这次会谈后不过两周时间，已知中共方面所得到的武器就有三批，足够装备一支将近十几万人的部队。其中步枪约10万支，轻重机枪约3400挺，掷弹筒约500个，大炮100余门，各种弹药将近2000万发。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刚从重庆回到延安，就当机立断，决定依目前部队调动情况确保山海关一线虽暂时做不到，但仍可按照苏方建议，“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

为协助中共夺取东北,苏军这时可以说也是尽其所能。它先是不顾美蒋方面的外交交涉,拒绝美舰运送国民党军在大连登陆;然后把美舰可能登陆的东北营口和葫芦岛两地转交中共军队接收,宣称苏军对两处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将概不负责;同时把南满的大批兵工厂、武器弹药仓库,甚至一些重型武器和飞机统统交给中共;还将中共武装引入长春市郊及机场附近布防,要其严防国民党军通过空降进入东北。

10月25日,苏军代表甚至通知中共东北局说:"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如果国民党军在11月15日苏军正式撤退之前敢于进入东北,苏军将协助中共打击国民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关内作战的军事形势也明显对中共有利,毛泽东提出了"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这一十分强硬的政治主张,公开宣布:"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中央军不得开入"。

但是,斯大林显然没有料到国民党会以退为进,发动外交攻势。11月17日,眼看大批中共军队开入东北,苏军处处掣肘,接收东北已成泡影,国民党派往长春与苏军接洽接收行动的东北行营奉命撤回关内,蒋介石并将苏方违反条约的行为告到了杜鲁门那里,美国海军因此也调派军舰接连在苏军驻守的大连附近海面向苏军示警,弄得15日刚刚开始的苏军撤退行动不得不中途停止不说,还被迫紧急向大连空投了一个师的兵力,并向沈阳增兵至4个坦克旅和一个炮兵师,同时把部队又开回了原已放弃了营口重新布防。

前苏联支持中共夺取东北,为的是阻止美国人进入东北。中共如果能占据东北,则整个山海关以北就可能实现与中国的分治,成为既依托于前苏联,又可以有效保护前苏联的受中共控制的一道理想的防波堤。即使中共不能完全占据东北,引进大量中共武装,并建立起相应的根据地,也足以对美蒋在东北的地位形成严重牵制,避免东北成为反苏的跳板或桥头堡。

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在确保前苏联外交利益的情况下实现,对前苏联才是有利的。如果因为苏军公开援助中共,违反了自己在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中的外交承诺,造成美英推翻雅尔塔协定,其后果就远不止是一个中国东北问题,势将影响到前苏联通过雅尔塔会议得到的许多利益,甚至引发苏美两军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正因为如此,莫斯科的态度马上就发生了一个180度的改变。

苏军代表很快就通知中共东北局:凡长春路及沿线城市的中共军队必须立即全部撤出,凡有苏军之处,均不许有中共军队存在。结果,中共中央

也不得不改变了刚刚确定了的夺取全东北的战略方针。它明白告诉东北局:现在方针必须顾及前苏联国际信用,因为“这是一个严重的世界斗争”。据此,中共中央放弃了独霸东北的计划,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新方针,主张部队多占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准备背靠前苏联、外蒙和朝鲜,长期坚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从上面的情况中不难看出,随着苏美关系的渐趋恶化和前苏联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的态度反复,中共中央推进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也在随之发生着相应的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由于苏美关系变动而造成的莫斯科对国民党的严重不信任,给中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强大的实力支持(使中共得以不战而得到东北的相当部分地区)和重要的军事援助(使中共获得了渴望已久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大量现代化武器装备和充足的弹药)。

1945 年 11 月 17 日蒋介石下令东北行营撤离,他在给杜鲁门的电报中特别强调了苏军公然支援中共军队进入东北的严重情况,并且声称:“当前之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之领土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之重大威胁”。

魏德迈对这种情况也有着更加清楚的说明与估计。他报告称:目前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十分强大,它们威胁着所有的交通线,而前苏联明确表现出要在华北和东北造成对中共有利的形势,为此它正在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设置层层障碍。事实上,中国已经变成“美苏这两个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竞技场”,“美苏在华北和东北争夺实力地位的斗争已经展开”。如果中共在这场斗争中取胜,中国就将变成前苏联的傀儡,前苏联就会在实际上控制亚洲大陆。

但是,魏德迈同时告诫美国政府称:如果美国直接干涉国共冲突,就有可能卷入同前苏联的战争,势必要动用大量的美国军队,而这无论从美国国内民众的愿望来看,还是从美苏关系的全局来看,事实上又是办不到的。因此,他的结论是,除非蒋介石与前苏联和中共达成协议,否则他不仅不可能得到东北,就连控制华北也难。

显然,美国政府并非不了解前苏联已经在支持中共。但是,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国会,即使是其中最激烈的反苏反共分子,也没有人主张像英国在希腊那样,直接派军队投入到打击中共的军事行动中去。

为什么?据邹谠的分析,原因有三:“第一,对中共的性质与意图的估计错误;第二,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及它顽固拒绝美国劝告的态度;以及第三,美国对欧洲共产主义势力日益发展所感到的焦虑与美苏之间日益剧烈的争吵。”

但是，邹谠这里所谈到的第一个因素这个时候其实已不复存在，因为大多数美国外交官和政治家都已看出，中共已经与前苏联走到一起去了，不管其性质或意图如何，两者结合的结果不可能对美蒋有利。

邹谠这里所谈到的第二个因素也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因为这时英国支持的希腊政府，以及此后美国支持的某些反共政府，情况未必比国民党政府好多少，它们不是照样为之出兵？

说到底，邹谠这里所谈到的第三个因素才最重要的。这就是，美国这时更关心的是欧洲，美苏之间日益剧烈的争吵，涉及与美国利益攸关的问题也主要集中在欧洲和中近东，中国远在其次。因此，如果美国直接干涉国共冲突，有可能要卷入对前苏联的战争，那对美国来说是划不来的。何况美国是个不得不注重民意的国家，二战后的美国民意是渴望和平，美国的政客们都极力在要求政府裁军问题上做文章，以争取选民的好感。这也不能不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

因为不能采取军事的方式阻止前苏联通过中共在中国进行扩张，又始终幻想可以继续影响中国的政局，保持自己在中国的地位，牵制前苏联，结果就出现了马歇尔出使中国积极调处国共冲突这样一种局面。但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的调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要失败的。因为，马歇尔根本没有打算，也不可能解决前苏联最关心的问题，即美国独占日本后前苏联所感受到的安全威胁问题。

不仅如此，就在马歇尔使华的几乎同时，前苏联为了能够既不违背其外交承诺，又能有效地阻止美国插足东北，别出心裁地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中苏在中国东北实行全面经济合作的建议。

对于前苏联方面的这一要求，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暗中抵制，有意在谈判开始之前先把谈判代表张嘉敖派到华盛顿去走一圈，征询美国政府的意见。美国政府也是有意从中作梗，声称："美苏间绝无满洲为苏俄势力范围之默契"，坚持"美国继续主张满洲门户开放"，表明了必欲插足东北的决心。当谈判开始后，美国不仅正式向两国政府发出照会，扬言"中苏政府就满洲的工业进行谈判"违反了门户开放原则，歧视了美国人，而且与英国一起公开了雅尔塔秘密协定，致使前苏联遭到中国民众和舆论的强烈抨击，把东北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努力严重受挫。

斯大林这时的态度已经非常明了，那就是逼着国民政府摊牌："你们要么和我们一起，要么就反对我们"，在美苏之间必须做出选择。而要倒向前苏联，仅仅不许美国人沾指东北还不够，还不能让美军驻在中国。他明确告

诉这时到莫斯科去的蒋经国:“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斯大林这话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即苏军此前之所以联合中共阻挠国民党接收东北,就是因为国民政府把美国兵引到中国来了。只要驻华美军不走,前苏联就不会轻易把东北交给国民党。想不到,国民党痴迷不误,跟定了美国,这自然也就使前苏联很快就彻底破灭了与国民政府在东北合作的希望。

马歇尔使华的头两个月,正值前苏联寄希望予与国民党谈判东北经济合作问题的过程中。因此,前苏联政府虽拒绝参加调处,对马歇尔使命倒也没有表现出反感。美英苏三国 1945 年 12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外长会议,反而比 9 月在伦敦召开的五国外长会议显得气氛融洽,会议公报中美国甚至和前苏联一起承诺不干涉中国内政,双方都要尽早从中国撤军。

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利用美苏这种暂时的并且是表面的“合作”,左右开弓,一时间也成功地促使国共两党互相有所妥协,达成了一纸停火令和几个政协文件。但从 2 月份美苏因中苏经济合作谈判引发一系列冲突之后,美苏间敌对气氛明显加剧,国共妥协的趋势自然也不可能持续下去。

2 月间美苏关系恶化的最典型的反映,是美国驻前苏联代办乔治·凯南力主全面遏制前苏联的著名长电,和苏军再度鼓动中共在东北抵抗国民党。凯南 22 日的这封电报对华盛顿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以至成为一年后美国对苏冷战政策的基本依据。

凯南在电报中断言,前苏联领导人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他们绝不相信前苏联能够与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和平共处。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从前苏联正在遭到资本主义包围这一观点出发的。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一切方法,包括参与国际活动和暗地里搞颠覆与离间,来削弱西方和加强自己。美国政府和人民绝不应再对前苏联抱有任何幻想,应对前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同时坚定自己对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信仰,并用以指导世界各国人民,不使共产主义有可乘之机。

就在凯南发出这封电报的当天,苏军代表再度找到中共东北局,一面说明苏军主要负责人希望与东北局负责人见面,一面传达莫斯科的意见说:苏方正全力争取在除大连、旅顺外的整个东北插足,与国民政府谈判经济合作,就是为了迫使其承认苏方在东北的地位。但苏方努力必遭美蒋阻挠,为此中共应在政治上保持强硬态度,在军事上加强进攻,予以配合。中共在武器方面有任何要求,苏军都将尽可能给予满足。有关细节及组建炮兵、坦克

部队和设立训练基地的问题,可做进一步研究和磋商。

在第二天双方负责人的会见当中,苏方更进一步表示:过去苏军因顾虑与美国冲突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态度较软,如今态度已变。苏方不论与国民党的谈判成功与否,支持中共确立在东北的主人地位的目标将不会改变。因为国民党借英美公开雅尔塔秘密协定煽动反苏运动,美国假门户开放之名必欲深入东北,已显示美蒋决心取消前苏联在东北的经济优势地位。因此,苏方建议中共再迅速增调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来,准备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主人地位。

美苏之间的冲突在 1946 年 2 月以后已日趋白热化。两国在成立朝鲜临时政府问题上这时也开始发生争吵。在中近东,双方更是剑拔弩张。在土耳其,因为怀疑前苏联可能对土动武,美国竟采取了强硬的炮舰政策,派出战列舰密苏里号开抵土耳其以访问为名炫耀武力。在伊朗,美英逼前苏联撤军,前苏联心有未甘,坚持要成立由前苏联控股的苏伊石油公司,并策动阿塞拜疆分离主义势力制造事端,但美英态度强硬,前苏联极感被动。

美苏关系的全面恶化,十分明显地促使国共两党的态度都迅速强硬起来。2 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对军队国家化方案实际采取抵制态度。国民党也很快撕毁了政协决议,蒋介石甚至还乘机公开煽风点火,告诉美国记者说,美国应当对前苏联采取强硬态度。面对这种情况,前苏联终于开始不顾外交条约,还美蒋以颜色。

3 月 8 日,苏军首先撤出抚顺、吉林,并通知中共东北局,沈阳一周内也将撤退,沈阳以南地区一概不向国民政府办交代,中共军队可以自由行动。但苏方行动似乎并未引起美蒋的恐慌,蒋介石由于已经有 5 个多军开入东北,因此态度倨傲,十分强硬,根本否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不承认东北有同关内一样的停战问题。为此,东北局与中共中央和重庆代表团意见发生分歧。东北局力主夺取全部苏撤区,不怕与国民党大打;负责与马歇尔谈判的周恩来等强调长春路及其沿线存在接收问题,主张让出以实现停战;毛泽东意识到东北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愿意和平,但只同意将已占领的部分苏撤区让给国民党。

苏方明显对中共方面的这种态度不满,苏军领导人在会见高岗时特别问:你们为什么答应让国民党开 5 个军到东北来?听说你们中央对美国人很客气,为什么?据此,毛泽东考虑再三,终于决定按照苏军愿望,争取控制自四平、本溪以北的大半个东北。他因此提出:“我党方针是全力控制长(春)哈(尔滨)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

4月初，苏方代表接连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将于15日和25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请中共军队立即前进至三市近郊待机，并入市侦察，以便届时就近占领。苏方代表并且说明，美国利用国民党接管东北来反苏，蒋介石利用美国来反苏反共，前苏联目前因谈判不成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但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而为了帮助中共作战，苏军还进一步向东北局转交了大量日军武器弹药，仅轻重机枪就在万挺以上，各种炮也有上千门之多。

根据苏军的建议和中共中央的决定，东北局开始在东北作出全面部署，拦截国民党军北上的阻击战迅速在四平和本溪打响。14日苏军撤出长春，中共军队立即对城内国民党军发动了大举进攻，并第一次使用了包括坦克和大炮在内的重型武器。19日，得知部队完全占领长春后，毛泽东十分兴奋，指示东北局要“做长期保持计划”，要准备以长春做我们的首都，首先成立东北自治政府。

1946年4—5月间，国共之间在东北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防战。尽管毛泽东再三强调的“不惜重大伤亡”、“不惜任何牺牲”的四平守卫战历时一月有余，最终未能阻止住国民党军的推进，但苏方对此次作战评价甚高。在长春得而复失后，前苏联政府为阻止国民政府进一步以武力向北满推进，甚至通过其驻华外交官非正式地向美国驻华外交官发出警告，扬言前苏联对中国问题始终采取不干涉政策，但是，如果美国继续鼓励国民党实行这种对前苏联带有进攻性的政策，前苏联将不能坐视不管。此举不能不引起美国方面的高度警惕。马歇尔随后极力压蒋停止向北满追击，与此不无关系。

但是，时至于此，不论是美苏之间的冲突，还是国共之间的战争，都已经不可能停下来了。苏方明确支持毛泽东在关内实施“报复作战”，并陆续通过东北局向关内华北华中各主要根据地秘密输送武器弹药，已知5—6月就从东北运送三批军火前往山东。7月间仅一次提供的可供转运山东的军火就有100多车皮。中国的内战已经名副其实地全面爆发了。蒋介石顿时捉襟见肘，在东北被迫转入了守势。极大地决定着此后中国革命命运的中共东北根据地由此得以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就在中国内战全面打响之际，美苏还在中近东进行着激烈的较量。欧洲的战略地位，中近东的石油，所有这些都更直接地牵动着美国政府的神经。美国国务院开始全盘接受凯南的“遏制”理论，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秘密拟定了“对于一旦爆发对苏战争的计划”。

问题是以双方力量对比的情况，苏军兵力上在欧洲明显占据绝对优势，在远东更是大大强于美英。军方估计，届时美国在远东只能不惜一切代价来保住日本。这种情况进一步决定了美国介入中国内战的可能性只能是极其有限的，从而也就注定了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在与充满活力的共产党人的战争中只能日渐陷于被动。当然，这种情况出现得越多，就越是容易感觉到前苏联威胁之可怕，美国政府和国会领导人所共有的那根意识形态的神经就会绷得越紧。美国全面对抗和遏制前苏联的政策的出台，自然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思考题：

1. 美苏冷战的起源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2. 美国对苏政策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3. 前苏联在战争期间及其战后向外扩张的原因？
4. 美苏冲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革命？

参考书目：

1. Joseph Smith, *The Cold War*, Second Edition, 1945—1991,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1998.
2. John L.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 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
4.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

第二章
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冷战在亚洲的兴起
(1950—1953年)

沈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

第一节　中苏结盟的背景及谈判结果

战后前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有三个层次,即和平共处—世界革命—国家安全利益,在这个三维结构中,前苏联国家安全利益始终处于最高地位。在处理战后国际关系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斯大林或者把维护和平共处作为调整对外政策的标尺,或者把鼓动世界革命作为发起外交攻势的目标。但这些都是暂时的和易变的,其根本目的还是保障前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切都要服从前苏联对外政策的这一终极目标。从这一基点出发,在战后的几年当中,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从维持大国合作同时进行有限扩张的政策,逐步发展到实行东西方两大集团对抗的政策。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是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特别是在欧洲和远东,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前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

同时,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确定或调整的地区,例如近东的土耳其和伊朗,前苏联有意推行一种有限扩张的对外政策。不过,斯大林在近东的做法虽然有扩大前苏联在近东势力范围的动机,但他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与西方合作的基本政策。所以,面对美英的强硬态度,前苏联采取了退却和调和的方针。前苏联从伊朗的撤军,与它从中国东北和北朝鲜的撤军一样,表明斯大林的扩张企图是有限的——他仍然希望避免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发生直接的对立和冲突。

真正促使前苏联战后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是1947年上半年发生的两个事件:一是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被排挤出联合政府;二是美国提出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

在莫斯科看来,一方面,法、意共产党这两个在欧洲最有影响的共产主

义组织不再参与执政，标志着斯大林在战后推行的“联合政府”政策的破产，而莫斯科事前对此毫不知情，则表明前苏联正在失去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另一方面，马歇尔计划的目标显然是要通过经济活动在欧洲建立起一个反苏集团，而且最不能容忍的是美国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把东欧国家纳入西方势力的影响之下，并以援助德国西占区的方式重新武装起一个俄国的宿敌。因此，斯大林决定全面调整其外交政策，对西方和美国采取对抗性方针。为此，他很快建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并公开提出了世界上存在着两大阵营的理论。

依据这样一套理论观点，莫斯科再次打出世界革命的旗帜，强调凡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和国家，就应该加入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凡不服从莫斯科号令的人，则被视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和敌人，受到共产党国际组织的集体讨伐和围攻。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开除出情报局就是这种理论观点在实践上的必然结果。南斯拉夫的例子无疑对各国共产党都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1948 年 6 月至 1949 年 5 月，前苏联与西方之间出现了自冷战格局形成以来的第一次正面冲突——柏林危机。其结果，开始时极力试图通过封锁西柏林的办法迫使西方国家妥协的前苏联，反而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硬立场面前退缩了。斯大林显然没有估计到美国政府会从实力政策出发，针锋相对地通过大规模空运的办法，坚决不放弃对西柏林的占领和控制。显然，这一番较量使斯大林对在欧洲与美国公开对抗，不能不采取更加小心谨慎的做法。他转而把注意力放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极力帮助中国共产党，与此不无关系。

从 1948 年开始，莫斯科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明显地变得比过去更积极了。到 1949 年初，随着中共取得半壁江山，斯大林特意派米高扬（A. I. Mikoyan）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对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作秘密访问，以便就近考察毛泽东及其他中共最高领导人。

1949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8 日，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和深入谈话。斯大林了解到：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已经势在必行；新中国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逐步走向社会主义；中共感谢前苏联的援助，并愿意接受苏共的领导。斯大林非常重视这次访问，米高扬在西柏坡期间，苏共中央政治局每天都开会研究和讨论米高扬的电报。会谈结束后，斯大林要求米高扬尽快赶回莫斯科，详细汇报各种情况。米高扬走后，毛泽东更加明确了中共必须向前苏联靠拢的方针，并且多次在党内指出这一点。中共的亲苏立场

使斯大林感到欣慰,吸引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条件看来已经成熟。

米高扬在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当中,谈到了建立中央政府和与前苏联等国缔结条约等问题。这说明,前苏联已经做好了正式与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发生外交关系的准备。斯大林通过米高扬告诉毛泽东,对于中国人极为关心的前苏联在中国东北保留军事基地的问题,"前苏联政府作过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继而美军撤出日本,它就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并把军队撤出旅顺口。但是,如果中共中央认为前苏联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为好,那么前苏联就准备实现中共的这个愿望。"

旅顺口、中长路和外蒙古这些前苏联通过1945年中苏条约取得的权益,显而易见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之间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前苏联为什么一定要在中国取得这样一些特殊权益呢?这是因为,前苏联自建国以来,长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下,斯大林为确保前苏联自身的安全,一直竭力构建一个由前苏联的势力范围或亲苏国家所组成环前苏联的缓冲地带。为了这一目的,前苏联在战前就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强占了芬兰的卡累利阿地峡,与德国瓜分了波兰的东部领土。战后又将整个东欧纳入了前苏联的势力范围。而关系着前苏联东部地区安全的最主要的国家,就是中国。

中国与俄国长期以来就存在着领土纠纷和争端,总体上看,是势力强大的俄罗斯帝国不断蚕食中国的领土。俄国革命成功以后,前苏联政府虽然几次提到要废除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但始终没有完全实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苏之间的边境线长达6000—7000公里,其东西两段均有漫长的尚未确定的国界,中段的外蒙古长期处于前苏联势力控制之下,并在前苏联的怂恿下表现出某种独立的倾向。于是,中苏之间的地缘利益冲突就表现在新疆、蒙古和东北这三个问题上。

前苏联先在1944年11月支持、援助并直接参与了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尔泰地区的少数民族暴动,从而很快就控制了新疆北部地区;后在1945年2月以出兵参加对日作战为由,促使美英两国领导人在雅尔塔以三方协定的形式,承认将日俄战争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益归还给前苏联,并保持外蒙古的现状(即独立地位)。

依据雅尔塔协定,在1945年6—8月前苏联与中国国民政府的谈判中,斯大林以放弃对新疆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并促其和谈,以及在中国只承认蒋介石政府、不支持中共为条件,迫使国民党人接受了前苏联的要求:承认外蒙古独立,与前苏联共同占有和经营中国长春铁路,将旅顺港租借给前苏联

作为海军基地，将大连开放为国际港口，其行政官员由苏方任命等等。

前苏联从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谈判中获得的这一系列特殊权益，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还在1949年2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6—8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期间，中国领导人对外蒙古回归问题进行了试探，苏方表示前苏联不支持内蒙古并入外蒙古。在东北的权益问题上，斯大林也承认1945年中苏协定中有关中东铁路和大连旅顺港的规定是不平等的，应当废除，并表示愿意立即将旅顺港归还中国。但是，对于中共中央希望废除旧约，重订新约的提议，因为顾虑到雅尔塔协定的法律效力问题，斯大林始终犹豫不决。

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保障前苏联东线的安全，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前苏联的东方集团。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安全利益，以及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考虑，显然也要求与前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与毛泽东有着目标一致的共同愿望。然而，如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双方的利益冲突——实现这一愿望，中苏之间却有不同的设想。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名义上是为斯大林祝寿，实际目的主要是想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在12月16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双方的意见分歧便显露出来。当毛泽东提出可否订立一个新的条约时，斯大林着重解释了前苏联方面的困难，即中苏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的，而雅尔塔协定是保障前苏联合法地取得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唯一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如果废除中苏条约，很可能会给本来就心怀鬼胎的美英两国政府提供口实，拒绝承认雅尔塔协定的效力，结果就会使前苏联失去依法保障该两岛归属的权利。因此最好在形式上保留，“暂时不改动任何条款”，但实际上前苏联可以从旅顺撤兵。

毛泽东对不能另订新约自然不会满意。在12月24日的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又委婉地拒绝让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前来莫斯科签订贸易通商条约，这无疑让毛泽东深感不满和失望。毛泽东因此拒绝了一切公开活动，最终迫使斯大林在1950年1月1日下决心作出了让步。

斯大林让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显然还是因为他非常清楚，前苏联在东方不能没有新中国这个盟友。既然如此，深具战略头脑的斯大林，自然不会死死抓住前苏联在旅顺港和中长路的那些具体权益。

从前苏联方面最初提出的各项协定草案看，由前苏联各部门设想的方

案几乎都是对前苏联有利的。关于中长铁路问题，与 1945 年的协定相比，不仅保留了原来的 30 年有效期，而且在资产确定、免征海关税和货运税、缴纳铁路营业税等方面的规定都更有利于保障前苏联的利益了，唯一的让步，就是同意领导职务可以采取轮换制。关于旅顺口和大连问题，除规定前苏联驻军应从 1950 年开始撤退，并在条约生效后 2—3 年内撤退完毕外，其余则一切照旧，要等到对日和约签订后再行审议。

但是，当中方提出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的草案之后，斯大林很快就下令做出了让步。苏方最终接受了中方提出的一旦对日和约签字，苏军就将撤出旅顺口，而若"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三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则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的条款（不包括移交财产）；也接受了大连的行政完全隶属中国管辖且立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大连（不包括旅顺口）的一切财产的条款；还接受了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或不迟于 1952 年末无偿地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的权利及全部财产的条款。

2 月 14 日，斯大林和毛泽东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中苏条约签字仪式。至此，中苏结盟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均已化解。中国加入了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前苏联在亚洲的安全和战略利益得到了保证，而中共政权也取得前苏联的保护和帮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中苏同盟的确立，代表着冷战从欧洲向亚洲的扩展。理由很简单，如果说在 1947—1948 年，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集团对抗为标志的冷战，仅仅表现为美苏在欧洲的政治和军事对峙，那么此时，由于中国加入了前苏联集团，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一片，美苏两大集团在东方的缓冲地带已不复存在，冲突的前线已经推至太平洋的亚洲大陆沿岸。

第二节　朝鲜战争的爆发与美国的大举介入

战后初期，前苏联与美国在远东地区既有矛盾，又需合作，既要划分势力范围，又要避免直接冲突，朝鲜半岛上三八线的确定就是这一状况的反映。战后前苏联在朝鲜的目标最初是试图通过托管或其他方式，与美国合作在朝鲜建立一个与前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的朝鲜政府。与美国矛盾日渐加剧后，则转为加强朝鲜北方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的统一政府实行对苏友好的政策。在朝鲜南北双方先后分别实行选举，并建立单独政府后，前苏联又提

出美苏同时从朝鲜半岛撤军,而且首先实行了单方面撤军,以压迫美国撤军,以便使美苏军队脱离接触,并促成朝鲜半岛上的力量均衡。

然而,自从三八线划定以后,南北朝鲜就一直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特别是朝鲜南北双方各自成立了单独的政权机构以后,这里的局势便更趋紧张,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断发生。1949 年的朝鲜半岛,北南双方的军事力量都还相当薄弱,而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看来,北方的军力甚至可能还要差一些。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不仅不赞成北方对南方发动进攻,而且担心南方会进攻北方。出于支持朝鲜人民军的考虑,中共中央决定把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由朝鲜人和朝鲜族人组成的三个师,转交给北朝鲜,编入人民军,以加强其军事力量。

朝鲜战争从一场内战迅速演变为震撼世界的国际性战争,其直接原因就是美国的大举介入。美国军方一向认为朝鲜半岛在军事上没有太多战略价值,因此也没有将其列入美国在太平洋的弧形防御线之内。那么,美国为什么会卷入这场它本不该也不愿参与的战争呢?本来,在 1950 年 1 月初,美国总统已经宣布美国不会干预在台湾地区发生的军事冲突;美国国务卿随后也表示,台湾和朝鲜半岛不在美国的防御范围之内。然而,随着 2 月 14 日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美国对台湾和远东的政策便开始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中国内战爆发以来,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对华政策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溃败之后,这种矛盾更加尖锐地反映在台湾问题上。以艾奇逊(D. Acheson)为首的美国国务院主张放弃蒋介石,从中国的纷乱中脱身出来,同时保留与中共新政权打交道的回旋余地。军界首脑和共和党则主张采取强硬的援蒋方针,甚至不惜使用军事力量保护台湾,以建立亚洲的反共基地。

早在 1948 年 11 月,国务院就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台湾在美国安全中的战略地位作出估计,同时,也征询了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D. MacArthur)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大致相同,都认为台湾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不让共产党统治台湾,从而保证其留在对美国友好的政府手中,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麦克阿瑟还进一步分析到,如果前苏联利用了台湾,就会把美国在远东的整个防线打断。关于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国务院与军方的看法是一致的,1949 年 1 月由国务院起草并经杜鲁门(H. Truman)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37/1 号文件认为,美国的基本目标是不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落

入共产党手中。

新中国成立以后,问题的焦点转变为:为了美国的战略安全利益,是否应该重新介入中国内战,支持和援助蒋介石政权。军方的意见是通过有限的军事援助使蒋介石政权再拖一个时期,看情况发展而定。而国务院的主张却是要为完全放弃台湾作准备,但其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中国的新政权不致完全倒入前苏联的怀抱。

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美国国务院和军方发生了激烈争论。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从军事角度看,国民党在台湾的地位比过去稳固,因此只需要相对低廉的费用,台湾便可以支撑下去。因此,美国应该增加给台湾的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驻台,从而控制台湾。国务院强烈反对这些意见,认为增加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只会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情绪。确保中国不受前苏联支配是美国"在华的一项重要资产",美国不应"以自己代替前苏联作为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尽管中国共产党人现在把前苏联当作唯一的盟友,但美国的政策应建立在长远目标的基础上。

杜鲁门总统支持了国务院的意见。12 月 30 日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48/2 号文件规定:"美国应当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和前苏联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至于台湾,其"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随后,为了稳定国会和舆论,杜鲁门和艾奇逊分别发表了声明和演讲,公开将台湾排除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外。

然而,2 月 14 日中苏同盟条约签订的消息以及随后美国国内掀起的麦卡锡主义的风潮,使得国务院的对台政策受到越来越猛烈的攻击。在国防部里,从 4 月至 6 月,不断有人提出各种意见书,主张推翻杜鲁门 1 月 5 日声明的政策,尽一切力量"保住"台湾。理由是情况有了新的变化:前苏联已经完全接管了共产党中国。所提出的建议包括,向台湾增派军事顾问,用"援华法案"的余款为台湾购置舰只和军火,派遣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向台湾提供充分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使日本、菲律宾或者加上越南与这个"台湾民主政府"缔结安全条约,训练反共游击队并派遣到中国大陆活动等等。甚至在国务院内部,杜勒斯(J.F. Dulles)和腊斯克(D. Rusk)也对艾奇逊的主张提出挑战。与此同时,艾奇逊还受到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指责,国务院实行的对华政策被认为是"失去中国"的主要原因。

6 月 14 日麦克阿瑟起草了一份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绝密备忘录,即

“保台意见书”,并于6月24日交给了到东京访问的国防部长约翰逊(A. Johnson)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O. N. Bradley)。这份文件使用“不沉的航空母舰”这样的比喻,强调并重申了台湾一旦落入共产党手中对美国远东战线造成的威胁。麦克阿瑟极力主张美国应主动采取措施防止台湾被共产主义政权所统治。当约翰逊和布雷德利返回华盛顿时,正赶上朝鲜战争爆发。麦克阿瑟的“保台意见书”产生了效果。军方甚至怀疑“在朝鲜的进攻可能是一次佯动,目的是转移我们对共产党急迫进攻台湾这一事实的注意力”。于是,美国不仅决定干预朝鲜战争,而且决定派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

美国政府在朝鲜爆发战争后迅速做出全面介入的决定,虽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其背后却存在着美国卷入战争的政策和理念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世界冷战格局的出现,特别是由于中国加入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导致的冷战在远东的出现。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在台湾海峡,还是在朝鲜半岛,社会主义阵营发动的任何一次进攻,都会被看作是向西方世界全面开战的序幕,是多米诺骨牌游戏中倒下的第一张牌。况且,在1949年“丢失”中国之后,要不要援助韩国,已经成为美国能不能决心保卫西方世界的一个重要的象征了。

美国的参战以及随后联合国军的组成,使朝鲜战局在7月中旬便陷入了僵局。这时,在美国国务院就有人提出三八线决非政治分界线,美国的目标应当是统一朝鲜。不过,也有激烈的反对意见。两种观点争执的结果,使问题归结到前苏联或中共进行干涉的可能性上。9月11日,杜鲁门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号文件:“对朝鲜行动方针的报告”。这份文件实际上为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军事行动确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一,如果中国或前苏联军队介入战争,美国军队就应防守在三八线一带;第二,越过三八线的问题应与盟国协商,并以实现朝鲜的统一和独立为政治基础。

9月15日,麦克阿瑟力排众议而实施的“烙铁行动”计划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一举成功,朝鲜人民军的主力被隔断在汉江以南,很快就惨遭覆没。辉煌的军事胜利使麦克阿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忘乎所以,甚至总统和国会也沉浸在欢乐和轻松的气氛中。这时,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号文件限定的两个越过三八线的条件,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了。麦克阿瑟因仁川登陆成功而获得的声誉和威望,又反过来加重了他在政府决策时发言的分量,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阿瑟对于立即实现朝鲜统一的主张,使白宫和五角大楼都感到美军越过三八线是势在必行和理所应当的。

10月7日，麦克阿瑟下令联合国军队大举向三八线以北挺进。两天以后，经杜鲁门批准，五角大楼向麦克阿瑟发出命令：即使中共军队不宣而战，美军只要有把握取得军事胜利，就可以“继续行动”，但对中国境内的目标进行任何军事活动，都必须事先得到华盛顿的准许。至此，朝鲜战争由于美国战略目标的改变而再次升级——白宫和五角大楼都没有想到，美军越过三八线的举动，把中国逼到了非出兵朝鲜不可的地步。

第三节　中国被迫出兵朝鲜作战

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断了毛泽东统一中国的最后一步军事行动，但客观上也为中国参与朝鲜战争提供了前提和条件。一方面，美国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并派军队侵占这一地区，其结果无疑激发了中国人反美、仇美的民族情绪，为中共介入朝鲜半岛与美国作战提供了重要的口实；另一方面，集结在东南沿海准备渡海作战的几十万中国军队，因进攻台湾的任务取消而有可能调往东北，参加陆地上对美国的作战。

6月底，中央军委通知解放台湾的战役暂不进行。7月2日，周恩来会见前苏联大使罗申(N. Roshchin)时通报了中国对朝鲜战局的估计，认为美国可能向朝鲜增兵，并在南方一些港口登陆。建议人民军加速南进，占领这些港口，尤其是应在仁川地区组织强大的防御，防止美军陆战队在此登陆。周恩来一方面抱怨朝鲜领导人无视毛泽东屡次提出的美国将进行军事干涉的警告，一方面又强调，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会派出志愿军对抗美军。他希望前苏联能够为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

斯大林支持并鼓励中国在东北集结军队和准备入朝作战的想法，甚至表示前苏联将“尽最大努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朝鲜领导人由于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并不欢迎中国对此进行干预。然而，战事的拖延使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感到局势不利。因此，一方面几番告诫朝鲜要警惕美军侧后登陆，一方面积极进行出兵援朝的准备。8月11日，毛泽东指示集中在东北的第13兵团召开所属各军、师干部会议，进行战争动员。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在会上充分阐述了准备出国作战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必须主动地、积极地援助朝鲜人民，以志愿军的名义装扮成朝鲜人民军出兵，限期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9月15日，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一举成功，朝鲜局势立即发生了严重变化，中国领导人感到派兵赴朝参战已经不可避免。9月18日，周恩来会

见了前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抱怨对朝鲜的军事形势了解很少，并建议朝鲜应将主力北撤，同时利用西方对中国和前苏联参战的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9月21日，刘少奇再次向罗申表示，中国军队士气高昂，如果需要，他们愿意，也有信心打败美军。

9月28日，由于人民军主力被围歼的结果已经注定，联合国军眼看就要越过三八线，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求援问题。政治局一致认为，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人民军的残余部队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整个北朝鲜必将陷落。因此，会议迅速通过了要求前苏联和中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的决定，以及给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两封正式的求援信。10月1日凌晨，斯大林回电明确表示，前苏联无法提供直接的援助，最好的办法是请中国派出志愿部队。金日成当天深夜紧急召见中国大使，要求中国部队尽快过江，支援朝鲜作战。同时，派内务相朴一禹(Pak Il－u)携他的亲笔信赶往北京求援。

还在金日成的求援要求送达北京的前一天，斯大林已经致电毛泽东，建议中国“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到三八线，以便让我们的朝鲜同志有机会在你们的部队的掩护下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10月2日凌晨，毛泽东起草了给斯大林的回电，同意立即出兵朝鲜作战。但在当天下午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多数领导人对出兵持谨慎态度，认为没有必胜的把握，对中国正进行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影响太大。鉴于绝大多数中央领导人持反对态度，毛泽东不得不收回他的意见，并连夜约见前苏联大使，将中共中央讨论后的意见通知了他，说明中共中央许多同志认为目前出兵朝鲜的时机还不成熟，应慎重从事。中共中央还将开会讨论此事，并准备派人与斯大林当面商谈。

5日，斯大林再次来电，陈述中国立即出兵的利害关系。在当天下午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从西安赶回北京的彭德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力主派兵入朝作战。会议最后决定，以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立即组成志愿军部队，准备开赴朝鲜作战，同时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前苏联商谈解决武器装备和空军掩护等问题。

由于前苏联始终不愿意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因此，在涉及空中掩护等问题时，苏方再三强调前苏联空军马上出动存在困难，这使得周恩来与斯大林的交涉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中国出兵朝鲜的计划也因此发生波折。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不得不在13日电告金日成，通报了与周恩来和林彪会谈的情况，并建议金日成把他的残余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前苏联。

但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再度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没有前苏联空军掩护出兵的可能性问题。最终，会议"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同时希望前苏联空军尽快出动，无论如何不应迟于两个月，并要求以贷款方式得到前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

这时斯大林明确答复，前苏联飞机即使出动，也不会过鸭绿江协同中国步兵作战。经过再次紧急讨论后，中共中央在 10 月 18 日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无论有无前苏联空军的援助，志愿军均按原计划出动，进入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10 月 19 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部队从安东和辑安两地秘密地渡过了鸭绿江。6 天后，即 25 日，志愿军就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枪。

就初衷而言，中国既不愿朝鲜在这个时候爆发一场战争，更未曾想成为这场战争的主角。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出兵朝鲜作战是迫不得已的。但战争爆发后，在毛泽东的战略思考中，一是美国派兵侵入了台湾海峡，此举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的民族感情；二是中国的近邻和同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兄弟党陷入到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不能见死不救；三是美国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一旦美军占据了鸭绿江对岸，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东北乃至整个国家安全就将直接处于美国的威胁之下。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决心出兵抗美援朝又是必然的选择。

第四节　前苏联航空兵与中朝联军并肩作战

在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中，北京与莫斯科在前苏联出动空军问题上的一番讨论和争执，无疑是对刚刚形成的中苏同盟关系的一次严峻考验。然而，毛泽东毅然派出志愿军单独赴朝作战的决定，深深触动了斯大林。几年以后，毛泽东在接见前苏联驻华大使时说："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而斯大林对毛泽东表示信任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志愿军打响第一战役后，前苏联空军不仅立即投入了朝鲜的空战，而且很快就把作战半径从鸭绿江上空推进到清川江和大同江一线。

战争初期，美国空军动用了驻扎在远东地区的 44 个航空大队的 657 架作战飞机来对付北朝鲜。当时，朝鲜人民军空军只有 20 架性能落后的战斗机，在美国的密集空袭后，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时，中国空军的作战部队还没有真正组建起来。要想对抗美国的空中优

势，保护中朝联军的后方，就只有依靠前苏联空军。

根据中苏同盟条约，1950 年 4 月至 12 月，前苏联空军部队共有 13 个师先后进驻中国华北、华东、中南和东北地区，其中别洛夫（Belov）航空师是根据斯大林的提议于 8 月到达东北担负防空任务的。正是这支部队，率先参加了朝鲜的空战。1950 年 11 月 1 日，别洛夫航空师的米格-15 飞机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起飞，每个机场共起飞 8 个架次，投入了安东—新义州地区战斗，并击落了两架美国 F-82 飞机。此外，高射炮还击落了两架美国飞机。苏方没有损失飞机。

第一次空战胜利后不久，前苏联空军在驻守沈阳地区的两个歼击机师的基础上组建了第 64 独立歼击机航空军，仍由空军少将别洛夫指挥，以后是洛博夫（Lobov）继任。主要任务就是保护鸭绿江上的桥梁、发电站和大坝，以及在中朝边境以南 75 公里之内北朝鲜领土上的交通线和飞机场。同时，第 64 航空军也从沈阳和鞍山基地转场到中朝边境上的安东机场。仅在 11 月上半月，前苏联飞行员便取得了击落 23 架美国飞机的优秀战果。同时，斯大林决定分两批再为别洛夫增派 120 架米格-15 新式战斗机。

除了米格-15 飞机的性能可以同美国的 F-86 飞机相匹敌外，前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整体实力与美国远东空军相比，还差得很远。特别是随着中国军队向南推进，后方补给线不断延长，遭受美国空军轰炸和袭击的威胁也日益严重。显然，前苏联空军只在鸭绿江上空作战，远远无法保证中国军队物资和兵源的补给。为了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交通运输线，经与前苏联政府商定，自 1951 年 1 月 10 日起，由前苏联空军出动两个师，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运输线，以保证后勤供应。

战局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前苏联空军的作战半径继续向南扩展。在第三次战役时，中朝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而前苏联空军由于其基地在中国境内，受到飞行距离的限制，无法进一步南下，致使中朝联军在江界、安州一线以南地区的物资运输和部队调动，完全处于敌方空军的威胁之下。1951 年初，中朝联军刚刚进行补充休整，联合国便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对中朝军队后方战略目标的轰炸，使延长了几百公里的中朝联军后方供给线受到严重破坏，“兵员、弹药、粮食全无补充”。为此，中方明确要求前苏联出动两个空军师，转场至朝鲜境内，掩护三八线以北的交通线。

志愿军的要求经过毛泽东转报到斯大林那里后，斯大林当即表示：“如果您能够在安东地区留两个中国空军师掩护当地的电站和交通线的话，我们同意将别洛夫将军指挥的第 151 和第 324 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

鲜境内去，以便掩护中国和朝鲜的后方。如果朝鲜人已有一条钢板飞机跑道，我们可以从前苏联再提供两条钢板跑道。"斯大林还主动提出："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向您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并供应高射炮炮弹。"3 月 15 日，斯大林又要扎哈罗夫(Zakharov)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决定从前苏联再调拨一个大型歼击机师到安东去，以便两个原定掩护安东的中国歼击机师调往前线。这些情况充分显示，斯大林在使用前苏联空军掩护问题上的态度，比中国出兵前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变。

由于朝鲜境内机场的修建工作屡遭美国轰炸机的破坏，前苏联空军部队事实上未能进驻朝鲜。不过，随着中朝边境地区庙沟、大堡和大孤山三个新机场的建成，大批前苏联空军后续部队加入了掩护中朝联军后方的战斗，从而使第 64 航空军在机场或空中进行作战值班的歼击机数量从 2—3 个航空团增加到 4—5 个航空团。总的说来，到 1951 年春前苏联歼击机在朝鲜上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相当成效，完成了掩护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对中朝联军的运输线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

从 1950 年 11 月 1 日至 1951 年 12 月 6 日，前苏联空军共击落敌机 569 架(其中高射炮击落 59 架)，自己损失 63 架飞机。虽说由于飞行距离受限制，未能阻止住美国航空兵对朝鲜中部和东部地区机场和交通线的轰炸和袭击，但是在朝鲜西北部鸭绿江至清川江地区的上空已经成为"米格走廊"，以致美国空军不得不禁止在白天使用 B-29 战略轰炸机，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

第 64 航空军的另一项任务是帮助中朝联合空军，不仅为其训练飞行员，而且协助他们作战。中朝联合空军是在 1951 年秋天以后参加作战行动的。由于语言的障碍，中朝空军与前苏联空军并没有混合编队和联合作战。但双方在协调作战方针、统一使用兵力等问题上始终都是经过协商的。第 64 航空军的机组人员负责击退在 F-86 歼击机强大掩护下的大批轰炸机，而中朝联合空军的飞行员则负责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增援。他们的任务主要是与小股敌机进行战斗。前苏联歼击机还需要为中朝空军提供援助，在危急情况下，拦截追击中国和朝鲜驾驶员的 F-86 飞机。甚至当中朝联合空军在前线机场安东、庙沟、大堡、大孤山的飞机总数超过了第 64 航空军的米格飞机时，仍然需要前苏联飞行员来完成比较复杂的任务。如在 1952—1953 年冬天，复杂的气象条件使得飞行技术尚不熟练的中朝联合空军部队无法投入战斗，因此而加重了第 64 航空军的作战任务。1953 年前苏联空军战斗飞行的月平均数量与上一年比较增长了 33%。

当然，前苏联空军在朝鲜的参战仍旧是处于高度保密的一种行动。莫斯科为了不让前苏联飞行员被联合国军俘获，对前苏联飞行员的作战行动加以了种种限制。这些限制，在心理上和作战技术的发挥方面都给前苏联飞行员造成了障碍。在这些限制性的命令中，包括严禁任何飞机从前苏联领土起飞投入作战；前苏联飞机要消除一切自身的标志：有的要伪装成中国飞机，有的则要涂上朝鲜飞机的颜色；所有前苏联飞行员都要穿上中国的军服，并写下保证书，宣誓绝不泄露他们曾到过朝鲜作战的情况。甚至，前苏联飞行员还奉命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在空中通话时使用俄语。而为了不让前苏联飞行员击落被俘，还严格禁止前苏联飞机在联合国军控制区和靠近前线地区的上空飞行。在黄海上空作战时，则禁止米格飞机跨越平壤—元山一线往南追击敌机，即禁止跨越北纬 39 度线，虽然 1951 年前线已经稳定在三八线。

实际上，美国空军很早就知道他们真正的空中对手既不是朝鲜人，也不是中国人。美国飞行员不仅在空中看到了欧洲人的面孔，而且在无线电通话中听到了俄语。但是美国政府也同样不希望看到战争升级。因此，这一情况上报以后，美国决策机构对此始终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以免刺激舆论迫使政府采取报复行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默契，使前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被掩盖了 40 年之久。

很显然，前苏联空军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整个战争期间，先后有 12 个前苏联空军师投入了空战，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 7.2 万人，1952 年最多时达到两万五六千人。前苏联空军的歼击机总共击落了 1097 架敌机，高射炮兵总共击落了 212 架敌机。根据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统计数字，在朝鲜前苏联航空兵损失了 335 架飞机和 120 名飞行员。在这场战争中，前苏联军人的损失总计为 299 人。总之，前苏联空军不仅参与了朝鲜战争，而且在空战中成为中朝一方的主力军。谈到中苏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合作，如果说过去人们只知道前苏联曾提供武器装备援助的话，那么现在必须强调，前苏联空军直接参加战斗才是中苏军事同盟更重要的内容。

第五节　中苏同盟的经济基础与前苏联对华援助

从客观上讲，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后，进一步加强了新中国在经济上对前苏联的依赖性，前苏联也有义务为其盟友提供全面的经济援助。然而，中苏

条约谈判的过程及结果使得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心存芥蒂，他们之间的猜疑和不满必然形成中苏经济关系发展中的心理障碍。如果不是4个月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如果不是中国在前苏联最需要援手时出兵朝鲜，那么，前苏联履行各项经济协定的程度以及中苏经济关系的发展前景的确是难以预料的。所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对前苏联的依赖，以及前苏联对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回应，就构成了从1950—1953年中苏经济关系发展的前提，同时也决定了此期前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内容、形式及结果。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使中苏同盟出现了新局面。在整个战争期间，中苏不仅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配合默契，协调一致，而且经济关系也迅速发展起来。此期中苏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前苏联对华援助，其方式和途径包括援建重点项目、开办合股公司、提供技术资料、派遣前苏联专家、培养中国专家和协助编制经济计划等几个方面。

可以说，在恢复时期，中国现代工业基本建设的核心就是前苏联帮助援建的重点项目，即人们常提到的156项引进工程中的第一批50个项目。1950年2月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是前苏联政府答应帮助中国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撤销了1个项目，合并了2个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在这些项目中，能源工业项目21个，占44.7%，改建和扩建项目22个，占46.8%，充分说明这批援建工程带有为奠定工业基础和恢复经济建设的性质。

按中国国家统计局1953年3月11日的统计报告，1950—1953年中苏共签订技术成套设备进口合同68394万卢布，3年累计实际进口46974万卢布，完成合同68.7%。尽管这些重点项目完全建成投产尚待时日，但与恢复时期全部新增固定资产金额和生产能力数量比较，前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对于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以及未来工业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已经十分明显。比如，1950—1952年全国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59亿元，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实现新增：电力22.2万千瓦，煤炭开采1563.7万吨/年，生铁76.4万吨/年，钢锭55.8万吨/年，钢材33.6万吨/年。而前苏联援建的部分重点项目完全建成后将实现新增固定资产合计达41.39亿元，实现生产能力新增：电力87.55万千瓦，煤炭开采780万吨/年，生铁250万吨/年，钢锭320万吨/年，钢材250万吨/年。前苏联援建项目对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所起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156项工程的第二批项目是伴随中国经济发展一五计划的制定开始

的。1952 年 8—9 月，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前苏联政府商谈即将于 1953 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和中国工业化建设问题。原则确定之后，李富春等继续留下与苏方商谈前苏联援助的具体细节，历时 8 个月。前苏联政府在对周恩来交付的一五计划重点工业项目逐一进行了极为详细周密的研究后，同意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甚至增加了一些应该开办而中方没有考虑到的企业。双方最终确定，在 1953—1959 年内由前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 91 个企业。这样，到 1959 年中国的工业能力将超过现有生产能力一倍以上，不仅将有自己的汽车工业和拖拉机工业，钢铁、煤炭、电力和石油等主要工业产品将达到前苏联一五计划时的水平，接近或超过日本战前的水平。

在 50 年代初的中苏经济关系中，开办中苏合股公司是一件颇为引人注目的事情。过去很多人认为股份公司协定表现了前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似乎开办合股公司是前苏联强加给中国的。这种说法不公平，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中苏合股公司的问题是中方首先提出的。早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任弼时就提到了苏中经济联合体和租让企业的问题。毛泽东访苏时，刘少奇也来电说，负责西北地区工作的彭德怀要求中央人民政府与前苏联政府亦签订股份公司协定，“以便利用前苏联资本，开发新疆富源，发展新疆生产”。刘少奇认为，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合办这种企业，并建议毛泽东亲自向前苏联提出这一要求。

中苏股份公司主要是指 1950 年 3 月 27 日签订协定的中苏金属公司、中苏石油公司和中苏民航公司，以及 1951 年 7 月 28 日签订协定的中苏造船公司。根据协定，中苏双方股份各占 50%，公司领导职务也是双方按期轮换，股份公司赢利的 20%应作为税款交给中国政府，而前苏联有权出口的 50%产品还应向中国海关交纳关税。对比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中东铁路协定、中苏航空公司协定以及前苏联提出的中苏金属和石油公司的条款，在公司实际管理权和交纳关税等方面，有了很大改进。

从实际经营情况来说，前苏联人员在工作中确有大国意识和某种优越感表现出来，但在客观上，这些合股公司对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也确实起到了极大的带动作用。按企业资产计算，除中苏航空公司外的 3 家股份公司共有资产 4.4 亿卢布，合人民币约 5.86 亿元，而 1950—1952 年全国新增工业固定资产仅为 19.3 亿元，可见这几家股份公司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同时，从经济效益上讲，中苏合营企业也是比较突出的。除 4 个中苏股份公司外，建国初期旅大地区还有一些中苏合营企业。在 1950 年底国营工

业企业的整个发展中,中苏合营企业的效益最好,其平均产值为413.26亿元,大大超过了国营(162.75亿元)和公私合营(131.60亿元)企业。

对于中国经济建设必不可少的科学技术资料,前苏联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提供的,即图书资料交换和项目或设备进口合同。在1949年索非亚经互会第二次会议上,确定了经互会成员国之间无偿交换科学技术资料的原则。中国虽不是经互会成员国,但前苏联比照这一原则,以图书交换的方式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科技情报和文献。通过前苏联科学院图书馆、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社会科学基础图书馆与中国相应单位之间的交换,1950—1953年,前苏联总计提供了120842套(册)基础性科技情报材料、图书和杂志。涉及援建工程或中国特别要求的具体项目和设备的技术资料,是通过双方外贸进出口公司提供给中国的。对于前苏联提供的科学技术文件,中方实际上只需付移交材料的成本费和复印费,即使这点费用,也不是每每收齐。而1953年5月15日签订的中苏经济合作协定则第一次以独立条款的形式确定了无偿向中国提供技术文件的原则。从1950—1953年,前苏联根据中苏两国政府间科学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共2928套(件)。

新中国经济建设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缺乏科学技术人才。显然,派遣大量前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早在1948年夏,前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东北帮助修复铁路,1949年8月刘少奇访苏归国时,又带来200多名经济顾问和专家。大批前苏联专家来华,是在1950年的50项和1953年的91项援助项目协定签字之后。据考察,到1954年10月赫鲁晓夫来华签订新的援华协定以前,共有3000多名专家和顾问到中国来帮助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此外还有大约2000人的军事顾问和专家。

应该指出,前苏联在派遣专家的条件方面是颇为计较的,与赫鲁晓夫相比,斯大林更注重算经济账。中方除了要支付高额薪金外,还要给前苏联政府大量的补偿金,以至周恩来多次要求中国各企业尽量减少聘请专家的数量。尽管如此,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各部门、所有的重要企业、主要技术兵种的部队、重点大专院校,以至体育、卫生等部门,几乎都配备有前苏联顾问或专家。前苏联专家对于新中国政权的建设,经济的恢复,工业化基础的建立,乃至在中国大地上一度出现的从政治体制到经济体制的前苏联模式的形成,都起到过非同寻常的作用。

前苏联帮助培养中国专家主要是通过接受中国留学生学习和技术干部

实习两种途径。中苏两国于1951年12月6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前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践的条件的协定,1952年9月1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前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协定。在这两个协定中,前苏联都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在前苏联厂矿企业实习的中国技术人员,只需支付前苏联专家和教师的讲课费,以及少量的实习费,其数额仅为实习指导者工资的10%—20%。而对在前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除教科书费和公用事业费外,中国政府仅向前苏联政府支付50%的助学金。此外,前苏联还接待了大批来参观考察的中国各专业代表团,如1952年春,中国农业代表团一行200多人在前苏联各地考察了4个多月。

新中国的整个经济建设方针是以建立前苏联模式为目标的,其核心就是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形成以国有经济成分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第一次经济计划方案的制定,自然要寻求和依赖前苏联的帮助。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亲自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前苏联访问,并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文件的俄译本送交前苏联政府,请求指正。经过对中方计划的充分研究,1953年2月,前苏联组成以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Saburov)为首的代表团与中方代表进行会谈,分组研究中国的五年计划方案,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中国领导人很重视这些意见,认为苏方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所提的各项意见,都是很可贵而应该予以重视的,并要求正在莫斯科谈判的中方代表与前苏联进行各项磋商,进一步考虑和修改原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轮廓。

1953年5月18日,库兹涅佐夫(Kuznetsov)大使送来前苏联国家计委关于中国一五计划任务的正式意见书。在肯定恢复时期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意见书建议自1953年至1957年工业总产量年增长速度由20.4%改为14%—15%;大工业的发展必须和能大量生产民用必需品的手工业的发展配合起来;五年计划中必须特别注意农业问题,尤其要注意扩大技术作物的生产;在五年计划的任务中,必须制定有关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措施;五年计划中应有培养熟练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专门安排。第二天,中共中央讨论并通过了苏方的意见书。至此,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原则上确定下来。

总之,从1950年至1953年,中苏不仅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全面合作,在经济领域也是协调和互助的。前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构成了此期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至

于对前苏联援华政策的评估，应该指出，斯大林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既是慷慨的，又是有限的，既有效地帮助了中国的经济恢复，也遗留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此期前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确是有条件和有保留的。

第六节　结束战争：中国站在亚洲冷战的最前沿

毛泽东在未与美国开战之前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或驱逐侵入朝鲜半岛的美国军队，而这一方针是中国军队力所不及的，也超出了其安全目标需要的限度。1951 年 1 月 13 日，即中国军队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以后，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十三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的建议对中国极为有利，而使白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美国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是“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

对于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实现停战的绝好机会。如果中国军队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的条件，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当志愿军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时，毛泽东赖以决定介入战争的三层考虑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现实：美国此时接受停战，就等于是以战败者的身份来到谈判桌前，毛泽东的革命斗志和信念得到了充分表现；北朝鲜政权得以完整地保留，莫斯科所担心的引起美苏直接冲突的远东危机也烟消云散，中国履行了其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承担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有北朝鲜作为缓冲地带，中国对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自然可以化为乌有，甚至台湾问题和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解决。

然而，正像艾奇逊期望的那样，中、苏、朝方面经协商后的答复否定了这个联合国议案。1 月 17 日周恩来宣布了中国拒绝停火的决定，其理由在于“先停火后谈判”只是美国寻找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其结果，不仅为美国发动军事进攻提供了借口，而且使中国失去了联合国多数国家的信任和支持。

1952 年下半年，在朝鲜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 5 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 1952 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但停战

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在战俘问题上作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毛泽东则坚持认为，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并不断蒙受损失，使前苏联的建设和世界民族革命运动得到发展，"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后来，金日成虽然勉强表示接受中国的意见，但与前苏联大使谈话时他还是坚持："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

1952 年 8 月周恩来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除了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外，会谈的重点在于确定对朝鲜战争的方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认为现在有足够的把握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至于战俘问题，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并表达了毛泽东的看法："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1952 年底至 1953 年初，由于估计美国共和党上台后对朝鲜的政策可能更为强硬和激进，中国领导人开始关注如何应付战争进一步扩大的威胁，并对战争做了长期化的准备。彭德怀宣布：朝鲜战争明年有可能扩大，我们的方针是一面打仗，一面建设。面对联合国军前线部队的大量增加，中国对和谈表示不甚感兴趣，不仅压缩了谈判代表团的人员，也不拟再与印度接触，商谈战俘问题。至 1953 年 1 月下旬志愿军战场部署的调整已基本完成，除了部队调动外，还包括在国内征召新兵，向朝鲜战场增兵 25 万人，在朝鲜东海岸和西海岸构筑纵深配置的新工事，以及修建新铁路线和改善现有铁路线的状况，修建新公路和加宽现有公路等措施。为此，毛泽东要求前苏联满足 1953 年朝鲜战场一切军需用品和军工生产材料的供应。

斯大林明白，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在为前苏联而战，为世界革命而战。所以，前苏联尽其所能满足了中国的要求。无论如何，前苏联与中国的基本利益和方针是一致的。对于斯大林来说，朝鲜半岛最有利的局势就是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既不扩大战争——以免将前苏联卷入冲突，也不实现停战——以便把美国长期拖在朝鲜战场。在战与和的两手准备中，毛泽东的策略是只要条件有利就把战争坚持下去，直到对方让步为止。前苏联提供的大规模及时援助，更坚定了中国的信心。1953 年初，中国在朝鲜战场

的军事实力，无论是兵力、装备、训练、工事和交通，还是弹药和粮食储备，都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佳状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美国新政府宣扬的“放蒋出笼”、封锁中国等威胁性政策，毛泽东2月7日的回答是：中国准备将战争进行下去，“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然而，就在中国方面积极备战，以迫美国做出让步的时候，斯大林去世了，莫斯科随即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立场。过去有著作认为，中国建议立即恢复停战谈判并导致朝鲜停战，是毛泽东估计到艾森豪威尔试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有意进行试探后，经与朝方商议主动作出的决定。或者是中国在莫斯科陷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而无暇他顾的情况下，在外交上采取主动的结果。还有人坚持认为美国关于使用核武器的威慑作用是造成中国同意实行停战的主要因素。这些推测都因最近披露的档案材料而黯然失色。新的史料证明，莫斯科的新方针以及北京随后对这一方针的赞同，是导致朝鲜停战问题摆脱僵局的关键因素。

到50年代初，前苏联社会已经处于一种难以容忍的紧张状态，苏共许多领导干部，包括斯大林身边的人都有一种危机感，特别是斯大林晚年对党的机构和人事所进行的无常调整，更使前苏联高层感到人人自危。通过1952年10月的苏共十九大，斯大林首先把与自己同辈的“老近卫军”排除出新的领导核心。以前的政治局被扩大了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替代，但实际上“具体领导”国家的是只由9人组成的“主席团常务委员会”，莫洛托夫(Molotov)和米高扬都没能进入这个“核心”，伏罗希洛夫(Voroshilov)虽然在名义上是核心成员，但从未参加过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尽管只开过两次这样的会议，卡冈诺维奇(Kaganovich)也在反犹太主义的行动中遭到冷眼。党和国家的大事实际上都是在斯大林郊外别墅的晚宴上决定的，而能够被召来出席晚宴的只有贝利亚(Beria)、马林科夫(Malenkov)、赫鲁晓夫(Khrushchev)几个第二代领导人。就是他们几人也整日战战兢兢，不知哪一天就会被从晚宴邀请名单中除名。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突然中风倒下。

虽然导致斯大林最后死亡的真实原因目前仍无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希望看到斯大林能够再次站起来。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召开的中央主席团和部长会议主席团联席会议，以及会议作出的对党的机构和人事进行调整的决议——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让斯大林“退休”，充分证明了党内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尽管在是否背离斯大林整个路线的问题上，新领导人之间尚未取得一致，但前

苏联需要一个宽松和缓和的环境，确是大家的共识。提出在朝鲜实行停战的新方针的不是别人，而是以保守和顽固著称的莫洛托夫。

3月15日，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已经发出了信息："目前，一切有争议的或尚未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在有关国家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和平地加以解决。这适用于我们同所有国家的关系，包括同美国的关系在内。"3月18日，莫洛托夫向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提交了他起草的关于朝鲜战争新政策的方案。此时，周恩来参加斯大林和哥特瓦尔德(Gottwald)的葬礼后，正要回国。3月21日晚，前苏联新领导人集体与周进行了单独会谈，提出寻找可行途径，尽快结束朝鲜战争。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前苏联设计了中、朝、苏三方呼吁停战并与美国恢复谈判的具体步骤和安排。

对此，周恩来感到意外和惊讶，认为这个转变太大，太突然，必须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经过讨论后才能作出答复。莫斯科的新方针对于朝鲜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前苏联特使报告说，"在3月29日的第二次会议中，金日成再一次宣布他完全同意前苏联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建议，认为这一建议必须尽快实现。"中国的态度则有些微妙。3月26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同苏共领导人商谈的情况，并一起确定了中国政府按照前苏联的建议应采取的方针和步骤。虽然中国方面对于停战问题也有两手准备，但在此时此刻接受前苏联的建议，主动对美国做出让步，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尽管北京按照莫斯科的计划进行了安排：通知金日成准备重开谈判；李克农、乔冠华即将动身前往开城；3月28日向美国谈判代表克拉克(Clark)递交了复函；3月30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但在具体谈判和结束战争的实施过程中，毛泽东完全是自作主张——继续实行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的策略，以争取最佳的谈判结果。在这方面，反倒是前苏联领导人依从了中国的决定。

到1953年4月，志愿军已经基本完成反登陆作战准备，拥有兵力达19个军135万人(人民军尚有6个军团45万人)，火力空前加强，阵地更为坚固，作战物资十分充足，并且解除了后顾之忧，在战略上更趋主动，可攻可守。1—4月，志愿军和人民军正面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770余次，歼敌5万余人，志愿军空军在第一季度即出动飞机399批4093架次，共击落美机50架，击伤16架。因此，全军上下，士气高昂，积极求战，以配合谈判。

4月26日板门店谈判恢复以后，进展的确并不顺利。于是，中国一方面在是否把不愿遣返的战俘留在朝鲜、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进行解释的期限、如何处理经解释后仍不愿遣返的战俘等问题上，提出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方

案，并通过印度渠道，积极与美方谈判；一方面加紧发动新战役的准备，并于5月13日开始了夏季反击战役。5月16日，中央军委指示："目前停战谈判仍在拖延，何时能停尚难判定，因此，我们在朝的作战方针仍然是坚持过去所提出的'长期的稳扎稳打'的方针。"同一天，板门店谈判再次中断。

5月25日美国提出修正方案后，志愿军并没有停止在战场上的行动，而是从5月27日起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6月16日进攻停止，共扩大阵地面积58平方公里，共毙伤俘敌4.1万余人。在此期间，6月8日达成停战协议，美国方面做出了让步。中方接受美国的新提案，是因为"对方新方案和我方5月7日方案基本方针是相符合的"。

6月17日李承晚采取的"释放战俘"的行动，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扩大收获的机会。事件发生后，中国给克拉克发出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函，并停止了谈判，准备再次采取军事行动。6月25日志愿军司令部下达了命令：一线各部队加速准备，周密组织，狠狠打击南朝鲜军，并指示第20兵团在战役任务完成后，以2—3个军向纵深有限度扩张作战。主持谈判的李克农6月28日致电毛泽东分析说，"朝鲜停战的前途是肯定的。谈判虽然目前会拖一下，但准备停战的实际工作不应受影响。我们要利用有利形势，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停战。"于是，在7月13日，志愿军发动了第三阶段进攻——金城战役。中朝军队在这次战役中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92.6平方公里。毛泽东对此结果十分满意，他后来兴奋地谈到："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1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21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18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当然，毛泽东并没有打算背离莫斯科制定的总方针。步履维艰的板门店谈判终于有了结果，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听从莫斯科的指挥。斯大林已经不在了，朝鲜战争也结束了，前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从此开始受到中国的挑战。而在亚洲的冷战对峙中，中国即将取代前苏联，站到社会主义阵营东方战线的最前沿。

思考题：

1. 1950年中苏实现同盟的基础是什么？
2. 美国在1950年上半年转变其远东政策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3. 应该如何分析朝鲜战争的起因及其与亚洲冷战格局形成的关系？
4. 怎样评估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参考书目：

1. S. Goncharov, J.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 – 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3.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 年。

4.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Москва, 1998.

5. И.В.Гайдук, Н.И.Егорова и А.О.Чубарьян,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факты и гипотезы*, Москва, 1999.

6. 迪特·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张文武等译,新华出版社 2001 年。

第三章
缓和亚洲局势的“窗口时间”
(1954—1957年)

蔡佳禾　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中美研究中心教授

第一节　走向和平共处的尝试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是由列宁首先提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西方列强敌视苏维埃政权,希望将这个社会主义政权扼杀在襁褓之中。在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党也急于推动各国左派政党开展暴力革命,试图在世界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此,联共(布)在1919年春建立了第三国际。但是,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先后在本国资产阶级政权的镇压下失败。1920,苏军为反击波兰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而攻入波兰境内,但占领华沙的冒险决策导致了军事上的全面失败。此外,苏维埃政权与周围国家的关系普遍处于紧张之中。这一切都表明,联共(布)对一战以后的革命形势作了过高的估计。

苏俄当时的经济状况非常严重,粮食供应严重短缺,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必须停止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和平时期恢复和建设经济的新政策。1920年苏俄同英国开始谈判贸易问题,苏维埃政府还通过了关于建立租让企业的法令,将吸引外资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列宁认为,西方国家中存在着同情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力量,他们要求与苏俄进行贸易和经济合作,苏俄应利用这种局势稳定自己的政权。

1922年1月,西方国家邀请列宁出席即将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列宁在为会议所作的指示上说,联共(布)在热那亚会议上的主要任务是使西方的和平主义力量得到加强,苏俄有可能同西方国家达成妥协,全力争取以和平共处方式处理同他们的关系。在列宁看来,和平共处是苏俄在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保持敌意的同时,暂时和平共处而不处于战争状态。根据列宁的指示,苏俄代表在热那亚会议上表示,前苏联将坚持共产主义原则,同时也认为当前资本主义旧制度和正在成长的社会主义制度可

以同时并存。列宁去世后，由于各种原因，斯大林没有始终不渝地贯彻这一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政策方面提出，凡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国愿意民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原则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但在当时，社会制度的异同是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对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中国同他们直接建立了外交关系。对于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中国决定暂不主动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包括那些刚脱离殖民主义统治的亚非国家，中国政府规定，要经过谈判才能建立外交关系。

1949 年 7 月，中共中央书记刘少奇到前苏联访问。斯大林对刘少奇说，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国应该有某种分工。他希望中共以后多负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而苏共主要负责对西方国家革命的指导。斯大林的要求不久后得到了贯彻。

1949 年 11 月，新中国在刚刚建国一个多月后就作为东道主召开了亚洲和澳洲工会会议。刘少奇在会上向各国左翼组织介绍了中共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政权的经验。在分析亚洲的革命形势时，刘少奇对越南、缅甸、印尼、马来亚、菲律宾等地的民族解放战争加以赞扬，并要求各国代表支持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刘提到的这五个国家中有三个已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把这些国家仍然看作是殖民地，公开支持其国内的武装斗争，这表明了当时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倾向是支援革命斗争。

中国政府很快看到，亚洲新独立的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立场有较大差异。朝鲜战争发生后，以印度为首的亚非民族主义国家采取中立的立场，他们希望停战，反对扩大战争的要求给中国领导人很深的印象。

1950 年 10 月，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印度等国开展了外交活动，希望限制战争扩大。同时，他们也反对西方在联合国提出指责中国“侵略”的决议。12 月，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 在议会中指出：在朝鲜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对中国人民都有着极大的意义，印度政府的一贯态度是，朝鲜问题只有与中国人合作才能解决。1951 年 1 月，印度、埃及等 12 个亚非国家提议，由美、苏、英、法、印度、埃及与中国代表会晤，以便进一步了解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在这一建议被美国否决后，印度批评说，美国的态度是不停火、不谈判、也不要和平解决。

类似的分歧也表现在对日媾和问题上。日本在战后一直处于美国的军事占领之下，1947 年以后，美国改变了惩罚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削弱日本军

工体制的政策，转而利用日本对中苏两国进行冷战。杜鲁门政府决定由美国单独起草对日和约，将主要参战国中国和前苏联排除在媾和之外。中国和前苏联认为，美国的行为违背了国际协议，因此拒绝参与旧金山对日和会。缅甸、印度等一些民族主义国家认为，美国单独拟订和约是错误的。作为日本侵略的受害国，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赔偿要求没有得到重视，他们也决定不参加这一和会。这些国家坚持正义的立场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重视。1951 年 8 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这些国家的决定反映了亚洲人民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的意见，将受到亚洲各国人民的欢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民族主义国家的中立与和平政策表明，他们并不总跟着西方的节拍起舞。1952 年 4 月，周恩来总理在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应当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但落脚点是要影响和争取人民。周恩来在会上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不是铁板一块，中国的外交要分清敌、我、友，区别的关键就是各国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他认为从国家的性质上说，民族主义国家是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但这些国家不参加战争并要求中立是有可能的。所以中国对这些国家不能采取敌视态度，不能把他们挤到敌人的营垒里去。

周恩来强调，同中国已建交的一些东南亚国家，过去是殖民地，但现在已有了自己的国会与政府。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还认为这些国家是殖民地，那是不切合实际的。他指出：东南亚国家与帝国主义有矛盾，中国在战时要争取他们中立，在和平时要争取他们同帝国主义保持距离。他批评了“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的思想方法，要求中国的外交官打开外交领域的新局面。周恩来的这些观点表明，中国的对外政策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了局部调整。

但是斯大林和前苏联对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并没有变化。在 1952 年秋天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人马林科夫（Malenkov, G.M.）在报告中几乎点了所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名，认为他们受美国的驱使，放弃了本国的独立外交政策。此外他还把越南、缅甸、马来亚、菲律宾、印尼、印度、伊朗、埃及、摩洛哥、叙利亚、突尼斯等十多个情况完全不同的亚非国家都列入“殖民地和附属国”范围。苏共十九大的路线表明，前苏联此时不重视民族主义国家的作用，前苏联的这种立场不利于中国的政策调整。

进入 1953 年以后，随着斯大林去世和朝鲜停战谈判出现突破，有利于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的气氛也出现了。斯大林刚一去世，苏共中央政治局就

坚决提出了结束朝鲜战争和尽可能缓和国际关系的方针。

进入到8月份，马林科夫甚至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全面阐述了这一新的外交方针的基本内容。这就是强调两个制度的和平共处，强调没有使美苏两国发生冲突的客观基础。他在报告中指出：当前的形势很清楚地表明，大国有特别的责任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马林科夫照例提到了一大批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名字，但这次马林科夫谈的是如何与这些国家实现睦邻友好。这个调子同他一年前所作的报告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几天后，前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说，马林科夫的演讲是前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受到前苏联对外政策调整的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也迅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考虑到美国的敌视政策和中国自身的利益，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但是，周恩来明显地主张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的范围。他在6月份的一次讲话中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国人民，以及所有反对美国战争政策的人都是和平的力量，都应包括在和平统一阵线之内。他同时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美国的战争威胁可能使美国与西欧的裂痕加深，亚洲、中东、北非的国家大都不愿意跟着它走，跟美国走的没有几个国家，和平的影响一天天在扩大。

朝鲜停战以后，完成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推进工业化建设已成为中国政府的主要工作。中国需要和平的环境，希望通过大国间的协调合作实现国际形势的缓和。9月5日，周恩来在会见一位锡兰外交官时说，中国的对外政策不仅是同各国和平共处，而且谋求同他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互通有无。他说中国主张国际间和平共处，合作、贸易往来，各国应不分国家大小，平等相待。周的这些讲话表明，在朝鲜战争后，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开始了新的调整，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与西方国家的和平共处都提上了议事日程上。

中国的新政策首先影响了中印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印关系有些紧张。1949年春夏，人民解放军向西南地区进军，一些国际反华势力趁机鼓动西藏分裂。印度驻拉萨代表团团长、英国人理查逊(Hugh E. Richardson)对西藏"外交局"局长札萨柳霞·土登塔巴说，拉萨有许多共产党人，他们在这里会充当内应。他煽动西藏地方当局将汉人驱逐出去。7月18日，西藏地方当局果然以遣走"可疑"共产党人为名，将国民党政权驻藏办事处人员和其他汉族人全部赶出拉萨，制造了以分裂国家为目的的"驱汉事件"。

印度政府继承英帝国的政策，试图以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来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驱汉事件”发生后，印度报纸甚至说，西藏从未承认过中国的宗主权。

新华社9月2日发表社论说，新中国绝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西藏。社论说，“驱汉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英、美、印度反动派的目的是在解放军即将解放西藏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反而进一步变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

虽然印度政府在1949年12月表示愿意承认新中国，但印度并没有停止对西藏分裂势力的支持。美英及印度政府通过理查逊向西藏当局提供了可装备一万人的武器，试图帮助西藏分裂势力阻止解放军进军西藏。在1950年春夏季，他们还阻止西藏地方当局同中央政府谈判。印度政府还通过外交渠道要求中国不对西藏使用武力。10月中，毛泽东主席要中国大使转告印度政府，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10月19日，解放军攻打昌都。印度军方和情报部门有人建议进行军事干涉，但考虑到军事干预的可能与后果，新德里最后认为印度只能进行外交干预。

中国对印度的干预予以坚定的反驳，指出西藏问题不容任何外国干预。解放军迅速占领昌都地区使英国和印度意识到，他们的干预不会有任何结果。由于此时中国已经进入朝鲜作战，出于对战争进一步扩大的担心，印度政府认为它最好还是在西藏问题上有所收敛，避免同中国争吵。英国也认为，不应再阻挠西藏地方当局派人到北京谈判。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的协议终于在北京签字。

1953年，中国的政策调整为中印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印度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它积极主张亚洲民族主义国家采取中立主义的立场。中国为此相当重视印度的国际作用。印度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也在一直支持它参加有关亚洲的国际会议。但是印度的中立主义立场受到了美国的抵制，由于美国的反对印度无法参与朝鲜问题日内瓦会议。9月，尼赫鲁气愤地批评美国“藐视亚洲的意志”。他强调世界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旧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事物正在取而代之。

这一年秋天，美国同巴基斯坦谈判军事合作问题，准备签订美巴“共同防御协议”。巴基斯坦是印度在南亚地区的主要对手，印度认为美国的这一政策会加强巴基斯坦的军事能力，对印度造成一定的威胁，同时也会把亚洲各国拖入到冷战对抗中去。因此印度坚决反对美国的这一政策。中国政府

反对美国的军事同盟政策,对印度的这种立场表示支持。

1951年5月以后,解放军和平进入了西藏各地。1952年2月,印度向中国提出备忘录说,印度在西藏地区具有从英国继承下来的多项权益:这些权益包括它有权在拉萨驻有使团;在江孜和亚东设立贸易代表机构;在商业市场以外地区进行贸易的权利;管理江孜线路上的邮政和电信机构;在江孜派驻军队;以及到西藏一些宗教圣地朝圣的权利。印方说这些权益是从惯例和协议产生的,需要慎重处理。6月,周恩来在答复中指出,现存的情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印度政府对此并没有责任。但是英国与旧中国基于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新中国与印度在西藏的关系要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

1953年8至9月,中印之间因这些"权益"发生了一些纠纷。如印军要对亚东的卫队换防,印度邮政方面的代表要到江孜视察,中国军队扣留了印度商队的收发报机等。尼赫鲁建议,两国尽早就印度在西藏权益问题开展谈判。12月,两国代表在北京开始谈判。31日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说,中印关系的发展应有一些基本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

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团认为可以谈已经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不成熟的问题如边界问题以后再谈。经过四个月的谈判,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签署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两国政府还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序言写入了该协议,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一协议清除了过去英国损害中国主权的特权,根据平等互利原则,协议也规定了有利于双方通商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具体措施。协议签字后,尼赫鲁在印度议会表示,印度接受这一协议就放弃了英国在西藏的帝国主义遗产。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应尼赫鲁邀请访问了印度。两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希望推进和平和合作的努力,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应适用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6月27日,周在新德里召开的记者招待会说: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同时一个国家内人民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容许外来干涉。如果世界各国都根据这些原则来处理他们相互间的关系,那么,这一国对那一国进行威胁和侵略的情形就不会发生,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可能就会变成现实。周恩来的这一谈话受到了印度和亚洲舆论的高度评价。

10月,尼赫鲁总理对中国进行了回访。这是新中国接待的第一位非社

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毛泽东在会见尼赫鲁时说:应当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中国需要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印两国在思想和社会制度上不同,但两国都有要对付帝国主义的共同问题。通过这些访问,中印两国关系得到了发展。

但是中印之间还存在着边界划分问题。从1951年起,印度军队就悄悄地向北推进,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占领了"麦克马洪线"[①] 以南所有有争议的地区。印度政府在边界问题上一直持强硬的立场,要求中国全盘接受过去英国殖民当局规定的边界。中国认为,这种单方面划定边界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中国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由于尼赫鲁政府摆出一副边界问题不容谈判的架子,中国政府不得不表示,它需要时间对复杂的历史问题进行研究,因此暂时不能对领土和边界问题做出判断。中国希望今后良好的双边关系有助于解决棘手的边界划分问题。

在调整对印度这类国家的关系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基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调整了对日本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一方面,处于美国占领下的日本没有主权地位,在经济和政治都不得不听命于美国。另一方面,日本右翼势力又利用美国的支持,对内压制左翼力量,对外支持美国的冷战政策,与台湾国民党当局保持着密切关系。在朝鲜战争中日本当局还与美国沆瀣一气,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政策,试图削弱新中国的力量。但是,中日两国在经济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市场对日本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日本民间存在与新中国友好相处的要求。1950年日本成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中日友好协会、促进中日贸易议员联盟等民间组织。

1950年,美国政府决定要尽早签订对日和约。当时英国政府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工党政府主张中国参加对日和约,在台湾主权归属中国的前提下,对台湾采取中立化措施。但美国主张让国民党政权参加和约。最后美英两国达成妥协,新中国和台湾国民党政权都不参加和约,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后,由日本自己选择一方来缔结和约。美国起草的对日和约实质上是要保证美国长期控制日本,同时让日本尽快恢复经济力量。负责

① 1913年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召开了由中、英及中国西藏地方当局代表参加的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议。英国代表亨利·麦克马洪在这会议中背着中国代表提出了划分中印领土的边界线,这一方案试图吞并属于中国的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英国以欺骗方式让西藏代表接受这条分界线,但中国历届中央政府都没有承认过这条非法的边界线。

和约起草的杜勒斯(John F. Dulles)说过,旧金山条约只规定日本放弃台湾,但没有规定台湾主权属于中国。这是要形成台湾归属未定的事实,为以后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作铺垫。对于这样一个损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和约,中国政府当然不能接受。

为了阻止日本政府承认新中国,美国迫使日本同台湾国民党政权签署和约。杜勒斯秘密告知日本,如果它不与国民党政权缔结和约,美国国会就不会批准旧金山和约。1951 年 12 月,在杜勒斯的压力下,日本首相吉田茂(Yoshida, Shigero)发表了致杜勒斯的"吉田信简",保证同国民党政权签约,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吉田还无理指责中共有支持日共以暴力推翻日本宪法的计划,试图以此取得日本公众对其政策的支持。

1952 年 5 月 4 日,美日宣布旧金山和约生效。同日,日本和国民党当局宣布缔结了"和约"。有关的附件还说该条约适用于"现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及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从日本方面看,这个附件实质上为日本以后同新中国打交道留下了可能。次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单方面制定的对日和约,严厉谴责吉田政府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缔约的卑劣行为。声明说吉田政府不能代表日本人民,中国愿意同日本人民和平相处,友好团结,互通贸易,互相尊重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显然,此时的中国政府愿意以非官方的灵活方式推进双边关系。

1952 年 5 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邀请三名日本议员访问中国。他们在北京受到友好接待,双方还签署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这是日本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到中国访问,他们的访华行动在公众中引起了轰动。12 月,中国政府表示,目前在中国有三万日侨,对于希望回国的在华的日本人,中国政府愿意予以协助。吉田茂政府在公众压力下同意让友好人士到中国协商在华日本人回国事务。1953 年 3 月,中日双方达成了日侨回国的协议。此后,日本各界大批友好人士来华访问,掀起了中日民间友好的高潮。1955 年,中日双方经过谈判还签署了渔业协定,两国的贸易关系也有了显著的发展。1954 年双边贸易额为 5900 万美元,1956 年达到了 1.5 亿美元。

1954 年 12 月,亲美的吉田茂下台。民主党人鸠山一郎(Hatoyama Ichiro)担任首相。为了促使日本新政府在外交上采取和平中立的路线,1955 年中、苏两国政府分别提议同日本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鸠山政府明确表示愿同中、苏两国实行关系正常化。但是美国却极力阻止鸠山政府实施同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方针,杜勒斯甚至以不归还琉球群岛来威胁日本政府,阻止

日本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同前苏联达成妥协方案，阻止两国缔结和平条约。杜勒斯也竭力阻止日本同中国扩大贸易和其他双边关系。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这一时期对于推进中日友好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经常会见日本各界人士，反复向他们说明中日两国友好相处的意义。1955 年 10 月，毛泽东对日本议员说，中国在工业化等方面应当学习日本的先进经验，他本人还想去日本和美国看一看。1956 年 4 月，中国政府颁布了宽大处理在华日本战犯的法令，被释放的日本战犯不久都回到了日本。中国的对日政策在日本引起了积极反应，尽管日本政府维持亲美的立场，但公众当中要求同中国友好，实行和平中立政策的呼声有了明显发展。

中印和中日关系的变化表明，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已经有了一定进展。随着战争的结束和政权的稳定，新中国领导人的相信，中国共产党过去对国际形势的独立分析是正确的。中国仍将同前苏联协调对外政策，但现在已不需要事事向克里姆林宫“看齐”。

第二节　日内瓦会议与中国的和平努力

1953 年春，美国新上台的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政府认为，亚洲问题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在朝鲜停战以后，美国应当把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线转移到印度支那一带去。国务卿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里(Omar Bradley)上将都认为，印度支那的形势比朝鲜更危险。美国如果“失去”朝鲜的话，还可以使损失局限在东北亚地区，但是如果印度支那“失去”的话，其后果就必然要影响别的地区。为此，美国应帮助法国，打败胡志明(Ho Chi Minh)和“越南独立同盟”(以下简称越盟)领导下的越人民军。

越盟曾长期领导越南人民的抗日与反法斗争。1950 年初，中国在胡志明要求下同意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并派出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人民赶走法国殖民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帮助下，到 1953 年秋天，越人民军在越南已控制了将近三分之二的地区。在北部地区，法军和保大傀儡政权的军队只能龟缩在河内、海防等少数几个大城市中。在中部地区，越盟控制了大片解放区。在南部，越盟开展着活跃的游击战。此外，越盟利用印度支那特殊的地理条件，进入老挝和柬埔寨作战，他们同这两个国家中的反法力量合作，威胁了法国在这两个国家的殖民统治。

由于财政原因，法国政府已经无力支持这场战争，它在越南的殖民统治

面临着垮台的可能。美国愿意帮助法国，但艾森豪威尔认为，如果法国要继续得到援助的话，它还必须允许印支三国有更多的自主权，消除这场战争的殖民主义色彩。美国军方认为，法军的失败是缺乏明确的战略和进攻的决心，因此还必须在战略上作出重大调整。

1953 年 5 月，法国新上台的拉尼埃(Joseph Laniel)政府更换了军事主帅。新任总司令亨利·纳瓦尔(Henri Navarre)将军鼓吹采取进攻战略，法国似乎有决心将战争进行下去。7 月，在美国顾问的帮助下，法军制订了新的军事计划，试图在红河三角洲地区开展战略进攻。法国政府表示，它可以加快印支三国自治步伐，但他们必须加入"法兰西联邦"，以确保法国对他们的影响。为了阻止法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印支问题，10 月，美国政府决定再向法国提供 3.85 亿美元的武器援助。美国指望法国能打赢战争，将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推回"去。

尽管法国想扭转败局，但它在军事上却没能取得预期的进展。越人民军一部转进西北地区。11 月，纳瓦尔将军将 5 个营的法军空投到越老边境山区的奠边府一带。纳瓦尔对美国称，他的行动是进攻性的，是要吸引越军到这一地区同法军决战。越人民军与中国顾问团商量后决定，放弃原定在三角洲地区发起的一次战役，将军队主力转移到奠边府地区，并将这里的法军包围。为了摆脱这部分军队被歼的局面，法军指挥部逐步将守军增加到一个师的兵力，但他们却被三个师的越人民军牢牢包围。

在 1954 年 2 月的美、苏、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上，法国外交部长皮杜尔(Georges Bidault)要求四大国采取建设性的行动，召开国际会议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皮杜尔私下告诉杜勒斯说，法国愿意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否则法国政治局势将不可收拾。法国的要求得到了英国的支持。杜勒斯虽然不愿意开这样的会，但为了让法国同意重新武装西德，没有执意反对。四国外长会议决定，在 1954 年 4 月召开朝鲜问题日内瓦会议之时，也召开一次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

美国并不愿意看到印度支那问题得到和平解决。1954 年 1 月，艾森豪威尔批准了一份代号为 NSC-5405 的文件，这个名为"美国在东南亚的目标与方针"的文件声称：如果西方输掉了印度支那的战斗，这将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带来严重后果。因为东南亚各国间有着一种相互联系，所以任何一国的"失去"都会导致其他国家"屈从于共产党，或者同共产党合作。"文件还认为，如果东南亚地区落入共产党的控制，亚洲其他国家也会保不住，甚至对"欧洲的安全与稳定"也产生严重影响。不久，艾森豪威尔根据这一

文件发表了所谓"多米诺骨牌论"的演说，强调了印支地区对美国进行冷战的意义。

NSC-5405号文件规定，如果中国不对印度支那战争进行军事干预，美国也不在印支地区使用武力。如果中国军队进行干预，那么美国也将采取军事行动。1954年5月初，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越南人民军在奠边府发起了总攻。7日，法军宣布投降，越军在整个战役中共歼灭法军1.6万余人。奠边府的解放给法国以沉重的打击，并迫使美国走到前台来表演。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日内瓦会议。中共中央在1954年3月批准了有关日内瓦会议的工作文件。该文件指出，由于美国低估会议的可能成果，以及美、英、法之间存在着多种矛盾，中国应该采取积极方针，打破美国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文件表示，即使美国利用一切力量阻挠达成有利于和平的协议，中国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协议，甚至是临时的或个别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

中国政府还事先同前苏联、朝鲜及越南政府进行了磋商，协调各方参加会议的立场。4月23日，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莫斯科还分别同马林科夫、赫鲁晓夫（Khrushchev, Nikita）、莫洛托夫（Molotov, Vyacheslav Mikhaylovich）及胡志明举行了会谈。

4月26日，关于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正式开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在发言中提出，一切外国军队在六个月内撤出朝鲜、举行产生国民议会的全朝鲜选举等建议。杜勒斯在会议上攻击朝鲜的提议是要吞并南朝鲜政权。为了给美军留驻南朝鲜寻找理由，他声称联合国军撤出后不容易返回，但中国军队却仍容易回来。他要求中国单方面撤军，进行联合国监督下的大选等建议，表明了要在南朝鲜长期驻军的态度。

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提出了朝鲜和平统一、民族独立和自由选举的建议，中国表示反对李承晚的武力统一方针。周恩来强调，美韩缔结"防御条约"和扣押数万名中朝战俘的行为是对停战协议的破坏。周恩来说，中国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和维护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而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同时，中国也要求其他国家用同样的态度对待中国人民。他强调，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世界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朝鲜问题的讨论集中在应如何实现统一上，由于对政治选举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因此各方的立场相差很远。形势表明，停战后的朝鲜半岛只能维持战争爆发前的状态，即南北分裂的局面。会议进行了半个多月，但始终没

能取得进展。尽管中国代表团要求各方就今后仍可能举行会谈达成最起码的一致意见,但美国代表团拒绝了任何妥协性的建议。

5月8日,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开幕。法国外长皮杜尔首先提出停火建议,他还提议双方军队在指定地区集结、立即释放战俘、由国际委员会监督停火,越盟军队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出等建议。越南总理范文同也提出了停火方案,他要求法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地位,法国从越、老、柬三国完全撤军,在越、老、柬三国举行自由选举,允许老、柬两国的抵抗力量参加会议等。

从法越两方的分歧可以看出,法国只肯部分放弃它在越南的利益,法国不仅想维持它在越南的利益,巩固西贡伪政权,它还要确保其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利益。但法国的建议中也包含了它准备在越南妥协的信息。越南方面的方案是要迫使法国全面撤军,通过谈判争取反法战争的全面胜利。越南在谈判方案中表示,它可以考虑在自愿基础上加入法兰西联邦。但它要求把越、老、柬三国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也很难为法国和老柬两国的代表所接受。

在以后一个月里,与会各方进行了多次公开和秘密的会谈。他们围绕着在越南如何集结军队、如何处理老挝和柬埔寨问题、如何建立中立的国际监督委员会等各种问题进行了交锋,但由于各方立场相去太远而无法取得进展。英国代表团希望会议取得成果,它担心美国在印度支那扩大战争,从而影响欧洲的安全。但是英国不是当事方,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只能表示支持法国采取妥协态度。

美国参加印支会议是迫不得已,杜勒斯在会前对美国代表团下达的指令强调,法国的方案是要使印度支那在"自由"政府领导之下,要使当地人民"不会受共产党的统治"。杜勒斯还严令美国代表团不得跟中、越代表团进行接触,他说如果达成的协议不符合上述要求,美国将不支持或默认这个协议。因此,美国代表团一直阻止法国作出妥协,并且支持西贡伪政权的代表持强硬的反对立场。前苏联的着眼点是在欧洲,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6月8日发表讲话,全面批评法国的立场,但他没有表现出灵活的立场。

会议陷入僵局后,中国代表团积极了解各方的态度。6月12日,法国拉尼埃政府垮台。会议面临完全破裂的局面,6月16日和17日,周恩来先后会见了艾登和皮杜尔。他说中国不愿意看到会议破裂,中国愿意看到老挝和柬埔寨成为像印度那样的国家。他还说越南愿意尊重老、柬两国的独立、主权和统一。周恩来表示说,只要外国军队从这两个国家撤出,越南的

军队也可能撤走。中国提出的这个使老、柬两国中立化的方案得到了英国的支持,也使法国看到了会议成功的可能。就连美国代表、副国务卿史密斯(W. B. Smith)私下也承认,中国的这一提议"是克制的和合理的"。

由于法国陷于政府危机等原因,日内瓦会议暂时休会。7月初,周恩来同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在中越边境地区进行了会谈。周恩来指出,印度支那问题已经国际化,帝国主义绝不会让越南民主共和国取得大规模的胜利,如果因为要求过多而达不成和平,美国必然进行干涉,使战争国际化,这样对中越双方是不利的。周还对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处理提出了具体意见,希望越方能从大局出发作出让步。中方的观点最后为越南领导人所同意,双方决定力争在划区等问题上与法国达成协议。

美国政府一直在考虑是否要进行军事干预。3月13日,越人民军对奠边府发起进攻,法国要求美国提供空中军事支援。24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Arthur Radford)上将向总统提出"秃鹫计划",打算出动B-29轰炸机对越人民军进行打击,以便为法军解围。这一干预计划的军事前景很不明朗,但却得到了杜勒斯的肯定。他在3月底提出,美国应和其盟国采取"联合行动"来应付印支局势。4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了所谓"多米诺骨牌论",他说印支就像一排竖立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只要它倒下去,东南亚其他国家也会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但艾森豪威尔表示,美国不会单独采取行动,他说美国将把组织东南亚联盟作为迫切的工作来进行。

美国国会领袖反对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他们认为,在得到盟国实质性的承诺之前,国会不会考虑干预计划。英国保守党政府反对采取军事干涉行动。英国认为,在印支问题上存在谈判达成和平的希望,而且军事行动没有明确的目标。为了敦促美国接受日内瓦会议上的妥协方案,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6月底访问华盛顿,结果艾森豪威尔勉强接受了对越南实现分割,以及老挝和柬埔寨两国实行中立的方案。

杜勒斯一度想撇开英国组织干预,为了说服法国接受美国的条件,法美两国在5月份也进行了会谈。但法国担心美国加入战争会产生它自己无法影响印支三国的后果,因此他们磋商最终没有取得进展。由于英法两国的消极,加上美国国内公众舆论反对干预,艾森豪威尔最终没有批准军方的干预计划。

1954年7月,法国建立了以孟戴斯—法朗西斯(Pierre Mendes - France)为首的政府,新总理表示如果他在一个月内不能达成和平,他将自动下台。

在中国、前苏联、印度、英国等国的努力下，与会各方在7月21日最终达成了协议，越南在17度线附近被划分成南北两方，交战双方的军队将撤到各自一方。各国军队还必须撤出柬埔寨和老挝两国，在老挝保留一块由左翼抵抗运动暂时管理的地区。老、柬两国成为中立国家，不容许加入军事同盟组织或建立外国的军事基地。协议规定建立由印度、波兰、加拿大等国组成国际监督委员会，负责对协议的监督。日内瓦协议还规定，在三年过渡时期以后，印支三国要进行自由选举。

美国在协议签订后发表声明，宣称将不受协议的约束，但也不会以武力破坏这一协议。日内瓦协议结束了法国在印支地区的殖民统治，这一解决虽然未能实现越南的全部解放，但它阻止了美国对越南进行军事干预的计划，为越南和亚洲其他国家争取到了发展力量、重建国家的宝贵时间。通过这次会议，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中国的大国地位进一步确立起来。

第三节 台海危机与中美关系的再度紧张

中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要做的另一件事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这也是中国提出和平共处方针，缓和亚洲紧张局势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中国的这一方针遭到了美国政府的顽固阻拦。

艾森豪威尔政府一直认为，中国是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核心问题。在朝鲜与印度支那遭到挫败后，美国对中国的敌视进一步加强了。从1953年春季起，美国政府就开始制订一项长期性的对华政策，以确定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在美国政府内部，分裂中苏同盟和推翻新中国政权这两项目标被认为应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两项目标是相互矛盾的，美国不可能兼而得之。原因是如果美国要分裂中苏，美国就必须对中国采取一种利益诱惑的政策，结果新中国政权会得到巩固。反过来，如果美国想通过各种压力手段推翻中国共产党政权，那么中国就会更加拉近与依靠前苏联。由于这两种后果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被推迟了。

1953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一个代号为NSC-166号的文件，这个名为"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文件探讨了美国对华政策发展方向。该文件认为新中国政权的出现改变了远东的力量平衡，西方影响已经被逐出中国大陆。东亚问题都是由于中共政权的"存在"而造成的。166号文件说，中国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最大敌人，美国必须使用政治、军事、经济

等各种手段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确保它在亚洲的目标得以实现。166号文件提出了基本的政策框架，第一，美国不能接受用美国军队推翻或代替中共政权的政策。其次，美国也不能接受美军帮助台湾国民党军队推翻中共的政策。其三，美国不能为了克服中共对西方的基本敌对而向该政权让步，即使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让步，中国仍然会保持对美国的基本敌对。

166号文件实际上承认，新中国已经不是美国能任意用武力可以推翻的，但是它所表达的不让步政策就是要防止同中国妥协，逐步改善双边关系的一切可能，指望通过长期遏制来防止中国的发展壮大。艾森豪威尔的这一政策反映了美国右翼势力一贯的僵硬立场，也反映了他们不愿承认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失败。这是一种即不能战又不能和的政策方向。

针对英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要求缓和同新中国关系的呼声，12月，国务卿杜勒斯在百幕大出席美英法三国首脑会议时指出，中国仍是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来源，美国不能同中国妥协。美国也不能用同前苏联竞争谁对中国更好的方法分裂中苏，那样中国将处于世界上最有利的地位，而美苏的努力会相互抵消。杜勒斯认为加剧中苏紧张和困难的最好办法是加大对中国的压力，而不是减轻压力。他认为这种长期的压力最终会使中苏分裂。

美国不仅反对同中国妥协，而且竭力加剧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1954年5月，美国派遣海军海军舰只到大陈岛附近活动，试图以武力威慑阻止中国解放东南沿海的岛屿。6月，美国有意将一前苏联油船的位置通知国民党当局，让他们在海上劫持了这艘船只。7月，中国空军在南方沿海地区误将一架英国小型客机击落，虽然中国立即表示遗憾并愿意赔偿一切损失，但美国仍下令其空军伏击了两架中国战斗机。

美国在印度支那进行军事干涉的目的没有达到，杜勒斯认为，由于在亚洲没有一个西方的国际组织，因此美国要求各国同它进行了“联合行动”缺乏合法性，也没有组织上方便。美国在1954年6月开始就拉拢英、法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四国进行会谈，讨论如何建立一个东南亚地区的反共军事联盟，以应付将来可能发生的军事干预需要。

英国不愿意让美国在亚洲任意进行军事行动，担心这会影响欧洲局势。但是英国也需要美国的承诺，即一旦英国在马来西亚的殖民统治出现危机时，美国将会提供军事支持。因此，英国希望建立一个“洛加诺条约”式的组织，通过国际保证来阻止“共产主义扩张”。英国还希望不强调该组织的反共目的，以此吸引亚洲的中立国家参加条约。

美国不同意英国的设想，在美国看来，中立主义国家只会起消极作用。

拟议中的条约应当是以反对共产主义侵略和颠覆为明确目的,因此只能让亚洲反共国家加入这一组织。美国希望在需要时由这些国家提供陆军,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只需要出动海空军。结果,9月在马尼拉成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只有泰国、菲律宾和巴基斯坦三个亚洲国家加入。这些亚洲国家有的指望得到美国的援助,有的希望美国会"自动反应"进行军事干预。总之,他们的目的与美国有很大的差异。

"马尼拉条约"将印度支那地区列入"受保护"地区。这违反了"日内瓦协议"中有关老挝和柬埔寨中立的规定。该条约还允许成员国对地区内发生的"颠覆"进行干预,这种把一国内部事务作为军事干预理由的条约,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针对有的国家指望美国对任何"侵略"都做出反应,美国政府单独发表声明,宣称该条约只是对付共产党侵略的。

1954年12月,艾森豪威尔政府批准了NSC-5429号文件。在这个关于美国远东政策的文件中,美国在对华政策方面提出了三个目标:第一,要削弱新中国的实力,用一切可行的公开或秘密手段在中国内部制造不满和分歧。通过改变中国的方向,使中国出现与美国至关重大的利益不相冲突的政府。第二,要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并打击中国的国际威望,不同中国达成任何有助于缓和的妥协。第三,竭力促使中苏同盟发生分裂,破坏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同前苏联的关系。显然,美国还是要以僵硬的遏制政策来同中国打交道,它的远东政策是要加强亚洲地区的对抗,阻止这一地区出现和平共处的局面。

中国政府在朝鲜战争发生后推迟了解放台湾的军事准备。但台海地区的局势一直是紧张的。在美国的庇护和支持下,台湾国民党军队不断地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军事袭击和骚扰,干预大陆的海上交通,并且侵犯大陆上空进行侦察和骚扰飞行。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还提出了"放蒋出笼",企图利用国民党军队干扰中国在朝鲜的作战。美台方面的这些行动不仅使大陆人民遭到生命财产损失,而且加剧了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

日内瓦会议在1954年7月21日结束,毛泽东立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不能再拖延。《人民日报》在23日宣布,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8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不容任何国家干涉。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接到命令,准备对浙江沿海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较大规模的打击,目标是攻占在数万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大陈岛。9月上旬,为惩罚国民党军队的不断挑衅,人民解放军对福建省的金门岛进行了大规模炮击。中国的这一行动也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探路,测试美国和

台湾方面的反应。

在朝鲜战争发生后，美第七舰队以防止战争扩大为名，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在朝鲜战争停战后，美军继续留驻这一地区失去了借口。台湾当局希望继续得到美国的军事保护，甚至希望能在美国帮助下“反攻大陆”。因此它在1953年初就提出同美国签订条约，希望以这一方式拴住美国。美国虽然要阻止中国解放台湾统一国家，但是美国开始并不愿意受“防御”条约的束缚，希望让国民党军队对大陆具有进攻性的威胁。1954年5月，杜勒斯说，美国政府既不想阻止国民党对大陆的军事进攻，冻结台湾海峡的形势，也不想承担有可能使自己卷入国共冲突的条约义务。显然，美国此时还没有确定让台湾在它未来的对华政策中起什么作用。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美国意识到继续利用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来威胁大陆已经没有意义了，美国应尽快同台湾签订“防御条约”。但是由于台湾在东南沿海地区还占领了一些岛屿，条约的地理范围非常难以确定。美国希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但是美台条约如果将国民党军队占领的沿海岛屿纳入保护范围，今后就可能被蒋介石拖入“反攻大陆”的行动中去，如果美国拒绝保护这些岛屿，国民党军队会遭到严重损失，而且无法保住它们。这种失败在美国国内和亚洲盟国当中都会引起严重的政治后果。

中国炮击金门的行动震动了台湾，也震动了华盛顿。杜勒斯一度想把台海问题纳入到联合国的议程中去，希望以此阻止中国的军事行动。10月，美国政府决定同台湾签署“单纯防御性”的条约，杜勒斯对国民党“外长”叶公超说，美国不打算把沿海岛屿包括在条约内，但也不会让这些岛屿的地位发生变化。台湾起先要求让美台条约的适用范围包括“所有的中国领土”，但最后他们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方案，同意条约只适用于台湾和澎湖列岛。由于沿海岛屿地区正处于交战中，为了帮助国民党继续占有这些岛屿，双方同意在条约中加入“适用于经共同商定后确定的其他领土”这样的模糊文字。

11月，中国法庭宣判11名美国空军人员犯有间谍罪。这些军人是在朝鲜战争时期飞入中国东北地区侦察、因飞机被击落而被捕。美国认为这些人是战俘，应根据朝鲜停战协议加以遣返。美国军方提出了封锁中国海岸、进行空中袭击等报复措施。美国国会共和党领袖威廉·诺兰(W. Knowland)甚至公开宣称要对中国进行封锁。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决议，指责中国违反朝鲜停战协议。美国舆论中出现了一股新的反华浪潮。

1954年12月5日，美台双方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中国政府对这一

行动做出了强烈反应,周恩来指出,美国试图以美蒋条约来吓倒我们,但我们是吓不倒的,中国热爱和平,但不会拿自己的主权和利益去乞求和平。早在 11 月,华东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开始为解放浙东地区的大陈岛作军事准备,海空军部队对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发起一系列的进攻,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海军与岛上的目标。

"美台条约"的签字使中国暂时推迟了对大陈岛的进攻,但中国领导人很快判明,这一条约并没有改变美国的态度,美国不会因为这几个小岛同中国打仗。1955 年 1 月 18 日,解放军对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发起三军联合登陆作战,数小时后就占领了这个岛屿。这一仗表明,中国已具有海空协调和登陆作战能力,攻克国民党占据的其他沿海岛屿只是时间问题。

美国政府先是缩小一江山岛战役的意义,但是当台湾方面告诉美国说,它将死守大陈等岛屿而不考虑美国的立场时,美国政府不得不改变方针。蒋介石以"死"相逼,就是看准了在"美台条约"刚签订的情况下美国不能丢下他不管,那将会在美国国内引起严重的政治后果。杜勒斯与参联会主席雷德福在 1 月 20 日会见艾森豪威尔,建议修改安全委员会原来的决定,鼓励蒋介石从大陈岛撤出数万守军,同时表明美国将帮助蒋防守金门马祖。他们认为,如果美国对这一发展不加干预,人们就会认为美国在逃避责任。

1 月 22 日,美国向第七舰队增派三艘航空母舰,大批美国飞机和船只开向台海地区。24 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了"特别咨文",说中国的军事行动威胁了"美国的安全",要求国会授权他使用美军保卫台湾以及其他"有关地区"。美国参众两院经过三天辩论后以多数票批准了总统的要求。美国的这些措施导致了中美战争危机的形成。

美国的政策变化引起了英国的严重不安,英国反对美国公开宣布保卫金门,认为这会使各方面产生混乱,而且会使国民党长期留守沿海岛屿,使形势不能缓和。英国建议由联合国采取行动缓解危机,并争取中国的最低限度配合。在英国的说服下,美国同意不公开宣布"协防"金门,但美国也不否认它可能采取军事行动。但在私下里,艾森豪威尔政府向台湾作了"协防"的保证。

在英美授意下,新西兰向安理会提出讨论台海危机的议案。2 月 5 日,周恩来对为联合国秘书长传话的瑞典驻华大使说,这是一个制造"两个中国"的方案,中国不能接受联合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国希望缓和紧张,也不拒绝同美国谈判解决紧张局势。中国领导人还对国际社会表明,中国不要战争,但有人要侵略中国,中国就要坚决予以回击。

由于情况发生变化,解放军推迟了对大陈岛的登陆,但海空军对大陈一带进行轰炸和打击。2月5日起,在美国第七舰队的支持下,两万多国民党军队从大陈撤退,他们还强迫近2万大陈居民离开家园,迁往台湾。解放军对撤退中的国民党军队未加阻拦,20天后占领了无人驻防的大陈岛。这次作战解放了浙东地区全部敌占岛屿,基本解决了东南沿海长期受国民党军队骚扰的问题,达到了作战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搁置对福建沿海马祖等岛的进攻,并逐步停止炮击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岛屿。

第四节　万隆会议与中国重塑和平形象

朝鲜战争结束后,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国际政治舞台上更为活跃。这些国家迫切需要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需要全力投入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建设中去。1953年,由于美国同巴基斯坦缔结"共同防御协议",印巴两国出现了紧张气氛。锡兰提出在科伦坡召开会议,解决这些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科伦坡会议于1954年4月召开的,与会的有印度、印尼、锡兰、缅甸和巴基斯坦的五国总理。会议向世界宣示了要求和平与中立的立场,并表示应结束殖民主义的统治。

此时正是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科伦坡会议各国的立场表明,他们认为印支战争具有殖民主义性质,而不是西方所说的是"共产主义扩张"。会议要求法国保证让印度支那三国实现完全独立,会议也要求在印支实现停火,并要求中、苏、美、英采取共同行动,防止该地区再次出现冲突。与会国还宣布,他们反对干预其他国家内政,不管这一干涉来自共产主义国家、反共国家还是其他的代理人。

1954年12月,五国总理在印尼的茂物召开了第二次科伦坡国家会议,商讨如何推动亚洲和非洲新独立国家的合作。他们决定于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一次亚非国家首脑会议,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26个国家出席会议。五国总理宣布,会议将讨论与会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与各国间的关系,讨论有关民族主权和殖民主义,以及亚非国家和人民在世界上的地位等问题。

中国领导人对于参加会议的方针进行了仔细的研究。1955年4月,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外交部准备的与会文件。这一文件认为:亚非会议是首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并由亚非国家举行的国际会议。大多数亚非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要求和平、独立、发展经济的愿望。文件说,中国参加会议的总

方针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创造条件。这一文件还强调了友好合作应该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反对侵略反对战争为基础。

中国领导人对形势作了全面的分析，他们估计了台海危机可能的发展动向，并为如何应付这些发展提供了指导原则。关于会议上可能发生的意识形态的争论，方案也作了如何化解与反击的准备。中国政府希望尽力推动会议取得成功。

但美国政府对这次会议采取了与此相反的态度。杜勒斯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会利用万隆会议，美国必须避免会议的“破坏性后果”。1955 年 1 月，杜勒斯两次主持会议，讨论美国的对策。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饶伯森(Walter Robertson)说，万隆会议为周恩来提供了讲坛，他可以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掩护下向一些幼稚的听众传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共还可能提出一些没有一个亚洲领导人敢于反对的反殖民主义决议，中国还可能赢得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支持。

杜勒斯霸道地说，如果亚非国家养成一种在西方缺席的情况下经常开会的习惯，由于有众多的人口，印度和中国无疑将控制局面，这可能最终形成一个反对西方的集团。杜勒斯明确说他希望会议开不起来。美国的这种态度表明，它努力要阻止万隆会议的召开。

在以后两个月中，美国一直试图说服亲西方的亚非国家拒绝参加会议。但是这些国家内部也有民族主义要求，政府虽然受到美国的压力，但也不愿意表现出疏远多数亚非国家的倾向。因此，美国不得不提出第二种方案。2 月，美国国务院指示它的驻外机构说，美国要求有关国家派亲美人士参加会议，并敦促他们在会议上发表反共讲话。指示还说美国希望这些国家阻止共产党利用议，并使会议转而产生“积极的后果”。显然美国试图以反共观点冲击会议的反殖主题，迫使与会各国陷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之中，达到削弱中国影响的目的。

万隆会议在 4 月 18 日开幕。印尼总统苏加诺(Sukarno)在开幕辞中指出，虽然亚洲各国在政治、社会结构和文化方面各不相同，但他们同样有遭受殖民主义的痛苦经历，面临共同的未来。他加要求各国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反殖民主义的统一战线。他还要求反对集团政治，为全世界人民找到通向和平的共同出路。但是，伊拉克代表当天就作了以反共为主调的发言，第二天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的代表也加入了反共合唱。他们的讲话不仅反共，而且还对中立主义政策进行了批评。

周恩来在发言中对这些议论作了回应。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不讳言相信共产主义，相信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这个会议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他指出亚洲国家间有求同存异的基础，应当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各国间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周恩来的讲话受到了各国的欢迎。

但是会议的气氛仍然是不和谐的。黎巴嫩外长马立克(Charles Malik)、菲律宾外长罗慕洛(Carlos P. Romulo)、泰国外长旺亲王(Prince W. K. Wan)等人四处寻找支持者，他们对尼赫鲁进行围攻，试图歪曲削弱中立主义的意义。一些国家还将前苏联与东欧问题牵扯进来，称之为“新殖民主义”。在他们的分化下，与会各国一度分裂成两派，一派支持尼赫鲁的中立主义和不结盟政策，并赞成和平共处。另一派支持集体防御，要求与西方结盟，并且表示反对共产主义“扩张”。在这种情况下会议公报起草委员会无法达成共识，会议已经到了失败的边缘。

周恩来在会议上与各国代表进行各种交流，他一方面婉转地驳斥了一些国家议案中的反共言辞，另一方面反复要求大家寻找各国的共同点，要求将和平共处的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写入最后公报。在周恩来的努力推动下，一些亲西方的代表改变了态度。会议公报起草委员会最后成功地完成了工作。万隆会议的反殖民主义主题得到了突出，和平共处的各项原则被写入了公报。中国的对外政策进一步为亚非各国所了解，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得到提高。

万隆会议召开时，台海危机仍未得到解决。美国政府以核武器威胁中国，因此，亚洲地区的形势相当紧张。一些民族主义国家对台湾问题很不了解，有的还接受西方的观点，认为可以让台湾独立。为了阐明真相，周恩来在万隆向各国代表作出解释，指出台湾问题的实质是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正是这种干涉造成了国际紧张局势。4月23日，周恩来在政治委员会上说，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亚洲局势的问题。中国的这一立场公开发表后，赢得了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并结束了当时的台海危机。

在万隆会议之后，美国政府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同意同中国进行谈判，两国政府商定在日内瓦进行大使级会谈。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此时同意与中国进行谈判只是为了应当国际舆论。杜勒斯在对美国谈判代表、美国驻捷克大使阿历克西·约翰逊(U. Alexis Johnson)的特别指示中说，

在谈判中他不得涉及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认，不得涉及台湾当局的权利。美国在谈判中应当首先促使中国释放被扣押的美国人，并规定实现这一目标是进入下一步实质性谈判的前提。

中美谈判在1955年8月1日开始，为了尽早进入实质性谈判，中国政府在谈判开始前就宣布将释放被扣押的美国空军人员。在以后一个月的谈判中，双方就滞留在对方国家中的人员回国问题达成了妥协。但在取得这一进展后，美国谈判代表开始采取敷衍态度，他们仅提出讨论双方在台湾地区不使用武力问题，试图以此达到阻止中国统一国家的目标。

中国政府提出，谈判双方可以讨论台湾问题，也可以讨论美国取消对华经济制裁问题，以及可以讨论两国外长直接会谈问题。但这些实质性的议题都被美国政府拒绝。其实美国政府在NSC-166号文件中已经明确规定，不对中国作任何实质性的让步，美国只是迫于舆论压力而不愿中断谈判。在以后的两年中，中国代表还提出过讨论消除阻挠两国间贸易障碍的议题，提出过消除干扰两国间相互接触和文化交流障碍的议题，但这些建议仍然遭到美国的拒绝。针对美国在大使级会谈中采取“拖而不断”的方针，中国领导人表示，中国可以同美国十年、二十年的谈下去。

台湾当局对美国同意谈判非常紧张和关注，国民党特别担心中美间的谈判会达成某些妥协，使它的利益受到损失。由于“美台条约”已经成为现实，由于国内已进入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时期，中共决定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更为灵活的方针。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次年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提出，希望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去台湾和海外的人员，站到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为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

由于美国政府一直暗中推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中国的和平统一的方针也是针对美国的。这一时期，美国一方面在台湾秘密寻找可以替代蒋介石、接受“两个中国”政策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还试图让联合国出面推动“两个中国”的图谋。蒋介石为此对美国非常不满，他不仅打击了吴国桢、孙立人等亲美人物，而且还对台湾舆论严加控制。美蒋关系一度颇为紧张。

1956年夏秋之际，周恩来和毛泽东都公开表示，愿意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方法，愿意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毛指出，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合作过两次，现在为什么不能进行第三次合作呢？中国领导人还

表示，蒋反对“两个中国”，这一点大陆同他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还建立了对台工作小组，希望开辟与国民党当局的秘密对话渠道，请一些与台湾当局有关系的中外人士向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传话，表示大陆愿意和平谈判，而且不排除与任何人合作。中共向台湾方面指出，大陆对台湾不是招降，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共同商量。

1957年，蒋介石曾派人来大陆了解中共的具体想法。周恩来告诉来人，国共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成为中国政府管辖下自治区，台湾政府可以仍旧归蒋介石领导，共产党不派人去干预。中共提出和平统一方针后，美国对台湾更不放心。美国情报机构常常编造出蒋氏父子在与中共谈判之类的消息，测试台湾当局的反应，达到阻止两岸间接触的目的。1957年，台湾发生了“五·二四”反美示威活动，美台关系受到严重冲击。加上大陆政治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国民党当局停止了与大陆的进一步接触。

进入1957年，美国不仅没有采取缓和形势的行动，而且将美国的“斗牛士”地对地导弹部队派驻台湾。杜勒斯还故意而放肆地攻击中国。6月，他说新中国是暴政统治，共产主义在中国是一个很快会消失的现象。针对国际上出现的要求承认中国的呼声，他为美国不承认新中国、阻止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席位，以及美国拒不同中国发展经济贸易和文化关系辩护，声称中国“有连续侵略的历史”，说美国不接受承认中国是“不可避免的”那种观点，也不承认共产党的势力占有优势。他说前苏联多少还表现出和平的愿望，而中国则倾向于采取暴力手段。他还自我鼓吹说，美国是通过和平演变而不断取得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杜勒斯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要挑拨中苏关系，二是要刺激中国。

在台湾发生反美示威以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还专门研究了对台政策问题。会议否定了要改变国民党军队使命，否定了它应有进攻性能力的需要，但是杜勒斯强调，美国也不必使国民党军队一直维持在某种水平上。他说重返大陆是国民党维持其军队士气的原因，因此美国还必须让国民党军队具有反攻大陆的希望。杜勒斯还说，亚洲自由国家向望自由的原因是，他们希望新中国政权会垮台，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事情也会在中国发生，如果这种机会到来，台湾国民党军队就会得到他们要寻找的机会。杜勒斯这一番议论表明，美国希望利用复杂的国际形势，加强新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威胁。这次会议根据杜勒斯的建议，决定配合国民党进行的反攻大陆宣传，为国民党提供一些进行军事进攻所需的装备，并为国民党训练一些空

降部队。

第五节　苏共二十大与波匈事件的冲击

斯大林去世以后,马林科夫担任苏共中央主席团主席和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两个职务,而赫鲁晓夫负责权力有限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斯大林的心腹贝利亚(Beria, Lavrenty Pavlovich)兼任了内务部及国家安全部两个部门的部长。在斯大林时代,这两个部门只对斯大林个人负责,他们以清除内部阶级敌人为名,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贝利亚过去的行为,以及此时非同寻常的权力使前苏联其他高级领导人非常担忧。

1953年6月,在赫鲁晓夫、布尔加宁(N. A. Bulganin)和朱可夫(G. K. Zhukov)等人的策划下,苏共主席团以贝利亚有历史问题为由逮捕了他。年底,一个特别法庭宣布贝利亚犯有通敌罪和阴谋夺取权力罪,并判处其死刑。贝利亚在前苏联安全机构中的主要追随者也受到了审判。清除贝利亚集团,提高了赫鲁晓夫的个人威望,而且也使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大为增强。在1953年9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马林科夫因同贝利亚的暧昧关系,地位开始下降。

前苏联在1953年成功地试验了第一个热核武器,拉近了它同美国的军事差距。美国意识到前苏联军力的上升,加强了在核武器领域的投入,并积极推动西德的重新武装。美苏两国在外交和军备领域中开始了新的竞争。

前苏联长期奉行军事建设和重工业优先的方针,尽管这一方针有力地促进了国防建设,但它也使前苏联的经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并造成农产品、住房以及一般消费品的短缺。马林科夫一度希望将较多的资源用来发展经济,1954年3月,他在最高苏维埃大会上说:"考虑到现代战争的方法",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就"意味世界文明的毁灭"。马林科夫也许想改变过去的方针,使前苏联经济结构趋向较平衡的发展。但这一看法遭到了其他领导人及军队的抵制。

苏共主席团的其他成员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K. E. Voroshilov)等人强调,核战争不是不可能的,他们要求加强军队建设,这种立场得到了军队的支持。1955年初,马林科夫又受到莫洛托夫等人的批评,指责他忽视了重工业。2月,马林科夫宣布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前苏联领导层的变化表明,前苏联内对外政策仍不稳定。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前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两国关系取得

了新的进展。在访华以前，赫鲁晓夫克服了伏罗希洛夫等人的反对，决定将旅顺海军基地归还中国。根据两国协议，前苏联决定将基地的大部分军事设备低价或无偿移交中国。赫鲁晓夫在北京还表示，前苏联可以考虑放弃中苏互助同盟条约中的"补充协定"。这是一个损害中方在东北地区主权的秘密文件，中国对赫鲁晓夫的提议表示欢迎。一年以后，前苏联还正式通知废除这一不符合两国友好的协定。赫鲁晓夫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姿态加强了两国间的信任，有助于双边关系的发展。

为了适应经济贸易领域中的合作，中苏还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双方决定相互无偿提供科技资料，根据这一协定，中国得到了前苏联大量的科技资料。在中国投入朝鲜战争后，斯大林同意增加对华援助项目，赫鲁晓夫在北京访问时进一步明确了将援助项目增加到 156 项。这些重点经济项目得到了顺利执行，大量的苏制设备和技术交付中方。此外，两国在文化教育等方面扩大了合作交流，在对外政策领域中也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1955 年春，联邦德国加入了"北约"组织。前苏联一直认为德国的重新武装会增强西方的军事力量，为了向西方显示其强硬的立场，前苏联和东欧五国在 5 月份组织了华沙条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对立进一步强化了。在此同时，赫鲁晓夫坚持了和平共处的政策，他努力改善同南斯拉夫和奥地利的关系。1955 年 4 月，苏奥两国达成一致意见，奥地利成为永久中立国家，前苏联和其他西方国家将军队从奥地利撤出。在奥地利条约签订后，前苏联与西方的关系有所缓和。

7 月，前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在日内瓦举行了二战以后的第一次大国首脑会议。前苏联希望，这次会议能使它与西方的紧张关系得到步缓和。会议的议程主要有关于欧洲安全和和德国统一问题。西方强调要通过自由选举解决德国问题，赫鲁晓夫则强调选举必须同前苏联等国的安全利益相一致。赫鲁晓夫在会议上提出，东西方同时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将所有的外国军队从欧洲大陆撤出，并缔结一个欧洲的安全条约。这一建议的宣传意义似乎大于实际意义，因为西方不可能接受这种将美国排除在外的想法。

在有关裁军的议程中，艾森豪威尔提出了"开放的天空"的建议，要求前苏联和西方相互开放领空，为以后的裁军核查提供可能。前苏联一直认为这类建议就是要让美国飞机在前苏联领空进行侦察，所以这实际上也是美国的宣传姿态。这次首脑会议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冷战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在这次会议之后，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Konrad Ade-

nauer)访问了前苏联,两国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前苏联和日本也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清除贝利亚集团以后,苏共中央开始对斯大林时期的一些重要案件进行了重新审查。在苏共中央、中央监控委员会和总检察院的指导下,一些专门委员会开始对基洛夫(S. M. Kirov)谋杀案、奥尔忠尼启则(G. K. Ordzhonikidze)自杀案、图哈切夫斯基(M. Tukhachevsky)元帅间谍案等进行审查。委员会还为在斯大林时代受到迫害的一些官员和家属进行反平,为已经死去的官员恢复名誉。1955 年,有近 1 万被关押的人得到释放或被允许回家。他们大多数是 30 年代的党政官员。

这项工作是在小规模范围内进行的,而且速度很慢,但是审查工作的后果迅速传遍了全国。当时前苏联还有上百万人被监禁和劳改,总检察院收到大量来信,要求对有关案件进行重新审查。一些劳改营甚至发生了骚乱。苏共主席团成员米高扬(Mikoyan, Anastas Ivanovitch)首先提出清查斯大林时代的政治迫害问题,并向全党作一交代。他说如果等别人来做,现领导就会身败名裂。主席团在 1955 年冬建立了以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P. N. Pospelov)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指示他们对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和其他受迫害的前苏联公民情况进行研究。主席团一直得到该委员会调查进展的报告,结果表明斯大林本人对大规模政治迫害,甚至对一些政治局委员的迫害有直接责任。

苏共中央决定在 1956 年初召开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在主席团讨论专门委员会报告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对于如何评价斯大林、是否要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到斯大林滥用权力问题,以及现领导的责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认为应指出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继续人,赫鲁晓夫和萨布罗夫(M. Z. Saburov)等人则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斯大林已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布尔加宁和苏斯洛夫(N. A. Suslov)认为,可以分两个阶段评价斯大林。马林科夫虽然同意重新评价斯大林,但反对将该问题放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

最后,要求讲明真相的意见占了上风,主席团同意了在二十大开幕后作关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的专题报告。赫鲁晓夫建议由波斯别各夫作该报告,但主席团认为应该由第一书记本人作。

二十大在 1956 年 2 月中旬如期召开。赫鲁晓夫在公开报告中叙述了党在过去的成就,也提到党犯过错误,以及今后的工作方针。赫鲁晓夫强调了前苏联今后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原则,并说过去 20 年盛行的个人崇拜造成

了极其有害的后果。他还提出要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中调动各个层次的积极性，放松过紧的国家控制。

报告在谈到前苏联对外方针时指出，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体系，它的经济和实力地位已经大为改进。而资本主义世界却发展不平衡、不稳定。在亚洲和非洲还出现了反对战争的广大的和平区。因此，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条件已经改变，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间将展开和平竞赛，他们之间的关系将是和平共处的关系。

赫鲁晓夫还指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更具优越性，前苏联不需要通过战争来达到其目的。在不同的国家里，以不同的方式进入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赫鲁晓夫强调，战争不符合前苏联的利益，由于核武器的发展，新的战争不会有胜利者，共处是唯一的出路。赫鲁晓夫说要以加强信任作为裁军的一个步骤。赫鲁晓夫指出，和平共处已经是前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显然苏共认为和平共处已不是一种暂时现象，而具有在整个时期实现共处的前景。这表明前苏联对外政策将出现进一步的调整。

在会议结束前，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他先提到了列宁批评斯大林的"遗嘱"，指出斯大林应对农业政策和战争前期的失败负责。赫鲁晓夫指出，斯大林完全破坏了社会主义司法程序，从 1934 年起，他以调查"基洛夫谋杀案"为名在全党进行大清洗。在近五年的时间中，内务委员会等机构事先多次拟好名单，交给斯大林批准。这涉及到几千名党、政、军、团和经济、文化界人士。通过刑讯逼供迫使那些被迫害者承认强加的罪名。这些人一经判决反革命罪就立即执行，不得申诉和减刑。

秘密报告说明，在苏共十七大选出的 139 名中央委员中，有 2/3 被逮捕、枪毙。十七大的党代表有 1966 人，被逮捕的达 1108 人。一大批党和国家的杰出的领导人、大批的苏军高级将领遭到非法审讯和处决。报告认为，这种迫害是"消灭党政干部的敌对政策"。

秘密报告批判了大清洗的理论基础—阶级斗争激化论，指责斯大林利用这种理论违反一切革命和制度准则，进行大规模恐怖和镇压活动。斯大林鼓励个人崇拜，篡改党和他个人的历史。斯大林要对前苏联农业和外交政策上许多重大错误负责，甚至在其有生最后一年还准备进行新的大规模政治清洗。但报告最后部分还是提到了斯大林努力捍卫革命成果，对党、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功绩。他的所作所为是他相信那样做对人民和党是有利的。

赫鲁晓夫的报告使与会代表深感震惊，虽然他们对斯大林的错误有所

认识,但是对于问题的严重性却没有准备。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很快泄露出去,几天后就出现在西方的媒体上。苏共稍后进行了党内传达,让全党批判个人崇拜问题。这份报告的缺陷是明显的。报告虽然揭露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阴暗面,揭露了他对党和国家官员滥捕滥杀的罪行,但是对于成百万受到迫害的群众却完全没有提到。报告批判了斯大林破坏法制,但没有提及他破坏民主,建立极端集权的问题。赫鲁晓夫也没有对产生斯大林问题的背景作出历史和理论的分析,仅将这一时期的所有问题归咎于斯大林个人。

前苏联对斯大林的批判对于其国内政治经济政策的调整,对于调动广大干部与群众的积极性具有明显的意义。但是它在国际上引起了很严重后果。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反共和反苏的潮流,大批党员退出党的组织。西欧共产党受到特别严重影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不得不宣布社会主义可以有多种模式,共产主义运动也可有多个中心。表明了西欧党脱离苏共影响的倾向。

苏共二十大对东欧国家产生了严重冲击,斯大林时代形成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出现危机。波兰是最早出现动荡的国家。统一工人政府对过去的错案进行了审查,斯大林时期被关押的领导人哥穆尔卡(W. GomulKa)恢复了名誉,政府宣布进行大赦,数万政治犯被释放。波兰政府还放松了对社会和新闻的控制,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事实得到了官方承认。6月,波兹南地区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工人的请愿和示威游行发展为骚乱,当地政府下令进行武装镇压。

事件发生以后,波兰政府迅速采取安抚行动。7月,波党内改革派在七中全会上战胜保守派,他们同意哥穆尔卡回到政治局,同意给工人增加工资,并承诺要进一步进行改革。这些措施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应,政府的内外政策都受到了公开挑战。10月,党的领导人认为只有哥穆尔卡才能挽救党。他们全面接受了哥尔穆尔卡的观点,准备组织新的政治局,并将斯大林模式的支持者开除出政治局。保守派认为波兰在脱离前苏联路线,他们要求莫斯科进行紧急军事干预。

在波兰的苏军随即受命开始调动。19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开幕时,赫鲁晓夫率领一大群前苏联党政军领导人飞抵华沙。但党的新领导顶住了前苏联的压力,群众和军队也准备以武力抵抗苏军。在各方面压力下,赫鲁晓夫没敢对这次改革采取镇压行动,并接受了哥穆尔卡当选第一书记的事实。

受苏共二十大严重影响的另一国家是匈牙利。匈牙利在1953至1955年期间出现过一次改革浪潮，但是斯大林模式的强硬支持者、匈共第一书记拉科西(Matyas Rakosi)否定了改革。支持改革的总理伊雷姆·纳吉(Imre Nagy)也因此下台。

在苏共二十大后，匈牙利利出现了更强烈的改革要求，大批政治俱乐部被组织起来，人们不仅要求恢复改革，而且公开讨论前苏联模式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的问题。拉科西开始想作出让步，宣布为被作为美国和南斯拉夫间谍处死的前领导人拉伊科(Laszlo Rajik)恢复名誉，并宣布释放部分政治犯。但这一行动只是刺激了党内外的反对势力，他们要求更多的改变。结果拉科西在7月重新采取压制措施，逮捕了数百名反对派人士。

拉科西的行动引起匈牙利民众的强烈反抗。赫鲁晓夫担心形势失控，迅速进行了政治干预。匈牙利共产党宣布拉科西辞职，并起用格罗(Erno Gero)接任匈党第一书记、卡达尔(Janos Kadar)任中央书记。

注意到东欧国家所发生的政治风波，美国政府在幕后也进行了积极的干预。美国大使馆和情报机构支持反对派势力，他们先是让反对派支持纳吉等党内改革派，要求拉科西下台。在反对势力取得更大影响后，美国外交官鼓动反对派否定前苏联体制，提出苏军从匈牙利撤走等要求。10月6日，布达佩斯20万人为拉伊科举行葬礼，这一行动演变成街头抗议。10月22日，反对派提出了实现多党制，要求纳吉担任总理等要求。第二天形势失控，首都布达佩斯出现了武装造反。在这一情况下，纳吉被宣布重新担任政府总理，卡达尔任第一书记，苏军开始向布达佩斯调动。

但是赫鲁晓夫对于是否要采取镇压行动迟疑不决，苏军一度又退出匈首都。纳吉要求造反者放下武器，由他去谈判让苏军撤走。但是纳吉不能控制造反者，他们在美国及西方舆论的鼓动下继续同政府武力对峙。30日，一批匈保安部门人员被造反者杀害。同一天纳吉宣布废除一党专政，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局势更为恶化。11月1日，纳吉开始与造反势力合作，他公开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保护匈牙利的安全。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匈牙利的武装造反非常高兴，但美国担心引起全面冲突，不敢进行直接军事支持。卡达尔拒绝接受纳吉的立场，他到前苏联宣布另组工农政府。4日，苏军在坦克支持下强行进入布达佩斯，并造成了数万人的严重伤亡。匈牙利事件以改革开头，却以悲剧收场。

中共一直关注着苏共二十大以后东欧的局势。在波兰局势恶化后，中共收到了苏方的通报，称波兰出现了嚣张的反苏活动，前苏联准备以军事方

式解决问题。毛泽东认为,前苏联以武力解决波兰问题是很不妥当的,苏波关系紧张是前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中国共产党在10月20日决定,明确反对前苏联军事干涉波兰,并立即通知前苏联这一立场。此时前苏联已经决定不采取军事行动,苏共要求中共去莫斯科参加苏、中、波兰三方会谈。

刘少奇到达莫斯科以后批评了前苏联使用武力的想法,在支持波兰党抵制前苏联压力的同时,中国也希望波兰以大局为重,改善双边关系。经过多次磋商,各方决定由前苏联发表一份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宣言,承认前苏联过去的行为存在错误,今后要根据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方式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

但是,此时的匈牙利事态已经日益恶化,赫鲁晓夫已在波兰问题上碰了钉子,面对更为严峻的匈牙利形势举棋不定。10月30日,毛泽东认为匈牙利局势同波兰的性质不同,如果前苏联撤出军队,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政权就会垮台。他认为苏军应当留在匈牙利,帮助匈政府平定反革命叛乱。刘少奇将中共的这一立场通知前苏联时,苏共已决定要撤军。刘指出,如果此时撤军,苏领导人将是历史罪人。11月1日,刘少奇回国前接到赫鲁晓夫的通知,他说苏共已决定留在匈牙利,帮助匈人民保卫社会主义成果。赫鲁晓夫当时还征求了南斯拉夫的意见,在得到铁托(J. B. Tito)的支持后,决定使用武力进行镇压行动。

第六节　莫斯科会议与中苏分歧的隐现

中共对于前苏联否定斯大林没有思想准备。出席苏共二十大的邓小平认为,秘密报告虽然揭露了斯大林的很多错误,但报告内容杂乱,逻辑性很差,政策性内容也不清楚。毛泽东最初的反应是,赫鲁晓夫的这报告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这样做有破除迷信的积极方面,但也存在捅娄子的消极方面。他认为这个报告在内容与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中共要好好研究。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面讨论了斯大林问题和苏共二十大的路线,中共领导人回顾了斯大林与中共历史上错误的联系,分析了前苏联的个人迷信问题,以及赫鲁晓夫报告中的各种错误。中共领导人认为,由于共产主义运动是伟大和艰巨的,不犯错误也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会犯错误。斯大林犯过原则性的严重错误,但是他也有伟大的功绩,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中国领导人还认为,前苏联揭露斯大林问题,有

利于反教条主义，中国今后不能再照搬前苏联的一切，要将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探索在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担心否定斯大林会产生国际上的消极后果，他们准备采取一些补救措施。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政治局多次修改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从前苏联和国际共运的不同角度来分析了个人崇拜问题，文章指出斯大林犯下了严重错误，但也强调了他的历史功绩，并以很大篇幅强调革命过程中错误不可避免。这篇文章强调团结，并力求同前苏联保持基本一致，但文章也表达了不同于苏方的立场。由于前苏联对斯大林的批判缺乏基本理论与历史分析，加上中国自己的民主体制尚未完善，因此中共此时也不能认识斯大林问题所包含的深层意义和教训。

在以后一段时期内，中共谨慎地同前苏联保持协调，密切地关注前苏联和东欧的局势。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参加的国际场合，中国共产党开始强调各党之间的平等，并且批评苏共过去以不平等的态度对待其他的兄弟党。同时，中共也开始在国内政策上进行调整，力求纠正过去一味强调学习前苏联的教条主义思想，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方针。

1956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党代表大会。苏共派米高扬来北京参加大会。此时前苏联很担心非斯大林化会造成否定前苏联制度、否定前苏联领导地位的后果。苏共中央要求维持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国际友好团结。于是，米高扬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大力颂扬前苏联共产党的成就，强调前苏联是革命的中心。他甚至说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进步和成功都是根据前苏联的经验而来的。

米高扬的这番话显然使毛泽东不快，他专门同米高扬谈了一次中苏两党历史上的问题，批评了斯大林时期前苏联对中共内部事务的任意干预，强调了中共是从实践中克服了各种错误和缺点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他提出要对革命的经验予以认真全面总结，吸取教训。毛泽东说，谁也封不住中国人的嘴，“气不平、理不顺，就要出气，就要讲道理。”这番话显然不仅是针对米高扬大会上的讲话，也不仅是针对苏共的老子党态度，而多少是针对苏共领导层否定斯大林的路线而讲的。

匈牙利事件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再次受到打击。中共对赫鲁晓夫及苏共的态度也有了新的变化。11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铁托和匈牙利的一些人大反斯大林主义。美国也利用反斯大林攻击社会主义。他怀疑赫鲁晓夫甚至在抛弃列宁主义，他认为二

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和平过渡的设想，即通过议会道路争取政权，是违反列宁主义原则的。毛泽东说，东欧的问题基本上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没有肃清反革命分子，没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

1956年底，中共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对前苏联与东欧局势进行了多次讨论，希望形成更系统的看法。中共领导人认为，十月革命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规律，否定十月革命就是否定马列主义。各国有不同的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前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该明确的肯定，说前苏联是官僚主义统治是错误的。南斯拉夫现在的反斯大林主义是分裂共产主义队伍，非斯大林化实质是搞修正主义。中共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

毛泽东还认为，当前反苏反共风潮是一种阶级斗争，与人民内部矛盾是不同的矛盾。要以不同方针和政策解决不同的矛盾。中国共产党的这些观点表明，中苏两党已经有了重大的分歧，这些分歧涉及国际和国内政策的很多方面，并具有深层的意识形态冲突特点。

匈牙利事件对中共的影响是重大的。毛泽东认为中国要吸取教训，要利用这一事件教育人民。尽管1956年党的八大已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党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建设，但国际上的反共风潮使中共领导人重新考虑阶级斗争问题。这一年中国国内也发生了少量的罢工和罢课事件，这些发展都被看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1957年，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部署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运动，这场运动完全偏离了“八大”路线，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

在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的个人地位有了明显提高。这一年，前苏联在经济方面也实现了新的突破。在对外政策领域中，前苏联解散了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放弃了这一干涉各国党事务的工具。在中东，前苏联谨慎地支持纳赛尔总统对苏伊士运河实行国有化的政策。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和英法采取了入侵埃及的军事行动，英美争夺中东控制权的矛盾公诸于众。前苏联向英法提出抗议并谴责他们的侵略行动。11月5日，在英法的入侵行动无法维持下去时，前苏联公开警告说它可能进行军事干预。赫鲁晓夫的行动不仅使前苏联得到了阻止英法侵略的名声，而且为前苏联影响进入中东地区打下了基础。

进入1957年，赫鲁晓夫更显得踌躇满志。他迫切要对前苏联的企业管理制度进行全面改革，计划将大批中央企业转交给区域性的经济委员会管理。这一方案因涉及的问题太多，处理方式过于简单而受到主席团多数人

的怀疑。但赫鲁晓夫一意孤行地推动改革。他解散了中央政府的许多工业部门，将其职能移交给各经济委员会。由于对仓促改革不满，也由于对非斯大林化的后果不满，苏共主席团中出现了反赫鲁晓夫的小集团。

1957 年 6 月，趁赫鲁晓夫出国访问之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Kaganovich, Lazar)等人作了准备，试图解除他第一书记职务。但是赫鲁晓夫回国后拒绝主席团多数解除其职务的决定。他说自己是由中央委员会选举的，只有中央全会才有权解除他的职务。在与主席团多数僵持不下时，大批支持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迅速来到莫斯科，他们最终成功地召开了全会。赫鲁晓夫取得胜利，莫洛托夫等"反党集团"的成员或被处置或被批评。

1957 年 8 月，前苏联试验成功了洲际导弹。10 月，前苏联又宣布它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一消息立刻震动了全世界。前苏联的成功带来了强有力的政治和心理效应，它不仅对美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而且加强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1957 年 11 月，他们集聚到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胜利 40 周年，并且举行了 61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将莫洛托夫等人打成"反党集团"不满，但是考虑到这是苏共内部的事务，中共没有加以干预，并且在公开场合还表示支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中共这样做是从团结的全局考虑的，希望前苏联局势能够保持稳定。在中共表明态度后，处境困难的赫鲁晓夫对中共相当感激，他同意向中国提供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并同意为中国提供一个原子弹样品。10 月中苏两国签订了新技术合作协议。前苏联承诺向中国提供一大批国防新技术。

1957 年秋，毛泽东决定去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他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加强各国共产党人与帝国主义斗争的勇气，消除苏共二十大的一些错误思想的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的与会方针是，对苏以保为主，以批为副，尽可能去掉苏方的会议宣言草案中有害的东西。中共希望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以斗争求团结，协商一致，求同存异。

毛泽东、邓小平等人提早到达莫斯科，希望深入同苏共等兄弟党交换看法，商讨对会议宣言草案的修改。在会谈中中国代表团发现，各国党在如何看待战争与和平、社会主义共同道路、和平过渡、如何估计美国的作用等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一些西欧党和东欧党不愿意公开批评美

国，他们强调各国的独特性，并且反对强调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前苏联也坚持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观点。与中国相比，赫鲁晓夫的观点可能更接近一些西欧党的观点。

中共代表团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毛泽东还两次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强调了国际形势中的东风压倒西风，即社会主义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力量。他还提出了不要害怕帝国主义战争和原子弹是"纸老虎"的问题。但他的这些观点未能得到苏共和多数欧洲党的认同。赫鲁晓夫在会议上说，核战争会造成千千万万人死亡，会导致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毁于一旦。中国共产党不接受关于和平共处是国际共运的总路线的提法，以及和平过渡已具有现实可能性的观点。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深化和扩大了。

中共是抱着团结的愿望参加会议的，在坚持自己看法的同时，也在和平过渡这类问题上作了妥协。最后，中、苏等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签署了"莫斯科宣言"。南斯拉夫和其他一些西欧共产党不愿谴责美国，因此没有在这一代表中、苏观点的文件上签字。各国共产党在莫斯科显示了团结，苏共二十大的观点也被写入了文件。尽管各国党都认识到，一切以莫斯科为准绳的时代已经过去，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种分歧已经很难协调，但是无论在中共领导层还是苏共领导层，那种认为国际共运应当有一致性原则的观点却没有改变，这种局面隐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一步分裂的危险。

中国这一时期希望同西方实现和平共处。尽管中国对东西方和平共处的认识是初步的，但这一方针为缓和东西方关系提供了重要机会。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非常僵硬，美国不仅拒绝了和平共处的设想，而且希望利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不稳定来谋取冷战优势。美国有意识地强化中美之间的敌对气氛，并处心积虑地扩大中苏间的分歧。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和平共处的路线产生了消积的作用。

苏共二十大以及前苏联内外政策的调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赫鲁晓夫的草率处理，由于各国面临不同的现实等原因，它也对各国共产党造成了负面影响。中国领导人希望维护马列主义原则，力求全面总结前苏联的经验教训，其用意无疑是好的。但是中国当时也存在着从抽象原则判断前苏联历史是非的倾向，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对斯大林的罪错进行淡化和开脱。当时国际上的确有反共风潮，但仅从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共产党批判斯大林的言论中就得出他们是搞修正主义，这种判断不仅影响了中苏和中南关系，而且也影响了中国的内外政策。

1957年12月，杜勒斯决定，让一名代办级官员同中国大使谈判，以达到中断大使级会谈的目的。5月，日本右翼代表岸信介在美国支持下当选首相，他上台后加强同台湾的关系，并多次发表反华讲话。同年秋天，中印关系也因为领土问题表面化而冷淡下来。虽然中国政府作了很大的努力，但和平共处的政策没能取得预期的成果，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方向产生了疑问，缓和之窗面临着关闭的可能。

思考题：

1. 中国和平共处外交政策形成的历史背景。
2. 如何评价中国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作用和影响。
3. 第一次台海危机发生的背景及其原因。
4. 中苏分歧的形成与苏共二十大的关系。

参考书目：

1.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7)》，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
2. 蔡佳禾：《双重的遏制——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一册，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
4.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5.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6.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第四章
革命与危机的年代
(1958—1960年)

陈兼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

第一节　大跃进兴起与中国内外政策的转变

1958年,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以及全球冷战史的发展都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在中国国内政治与社会生活围绕着“大跃进”而急剧激进化的背景下,中国对外政策及安全战略也出现了一系列“革命化”转变。就内在逻辑而言,这两方面的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其过程与结果,不仅对中国本身的发展,也对全球冷战的进一步演变产生了深刻影响。

50年代中期,中共“八大”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国家发展大战略,与这种战略相适应,同时也出于打破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孤立与封锁政策的考虑,中国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要倡导者之一。中国对外政策与安全战略也在坚持向现存国际体系与体制挑战的革命性原则的同时,表现出了某种追求“缓和”的趋势。但所有这一切,都在1958年随着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以大跃进兴起为中心大幅度“左”转,而发生了重大变化。

大跃进发生于1958年,但其设想以及与之联系的中国政治“左”转,却有着更为长远的历史。

其重要根源之一,在于中国长期受到列强的侵略与压迫,对实现国家富强,以求得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的要求极其强烈,存在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诉求。在经历了几十年持续不断的战争之后,共产党最终一统江山,这不可避免地激发起整个社会想要尽快实现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极大热情。然而,由于冷战的影响,世界被划分成两大阵营,中国又因为台湾问题与美国处于尖锐对抗的局面,中国的国际地位更因为美国坚持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难以得到应有的承认。这些都使作为执政党,并且极度渴望实现自身的民族主义理想的共产党领

导人,受到相当的刺激。他们急切地希望能够改变这种情况。

其重要根源之二,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有着不同于前人的社会改造理想和革命的民族主义目标。毛泽东相信,中国革命于1949年取得的胜利绝不是革命的终结;中国的"革命后革命",将更为伟大也更为艰巨。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从一开始便同国内政治发展及其需要紧密相关。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事例,就是中国对朝鲜战争的参与。这固然是出于保卫东北边境并"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安全利益的考虑,但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次来看,毛泽东对朝鲜危机的处理中还包含着这样的意愿:通过高举"保家卫国"的旗帜,将朝鲜危机带来的挑战转变为中国共产党实行最广泛国内群众动员的动力,以加强普通民众对于新政权"合法性"的认同,有利于进一步推进革命性改造的进程。同时,通过在朝鲜战场上取得战胜美国这个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的胜利,来提升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领导人做出入朝参战决策的同时,会接连发起席卷全国的"镇反"、"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等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因为,利用朝鲜战争这样一个举国对外的非常状态来发动这样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对共产党一举将自己的愿望和意志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当中去,牢固地确立自己政权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合法性,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由此不难看出,当时中国国内情势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从两者都是毛泽东"革命后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意义上最为深刻地表现出来的。

1953年前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在党的领导人中,毛泽东对于在中国迅速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表现了最为积极的态度。对于"八大"以促进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与战略,毛泽东当时似乎是赞同的。但同其他许多领导人相比较,他关于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设想,具有更为强烈得多的理想色彩;他对于"人定胜天",有着一种极为深刻的信念;他对于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造的速度,则有着一种独特的紧迫感。1956年以后,在毛泽东看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出及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成功推进以及对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都表明已有可能将中国的"革命后革命"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加快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渡。

使中国革命达到更高阶段的理想,是与中国受到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敌视,以至不仅受到经济封锁,而且不能完成解放台湾,从而彻底统一中国的理想,和不能进入联合国的残酷的国际政治现实相联系的。相比较美国

与前苏联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对立，却不能不把前苏联作为一个重要的竞争对象来看待，毛泽东显然一度相信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态度，根本上还是因为中国经济上太过落后，国力不足以同美国相抗衡。为了要争这一口气，从1955年底以后，毛泽东就再三地谈到了要"追英赶美"的问题。

在1955年秋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就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以后，毛泽东一再表明了这一想法。他一方面感慨地表示："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前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但另一方面，他则再三强调，中国完全拥有赶上美国的条件。他在八大上发言时就极具鼓动性地告诉全党："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有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正是由于毛泽东对于改变中国弱国地位重要性的认识，他对于中共八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曾有认同的一面。但问题在于，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家，又相信，要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如同战争年代那样，采用大规模群众动员的方法（非如此，便不能发挥中国的人口优势），并动用种种非常规的革命性手段。也正是在这个重要关节点上，毛泽东的想法同八大路线有着明显的差异，并成为他迅速走向倡导"大跃进"、推动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大踏步向"左"转的一个重要的逻辑出发点。

1958年，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到来的。1月31日，毛泽东在一篇题为《工作方法60条》的重要文章中，明确地提出了"不断革命"的主张。他指出：

> 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7月1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15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

在这里，毛泽东通过对于“革命后革命”发展历史的阐述，强调了它的不间断性质和各个阶段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实际上已为行将席卷中国广大城乡的大跃进运动的兴起定下了目标与蓝图。

此后，在毛泽东的全力推动下，经济大跃进的运动迅速席卷全中国。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夏粮的产量就到处大放“卫星”。各地上报的粮食亩产几十倍乃至上百倍地增长，这就极大地鼓舞了毛泽东进一步在工业上创造奇迹的想法。随着他的一声号令，1958 年夏秋之际，全国上下 9000 万人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大炼钢铁的运动，各地同样捷报频传，钢铁产量也是直线上升。与此同时，成千上万集生产、学习、消费与生活为一体的人民公社在中国城乡出现。人民公社的出现，以及粮食、钢铁产量的突飞猛进，甚至激发起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一朝成就共产主义的极大热情。

面对这样一种形势，原本就不把英国放在眼里的毛泽东，很快就把赶超的目标锁定在了前苏联和美国的身上。1958 年 5 月份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毛泽东就已经在内部提出 7 年赶上英国、加 8 年赶上美国的 15 年奋斗目标了。又过了一个月，他干脆提出，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就超过英国。进入到 9 月初，他不仅已经不再注意英国，而且相信中国已经可以走在前苏联前面了，因此，他直截了当地要求党的领导人，要有大手笔，要解放思想，鼓动他们：“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安全战略，从来便是他的“革命后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变化发展，同中国国内情势的发展息息相关。毫不奇怪，当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发生急剧“左”转的时刻，中国的对外政策也会发生相应的事件。

第二节　中苏同盟关系的逆转

1958 年，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具深远影响的大事，应当是中苏同盟关系的进一步逆转。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起，根据“一边倒”原则而建立起来的中苏战略同盟关系，便一直是新中国国内建设及对外关系的主要基石。中苏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高度的一致。在双边关系的具体层面，中国在建国初期经济恢复，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及实行过程中，都以“斯大林模式”为蓝本，建立起了

以国家对社会及其资源实行全面统制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来自前苏联的援助。在新中国对外关系中，中苏同盟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全面孤立新中国的图谋，并在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以及处理台海危机等重大事件的过程中，极大地加强了中国应付国际事变时的实力地位。

然而，中苏同盟关系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历史与政治文化因素差异的重大挑战。

在中国革命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前苏联曾向中共提供过大量援助，但莫斯科也一贯以国际共运领导者的身份，对中共战略与政策的制定与实行指手画脚，发出过许多在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在中国本土环境中成长起来并走上中共领导地位的毛泽东——看来，属于错误的指令。

前苏联长期面临着"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又受到沙俄帝国对外政策传统的影响，在其对华政策(包括对中共的政策)中，也就时时表现出严重的利己主义倾向，从而极大地削弱了莫斯科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所应该具备的道义力量与形象。

新中国建立后，中苏关系中依然存在着这种由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平等特征。而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必须集中力量向帝国主义阵营提出挑战，再加上斯大林在国际共运中的崇高地位，更使得这种不平等特征得到了加强。如果说，这种不平等特征在前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及共产党的关系中也存在的话，那么，它在中苏关系中就显得尤为突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并在历史上长期自以为处于"天下中心"的地位。近代中国备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欺凌，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和在国际事务中的高度敏感性。这一点在中苏两党关系中就表现得十分明显。

毛泽东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他有着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所不具备的世界主义(或曰国际主义)眼光，但他通过革命手段使得中国在世界事务中重建中心地位的革命民族主义情感却是极为强烈及真实的。毛泽东从未对斯大林的世界革命领袖地位提出过正面挑战，但他对于斯大林在他面前时时显露的优越感，内心里却又极易反感。这在斯大林死后他对斯大林所提出过的各种强烈的批评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仅仅是因为中苏两国间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实际构成上的一致性，才使得双方由于历史及文化因素而产生的差异一直处于隐性状态。

如前所述，直到 1957 年，中苏关系至少在表面上看来仍在平稳发展。

但斯大林去世，特别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尝试改变斯大林主义的许多政策之后，毛泽东显然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心在事实上已经转移到中国来了。因此，公开地继续肯定前苏联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其潜台词却是，前苏联党今天这种中心地位，实际上是需要由中国党来支持和肯定才能生效的。它意味着，毛泽东与中国党已经在道义上占据了比莫斯科更为崇高的地位。

进入1958年以后，中苏两党关系中潜在的紧张终于由于两个互有关联的事件而暴露出来了。

第一个事件的起因在于莫斯科关于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的建议。早在1957年11月，在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访苏期间，双方达成了在远东进行海军和空军合作的一般性协定。1958年4月18日，前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信中向中方建议：为了加强对太平洋地区前苏联海军舰艇的指挥控制，苏方希望由中苏双方用四年时间联合建设一座高功率长波交换台和一座为长距离通信而设计的长波接受台。苏方将承担这两座长波台建设费用的70%，而中方则承担30%。

苏方建议所反映的，实质上是一种在莫斯科有着长远的历史渊源、又因冷战时期苏美两大国在全球范围的对抗而变得更为突出的战略考虑。即对于前苏联来说，如果不能解决由于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缺乏不冻港而带来的战略劣势问题（这是一个在近代以来便不断困扰俄国的问题），便难以在同美国这个两洋大国的长期对峙中获取上风。如果前苏联能够利用与中国的同盟关系而获得在亚太地区部署海军力量的有利地位，便能够极大地改变前苏联在这一地区——甚至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对峙时的相对战略劣势。而从前苏联领导人的角度来看，这也将加强缺乏现代海军力量的中国的国防实力地位，并进而使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地位也得到改善。

然而，毛泽东获悉苏方建议后的反应却是，前苏联的这种建议触及到了中国的主权与尊严。中方不仅应承担电台建设的全部费用，并应独自掌握电台的拥有权。这样，毛泽东便将长波电台建设的费用支付这一看来似乎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同中国是否对电台拥有主权这样的政治大问题挂起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于6月12日复信马利诺夫斯基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建立高功率的长波电台，并欢迎前苏联的技术援助”。但他同时在信中强调，“中国将支付一切费用，在电台完成后，由中苏共同使用”。彭德怀并建议中苏两个政府应就此事进行磋商，并在达成协议后就此签订正式协定。

然而,前苏联领导人似乎并未了解中方意图的真谛。从前苏联拥有长波电台的技术专有权的角度出发,7 月 11 日,苏方就建立长波电台提出了一项协议草案,仍然坚持电台由中苏双方共同出资建设、共同拥有并共同管理。中方对此毫不妥协:必须由中方独立担负电台建设的费用,电台建成后所有权归中国,中方将向苏方购买自己不能生产的设备,并将邀请前苏联专家帮助电台的建设,电台建成后,由中苏两方共同使用。

长波电台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中苏双方又因建立联合舰队的问题出现了新的分歧。早在 1957 年间,在中国工作的前苏联海军顾问就曾就中国海军建设方向的问题,向中方提议说,中方应改变大力发展海面舰只的设想,转向发展潜艇舰队,特别是核潜艇舰队。为此,不妨趁前苏联正在发展核潜艇的机会,向前苏联购买这种新的海军装备。

1958 年 6 月 28 日,周恩来即为此致信赫鲁晓夫,要求前苏联为中国的海军建设提供技术援助,尤其是新型潜艇设计制造方面的援助。7 月 21 日,前苏联大使尤金拜访毛泽东,转达了来自苏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后的回复意见。前苏联方面的看法是,今后海军发展方向应向组建潜艇舰队,特别是组建配有新型潜艇的舰队方向发展。但由于地理条件上的限制,前苏联很难充分利用新型潜艇的优势。在这方面,中国有着很长的海岸线以及良好的港湾,苏方提议由中苏两国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共同使用苏方的潜艇新技术。

在前苏联坚持长波电台要由前苏联控制的情况下,前苏联又提出来一个利用中国海岸组建联合潜艇舰队的提议,这不能不使这时正因为主权问题高度敏感的毛泽东,更进一步认定前苏联的提议是别有用心。他当即向尤金明确提出:“我们首先必须搞清一个问题,是我们建你们提供援助,还是我们共同建设,否则你们就不提供援助?”毛泽东还表示,他对于建立一个中苏“军事合作社”不感兴趣。

第二天,毛泽东召见尤金,同他进行了一场冗长并相当情绪化的谈话。毛泽东回顾了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发展的历史,批评前苏联人一贯从大国沙文主义立场出发对待中共。他并反复指出,前苏联建立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建议的实质,在于企图控制中国。他甚至气愤地宣称:“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者或另一个铁托,而我可以说你们要把俄国民族主义扩展到中国海岸。”这次会见基本上是毛泽东的一言堂,尤金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极少有插话的机会。当谈话行将结束时,毛泽东要他“把我们所有的意见都转达给赫鲁晓夫同志”,并强调说,“你必须原原本本地把我的话告诉他,不要修饰。”

赫鲁晓夫接到尤金的报告后,相信毛泽东误会了苏共中央的意思,于是停止了一切安排好的活动,急忙于 7 月 31 日赶到北京向毛泽东进行解释。到 8 月 3 日为止,他同毛泽东一共举行了四次会谈。

赫鲁晓夫向毛泽东解释说,前苏联绝没有控制中国的意图。共建长波电台的问题,只是马利诺夫斯基个人的主张,并不是苏共中央的决定。如果中国认为必要,他认为苏方可以按照中方的要求,仅提供财政与技术的援助,电台建成后共同使用,但归中方所有。在联合舰队问题上,他辩解说,可能是尤金没有准确地转达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因为苏方并不是想指挥中国的舰队。同样,如果中方需要,苏方也可以向中方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

毛泽东并不真的相信赫鲁晓夫的上述解释,他坚持是因为掌握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并重提斯大林当年对中国党的怀疑态度,宣称前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中长期存在着大国沙文主义。他甚至直截了当地宣称:许多前苏联人"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认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

经过四天的会谈,毛泽东的怒气才因赫鲁晓夫的反复解释逐渐平息了下来。中苏双方于 8 月 3 日签订了关于建立长波电台和前苏联向中国派遣海军专家的协定。但是,中苏领导人之间,尤其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心结并未真正得以化解。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断言:"同前苏联关系的转变发生于 1958 年,因为他们要控制中国。"

毛泽东面对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所表现出的激烈而毫不妥协的态度,清楚地反映了他在同莫斯科打交道时在中国主权与平等问题上的高度敏感。构成这种敏感的基础,是成为现代中国革命民族主义基本特征的独特的"受害者情结"。这种对近代中国备受侵略和压迫深感屈辱的历史情结,使毛泽东很容易怀疑外国那些看起来不甚友善的行为隐藏着可憎的动机。尽管前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受到这样一种历史情结的影响,毛泽东显然无法接受苏方把中国当成落后国家看待,在技术上总是想要控制中国的做法。

当然,中苏之间围绕着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的冲突,也是中苏双方因战略文化不同而在国际结盟问题上存在重大认识差异的具体体现。国家之间的结盟,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从单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同其他国家结盟之所以有必要,恰恰是因为其自身在国家主权范围内所拥有的手段不足以全面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因而有必要通过在主权实施范

围上的妥协,来使自身更为重大或更具根本性的国家利益得以维护。

前苏联领导人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向中方提出建议时,显然就是从上述思路出发的,并想当然地认为毛泽东也会按照同样的思路行事。然而,毛泽东革命民族主义情结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基于对国家主权的高度敏感性,反对一切形式的可能有损国家主权形象的妥协。赫鲁晓夫显然对这种情况缺乏了解。

但是,在既有的中苏关系历史当中,类似的引起毛泽东高度敏感的情况并不止于此。为什么毛泽东对前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激烈批评会爆发于1958年夏天,而不是更早一些呢?显然,这是与这一年里正在发生着的大跃进运动的背景密切相关的。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毛泽东与尤金及赫鲁晓夫的谈话记录的话,可以得到的一个印象是,它们在风格和基调上同毛泽东同一时期的许多党内讲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这两种不同的场合,毛泽东都表现出对于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理的深刻自信。这些讲话基本上都是他的一言堂,由他以批判性的、富于激情的,有时甚至是冷嘲热讽的语言对聆听讲话的对象们施以教诲。这些讲话高屋建瓴,就其底蕴与内在精神而言,充满了革命激情。十分明显,正是因为受到大跃进所创造的种种"奇迹"的激励,毛泽东这时在同赫鲁晓夫等人打交道时,也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豪气干云,且咄咄逼人的心态来了。

当赫鲁晓夫于1958年7月底、8月初访问中国时,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已经准备对国民党控制下的金门等沿海岛屿实行大规模的炮击。就毛泽东的动机而言,他不仅希望以此提醒国际社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还希望由此而创造出一种同大跃进兴起相适应的在全国实行广泛群众动员的氛围。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看这一段历史:如果说,大跃进是一出精彩的京剧大戏的话,那么,炮击金门就是剧中的鼓点。如果没有它的配合,这出大戏的演出也就失去了基本的韵律和节奏,其基本的戏剧性(这也是任何大戏的精华与实质)也就无法体现出来了。

但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方面在赫鲁晓夫来北京之前就已经决定了炮击金门的计划,并且一度准备在7月27日前后具体实施。直到赫鲁晓夫来访前三天,即7月27日当天,毛泽东才暂时放弃了这一计划。赫鲁晓夫走后两周,毛泽东又重新提出了炮击金门的计划,并于8月23日开始实施了大规模的炮击。而此前此后,作为盟国的前苏联方面都未得到通知。显然,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了中苏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在此后的两个月里，随着金门炮战的持续，美国援引 1954 年美台防御条约，大大加强了在远东的海空军力量，并使用美国舰艇为国民党舰艇护航。前苏联领导人出于对金门炮击所可能引起后果的担心，于 9 月初派遣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访问北京，探询中方采取炮击金门行动的原因和真实意图。直到此时，中国领导人才通知苏方，炮击金门只是为了引起全世界对于台湾问题的注意，并将美国帝国主义从世界其他部分（尤其是中东地区）引开，而不是为了进攻台湾，更不是为了挑起与美国的直接冲突。

对于中方的解释，这回是前苏联方面难以接受了。赫鲁晓夫既不理解中方为什么在发起可能直接导致美国卷入的这种严重行动时，不让缔结有军事互助关系的盟国预先有所准备；也不理解中国方面在已经实施了这一有争议性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且完全有机会拿下最后几个控制在国民党人手里的沿海岛屿的时候，为什么又突然放弃了夺取金门等诸岛的努力？

面对苏方的强烈不满，中方亦明确表示：如果因炮击而造成美国的武装干涉，中方愿意自己承担一切后果，绝不拖前苏联下水。但是，无论如何，出于盟国的关系，前苏联方面还是公开地向可能实施干涉行动的美国政府发出了严重警告。注意到福建前线中方的空中优势受到了装备有美国先进战斗机的国民党空军的严重威胁时，苏方甚至还主动提议，可以向福建前线派驻一个携带导弹的前苏联空军大队，以帮助中方夺回制空权。然而，对主权问题高度敏感的毛泽东依旧怀疑：赫鲁晓夫此举可能又是想要控制中国的一种表现。因此，他明确回答：中国只要前苏联的导弹，不要前苏联的部队。

可以想见的是，受到这样一系列猜疑的影响，中苏关系的逐渐恶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节　第二次台海危机与中美对抗的继续

1958 年，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另一件大事，是中美两国由于第二次台海危机而达到了几乎再次兵戎相见的地步。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起，尤其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便推行对新中国政治孤立、军事对抗和经济封锁的全面政策。而台海地区，则一直是中美交锋与冲突的一个“热点”。

如前所述，1954—1955 年，毛泽东作出的炮击金门和占领一江山及大陈岛等沿海岛屿的决定，触发了第一次台海危机。美国方面亦于 1954 年 12 月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作为报复。只是由于预期的军事目的已

经达成，且当时中国军方在福建沿海地区的部署及相关准备还远不足以发动更大规模的威慑行动，中国方面的行动始告一段落。

自第一次台海危机后，中美关系的发展以及北京对台湾政策的基调都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变化。1955 年 4 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宣布，“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华盛顿也对此做出了反应。1955 年 8 月 1 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举行。尽管会谈本身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它作为美国被迫承认新中国为谈判对象的一种外交形式，对北京来说仍然具有极大的象征性意义。因此，中方虽然不满意这种会谈方式，却一直坚持保持这一接触渠道。

另一方面，在处理已成为亚洲冷战新热点的台湾问题时，中共领导层的态度在第一次台海危机后也有所变化，提出了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以争取和平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新主张。1955 年 7 月 30 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1956 年 6 月 28 日，周恩来又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1956—1957 年间，北京一直尝试着推行这一较为宽松的对台政策，并还通过一系列的私下渠道，试图同台湾当局建立高层的联系。

当然，中国方面并未完全寄希望于这种和平的方式。特别是在一系列的尝试没有结果之后，到 1957 年下半年，军事方面的准备又成为重中之重。

1957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明确指示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请考虑我空军 1958 年进入福建的问题。”1958 年初，中央军委与福建军区一再制定空军入驻前线的计划，并定下了 1958 年夏天前必须完成此一任务的时间表。从 1958 年春起，在福建铁路线建成通车后，中央军委开始考虑对金门实行炮击封锁的计划。4 月 27 日，福建军区司令部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上报了炮击封锁金门的军事方案。北京对台湾的政策，又一次向着军事对抗的方向转变。

对台战略的新的转变发生在 1958 年，有着国际与国内多方面的原因。从北京对台政策本身的逻辑来看，“和平解放”战略的前提是台湾当局必须作出积极反应。而在经过 1955—1957 年两年多的努力后，台湾方面的反应却不能令北京满意，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中共领导人形成“以打促谈”的

心理。

从沿海军事态势的角度来看，由于国民党部队占领金门、马祖等岛屿，构成了对大陆沿海地区（尤其是福州和厦门）以及沿海交通线的威胁，沿海地区各级军政领导人出于对国民党军特的骚扰不胜其烦，要求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呼声一直十分强烈。如能夺取这些岛屿，将极大地改善这些地区的安全形势。而鹰厦铁路的开通，福建前线机场的建成，大批重型武器，特别是火炮的运入，都为夺取福建沿海岛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从解决台湾问题的需要来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从来便认为，有必要不断在国际政治中突出这一问题。在美国拒绝与中国方面讨论台湾问题时，也只有通过在台海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才能够以最有力的方式提醒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

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美国对中美大使级谈判一直应付了事，1957年底更以谈判大使休假他调，只能以代办出席的名义，在实际上中断了与中国方面的谈判。美国方面的这种态度，对在民族自尊方面极度敏感的毛泽东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因此，自1958年2月起，中国外交部就几度受命要求美方重新选派大使级代表续开会谈，但美方却拒不答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之所以会在1955年同意与新中国举行大使级会谈，很大程度上就是中方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用炮击金门的办法逼迫美国重视中国而得来的。既然如此，自然也可以再次通过对金门炮击的方式把它逼回到谈判桌上来。

不过，如果我们将1958年北京对台政策的转变以及台海危机爆发，同以“大跃进”兴起为中心的中国政治与社会全面“革命化”的情势联系起来看待，便不难发现，这一转变最深刻的原因，还在于大跃进时期全国范围“超常动员”的需要。

毛泽东当然并非简单地为了推进大跃进而“制造”了金门炮击，但是，金门炮击发生于1958年8月，却明显地同大跃进当时在全国范围内达到的高潮的背景是有关的。简而言之，在这个时候推动台海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使因大跃进的推进而出现的一系列内部高度紧张的状况，变得合理化。这就是为什么，在台海危机达到顶点时，毛泽东会一再强调“紧张局势有利无害”。他说：“这个紧张局势，对我们并不是纯害无利，也有有利的一面，什么道理？因为紧张局势除了有害的一面外还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

如前所述，毛泽东关于炮击金门的具体决定，是在1958年7月初以后

开始形成的。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受命先于6月30日发出了最后通牒式的声明，强硬地宣称，除非美国方面在15天之内同意恢复谈判，否则中国方面将不能不认为美国决心要使谈判破裂，由此而带来的一切后果只能由美国方面负责。对此，美国方面的反应是，美国并不完全拒绝继续会谈，且正在考虑另换地点和另换代表的问题，但是华盛顿不会接受“15天限期的约束”。

由于美国政府这时并没有完全接受中国方面的要求，并且有意拖延指派代表，到了7月14日，毛泽东显然已经决定要再度炮击金门了。这一天，彭德怀和解放军总参谋部等受命具体研究了炮击金门的行动部署问题。而7月14日伊拉克爆发政变，政变者宣布退出美国组织的反共的巴格达条约，随后美英两国宣布出兵黎巴嫩，引发了中东危机，这进一步给毛泽东提供了炮击金门的另一个口实，即声援中东人民革命。据此，解放军总参谋部与福建军区迅速完成了炮击金门的计划与部署，并确定以7月25日（后来又改为27日）为开始对金门国民党驻军实施大规模炮击的期限。然而，到了7月27日当天，毛泽东却又对炮击工作突然叫停，要求“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

解放军在福建前线大规模集结的行动，引起了华盛顿的高度注意。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杜勒斯国务卿等美国决策者会同军方及中央情报局就美国应采取何种应对之策的讨论中，一致的结论是，有必要对台湾提供新的援助，并增强第七舰队的力量，以便加强国民党部队的实力地位。然而，在关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的重要性，以及美国是否应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等问题上，美国决策者的意见并不一致。大致上来说，艾森豪威尔总统更倾向于认为，沿海岛屿并无太大的军事价值，同保卫台湾也并不存在必然联系，美国“没有足够的理由去保卫沿海岛屿，除非进攻这些岛屿是进攻台湾的前奏”。杜勒斯则更倾向于强调沿海岛屿的重要性，以及由美国对台海地区局势进行干预的必要性。

毛泽东之所以决定推迟炮击金门，显然与对美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回应了中方要求继续谈判的要求，并且在7月17日正式宣布任命比姆（Jacob Beam）大使为谈判代表，择期择地恢复与中方的谈判。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美国以颜色而实施炮击的意义已不很大。另一方面是因为，在美国已经确定恢复与中国谈判的情况下，他对炮击金门可能造成的负面作用尚未考虑清楚。因为很明显的是，国民党的军队都派有美国军事顾问，炮击金门如果打死了美国人，就不免会对美国刚刚确定的

恢复与中国谈判的政策造成强烈的冲击,甚至可能使中方所希望的谈判前景再度落空。

然而,由于7月14日伊拉克发生革命。随后,美国和英国为了避免伊拉克革命波及黎巴嫩等其他中东国家,相继出兵黎巴嫩,引发了中东危机。赫鲁晓夫对美英出兵做出了强烈的反应,陈兵中亚南部边界地区,并在靠近土耳其的边界一带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对此,毛泽东亦不能不考虑做出回应。因此,在8月中旬,毛泽东重新又决定要打金门。而原则是:"只打蒋军、不打美军"。即尽一切可能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1958年8月23日下午5时30分,驻福建前线解放军部队突然开始对金门岛国民党驻军的大规模炮击,在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发射炮弹30000余发。次日,炮击的重点转向了封锁金门岛。在此后的六个星期里,解放军对金门的炮击一直在持续。到9月上旬,随着金门岛上国民党驻军的补给供应线已几乎被切断,解放军对金门岛实施直接登陆作战似乎已经迫近。

解放军炮击金门的行动,立即引起了华盛顿的强烈反应。杜勒斯国务卿公开警告说,中共如以武力强行夺取金门、马祖等由国民党部队占领的沿海岛屿,将会引起严重后果。艾森豪威尔总统虽然在内部讨论中对金门、马祖的战略价值表示怀疑,但在公开声明中仍然宣称,金马等沿海岛屿对于保卫台湾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美国"不会放弃对中华民国的责任"。

8月27日,蒋介石向艾森豪威尔发出求援信,表示:如果对金门的炮击持续下去,国民党"在金门的守军无异于坐以待毙"。28日,福建前线广播台对金门国民党驻军播放了《告蒋军官兵书》,宣称解放金门已"迫在眉睫",要求国民党官兵不要做美蒋的牺牲品。美国国务院就此立即公开宣布,保卫沿海岛屿同保卫台湾本身有着密切关系。美国军方则制定了应急计划,决定为国民党军向金门提供补给的军舰护航,负责防卫台湾、澎湖的上空,而在中共进攻金门、马祖时,可考虑国民党的自卫权,包括对中共投入战斗的炮兵阵地和空军基地进行袭击。美国决策层甚至讨论了为应付危机升级而考虑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问题。

就在台海危机似乎达到了一个新的临爆点,并将中美两国又一次带到兵戎相见的边缘时,形势的发展突然出现了新的转机。因为,注意到美国可能卷入,危机可能失去控制,毛泽东当即决定,要向美蒋宣示中共并无武装夺取金门的意图。故9月4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福建前线部队宣布停止炮击三天,以观察"各方动态"。在同一天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

东解释说:此举是为了准备恢复中美会谈,福建前线的斗争,要"有武戏又有文戏"。"谈判是外交侦察,摸清底细。两手比一手好,保持谈判渠道是必要的。"

中国方面的此一表示,使在援蒋保卫金门、马祖等大陆沿海岛屿的问题上本来就存在分歧的美国政府,找到了一个下台的台阶。9月4日当天,杜勒斯就发表声明,在重复"保卫金马与保卫台湾相关"的同时却表示说,美国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争端。随后,美国方面更进一步压迫蒋介石撤退驻金、马的军队,公开宣布金、马不在其保护的范围之内。

对于美国方面的表态,周恩来在9月6日发表声明表示欢迎。但最初,中国方面仍旧想要通过谈判,由美国迫使国民党撤出金、马等沿海岛屿,以此来结束此次台海危机。9月13日,当时正在武昌视察的毛泽东就谈判策略授计于周恩来等,称:"华沙谈判,三四天或一周内,实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彼方亦似不会和盘托出,先对我们进行侦察。"周恩来随之转告王炳南:"先与美方周旋,逼其先我露底。"

美方的谈判战略,在于首先促成某种停火协定的达成。9月13日,杜勒斯在给美国谈判代表、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的电报中指出:由于金门的补给线实际上已被切断,台海地区局势极为严峻,如果不能在较短时间内达成中止敌对行动的协议,美国就有可能不得不提出某种形式的最后通牒,而这便有可能使美国卷入战争。因此,会谈中最为重要的是达成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在次日给比姆的另一电文中,杜勒斯又再次强调了会谈的紧迫性,指出美国最重要的目标是尽快中止敌对行动,同时亦不能将沿海岛屿交给中共,并坚决反对在联大讨论承认中共的问题。

9月15日,中断了近20个月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举行。比姆首先发言称,美国承认中美长期以来对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存在严重争议,也并不要求任何一方在目前阶段放弃自己的意见,美国的目的是减少乃至完全消除可能被对方视为战争挑衅的行动,防止军事行动进一步扩大。比姆提出,作为缓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第一步,中方应立即停止对金马等沿海岛屿的炮击。王炳南反驳了比姆的说法,强调了台湾是中国内政的原则,不同意签订两国之间停火协议的要求。

尽管毛泽东在会前曾指示周恩来,中方应首先让对方将"所有的牌先亮出来",王炳南却在双方短暂休会后,和盘托出了本应成为中方底线的一系列主张,这包括: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的领土,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是中国大陆的内海岛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

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解放中国的这些领土，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外国干涉。

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保证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直接威胁厦门、福州两海口的、为国民党军队所占据的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必须收复。如果国民党军队愿意主动地从这些岛屿撤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不予追击。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在收复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以后，将争取用和平方法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并且在一定的时期内避免使用武力实现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解放。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一致认为，在台湾海峡公海和公海上空的航行和飞行的自由和安全，必须受到保证。

比姆当即表示，美方不能同意王炳南所提五条建议，因为华盛顿"不能要求一个盟国从自己的领土上撤出"。

比姆的上述反应，并不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西方谈判文化的表现。在美国人看来，谈判是一种双方通过讨价还价而最终达成妥协的过程。因此，谈判的要旨，便在于以实力为后盾，绝不轻易表明自己的底线。同时，也不应轻易就对方在谈判中所提建议做出积极反应。而是要通过"一次切一片"的手段，迫使对方亮出底线。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谈判中达成最有利于己方的妥协。

因此，当比姆听到王炳南所提五点建议后，他几乎是出于直接的反应便对之予以拒绝，其主要目的则在于使美国占据有利地位，今后再以此为出发点，在谈判中作进一步的讨价还价。事实上，比姆在给国务院的汇报中，虽然提到了中方在停火问题上立场强硬，完全不愿就此进行讨论，并认为中方所提声明草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但他同时又提请华盛顿注意，按照中方的草案，如果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门和马祖，将不会受到攻击的，而中方关于将在适当时候"和平解放"台湾的建议也是令人感兴趣的。

毛泽东当时正在合肥视察，当他得到关于 9 月 15 日中美会谈的报告时，极为震怒。按照他先前的设想，中方提出五点提案的主要目的，应在于会谈中争取主动并迫使美方陷入被动。然而，中方代表却在美方还没有亮牌的情况下，便在谈判第一天就露出了中方的底牌。这就会造成美方的错觉，以为中国急于解放金门和马祖，从而产生中国人在美国人面前示弱的效果。毛泽东曾打算马上撤掉王炳南，只是在周恩来以后对这一错误承担责

任，并表示撤换王炳南可能会造成更大混乱后，毛泽东才同意让他留在华沙继续会谈。但他同时指示周恩来，中方应在下一次会谈时取进攻战略，以便争取主动。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两次讨论，并致信毛泽东，一面就"我方方案提得过早，给了对方一个错觉，以为我们急于求成"做出检讨；一面又提出了"争取主动"的五点建议："一、准备一个驳斥杜勒斯联大演说的外长声明；二、声明发表后，动员各地报纸、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广泛响应；三、将我们的斗争策略分告前苏联代办和刘晓转告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以便前苏联和兄弟国家配合我们行动；四、以我名义致电西哈努克，感谢他支持我们，向他解释美国所谓的停火的阴谋，说明我国收复沿海岛屿的决心和解放台湾的神圣权利，这些不容美国干涉；五、将上述同样内容以外交备忘录形式递交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和北欧国家政府，唤起它们注意。"

周恩来还建议，为配合这些外交活动和华沙会谈，"在不触及美国空军、海军的条件下，组织一次有我海军、空军、炮兵三方面参加的打击金门守军和蒋军运输舰、战斗机、运输机的较大行动。"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上述处置及建议表示了认可，认为这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周恩来据此指示王炳南，要他在下一次会谈中"坚持要求美国撤兵的新方案，以配合我在国内外和在军事上打击美国的斗争"。

于是，在9月22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谈中，王炳南明确表示，中方决不能接受美方关于在台海地区先实行停火"荒谬"主张，不能容许美国把"单独和集体自卫的权利"扩大到金门等沿海岛屿，更"不能承认美国侵占台湾和澎湖合法化"。他也完全不再提起自己一星期前所提出的关于国民党军队由金、马撤退的建议，而是一再强调，解决台海危机的第一步，应是美国"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其所有的武装力量"。

在9月25举行的第四次大使级会谈上，比姆发现，王炳南既没有提出任何新东西，也没有做出努力来试探美国的意图。很显然，中美大使级会谈又回到了1957年中断前的情形，已经重新沦为一个双方交换空洞的指责性话语、不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的场合了。

为了促使中国方面重新回到五点提议上去，杜勒斯9月30日干脆公开声明：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借以向中方示意愿意讨论以金、马交换台、澎安全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十分敏感地意识到，五点建议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在10月初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明："把金门、马祖让给我们是杜勒斯的方针，他想以撤出金门、马祖交换我们不收复台湾以及澎湖

列岛。”因为我们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不打算也不可能解放台湾，如果为了夺取金、马而使台湾永远地离开了中国大陆，那将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支持蒋介石。

10月5日，毛泽东下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暂停炮击两天，并起草了以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从10月6日起，以美国人不提供护航为条件，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金门，以便使金门等岛屿的国民党与同胞获得供应品。这以后，停火期一延再延，持续一个半月的第二次台海危机，终于结束了。

第四节　西藏叛乱与中印关系恶化

进入1959年以后，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一个新的重大挑战，是西藏局势的急剧恶化。而在这背后，更有着极为复杂的国际背景，涉及到了中国与印度、前苏联以及美国的关系。

1959年3月10日，西藏发生了大规模叛乱。这既是此前10年间中央与西藏地方守旧势力以及西藏内部各种政治与社会矛盾积累激化的总爆发，也同亚洲冷战以及南亚地区地域政治发展等因素有着直接与间接的联系。

早在唐代，西藏便与中原地区建立起了政治与文化联系。从元代到清代，西藏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清政府设立驻藏大臣并派兵入藏，更有力地将西藏置于大清帝国治下。然而，进入19世纪下半叶后，随着大清帝国本身在西方帝国主义及日本的侵略面前日益陷入危机，再加上英国势力对西藏的不断渗透，清政府对西藏的控制出现了松动。

辛亥革命后，特别是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面临着革命与内战、外患不断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无力处理西藏问题。不过，即便在当时，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政府的历届中央政府，都从未放弃中国对西藏的主权。1949年—1951年间，在解放全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成功地实行了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尽力争取以和平方式解放西藏的战略。1951年5月23日，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从1951年到叛乱发生的1959年，从总体上来说，中央政府在西藏推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政策。1956年前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在中国其他

省份和地区兴起,藏区的改革也一度出现了操之过急的趋势。但是,在出现了达赖喇嘛出访印度可能不归的情况,以及康巴地区发生暴动等警报后,中央政府将对西藏的政策进行了调整,明确做出了六年内不做改革、六年后是否改革将视西藏的具体情况并与西藏上层人士商讨后决定的保证。

然而,藏区的叛乱仍在扩散。特别是自 1957 年起,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插手西藏的叛乱活动,为叛乱分子提供武器及其他物质支援,并为叛乱分子提供培训之后,西藏反抗中央政府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

华盛顿这时其实并不相信叛乱分子具有使西藏走向独立的能力,也并不准备由美国直接对西藏进行军事干预。但是,从全面孤立、包围与遏制新中国的战略意图出发,美国政府已经将对于西藏叛乱分子的支持当作其敌视中国的冷战政策的一部分。

1958 年,西藏叛乱分子已建立起"四水六岗"的组织,叛乱活动已逐步蔓延到拉萨附近,许多叛乱分子进入了拉萨。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与中共领导层已经意识到同西藏分裂势力的最后"大决战"将不可避免。然而,毛泽东显然并不特别担心。在他看来,这甚至将会有助于推动藏区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到来。他在 1958 年 6 月 24 日的一个批示中便指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面叛乱。……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问。"

1959 年初,面对西藏局势日益严峻的情形,毛泽东又明确表示:处理西藏叛乱,"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此,当 1959 年 3 月 10 日大规模叛乱在拉萨发生时,毛泽东与中共领导层是有思想准备的。

针对西藏叛乱,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从一开始便采取了"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的危机处理战略,以争取控制事态的发展。此后,叛乱不断升级,而且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的许多高级官员于 3 月 17 日逃离西藏,前往印度"避难"。在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下,解放军驻藏部队从 3 月 20 日起对叛乱实行全面的军事镇压,很快便控制了拉萨的局势。在继续命令解放军部队平息西藏各地的叛乱的同时,中央即着手开始在西藏推行大规模的"民主改革"。

西藏叛乱的发生,在国际社会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尤其是造成了中国与印度关系的紧张。当达赖逃往印度"避难"后,中印之间的冲突表面化了。这是 1959 年中国对外关系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早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很快便承认了新中国,并是第一批与之建交的国家之一。整个 50 年代,中印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1954—1955 年,中印两国共同

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对于巩固中印友好关系及加强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起了积极作用。

但即便在50年代中印友好关系处于高潮时,两国之间其实已存在着种种分歧。除了双方在边界走向以及有关条约合法性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外,双方的分歧集中地表现在西藏问题上。

由于自认继承了英国殖民当局的一切权益,印度坚持它应当继承英国殖民当局早年与西藏之间签订的各种条约。因此,还在1950年解放军准备入藏时,印度政府便曾一再表示"关切",并通过外交途径提出"交涉"。1951年5月,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后,印度虽然承认了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但同时又希望以此换得北京对于印度在西藏"特殊利益"予以"尊重"。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包括尼赫鲁总理在内的印度决策层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印度的国家安全利益所要求的是,应排除或至少最大程度地减少中国在西藏的军事存在。"他们并因此而认定,使得西藏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是值得印度追求的战略目标。尼赫鲁之所以接受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相信北京有能力做到对于整个西藏的有效控制,他因而认为,与其帮助藏人同北京对抗,还不如尽力帮助拉萨在面对北京时做到最大程度的自治。

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次来看,中印之间的分歧,还表现在两国领导人对于各自国家在非西方世界所处地位的认识上。中国和印度都有着悠久的文明与历史传统,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并都在近代遭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压迫。40年代后期,在新中国诞生的几乎同时,印度也获得了独立。长期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对于印度的"世界性责任"有一种突出的使命感,希望通过在亚非国家的有关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而使印度在世界事务起到更大的领导性作用。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毛泽东等人作为新中国的领导人也从来深信,中国革命具有世界性意义,新中国因而也应当在世界事务中——首先是在亚非地区有关事务中——起到榜样的或领导的作用。正是在这里,人们可以找到为什么恰恰是中国与印度会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倡导国家的最重要的原因。然而,两国对各自在地区政治及世界事务中所起作用的定位,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潜在的冲突。

西藏叛乱的爆发,使得长期以来存在于中印之间的种种潜在矛盾表面化了。在几乎一边倒地对叛乱势力表示同情与支持的印度公众舆论的强大

压力下，尼赫鲁总理试图在危机处理与保持同中国的关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他一方面尽力避免对中国的政策提出尖锐批评，并表示尊重中国在西藏的“特殊地位与权益”（但却避免使用“主权”一词），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政府坚决平叛的举动表示“关切”，并对流亡印度的藏人、尤其是对达赖表示同情。

而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尼赫鲁的这种暧昧态度则是不能接受的。鉴于早在叛乱发生前，许多叛乱分子便以印度领土为基地展开活动，中国领导人认为，在支持叛乱的国外势力中，除了美、英帝国主义以外，还有被美、英帝国主义推到第一线的印度扩张主义者。在对印度的多元民主制度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往往将来自印度公众及舆论界对于中国处理西藏问题的指责，也一概视为尼赫鲁政府的态度和立场，这就更加加深了中印之间分歧的程度。

在具体设定在西藏叛乱问题上对印度的政策时，中国领导人面临着一种两难局面：一方面，他们清楚地知道，印度并非“帝国主义国家”，甚至也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因此，若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印度，只会加强新中国敌对势力的力量并使得中国自身在国际社会中遭遇更大的孤立；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确信，新德里确实对叛乱提供了支持。为了使得自己对于叛乱的镇压获得更大的合法性，有必要揭示叛乱的根源其实并不在于西藏本身，而在于境外，特别是以印度为基地的外部势力的挑动、支持与纵容。

如果说，毛泽东起初在如何对待印度时多少仍有所犹豫的话，那么，当达赖于 4 月 18 日在印度政府的协助下散发关于他离开西藏完全出自本人意愿（而并非遭到“劫持”）以及他主张西藏独立的声明时，这种犹豫便完全结束了。在 4 月 25 日的一封信中，毛泽东指示中共宣传部门，将关于西藏问题的公开宣传口径“改为‘英帝国主义分子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

从 4 月 25 日到 5 月 5 日，毛泽东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的一系列扩大会议，讨论的重点之一，便是对印度的政策问题。在 4 月 25 日晚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定下了讨论的基调：“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现在我们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

根据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以及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的指示，中国宣传部门迅速展开了一系列对印度政策及尼赫鲁本人的批判，并在 1959

年5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的社论时，达到了高潮。

在这一中印关系由于西藏问题出现严重裂痕的时刻，两国围绕边界问题的争端也逐步升级。本来，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在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双方对此的一般态度是“不直指争端”，以避免让既复杂敏感而又很容易引起民族主义狂热的边界问题损害两国的总体友好合作关系。但在西藏叛乱发生后，注意到中国军队正在迅速推进到中印边界地区，印度方面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试图迅速将中印之间的边界争端以有利于印度方面的方式予以了结。

3月22日，尼赫鲁在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宣称，印度同中国西藏地区的边界早已划定，而中方出版的地图却错误地将许多本应属于印度领土的地区划归西藏，对此应予以纠正。中方当时正集中力量镇压西藏叛乱势力，因而并未立即对来自新德里的指控做出回应。然而，随着解放军部队在平叛过程中逐步进抵西藏与印度接壤的边界一线，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中印两国军队在这些地区发生直接接触的情形，并使得中印之间因边界争端而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大大增强了。

于是，中国领导人开始对中印边界问题给予新的重视。5月4日，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明确地将西藏平叛与中印边界问题联系起来，指出：“在西藏问题上，尼赫鲁可能又有错觉，想利用达赖讨价还价，……我们现在军队开到边境，关起门来平叛，……他们可能抛开西藏问题来掀起反共反华新高潮。”周恩来表示：“对印度我们一定要反击，这是他们挑起来的。他们搞冷战，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印边界的形势日益紧张。1959年6月，印度部队越过中印东段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占领了该线以北的朗久等地区。8月25日，中印双方的边境部队在朗久地区发生军事冲突。10月21日，一场更大规模的边界冲突在中印边界西段的空喀山口发生。西藏叛乱发生后不过8个月时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中印边界的和平局面便开始被打破了。这也成为中印关系由友好合作转向敌对冲突的转折点。

第五节　中苏分歧深化与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起始

西藏叛乱及其后中印关系的恶化，又使得当时已是阴云密布的中苏关系的前景变得更为复杂了。西藏叛乱本身，并没有给中苏带来直接的负面

影响。事实上，在西藏叛乱发生后，北京适时地向莫斯科通报了有关情况，前苏联领导人则对中方镇压叛乱、控制形势的行动表示支持。同时，前苏联方面还向中方提供了有关叛乱分子活动及转移的情报资料。

然而，当北京开始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尼赫鲁时，前苏联领导人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中国方面很快便注意到，前苏联报刊发表了很多西方攻击中国平定西藏叛乱的报道，同时却几乎全然忽视中国报刊对于印度对西藏及达赖态度的批判。

为了使莫斯科能够更为全面地了解中方的立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还在 5 月 7 日就接见了前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驻中国大使，由周恩来向他们详细讲解了中方关于西藏叛乱以及印度与之关系的看法。周恩来指出：尼赫鲁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要在西藏建立“缓冲国”，阻止那里的民主改革，并迫使解放军撤出西藏。毛泽东则强调，中国的政策不是要把尼赫鲁推向帝国主义一边，而是要教育印度人民以及尼赫鲁本人。而他在谈话中特别强调了“不怕鬼”的问题，声称：“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在他看来，前苏联对印度的态度，多少就有点怕鬼的样子。

就在中苏关系处在这样复杂转变的时刻，莫斯科走出了损害中苏关系的新一步。

1959 年 6 月 20 日，鉴于赫鲁晓夫计划访美，实现美苏两国首脑会谈，和美苏之间正在就禁止核试验问题进行谈判，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苏共中央通知中共中央，它将不得不暂停向中国提供原子武器技术方面的援助，以免使“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努力受到损害”。与此同时，鉴于中国方面已表现出不再需要很多前苏联专家的态度，苏方决定许多前苏联专家在回国休假后，也将不再返回中国。

赫鲁晓夫的这一单方面的举动，与自 1954 年以来在援华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主动热情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因而不仅让中国党以及毛泽东本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而且也对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害。在中共中央看来，赫鲁晓夫这无异于将同美国保持并改善关系放到了比同中国发展与巩固同盟关系更为重要的地位。尤其是自苏共二十大以来，毛泽东就一直对赫鲁晓夫宣传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以及和平过渡的观点深为反感，对赫鲁晓夫热心于同中国的死敌美国达成缓和、实现首脑会谈极为不满。赫鲁晓夫此举无异于落实了毛泽东对他的判断。

此后,随着中印之间争端的升级,中苏之间的分歧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印边防部队在朗久地区发生冲突后,中国外交部于9月6日通知前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冲突系由印度方面首先挑起,中国的态度则是尽力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然而,赫鲁晓夫等前苏联领导人却对此存在着不同看法。9月8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对中方关于朗久冲突系由印度方面挑起并应由印方负责的说法提出了异议。信中声称:发生冲突的中印边界属于高寒山区,难以划出准确的边界线,而既然冲突造成了印方的人员伤亡,中方便应当承担责任。

9月9日,前苏联代办安东诺夫又约见陈毅外长,递交了一份苏方准备于次日发表的塔斯社声明稿,其中将中印边境冲突称为"可悲的"事件,并强调:西方国家正企图借此事件造成赫鲁晓夫访美前国际局势的复杂化,前苏联政府因而不能不对此表示遗憾。声明希望,中印双方从相互利益的考虑出发,解决存在于两国间的误会。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当即提醒安东诺夫,中方在几天前已向苏方通报了中印边界冲突的情况,因此,苏方没有必要以任何方式就此事公开发表声明或作出评论。

然而,莫斯科不顾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对,决定将原定于9月10日发表的塔斯社声明,提前一天于9月9日发表。赫鲁晓夫此举在中国领导层内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尤其使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感到愤怒的是,前苏联党竟然认为,中印边界冲突是对于"在国际关系中缓和紧张局势努力的打击",同时也会使赫鲁晓夫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之间会谈的前景变得复杂化。从中共中央的角度来看,前苏联方面由塔斯社就中印边界争端匆匆发表声明,表明"赫鲁晓夫完全是出于对中国的不满和不信任",才会决定如此行事。

当中国领导人就莫斯科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反应进行深入讨论时,他们又进一步将前苏联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同他们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行为联系了起来。他们显然认为:"这两件事情都是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前做的,是赫鲁晓夫做给艾森豪威尔看的。……是真正的贡礼。"这种愤怒的感觉,充满于9月13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信的字里行间。信中写道:"塔斯社的声明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与前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印度资产阶级和想尽办法要离间中苏的美英帝国主义者则弹冠相庆。"中国领导人指责道,赫鲁晓夫"是在拿基本的原则做交易"。

正是在中苏关系已经处于紧张状况的背景下,赫鲁晓夫进行了他的访问美国之行。在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华盛顿和戴维营进行了广泛会谈之

后，赫鲁晓夫于9月30日专程到中国北京进行访问，同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当晚，赫鲁晓夫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庆宴会上发表了40分钟的讲话，对美苏会谈所表现出的“戴维营精神”大加宣扬，声称这将为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带来缓和。在得知赫鲁晓夫的讲话稿里使用了“用武力来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是不明智”的影射中国党政策的说法后，毛泽东显然十分愤怒。他当即决定，不在国庆宴会上发表谈话。

10月2日，赫鲁晓夫及前苏联代表团其他成员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谈。本来，这次会谈为中苏两国领导人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使他们能够通过面对面的交换意见来解释双方各自的看法，从而弥补已经存在的裂痕。然而，情况恰恰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从会谈纪要来看，双方的对话很快便演变成了激烈的争吵。

会谈伊始，赫鲁晓夫便极不明智地向中国领导人传达了来自艾森豪威尔的口信，要求中国释放两名因被控犯有间谍罪而被拘押的美国人。毛泽东当即强硬地表示，这两个人最终会被释放，但决不会在现在被释放。当会谈转到台湾问题上时，赫鲁晓夫批评中国方面在处理1958年台海危机时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并对中方事先不将炮击金门的决定通知苏方的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他甚至举出十月革命后列宁通过建立远东共和国来作为苏俄和日本之间的缓冲区的例子，来教导中国领导人应当学会在激烈的对抗中求得缓和。中国领导人愤怒地驳斥了赫鲁晓夫的说法，他们激烈地指出：美帝国主义一直在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赫鲁晓夫的意见正好适合了美国人的阴谋。

赫鲁晓夫随之又将话题转往中国对印度的政策。他宣称，中国在同印度发生争端时使用武力是错误的。他甚至对中方对中印边界上一些地区的主权要求提出了疑义，批评中方“为了几平方公里的不毛之地”，而同在不结盟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印度发生争端，是不明智的。赫鲁晓夫的这种态度触怒了中国领导人。周恩来讽刺道：赫鲁晓夫根本就缺乏分辨正确与错误的能力。陈毅则提高嗓门告诉赫鲁晓夫：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应当团结民族主义国家，但绝不应当姑息它们的错误。他还特别提到了塔斯社1959年9月9日的声明，称其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会谈到了这个地步，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控制。双方领导人都提高声音指责对方。赫鲁晓夫甚至宣称：“毛泽东去年当面对着尤金严厉地指责我们党，当时我们忍受了，现在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最后，双方不欢而散。

赫鲁晓夫一行于10月4日离开了中国。注意到10月2日会谈过于情

绪化的情况，双方商定销毁各自关于此次的记录。但是，就在离开北京不久，赫鲁晓夫就又一次含沙射影地攻击了毛泽东。

赫鲁晓夫在回莫斯科的路上，特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做了短暂的逗留。他并且在10月6日发表了一次公开的演说。他表面上称赞中苏之间的“兄弟团结”是世界和平的基石，实际上却公开宣称：如果有人“像一只好斗的公鸡那样渴望战争，那是不明智的”。这一影射，显然是指向了毛泽东的，这不能不更加恶化了双方的感情。

在这种情况下，中苏双方都开始在党内就与对方的分歧问题“打招呼”。1959年12月18日，曾陪同赫鲁晓夫访华的苏斯洛夫在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准备的一份长篇报告中，指责中共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时“犯了严重错误”。他认为，中共应“更及时地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这样，“西藏叛乱也许便不会发生了”。在中印关系问题上，他声称：“帝国主义的阴谋是要使西藏问题首先造成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紧张，然后挑动这两个亚洲大国自相残杀。”而中国领导人则“完全没有识破帝国主义的伎俩”，反而“向印度以及尼赫鲁本人开火”，实际上“恰恰是中了(帝国主义的)圈套”。

同样，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工作会议期间，经毛泽东批准，特地印发了《前苏联和我国对于重大政治问题的一些看法》、《中苏关于国际形势的若干观点》，《中苏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观点》等一系列文献材料，第一次将中苏之间可能存在重大分歧的情况向党内干部“露底”。

与此同时，在两国双边关系的层面，中苏之间的分歧也在急剧发展，并继续从双方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中表现出来。

1月19日，在得知赫鲁晓夫将对印度进行访问后，周恩来接见前苏联驻华大使契沃年科，要求赫鲁晓夫在访印期间不要谈及中印边界问题，以避免两党之间的分歧暴露并为印度资产阶级所利用。三天后，契沃年科转达了莫斯科的回复意见，坚持将一如既往地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严守中立”，并反对第三国进行干预。

在这一关键性时刻，中苏双方又走出了将中苏之间分歧带到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场合的重要一步。

1960年1月13日，赫鲁晓夫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表示，前苏联将单方面采取大规模裁军的行动。毛泽东对此表示了一般意义上的支持。2月初，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协商会议例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国派出康生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在会议的发言中，康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明确要求任何

国家不要在裁军等问题上代表中国说话或承担义务，没有中国正式签字的国际协议，对中国没有约束力。随后，《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康生的这一讲话，以示支持。

通过单方面裁军行动来显示社会主义国家爱好和平的姿态，以动员国际舆论迫使美国放弃僵化立场，是前苏联政府对美政策的一项重要策略。中国的公开表态不仅等于公开了中苏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而且对社会主义国家一致行动的原则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因此，赫鲁晓夫几乎是怒不可遏地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在华沙条约组织例会的闭幕式上，他对毛泽东进行了更加露骨的攻击。2 月 5 日，苏共中央又在一项致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中批评说：康生的发言是错误的，并给中共领导人扣上了“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帽子。

当时，在中共与苏共领导层内部，仍有很多人希望不使中苏之间的争论过度升级。然而，双方因分歧而产生的冲击力与惯性却是巨大的。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分歧所涉及的，是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世界革命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在毛泽东的提议与部署下，中共中央在纪念列宁诞辰 90 周年的时机，于 1960 年 4 月由《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列宁主义胜利万岁》一文，《人民日报》发表了《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的社论，以及由陆定一署名的《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一文，就当前时代特征、和平共处与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等问题，对赫鲁晓夫与苏共领导层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

在中苏双方的争论向深层次发展的同时，双方又各自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及共产党进行游说，希望将它们在政论中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与此同时，在 1960 年春夏举行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上，中国都以颇带火药味的革命性主张对莫斯科的“和平共处”与“裁军”的立场提出挑战。这些对峙性活动，在 1960 年 6 月 24—26 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各党会议上，终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次会议本来的宗旨，是要就召开一次由各国共产党广泛参加的代表会议进行磋商与准备。然而，当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来到会议上时，却发现，赫鲁晓夫与苏共代表团其实是有备而来的。

在会上，苏方散发了一份早已准备好并已译成各国文字的 84 页的“通知书”，对包括《列宁主义万岁》在内的中方所发表的文章进行批判。赫鲁晓夫的发言，更是到了语无遮拦的地步，他甚至攻击毛泽东“应该被认为是疯子”，批评中国对印度的政策是“纯粹的民族主义”，指责中共“要发动战争”，

等等。他还明显地表现出了试图利用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巨大影响,通过集合起某种“多数”来压服毛泽东与中共的意图:“毛泽东同志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毛泽东同志,因此,问题只好拿到这样的会上来解决。”

然而,赫鲁晓夫完全未能理解的是,对于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感,并对与前苏联关系中“不平等”现象高度敏感的毛泽东来说,这样的方法非但解决不了问题,只会为中苏之间的争论火上加油。

彭真在会上几次发言,均遭到与会者的起哄和打断,但彭坚持进行了辩解和还击。根据来自北京的指示,为了不使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过分地陷于孤立,中国代表团在会议公报上签了字,但在会议结束时却发表书面声明,指责赫鲁晓夫在会上破坏了兄弟党协商解决问题的原则,采取的是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重新把兄弟党关系当作父子党关系来处理。在中苏两党关系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1960 年布加勒斯特会议是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将中苏分歧从两党之间的问题变成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

赫鲁晓夫并不准备就此罢手。他对毛泽东富于斗争性的性格毫无了解,居然认为,可以通过对中国施加压力,来加深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从而迫使中共改变其内外政策。当时,大跃进给中国经济及社会带来的各种灾难性后果已逐步显露出来,中国正面临着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各种巨大困难。恰在这时,前苏联政府于 1960 年 7 月 16 日突然照会中国政府,以中方不信任和不尊重前苏联专家,以及向前苏联专家散发宣示中苏分歧的三篇文章为借口,单方面宣布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前苏联专家,并同时大幅度地减少了前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及其他各方面的物质援助。

赫鲁晓夫及苏共领导召回全部前苏联在华专家的决定,无疑使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当时所面临的严重困难时处于更为不利的局面。然而,依照毛泽东的性格,他却并不把它看成是一件坏事。面对大跃进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困难,毛泽东现在有理由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国现在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不仅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背信弃义密切相关,而且也是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及其利益所必须要承受的一种经历。

到这个时候,中苏同盟关系的逆转,已经走上了不归之路。尽管在 1960 年 11 月召开的 81 国共产党与工人党会议上,中苏两党曾就缓解两党之间的矛盾问题达成协议,两国关系也在 1961 年间得到了某种改善,但中

苏之间的深层次分歧依然存在。1962 年以后，中国的内外政策随着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这不仅是针对国内的事务，也是针对国际事务的)，进一步开始“左”转，中苏意识形态公开论战，进一步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与瓦解，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就对全球冷战发展的影响而言，中苏两国关系破裂，以及社会主义阵营走向瓦解，则使冷战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立为特征的两极化的“典型时期”，逐渐转向了一个依旧保持着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立的特点，却越来越具有多元性特征的“新时期”。

思考题：

1. 中国内外政策在 1958 年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同“大跃进”兴起有怎样的深层次关系？
2. 什么是中苏同盟关系的基础？为什么中苏同盟关系会在 50 年代中期后发生逆转？在中苏关系逆转的过程中，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3. 第二次台海危机为什么会发生？危机的发生同中美关系有何种影响？危机的进程又对中美关系的演变产生了何种作用？
4. 印度对西藏叛乱持什么样的态度？中印关系为什么会受到 1959 年西藏叛乱的影响？前苏联对中印关系恶化持什么立场？
5. 中苏分裂同冷战全局的发展有什么关系？对全球范围冷战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什么作用？

参考书目：

1.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2.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
3.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
4.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年。
5. 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6. 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

第五章
中国外交的革命化进程

牛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第一节　50年代后期中国对外关系动荡的起因及影响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60年代前期的中国对外政策已经处于一个重大变化的过程中。要理解60年代前期中国对外政策变化的特点,必须首先探讨50年代末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状况。

自1954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中国对外政策开始进入比较平稳的探索和发展的阶段。至中共八大召开,伴随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努力,中国领导人也为中国对外政策确定了方向,即"努力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不论是基于何种分析,他们明确地认为:"世界局势正在趋向缓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但是这种势头并没有持续多久,两个事态的发展开始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方向。它们分别是中苏同盟动摇和"大跃进"运动的兴衰。

50年代末中苏同盟开始全面动摇,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中苏结盟过程中便形成的领导(前苏联)与被领导(中国)的关系,在1956年波匈事件的冲击下,已经难以维持下去。这方面的变化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中国领导人利用前苏联在波匈事件中面临的严重危机,迫使其改变以往处理前苏联阵营内部国家间关系的某些方式和规则,并通过公布《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前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了以往的错误。

其二是中国至少暂时取得了在前苏联与一些东欧国家之间充当调解人的地位,这比较突出地表现在波匈事件的处理过程中。

其三是中国在前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显上升,特别是在东欧国家中的影响力明显加强,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中国领导人的活动反映了这种情况。

当时中国领导人有理由相信，中苏之间那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前苏联领导人当时至少在表面上也承认，事实确实如此。

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强调了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如何评价斯大林及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而且正是这个分歧埋下了中苏同盟破裂的种子。一个被忽视的重要方面是，从中苏国家关系的角度看，在经历了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浪潮和波匈事件后，中国领导层普遍认为并且相当重视的一个重大变化是，过去前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特别包括与中国之间那种"猫鼠关系"、"父子关系"，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

上述种种使中国领导人不能容忍前苏联在任何问题上表现出被认为是以势压人的态度，并斥之为是重演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如果不是中国领导人认为中苏在同盟中的相对地位已经发生了基本的变化，很难想像，1958年夏毛泽东在"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两个问题上，会如此怒不可遏。他当时直截了当地告诉前苏联驻华大使说，前苏联有关军事合作的要求使他"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中苏关系的变化从某个角度说，就是中国在前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显提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至少包括：这种提高实际达到了什么程度？前苏联能够允许这种变化达到什么程度？以及当出现分歧和矛盾时，中国领导人迫使前苏联按照他们对双方关系变化的理解，改变其态度和政策的能力，达到了什么程度？

进一步说，苏中之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曾经是中苏同盟得以建立并维系的基本条件之一。当这个条件被改变以后，中苏同盟该如何维系？双方关系建立在何种准则之上？或者说前苏联是否真正理解并接受了中国希望遵循的关系准则？至少当时没有人回答这些问题，很可能也没有人能够回答。

除了抗日战争的后四年参加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外，近代以来的中国对外关系历史没有提供过任何结盟的经验，尽管在不同的时期不乏结盟的愿望。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基本上是根据以往处理国际共运中的党际关系、国际统一战线中的"同路人"关系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关系等几个方面的经验，应付中苏同盟中出现的复杂情况的。反之，前苏联在结盟问题上有丰富的经验和传统，它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对盟友施加惩罚是维护同盟的必要手段，仅靠规劝和争论是不够的。当然使用惩罚手段不当，也会损害甚至摧毁一个同盟，特别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从革命运动中脱胎不久的

国家。

中苏同盟或更广泛地说一种全面发展的中苏关系，是当时中国对外关系的一块巨大而且关键性的基石。一旦这块基石被动摇，中国的对外关系就会出现全局性的不稳定，甚至国内政局也会随之动荡，这一点被后来的发展充分证明。

由于中苏同盟破裂后两国长期敌对的影响，当时中苏同盟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大作用，被普遍和长期地低估了。中苏关系恶化造成的冲击之大，很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未曾料到的。他们当时对同盟动摇后处理中苏关系应遵循的准则的定义并不那么清楚，而且肯定也没有被前苏联方面清楚理解并接受。在这样的基础上应对中苏关系恶化，必然是相当吃力的，而且肯定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中国领导人应对中苏关系恶化的独特方式，以及这种独特方式所反映出来的他们对同盟关系的理解，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从处理同盟国关系的角度看，有很多需要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几乎与中苏同盟开始动摇后不久，中国的国内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趋势。从 1957 年春夏开始到 1959 年，中国国内发生了两个重大的事件。一是 1957 年春发起了“民主整风”，即中共中央为吸取前苏联和波匈事件的教训，开展了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其目的是用“民主整风”的方法，解决当时社会中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党的部分干部与群众的矛盾。

另一个重大事件是 1958 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加速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步伐，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超西方大国如英国、美国等，并争取早日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不论是“民主整风”还是“大跃进”，都以失败结束。前者导致了反右派斗争，实际上加剧了社会矛盾。后者导致了三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并且严重地加剧了中共党内的紧张气氛。

这两场改革失败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失败本身。就对中国对外政策的长期影响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持续进行的党外和党内斗争与压制不同意见，大致确立了一种政治价值，即无论效果如何，只要是推动激进的变革，追求充满激情的目标，就是“政治正确”。任何务实与理性的思考和政策，只有在战术的范围才允许有存在的空间，而且通常很快就被新的更强烈的激情所淹没。这种“宁左勿右”的政治价值观在尖锐的党内斗争中得以确立，使中国对外政策中任何趋向务实与稳定方向的调整，都很可能是困难的

并难以持久。

到1959年夏季,“大跃进”实际上已经露出败相,中国领导层出现了要求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呼声。但是毛泽东将中共党内的批评意见一概斥之为“右倾”,将党内出现不同意见视为是“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与他共同浴血奋斗二十多年的彭德怀因此被定为只是一位暂时的“革命同路人”,并终于被彻底打倒。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中苏关系也开始走向危机。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7月间在波兰关于公社的讲话是对中国人民公社运动的暗讽,他几乎因此下决心与前苏联公开决裂。在毛泽东看来,《内部参考》上登载的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影射和攻击人民公社的讲话,既是落井下石,也是火上浇油,而且是与彭德怀等人“内外呼应”。他立即部署最快在当年秋季、最迟在1960年春季,反击前苏联的“反对派和怀疑派”,甚至考虑马上在《人民日报》公布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反公社”的言论。后来经讨论未获同意,才没有付诸实施。

赫鲁晓夫很可能并不了解毛泽东的愤怒,他在随后的中印边界纠纷中扮演了堪称愚笨的角色。特别是他访问美国以后,专程绕道北京,试图说服毛泽东配合前苏联的对外政策。

在9月30日的国庆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按捺不住地暗示中国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需要改弦易辙。在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在台湾、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上,指责中国采取了“冒险主义”的政策,并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在信念和目标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在同盟行动上也是紧密联系的”。赫鲁晓夫的此类言行引起毛泽东的极度反感,他谴责赫鲁晓夫是“右倾机会主义”,说前苏联“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此次中苏首脑会晤实际上成了中苏同盟走向衰亡的转折点。

不论是由于何种原因,伴随着“大跃进”的进程,中国的周边环境的确从1959年夏季开始恶化,而且这种恶化似乎是在几个方向同时发生的。

1959年夏季由于印度坚持其对中国的领土侵蚀,双方先后在朗久和空喀山口发生武装冲突,中印边界局势急剧地紧张起来。中印关系紧张无疑增加了中国平息西藏叛乱的困难,而且间接损害了中苏关系。中印边界冲突毋宁说是中国周边关系开始恶化的一个先兆。到1960年夏季,前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挑起边界事件,从此中苏边境地区开始不再安宁。与此同时,印度支那地区因老挝局势动荡而趋于紧张,特别是美国明显在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直接干涉。

上述情况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严重关注,如何认识和应对开始出现动荡的周边局势,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议事日程中的一个重点。

第二节 1960年的对外政策调整

一方面因“大跃进”出现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和粮食短缺,一方面外部关系高度紧张,这种情况引起了中国领导层的高度重视。从1959年11月开始到1960年上半年,中国领导层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反复讨论国际问题,以便决定如何认识和应对开始恶化的周边环境及对外关系方面的困难。

目前可以接触到的历史文献表明,这时的中国领导人大多还是倾向于要采取稳妥应对的方针。根据吴冷西的回忆,在1960年1月7日至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与会者基本确定了“努力主动地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的基本方针。在随后一段时间里,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次开会,肯定了一月会议的精神,并讨论了落实的具体办法。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正是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外交一度出现了比较务实的局面,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争取缓和和改善中苏关系 由于中苏两国不仅是盟国,而且前苏联还是中国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上的唯一援助国,中苏之间虽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是事后中方仍旧希望避免与前苏联关系破裂,为此,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争取“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甚至要“赖着跟他(赫鲁晓夫——引者注)搞团结,赖着不分裂”。

当然,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与前苏联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正面斗争,1960年在毛泽东的组织下,中共中央专门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分量极重的文件,将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公开化。紧接着,两党领导人更进一步在罗马尼亚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而中共中央坚持向各国党以及前苏联专家宣传中共正确主张的作法,甚至还促使前苏联政府单方面于1960年7月宣布撤退了全部援华的专家。即便如此,中共中央依旧抱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积极参与了当年年底在莫斯科召开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与前苏联领导人达成了一定程度的谅解。会议以后,刘少奇还以国家主席的身份,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对前苏联进行国事访问,从而使两国关系得到改善。

正是在上述情况下,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虽然已经日渐激烈,但直

到 1961 年，中苏两国国家关系仍旧保持友好，前苏联甚至决定再次向中国转让如制造米格 21 战斗机一类的先进军事技术。

争取缓和中印边界局势 这是这一时期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的关键环节之一，因为中印边界冲突的解决关系到整个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大局和总政策。

1959 年间，中印关系在西藏叛乱和边界冲突的影响下，极度恶化。中国领导人认为，印度的政策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特别是印度方面利用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制造舆论，配合西方的“反华浪潮”，所以中国必须予以坚决反击。不过经过 8 月边界军事冲突后，中国决策层显然既不希望两国关系继续恶化，也不希望中印边界冲突成为政治性议题的中心。在 9 月 8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了解并讨论了中印边界的情况后，中国领导人决定争取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

在中共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前两天，中国已经向前苏联方面通报了中印边界冲突的有关情况。但前苏联不顾中方的建议，在中共 8 日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以塔斯社声明的方式，公开对中印两国间的冲突表示“遗憾”，以显示在这一问题上态度中立，实际上是对中国表示不满。

中国领导人的反应是相当严峻的，他们认为前苏联那样做是“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而“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不过，毛泽东亦深知与中立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不结盟国家的主要代表印度发生冲突，将会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他很快就决定，停止与印度辩论边界问题，并指示媒体亦停止一切相关的报道。

为了要找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办法，在 1960 年 1 月的政治局常委会期间，中国领导人确认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并进一步提出用“互谅互让”的办法，即“我们做点让步，印度也做点让步”，从而达成妥协。会议还决定派周恩来访问印度。这时驻守中印边界的中国军队也接到命令，在中方实际控制线 20 公里内实行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等措施，尽可能避免军事冲突。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即着手准备访问印度，并拟订了《中印两国总理关于边界问题会谈的方案(草案)》。根据周恩来当时的估计，访印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也不可能破裂，最有可能的是取得某种有限的协议。他建议应采取力争缓和紧张局势但不怕拖延解决的方针，将访印的目标定为进一步缓和两国关系，为未来继续会谈和合理解决边界问题准备条件。周恩来的建议获其他领导人同意。

4月19日至26日周恩来对印度的访问证明,中国领导人的估计基本上是准确的。通过周恩来这次访问,暂时缓和了中印关系,中印边界形势平静了下来。

加快和平解决边界问题 缓和中印关系和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决定尽快解决与所有邻国的边界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在当时被置于首要的地位。不过,与印度谈判的搁浅并没有减缓中国与其他邻国解决边界问题的步伐。

在1月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国领导人全面讨论了与所有邻国的边界问题。可能是受到中缅边界谈判比较顺利完成和中印发生边界冲突的影响,中国领导人在会议期间制订了基本方针,概括地说就是尽快和有步骤地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所谓有步骤就是安排了大致的顺序,即当前抓紧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同时尽快解决中朝、中蒙的边界问题;加快解决与缅甸、尼泊尔和老挝的边界问题;中越边界因越南还在与美国作战,可以暂不解决;与前苏联的边界线最长,问题比较复杂,但也要争取解决。

与周恩来准备访问印度同时,中国政府即开始着手解决与其他邻国的边界问题了。从后来的情况看,尽管中印边界问题未能解决,中国还是基本实现了1月政治局常委会的设想,先后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等签订了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可以设想,1964年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如果不是被纳入到中苏论战中,也不是没有可能解决的。

缓和印度支那紧张局势 在印度支那地区,随着紧张局势逐步升温,中国对该地区的政策面临着进行调整的外部压力。当时中国需要处理的是两个问题,即是否支持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和如何解决老挝危机。相比较而言,中国领导人这一时期更关注的是老挝危机,而不是越南的局势。

1959年和1960年,在越南南方局势急剧变化的压力下,越南劳动党领导人开始改变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执行的加强北方建设,争取和平统一的战略方针,认可并越来越明确地支持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1960年9月召开的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加强解放南方武装斗争的政策。

越南劳动党的政策转变和越南南方解放战争的发展,使中国面临着相当复杂的情况。中国在1958年曾经比较明确地表示,越南劳动党应将巩固和建设北方作为首要任务,在南方则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联系群众,等待时机的方针”。现在中国不得不在既要维护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又要防止美国大规模军事介入,同时还要在坚持支持传统盟友等相互交织的矛

盾中做出选择。从随后中国有关政策的演变过程看，中国这一时期是逐步对越南形势做出反应的。

首先，越南南方的形势当时还不是中国外交中特别重要的议程，那里局势虽然出现动荡但并不严重，对于中国，它甚至还不如老挝问题那么严峻和直接。有北越作为屏障，美国当时在越南南方相当有限的介入，并没有对中国的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其次，越南劳动党的政策也是逐步发展的，至少在1960年还没有导致那里的局势出现剧烈的变化；第三是中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也不可能完全与中国领导人既定的大方针背道而驰。

正是上述这些因素使中国领导人在涉及越南是否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时，政策上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情况。基于一贯坚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中共中央不能不支持越南党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在越南劳动党三大召开期间，《人民日报》即公开发表社论，表示支持越南劳动党三大确定的支持南方武装斗争的政策。12月越南南方解放阵线成立，中国立即给予承认和支持。

与此同时，出于自身安全利益的考虑，中国领导人也不希望越南劳动党放弃政治解决的选择，甚至不希望越南南方的战争规模太大，导致美国大规模的军事介入。他们一再向越南领导人强调，既“要解放南方”，又要注意斗争策略，注意农村与城市的区别，斗争“策略上可以灵活”，要“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直到1961年中期，中国在公开场合仍然明确表示，支持越南根据日内瓦协议“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

这一时期中国坚持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立场和努力，更能反映中国对印度支那政策的特点。这首先是因为老挝与中国接壤，美国在老挝的军事介入比它在南越的干涉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要直接的多。其次是当时老挝局势显得更复杂更紧张。这两个因素使中国领导人更关注老挝问题，为控制那里的危机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正因为如此，中国对老挝问题的政策比对越南的政策要稳定清晰得多。中国在这一时期积极促成了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为最终签署《关于老挝中立宣言》及相关的议定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强调这一行动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是因为其结果缓和了印度支那形势和延缓了美国介入。从中国领导人处理老挝问题的过程看，他们几乎是在复制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期处理此类问题的思路、对形势的判断和选择的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政策的一个部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决定更多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的印度支那政策具有明显的

延续性，而且这种延续性这时还是中国政策的主要方面，尽管它开始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

尝试缓和中美关系 即使在美国被认为正在开始加强对印度支那的干涉时，中国领导人也还是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进行了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只是相当有限的试探，它也可以表明中国领导人调整对外政策的决心与力度。

在1960年初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期间，中国领导人确定了处理对美关系的基本方针："谈而不速，谈而不破"，即继续与美国谈判，既不破裂，也不急于解决问题。这一方针指导下的中国对美政策表现出一定的弹性。

毛泽东本人在1月初对一份分析美国对华政策可能出现变动的报告明显表现出兴趣。该报告认为，美国基于若干理由，今后有可能增加与中国的接触，并利用华沙会谈进一步试探。迄今为止没有历史文献揭示毛泽东是否和如何进一步思考有关的问题，不过后来的一些发展表明，他很可能并不只是感兴趣而已。当然，中国领导人的决定也同美国正在举行总统选举有关，它毕竟为了解美国对华政策是否可能出现调整以及美国未来的政策执行者，提供了一个窗口。

1960年5月，周恩来在与英国元帅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会谈时，明确表示中国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只要美国宣布愿意从台湾撤军，中美即可以开始谈判。8月30日，周恩来会见了美国记者斯诺(Edger P. Snow)。周恩来在美军撤出台湾的问题上，提出了比以往更富灵活性的建议，即美国首先承诺从台湾撤出其军事力量，至于何时和如何撤出，可以随后讨论。10月18日，周恩来再次会见斯诺，全面阐述了中国在裁军、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核试验和台湾等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并介绍了有关中苏分歧的情况。

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现出对即将就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Joseph Kennedy)在对华政策上的立场了如指掌。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断，他的谈话很可能是有准备的和有的放矢的。

4天以后，毛泽东接见斯诺，同他讨论了肯尼迪与尼克松(Richard M. Nixon)电视辩论的内容。他明确告诉斯诺，中国会将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里，中国"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不过中国会承担维护和平的责任，不会主动向美国开战，并且"要谈判解决"台湾问题。

从历史上看，中国领导人会见斯诺这样的美国记者从来都是有的放矢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如此频繁地与斯诺讨论中美关

系，显然是在为与美国的新领导人打交道进行试探。

肯尼迪当选总统后不久，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向美方表示，希望肯尼迪政府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他的表态当然是得到中国领导人允许的。此后不久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访问缅甸时，表达了同样的信息。将这些行动同“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的方针结合起来考虑，至少可以说，稳定甚至争取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环节。

以上种种表明，从1960年上半年开始，中国多数领导人的确认真地希望，通过积极推行务实温和的对外政策，能够稳定中苏关系和改善周边环境，并创造一个“外交新局面”。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能够同意，在面临“反华高潮”的情况下，全面推行务实灵活的对外政策？

有相当多促使中国大多数领导人调整对外政策的因素，它们包括八大方针的持续影响、大家仍然认为国际形势的总趋势是以缓和为主、他们对前苏联的赫鲁晓夫和印度的尼赫鲁等的看法仍然是矛盾的和不确定的，如认为赫鲁晓夫还不是完全的修正主义者，尼赫鲁还有进步性，等等。而毛泽东则大致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调整对外政策的。

首先，毛泽东希望有一个比较安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精力较快地消除已经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完成“大跃进”。

尽管1959年夏季已经出现了“大跃进”肯定失败的征兆，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人这时很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其后果的严重性。特别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后，“宁‘左’勿‘右’”的政治倾向严重削弱了许多人的洞察力，也使各地区干部宁愿浮夸虚报，结果是上下仍然一片凯歌飞扬，掩盖了形势的严峻程度。

1959年农业方面首先出现的衰退被隐瞒，1960年的元旦社论相当典型。它声称1959年不仅“工业总产值大大超过了国家的计划”，而且“农业生产在战胜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之后，……仍然取得了比1958年更大的丰收。农业生产总值显著地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这样的形势当然会使中国领导人“不但对于1960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决心和信心，而且对于整个六十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决心和信心”。

毛泽东在年初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国内形势是好的”，中国“如果能在国际上发生什么影响的话，主要靠我们自己把国内工作做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把事情办好”。正是基于对国内的“大跃进”的前景仍然抱有不切实

际的信心，以为在做某些局部性的调整后，仍然可以达到预定的目标，所以毛泽东再次提出争取“10年、15年”的和平建设。

再就是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看得相当严重。在1959年12月于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1960年3月，毛泽东又一次专门提出国际上“所谓大反华”问题。他在一份有关中国在巴基斯坦举办展览的电报上所做的批示中提醒说，要认识“所谓大反华问题的性质和意义”，并“做出充分的精神准备”。

毛泽东认为，之所以出现“国际反华浪潮”，就是因为中国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纯洁性。面对可能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要打退反华浪潮，“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的好”。他号召“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用他当时的话说就是如果给我们40年时间的话，那时候世界形势将会起大变化。

毛泽东自己相信并告诉他的同事，尽管需要对某些方面的政策进行调整，但“大跃进”必将取得胜利，而且中国也只能通过迅速实现“大跃进”的设想，才能抵御愈演愈烈的“反华浪潮”和其他的外部压力。因此毛泽东等一度希望排除任何来自外部对大跃进的干扰，这种干扰在当时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特别是1960年上半年中苏关系明显恶化，前苏联突然撤退全部在中国的专家，不仅立即给中国带来直接和巨大的经济困难，而且打击了中国干部队伍的士气。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讨论局势和处理中苏关系，中共政治局会议有时无法讨论既定的经济议题。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还必须采取措施来安定国内的人心。

据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介绍，1960年7月14和15日，周恩来向省市自治区领导人做有关中苏关系的报告，其中心就是告诉他们，不要因为中苏关系恶化而“灰心”。由此可见，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当时不调整对外政策，就不可能集中精力克服困难，实现“大跃进”的目标。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具体地说就是“大跃进”的成败及可能引起的政治后果，是最终决定中国这一时期对外政策走向的首要因素。澄清这一点不仅有利于说明，当时对外政策调整的程度并不足以大致消除导致对外政策动荡的根源，而且对理解后来对外政策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节　1962 年对外政策的再度转向

1960 年开始的对外政策调整取得了效果，但在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对外政策再次出现波动，其结果是导致对外政策开始向与 1960 年的调整相反的方向发展。

经济衰退对对外政策的影响。1960 年初开始的对外政策调整固然有其积极的效果，但是国内经济、首先是农业的严重衰退及其给对外政策带来的压力，却出乎中国领导人的预料，特别是出乎毛泽东的预料。1961 年的社论显示了建国以来少有的低调，与前一年相比，对国内形势的分析不仅数量增加，而且也务实的多。社论承认"农业两年歉收"，1960 年"农业生产计划和依靠农业供给原料的轻工业生产计划都没有能够完成"。国内经济严重衰退的后果之一，是造成了要求进一步调整对外政策的压力。

首先是经济衰退在深层次上改变了 1960 年中国领导人调整对外政策的动因。如上所述，中国领导层在 1960 年初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主要是基于他们对"大跃进"虽然面临困难但仍然会达到其目标的信心，其目的是给"大跃进"创造国际条件。1960 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则证明，对外政策调整的初始动力是没有基础的。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对外政策调整的方向并没有改变，但其目的已经自动地转向为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创造条件，即帮助克服"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而不是要创造"大跃进"胜利的奇迹。

其次，国内经济衰退造成的困难在客观上形成了要求对外政策更加务实的巨大压力。例如由于农业和部分轻工业没有完成预定的计划，给中国的对外贸易带来相当大的麻烦。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向前苏联及其他一些东欧国家请求推迟偿还 1960 年所欠债务，压缩同这些国家进出口贸易的规模，并接受前苏联的经济援助。这种情况自然要求中国要尽可能地稳定而不是恶化中苏关系，其中就包括了妥协的必要性。

此外，农业连续两年歉收，也迫使中国政府开始向非前苏联阵营的国家寻求粮食进口，同时与西方国家在其他领域的贸易也出现了发展的趋势。1960 年 8 月，中国领导人提出了逐步恢复 1958 年中断的日中贸易的"贸易三原则"，11 月签订了民间贸易协定，1961 年中日贸易逐步恢复。中国领导人甚至认真考虑了签订协议，从美国进口粮食。

上述情况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对外政策的一些重要方面。例如可以合理地推论，在中国经济陷入衰退，甚至影响到偿还外债的能力的情况下，中

国的对外援助必然需要压缩,这也间接地涉及对西方国家的政策,因为中国当时的外援主要是为了支持革命运动的。

到1961年末,经济形势更加严峻,继农业和轻工业之后,重工业也出现大衰退。中国经济出现未曾料到的严重衰退,进一步凸现了1960年对外政策调整的力度和程度的明显不足。更何况1960年初中国领导层虽然提出了"开创外交的新局面",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但是上述导致对外关系动荡的深层问题并没有解决,甚至有可能没有被认识清楚。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认识清楚了,也未必能找到恰当的解决办法。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的变化(且不论其原因为何)也形成了需要进一步调整对外政策的压力。

首先是中苏关系虽然出现缓解的趋势,但是仍然相当脆弱。经过1959年夏到1960年上半年的冲突和莫斯科会议前后的妥协,中苏关系从形式上看有所缓和。1961年上半年双方的经贸、科技和军事技术合作都在恢复或发展。4月中国与前苏联签订了新的贸易议定书,虽然其中规定的贸易额比上一年度少(主要是受中国经济状况的影响),但两国正常的贸易关系毕竟重新开始了。双方在国际事务上采取了相互协调的态度,相互通报有关情况,一些高层互访也在安排之中。中苏双方都对这种情况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前苏联方面认为苏中已经恢复了"友好、信任和兄弟般的关系";中方也表示中苏分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可以通过协商妥善解决。

中苏关系暂时缓和是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重要成果之一,不过当时的调整并没有能解决中国对苏政策中的深层问题。从1960年初中国领导层的讨论看,他们固然为缓和对苏关系的合理性,作了种种理论方面的阐述,其中迫于眼前利益的考虑也是一目了然的,他们的认识有不少是基于对当前利害关系的分析。这其实表明,在经过最初的意识形态争论以后,中苏关系的某些特征正在发生变化,务实地追求具体的共同利益,就有可能为维护和改善中苏关系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不过中国领导人很可能没有理解,当时中苏关系不可能在解决意识形态斗争的胜负后得到发展,但有可能在停止、淡化甚至回避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况下继续缓和。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中苏关系的缓解提供了一个思路,即在共同利益而不是在对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一致解释的基础上,是有可能保持中苏关系的稳定甚至发展的。问题是按照毛泽东当时的逻辑,前苏联党还没有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是可以挽救的,这才是中苏关系可以缓和和改善的主要依据。他总是以为,必须通过斗争,特别是分清理论是非,才能

达到中苏团结。为了取得这方面的胜利，中共领导干部也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

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在同前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中的所谓克制，只是表现为暂时不点名，如1960年春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的三篇文章，或不直接批评，如对1960年莫斯科宣言中有关如何评价苏共二十大的处理方式等。这种指导思想决定了这个时期中国不可能终止同前苏联的意识形态争论，只不过是时起时伏而已。这种状况一直是造成中苏关系难以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1961年春，双方又因为应如何对待前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发生了分歧。中国有关部门曾经建议，应在苏阿冲突中保持谨慎，以免严重损及中苏关系。但该问题仍然成为中苏关系再次恶化的导火索。毛泽东无法容忍前苏联对待阿尔巴尼亚的做法，他尖锐批评了前苏联，认为那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在10月中旬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期间，中苏在苏阿关系上的矛盾迅速激化，其背后实际上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即中国领导人不赞成赫鲁晓夫在诸如斯大林问题、和平共处等问题上的政策，并认为前苏联领导人攻击阿尔巴尼亚是指桑骂槐，攻击中国。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苏关系虽然没有立即恶化，但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

更为严重的是，1962年春夏之交，中国领导人曾经预见到的前苏联制造边界事端的情况发生了。在新疆伊犁地区，6万多名中国居民外逃到前苏联。迄今为止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前苏联决策层直接策划了这次事件，但它与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苏关系趋于恶化有关，应是合理的推断。且不论其原因为何，这一事件不可避免地导致中苏边界地区出现了紧张气氛。中国实际上面临着再次调整对苏政策的压力。

其次是如何应对越南日趋紧张的局势。如前所述，中国当时在印度支那地区仍然是将防止美国的大规模军事介入作为首要目标的，维持地区稳定和支持那里的革命运动，都要受到这个战略目标的制约。但是就中国已经开始实行的支持越南南方解放斗争的政策而言，已经出现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援助的责任。

除中国领导人一贯主张的不干涉其他党的决定外，当时主要有两个因素决定了他们的选择方向。其一是在中苏意识形态分歧中，中国领导人所坚持的理论原则导致他们无法不支持越南南方武装斗争。当他们坚持认为武装斗争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获得胜利的必由之路时，要他们不赞成、不支持一场发生在自己家门口的民族独立战争，是不可想像的。

其二是中国领导人在当时曾经设想，与中国周边的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蒙古、朝鲜和北越）建立一个联盟体系。为达此目的，毛泽东提出设想中的协议可以包括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条款。根据这种考虑，当北越提出请求时，提供支持和援助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从客观情况看，中国领导人中的确存在着援助越南统一战争的主观冲动，但这种援助的规模和性质等，直接受到美国加强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的巨大影响。1960 年底老挝内战升级，加剧了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1961 年初肯尼迪政府一上台，就将应付老挝局势作为重要议程，并从所谓“遏制中国”的战略层次，决定进行军事干预。3 月美国第七舰队开进中国南海，驻日本冲绳和泰国的美军宣布进入战斗状态。此后不久，美国在越南南方发动了“特种战争”，美军开始直接参加作战。

美国加强军事干涉使中国领导人感到，中国南部边疆的安全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1962 年初中国政府公开指出，美国在越南南方的军事行动对中国安全构成了威胁，认为美国的干涉“直接针对着越南民主共和国，而间接则针对着中国”。中国领导人更加相信，只有通过增加对北越的援助，才能打败美国的军事干涉。1962 年 5 月，肯尼迪政府宣布美地面部队和空军进驻泰国，中国立即做出了极强硬的反应，公开号召将美军“赶出东南亚”。此后不久，中国决定立即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 230 个步兵营的武器装备。

可以说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介入使中国加强援越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且其程度与美国干预升级的程度是成正比的。这时中国领导人对其他国家的外援还可以“量力而行”，在越南实行这个原则确实越来越困难了。

从 1962 年中国在整个印度支那地区的行动看，中国领导人选择的策略是与前苏联配合，通过政治方式解决老挝问题，防止美国在与中国边界接壤的地区进行直接军事干涉；同时增加支持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挫败美国在那里的“特种战争”。这两方面的努力都在逐步加强，其中支持越南南方武装斗争却使中国的有关政策不得不直接面对两个问题并有必要作出决定。其一是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是否会引起美国更大规模的军事干涉，甚至造成朝鲜战争中曾经出现的局面，即美军越过 17 度线，中国被迫直接参战？其二是中国在经济严重衰退的情况下，是否应该以及能否负担如此沉重而且还在与日俱增的对外援助？

第三是中印边界冲突进一步加剧。1960 年 4 月周恩来访印后，中印边界出现过短暂的平静。从 1961 年 4 月起，印度开始实施“前进政策”，随后

于年底对中国边疆领土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蚕食。作为对印度侵犯行为的反应，是年末中国对印度的谴责明显尖锐起来。中国舆论批评印度挑起边界纠纷，是在配合美国在国际上掀起的“反华逆流”。《人民日报》甚至公开点名批评印度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不分青红皂白。

1962年初，由于印军不断侵入中国领土，解放军开始恢复在边界地区巡逻，并逐步展开反蚕食斗争，加强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给印度的照会中正式警告对方，如拒绝撤出其侵略据点并继续其军事挑衅，“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被迫实行自卫”。

根据中国决策层当时的设想，还是要争取避免发生军事冲突。从2月1日中央军委下达的指示和5月6日解放军总参谋部下达的《关于恢复边境巡逻的具体措施和边防哨卡处置情况的原则》等命令的内容看，中国领导人几乎设想出了可以用来避免军事冲突的所有办法。

1959年夏印度军队在边界挑起军事冲突，造成解放军官兵伤亡，已经在解放军中引起极大的愤怒。毛泽东在1959年9月提出中印军队各自后撤20公里，以便双方军队脱离接触，以及后来单方面后撤军队等等，同解放军中已经形成的“怒不可遏”的强烈求战情绪有直接的关系。中国领导人认为，如果不将双方军队分隔开，军事冲突就很难避免。从逻辑上讲，只要印度不放弃对中国的领土要求而企图诉诸武力，在中国内部特别是负责边防的军队，就必然会提出进行军事反击的要求，也就是说中国决策层必然要面对来自内部要求采取军事行动的压力，并且最终要做出是否诉诸战争的决定。

除中苏边界、印度支那和中印边界出现紧张形势外，在东南沿海也出现了紧张气氛。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试图利用大陆的经济衰退，发动军事反攻。由于台湾与美国存在军事同盟关系，蒋介石的军事准备对东南沿海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解放军于5月开始战备动员，在有关地区进行军事集结并提前开始征兵工作。中共中央于6月间专门发布战备动员指示，要求加强在东南沿海的战备，以打败蒋介石军队可能发动的“二三十万人的登陆作战”。东南沿海备战与中印边界的反蚕食斗争结合在一起，在解放军中造成了高昂的士气，而且当时解放军已经完成了作战的充分准备。

经济衰退造成的压力和对外关系面临的严峻局面，终于导致中国领导层内出现全面系统地检讨对外政策的声音。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全面检讨一个时期以来的政策。这次会议没有讨论对外政策问题，不过刘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所

做的报告中，实际上为对外政策确定了基调。他在书面报告中照例提出，中共在取得国家政权后，要“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一直到共产主义世界的实现”。但在随后的补充发言中，他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说，为了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主要的是要把我们国内的工作做好。……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摆在国内问题方面。”刘少奇的这段讲话表明，当时中国领导层（包括毛泽东本人）一致同意，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这等同于履行“国际义务”。

刘少奇讲话后不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于2月27日写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一封信，阐述了对中国对外政策的意见和建议。这封信至今仍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其内容已经被有关的研究成果广泛引用。此后王稼祥又陆续起草了一些报告，就有关对外政策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建议。迄今为止，在已经公开或被披露的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只有王稼祥的信和有关报告全面系统地检讨了对外政策。

综合起来看，王稼祥的建议可以分为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试图全面、深入和系统地检讨以往对外政策涉及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包括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对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的基本判断、对战争、和平与革命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对和平共处的可能性的理解，等等。其二是关于进一步调整对外政策的建议。

就第一方面的内容而言，王稼祥提出的问题用当时的话语来评估，已经达到对毛泽东的一些政策理念构成根本性挑战的程度，这可能是后来毛泽东严厉批评王稼祥的观点的主要原因。对于毛泽东来说，从来都是具体政策可以讨论，而深层的基本的理论思想则不容置疑。

关于第二方面的内容，那些建议包含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层次是基本的外交策略原则，第二层次是处理一些具体问题的原则。从后来的情况看，那些策略原则至少在当年夏季以前，是与中国领导人的具体做法相吻合的。至于针对具体问题的建议，有的在随后形势变化的情况下，是难以行得通的，如他建议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上，要采取新措施打开僵局。而实际情况是，中国决策层不得不下决心使用武力驱逐入侵的印度军队。有的是后来从未被否定的，如在印度支那地区避免爆发“朝鲜式的战争”，在这方面中国领导人几乎尽了最大的努力。

不论是刘少奇的讲话还是王稼祥的建议，都产生于共同的国内外背景，它们在原则上也是一脉相承的，即主张实行更加务实稳妥的对外政策，为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毫无疑问，随后出现的堪称险恶的

国际形势，影响了此类政策的贯彻，迫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采取一些坚决的措施，包括使用武力，应对周边的压力。

如前所述，当时中国的周边环境正在恶化，一些情况的发展趋势显然不利于中国对外政策沿着务实稳妥的方向调整。此外，王稼祥在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针对具体问题的建议，在逻辑上固然是合理的，但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已经被证明很难行的通。尽管如此，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周边环境的恶化及其达到的程度，并没有严重到足以迫使中国决策层根本改变1960年初开始实行的、1962年初被王稼祥进一步明确地提倡和发展的对外政策，那些事件也不能被证明是当时促使毛泽东开始改变对外政策的主要理由。

6月间，肯尼迪政府通过华沙的大使级会谈，向中方表示美国无意支持台湾当局军事反攻大陆。没有美国的支持，台湾当局的军事行动只能是相当有限的。

新疆伊犁事件主要是通过外交渠道解决，至少在11月以前，并没有特别使中苏边界局势进一步恶化，也不是后来严重地冲击中苏关系的主要原因。中国领导人当时也认为，除了前苏联方面的挑动外，中国自己的有关政策也是需要检讨和改进的。

在印度支那地区，美国军事介入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总的说来还是间接的，尽管从后来发展的趋势看也是严重的，但7月间包括中美在内的有关国家等，还就和平解决老挝问题达成了协议。

最严重的中印边界问题，即使在10月升级为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也是有限的和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中共中央在中印边界反击战取得成功，主动从印度境内撤兵后发出的《关于结束中印边界冲突和中印关系问题的宣传提纲》表明，中国决策层当时认为，危机已经过去，可以一面寻找与印度重开和谈的机会，一面继续抓紧国内的各项工作。

这一时期中国周边发生的种种事件如果说对中国对外政策有影响的话，它主要是在中国内部造成了一种政治气氛，使主张改变1960年以来那种相对务实的对外政策的激进主张，比较容易引起共鸣和得到支持。当然，恶化的国际环境很可能也影响到毛泽东的心理状态。从他在1961年发表的诗词中，仍然可以读到一种堪称高雅的自信，如“无限风光在险峰”、“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等脍炙人口的诗句所表露的那样。1962年底及以后的诗词则反映出他对国际环境造成的压力的感受和愤怒，如《七律·冬云》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著名的诗篇。

当然，导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批评所谓“三和一少”，并因此开始改变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因，还是应该从中国国内政治带有全局性的重大事件中寻找，这个事件就是围绕对“大跃进”的评价展开的矛盾。

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是在经济形势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检讨中央的错误和决定全面改变政策，直接导致了对“大跃进”的怀疑甚至批评。在2月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和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国领导层形成的主流意见是，承认经济衰退的严峻程度，必须做出改变经济政策和大规模调整国民经济的战略决定。

应该指出的是，七千人大会以来的政策调整是为了解决经济衰退问题，但政策调整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党内的民主体制、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等等比较敏感的政治领域。这些领域中新政策的落实，的确引起了整个社会政治气氛的明显改善。在这样的气氛中，对以往错误的认识和批评必然更加深入和尖锐，王稼祥就对外政策提出建议也属于其中一部分。一些在党内斗争中因提出不同意见而遭受打击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如彭德怀等，必然要提出申诉。

“大跃进”因经济问题兴起，进而冲击到各个领域；现在它因经济问题而衰落，必然也冲击到各个领域。其结果如同搞“大跃进”引起党内矛盾尖锐一样，(实际上)否定“大跃进”也引起了党内矛盾的尖锐化。七千人大会上就存在对“大跃进”的不同意见，所谓不同意见包括肯定和否定“大跃进”的意见。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党内的分歧，特别是毛泽东如何看待否定“大跃进”的意见。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已经展现了他的基本逻辑。他一方面将发扬民主作为讲话的基调，同时提醒与会者必须认识到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要考虑自己站在哪一边的“根本立场问题”。特别是他针对当时的国际环境，提到帝修反、蒋介石、地富反坏右等都在骂中国。这毋宁说是给批评“大跃进”者划出了一条相当清晰的底线。只有理解了他不反对适度批评但坚持要有限度这种逻辑，才能理解他何以会在8月以后开始发起反击。他显然认为，党内对“大跃进”的否定已经超越了界限，必须彻底纠正。

1962年8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准备进一步讨论经济工作。毛泽东在发言中完全推翻了原定的议程，提出要讨论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并尖锐谴责了前一阶段那些明确否定“大跃进”的观点。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观点，将对“大跃进”的否定概括为“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最严重

的后果，是会议发表的公报包括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那段著名的论述。

这个时期毛泽东对所谓“三风”的批评中，有两个观点是关键性的。其一是党内对“大跃进”及其后果的批评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中国的修正主义”的表现；其二是“国内外修正主义都要里通外国”，即他们是相互勾结的。这在逻辑上决定了他在考虑对外政策时，很容易将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不同意见，特别是那些理论层次上的意见，同所谓“修正主义”问题联系起来。

正是在这两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批评了王稼祥建议中的观点。迄今为止，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毛泽东本人当时已经读过王稼祥的信和报告。一些论著的描述和介绍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毛泽东是否对当时的对外政策表示不满？如果不满的话，都包括那些方面，还是一切均不满意？他的不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等等。

有间接的历史记录表明，导致毛泽东当时批评外交工作的直接事件是他认为，在7月召开的争取普遍裁军和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接受了会议起草的没有反对美帝国主义字样的共同文件，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上，王稼祥联系上述事件，就外交工作作了检讨发言。此后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又点名批评了王稼祥。

不过将王稼祥的建议同所谓“三风”联系起来的最直接原因，很可能与9月14日外交部领导人在华东组的发言有关。他当时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即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要和气一点，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要少一点。他认为，同美苏和印度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外援“要算政治账”，还要更多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毛泽东对该发言显然很赞赏，在简报上批示“可看，很好”。此后“三和一少”同“三风”一样，开始被列入批判对象。

很有可能的是，外交部领导人同其他一些中国领导人一样，此时并不理解毛泽东批评“三风”的根本用意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该发言还是基本肯定了1960年以来的对外政策，即一方面认为进行斗争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斗争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关键在于“一股风”三个字。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毛泽东对反对所谓“三和一少”的赞扬，是同反对“三风”联系在一起的，对他来说，那不是哪个具体政策的问题，而是涉及指导思想，即对外政策应该服务于什么目的。这是问题的症结与严重性所在。

正是因为毛泽东批评“三和一少”是与批评“三风”联系在一起的，而所有这些批评又是上述两个观点的合逻辑的产物，所以说八届十中全会实际上改变了 1960 年以来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当然，指导思想的改变要贯彻到具体的对外政策中还有一个过程，就像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被最终贯彻有一个过程一样，而且它们实际上也是基本同步的。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还不能将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发生的中印边界反击战和其他一些外交方面的决定，简单归结为对外政策指导思想改变的结果。

1962 年的中国对外政策实际上受到一种结构性的矛盾的影响。当时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矛盾。第一个层次是国内经济衰退要求对外政策向更加务实稳妥的方向调整，同时周边环境恶化迫使中国至少要在某个方向或局部做出强硬的反应(如中印边界冲突)。

第二个层次是中国领导层在如何评估“大跃进”和应对经济衰退方面，明显开始出现不同意见，那些不同意见的出现及其争论结果等，也在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方向。不仅如此，这两个层次的矛盾都不是 1962 年突然出现的，它们各有其演变脉络，而且不同层次上展开的各种矛盾，也是相互联结、相互影响的。相比较而言，第二层次的矛盾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无疑是主要的，它是导致对外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

如上所述，这时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主要不是起因于足够严重的外部环境变化或外部冲击(如世界大战、大规模外敌入侵或其他威胁到国家根本利益的事件)，也不是全面检讨对外政策各个方面的结果(如中共八大前和 1960 年初的情况)，它主要是被国内政治变化所带动、是从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转变开始的。正因为如此，在研究它对此后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时，有几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其一是指导思想的变化有可能是逐步贯彻到具体政策中的，这个过程从逻辑上说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联系密切，而且很有可能国内政治仍然在发挥主要作用。

其二是指导思想的变化在对外关系的各具体方面，不大可能都有程度相同的体现，在某些方面甚至会受到以往政策的较大牵制。

其三是在某些具体的领域，指导思想的变化甚至有可能不会被贯彻。因此，对 1962 年以后中国对外政策的演变，仍然有必要做具体、细致和深入的考察。

第四节　中苏论战及其后果

如前所述，经过中苏共同努力，两国关系从1961年起得到明显的恢复。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后，中苏关系再次恶化。

在10月17日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中苏双方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几乎发生了直接的交锋。赫鲁晓夫在政治报告和总结报告中，以及其他领导人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都谴责了阿尔巴尼亚。由于阿尔巴尼亚是中国意识形态上的坚定支持者，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不能不曲折地批评了前苏联党的做法。对此，苏方领导人也反唇相讥，对周恩来的讲话进行了明确的反驳。

二十二大以后，中苏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矛盾明显在激化。11月间，当时任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的安德罗波夫(Yury Vladimirovich Andropov)约见刘晓，指责中共中央发表阿尔巴尼亚的反苏材料。12月前苏联宣布与阿尔巴尼亚断交。中国代表在几次国际会议上都公开批评了前苏联的决定，中国的舆论工具则不断地热情赞扬阿尔巴尼亚，并报道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各种援助的消息。

从后来的发展看，中苏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争论只是一个导火索，一个双方都认为是可以控制因而大加利用的矛盾发泄孔。围绕苏共二十二大激化起来的中苏争论的基本原因是苏共二十二大再次激烈地批判了斯大林，会议决定将斯大林墓迁出红场的列宁—斯大林墓地，安置在克里姆林宫旁。苏共二十二大还批判了所谓的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并决定将莫洛托夫等人开除出党。赫鲁晓夫对不满其政策的莫洛托夫等人的这种做法清楚地表明，他是决心利用苏共二十二大宣布将继续奉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政策，清除党内的反对派也势在必行了。

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上可能出现的情况看来是有所准备的。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后，即提出向列宁—斯大林陵墓献花圈并获苏方同意。中共代表团当时向列宁墓和斯大林墓各献花圈一个。在给斯大林的花圈的缎带上写上了"献给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前苏联领导人对此必定是极为不满的。周恩来在二十二大上发言后，引起参加会议的其他一些国家代表的不断指责。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提前回国，并在机场受到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彭真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继续参加会

议。苏共二十二大以后，毛泽东向路过北京的一些国家党的领导人强烈表达了他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二大纲领的不满，认为赫鲁晓夫批判阿尔巴尼亚是指桑骂槐，是在攻击中国。

尽管在苏共二十二大期间事态已经如此严重，苏共二十二大结束后，中苏对双方的分歧还是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赫鲁晓夫之所以在二十二大期间没有立刻向中国发难，而且在二十二大以后一段时间里继续保持低姿态，主要是因为前苏联的缓和政策没有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响应。就在苏共二十二大召开期间，又爆发了一场柏林危机，美苏两国的军队甚至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对峙。直至 1962 年春天，前苏联在东西德关系、核禁试和裁军等重大问题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处于对抗的状态。8 月间在柏林还再度出现危机和军事对峙。10 月间更进一步爆发了震动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前苏联在面临接连不断的严重危机时，当然不会蓄意恶化与中国的关系，以致给自己的外交雪上加霜。

中国自 1960 年确定的改善中苏关系的政策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并没有立刻发生变化。尽管毛泽东本人对赫鲁晓夫已经是深恶痛绝，但党的多数领导人当时并不认为中苏破裂已经不可挽回。他们认为中苏关系将是“时紧时松”，“中苏两国的团结，是中苏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王稼祥这时在给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报告中，甚至提出了更为稳健的建议。

中苏双方试图维持住两国关系的愿望终于未能经受住冲击。10 月 28 日，古巴导弹危机以前苏联的退让而告结束，中苏在此前的短暂合作也随之迅速结束。11 月 19 日苏共中央召开会议，肯定了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从而使他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他立刻着手反击中国在危机期间对前苏联政策的批评。从 11 月起相继召开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的党代表大会上，前苏联及其盟友对中国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中共中央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从 12 月中旬起，连续发表了 7 篇评论文章，对前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不点名的)全面批判。

这场论战持续到 1963 年初。1 月 16 日，苏共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上提出了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2 月 21 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高级会谈。23 日毛泽东在会见前苏联大使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时，拒绝停止论战，但同意举行两党高级会谈，并邀请赫鲁晓夫访问中国。3 月 9 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表示赞成举行两党高级会谈，并提出会谈应该讨论那些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战略和策略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讨论两国的关系。

3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建议于5月15日举行会谈，并就中国提出的需要讨论的问题，全面阐述了苏共的主要观点。5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前往前苏联，并于5月9日通知前苏联。双方最后商定，会谈于7月5日开始。

6月14日，在没有通知苏方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对苏共3月30日来信的复信，题目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共中央在《建议》中强调说，苏共在来信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因此，中共中央有必要就一些有关的原则性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

中共中央公开答复苏共中央来信和《建议》中的观点引起前苏联的强烈反应。在此后不久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指责中共中央使中苏分歧“尖锐化到极点”。苏共中央全会还通过了《关于行将举行的苏共中央代表同中共中央代表会谈》的文件，要求苏共中央代表在会谈中必须坚决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6月27日，前苏联驱逐了3名中国使馆工作人员和2名中国公民，理由是他们在前苏联非法散发中共中央的《建议》。7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责前苏联是在将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与此同时，进一步加速中苏两党关系破裂的一个原因，则是前苏联这时邀请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到莫斯科，谈判签署核禁试条约。在5月之前，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向前苏联提出了重开谈判的建议，前苏联一直未作答复。5月下旬，前苏联与美国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备忘录。6月8日，赫鲁晓夫致函肯尼迪，表示将在莫斯科接待美英特使，谈判签署一项核禁试条约。两天后肯尼迪即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就中共中央《建议》所做出的激烈反应，包括其在公开讲话中对中国对外政策的赤裸裸的政治攻击，都不可避免地会被中国方面看成是前苏联蓄意勾结美国对付中国的最恶劣的表现。

就在中苏两党会谈在莫斯科进行的过程中，美国代表团于7月14日到达了莫斯科，他们受到前苏联领导人的热烈欢迎。《真理报》当天又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声明，再度指责中国领导人蓄意要在核战争中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声称前苏联不能同意“中国领导关于在亿万人尸体上创造出‘高出千百倍的文明’的观点”。

在上述情况下，中苏两党会谈除了继续激烈争论外，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7月20日，中苏发表了公报，实际上宣布了会谈的失败。但几天后，即7月25日，前苏联在未通知中国的情况下，与美国和英国共同签署了部分

禁止核试验的条约。

中苏两党会谈失败不仅是中苏关系全面破裂的标志。从中国对外政策的角度看,中苏关系破裂与美苏共同签署核禁试条约几乎同时发生,实际上预示着中国将面对美前苏联手反华的困难局面。

中苏会谈破裂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开始更加猛烈地抨击前苏联,指责前苏联企图与美国共同“统治世界,要全世界都听他们的命令”。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了总称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论战》的九篇文章(通常简称为“九评”),全面抨击苏共的对内对外政策。

“九评”阐述的重要观点包括:断定“在十月革命的故乡已经发生了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的国家领导的事件,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表现是用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在对内政策方面则是提出所谓“全民国家”和“全民党”,否定在前苏联仍然有必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毛泽东自始至终领导着中苏论战。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是经他定名的,随后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连续发表的“九评”,也是经他审阅修改,并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定稿的。他还为这场论战制定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九评”的最后一篇文章提出了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该文的重点是最后一节“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它把毛泽东关于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归纳为十五个要点。

后来的发展表明,这些观点把当时国内已经开始形成的“左”的思想系统化和理论化,实际上为“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通过中苏论战,“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在毛泽东心目中,已成为一个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的压倒一切的问题。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因前苏联领导层内部矛盾而被迫下台,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A.N.Kosykin)被任命为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中国领导人当时不了解前苏联内部发生变化的原因,他们作出两个决定:1.通过访问了解情况;2.争取利用前苏联国内变动,改善中苏关系。中共中央决定暂停论战,并派出以周恩来、贺龙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

中共中央希望以赫鲁晓夫下台为契机,通过两国领导人的直接接触,寻

求消除分歧和改善关系的新途径。然而，中苏双方都没有在意识形态主导权上向对方妥协的打算，因此，中共代表团对莫斯科的访问并不愉快。11月7日，在庆祝酒会上，前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Malinovskii)借着醉意，要求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学习他们，搞掉毛泽东，引起了周恩来的严重抗议。

在随后举行的两党会谈中，中方清楚地意识到，苏方丝毫没有表现出可能改变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些基本政策。苏方明确表示，赫鲁晓夫被解职只是由他的"工作作风和方法"，没有其他问题。对于两党之间的问题，苏方也只是要求停止公开争论，然后召开各国党的会议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周恩来因此得出结论："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苏共领导还要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路线不变"。

1965年2月，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访问越南和朝鲜途中，先后两次在北京停留。周恩来、陈毅与柯西金会谈，劝告苏共不要举行由赫鲁晓夫提议召开的各国兄弟党会议，柯西金表示不能同意。3月1日至5日，苏共中央不顾中共中央的一再反对，在莫斯科召开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并发表了会议公报。对此，《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于3月23日联合发表了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社论，通过谴责苏共中央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宣布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实际上也是公开宣布与前苏联新领导人决裂。

面对这样一种不利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很快提出了他的一个基本判断，即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天下大乱。毫无疑问，中苏同盟的破裂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的危机感，使他对中国安全环境的估计更加严峻。也是从这时开始，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关注前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

第五节　援越抗美政策的形成

从1963年开始，中国明显加强了对越南祖国统一战争的支持和援助。这一年夏天，总参谋长罗瑞卿前往河内同越南领导人商定，如美军越过十七度线北进，中国将出兵参战。9月，在广东同化又召开了中、越、老、印尼四国党会议，讨论整个东南亚在美国干涉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形势。这一切表明了中国已经转向坚决支持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革命运动的立场。

中国决定积极支持越南南方开展武装斗争，除了美国对越南军事干涉不断升级对中国安全利益所构成的威胁，促使中国必须要采取积极的对策

以外，毫无疑问与毛泽东决心在国际上全面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的政治需要密切相关。由于赫鲁晓夫过去为了搞苏美缓和，拒不支持越南搞武装斗争，因此，随着中苏论战的全面展开，越南劳动党这时一改过去在中苏之间极力调和的态度，明显地赞同中国党的革命观点，自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1964年中期，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据统计，到1964年6月，越南南方的主力部队发展到10万人，民兵达到20万人。与此同时，美国先后启动了34A计划和海上封锁计划，加紧在越南的军事干涉。

面对美国的干预，中越开始协商美军直接介入后的军事合作。越南当时认为美国的军事干涉有几种形式，即1. 继续强化目前的特种战争，不进攻越南北方；2. 直接出兵打殖民战争，在越南南方打局部战争；3. 将战争扩大到北方，打朝鲜式的局部战争，或对北方进行海空战争。北越提出，如果美国地面部队进攻北方，希望中国直接参战。

6月下旬越南国防部长文进勇访问北京，毛泽东接见他时承诺，无条件共同对敌，你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7月，毛泽东指示把老挝爱国部队的后勤供应包下来。周恩来这时也表示，如果美国进攻北方，中国会作出最强烈的反应，具体措施则看战争进展的情况。在这个月里，中国、越南、老挝领导人在河内举行了三党会议，中方表明，中国的原则是尽一切可能将战争限制在目前的规模上，同时积极准备应付第二种可能，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就出兵。中国军队随后开始军事部署，加强训练，与越南军队共同进行了协同作战的战场准备。

会议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北部湾事件爆发。8月4日，美军发动大规模空中袭击，击沉、击伤北越25艘鱼雷快艇，摧毁荣市附近的大部分储油罐。5日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声称“国会赞成和支持总统作为总司令决心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以击退对美国部队的任何武装进攻，阻止进一步侵略”，以及“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包括动用武装力量，援助求援保卫其自由的任何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成员国或保护国”。

1965年3月2日，美军发动所谓“雷鸣行动”，开始对北越进行持续轰炸。美地面部队则以保卫美空军基地为理由，开始直接在南越与越南人民武装力量作战。首批美海军陆战队于4月间在南越的岘港登陆。5月间，美空军突破北纬20度线，将空袭扩大到整个越南北方。侵越战争变成了一场美军为主体、以“南打北炸”为特点的局部战争。

与此同时，美国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也在增加，美海空军加强了对中国

领海领空的侵扰活动，包括加强中越边境地区的侦察飞行，美军战机也不断侵入中国领空，甚至在中国海南岛地区上空攻击解放军的巡逻警戒飞机。美海军舰只频繁地在中国南海巡弋，它们甚至袭击中国的商船和渔船。

在美国军事干涉的大规模升级和直接威胁中国南部边疆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决定继续大力支持越方以升级方式与美国对抗。全力以赴地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是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措施。一个敌对的大国在如此接近中国的周边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中国很难袖手旁观，更何况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本身就是针对中国的敌对行动。

据此，毛泽东在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时声明，中国将全力以赴地支持北越抗战，中国也要准备打仗，并提出了中国参战的可能性。中国政府公开宣布："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支援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东京湾事件"发生后，北越领导人曾经向中国领导人表示，他们打算保持行动谨慎，并尝试与美国进行谈判，以便尽可能地阻止美国直接进攻北越。中国领导人很有可能是基于同样的考虑，一度也曾赞成北越采取包括尝试和谈在内的谨慎措施。但从 1965 年春季起，中国领导人开始对北越与美国和谈持反对立场。

促使中国反对美越和谈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其中固然有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的原因，也有中国反对前苏联修正主义斗争的影响，因为前苏联差不多从插手越南问题之日起，就透露出争取和平解决的意图。此外，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宣传氛围中，北越的抗美救国战争也被赋予了同时具有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一线和代表世界革命的一面旗帜等双重意义。

1965 年 3 月 22 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阐述了民解在抗美救国战争中的五点宣言。声明同时提出两点和谈的先决条件：1. 从越南撤除一切美国军队及其装备和设施；2. 民解必须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这反映出越南方面接受了中国党的劝告，事实上是拒绝同美国进行和谈的。

4 月 8 日，范文同在北越第三届国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了北越关于和谈的四点立场，即 1. 美国从越南撤退军事力量和设施，停止在越南南方的军事干涉和对越南北方的轰炸；2. 在越南实现统一以前，严格遵守日内瓦协议；3. 根据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纲领，由南方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4. 由越南两个地区的人民自己解决越南统一问题，外国不许干涉。对此，中国政府立刻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支持上述

立场。

在中国的鼓励下,越方决定不向美国让步,坚决抵抗,在南方扩大战争规模。1965年4月初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Le Duan)等访问北京,正式提出希望中国派支援军队进入北越。在中越两党会谈中,刘少奇表示:"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我们哪一部分去。"双方签订了一系列涉及中国向越南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协定。5月下旬,越南军事代表团访问中国,具体讨论军事援助和作战问题。

中共中央根据大规模援越工作的需要,组成了中央援越领导小组。6月9日第一批中国支援部队进入北越,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援部队开始进入北越,参加防空作战和协助修筑军事工程、铁路和提供后勤保障。据统计,到1970年7月,中国先后向越南派遣防空、铁道、工程和后勤保障部队共达32万余人,其中最高年份达17万人。他们在北越主要承担防空、修路、修机场、建通信线路等项任务。

从1963年夏开始到1965年夏,经过两年左右的时间,在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抗美援越政策终于形成。这项政策的基本内容是通过除直接参战以外的一切手段,支持越南北方统一祖国,抗击美国军事干涉的斗争,维护中国南部边疆的安全。但是,这一政策是在与前苏联尖锐对立和公开论战的背景下形成的,中越两党两国的密切合作,与前苏联过去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对美妥协,拒绝大力援助越南的情势密不可分。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前苏联对越南战争的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即从消极反对转变为积极插手。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援越政策造成巨大的冲击。

前苏联政府转而积极援助越南的标志,是11月27日前苏联政府发表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前苏联公开表示愿意向越南"提供必要的援助"。1965年2月,前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河内,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前苏联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不会对保障越南的安全"漠然视之"。4月10至17日,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访问莫斯科,前苏联在苏越联合公报中声称,前苏联在必要的情况下,将应北越方面的请求,派前苏联人员前往越南参加战斗。由于前苏联有着较中国强大得多的经济国防实力,掌握着大量中国所不掌握的可以用于对抗美国先进技术的先进武器装备,它的积极介入和援助,越南求之不得。因此,越南和前苏联的关系迅速密切起来,前苏联对北越的影响力也因此明显增强。

几乎从前苏联公开表示积极介入越南战争开始,中苏即在有关问题上发生矛盾。2月柯西金访华时,曾经提出两方面的建议。其一是双方协调

援越行动，发表一个社会主义各国首脑援越抗美的联合声明。其二是争取和平解决越南问题，提出应给美国“从越南找到一个出路”。

由于对前苏联党极端不信任，且已将之视为与帝国主义同流合污的修正主义，毛泽东显然无意在越南问题上与前苏联合作。中国方面不仅拒绝了前苏联的上述建议，而且在3月莫斯科会议以后对前苏联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居心进行了越来越严厉的谴责，并且一再声明反对前苏联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任何建议，在越南问题上决不与前苏联搞“联合行动”。

中共中央不与前苏联合作的方针必然反映到具体的政策中。1965年2月柯西金访华后不久，前苏联政府便向中国提出，通过中国铁路运送前苏联军队前往北越，并请求中国为前苏联军用飞机前往北越提供军用机场和开辟空中航线。中国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拒绝了前苏联的这些要求。中国领导人表示，前苏联援越物资通过中国，只能按照协议进行，并以此为理由拒绝前苏联利用中国港口向北越增运物资。中国领导人还一再向越南方面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前苏联志愿人员参加北越作战。

中国阻止前苏联插手和利用越南问题，根源于中国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它所产生的实际效果难免引起北越方面的反对。北越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抗击美国扩大战争，它的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必然是要为民族的生存，争取一切可以得到的外援，因此不可能接受中国的立场。要求北越在反对美国扩大战争的同时，拒绝接受或限制接受前苏联的援助，这不能不引起北越领导人的不满。再加上北越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对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坚持要求越南方面暂停武装斗争，接受大国调处，将越南一分为二的做法耿耿于怀，中国方面再度按照自己的意愿施加压力的做法，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也是自然的。

北越领导人这时直率地告诉中国领导人，他们不同意说前苏联正在出卖北越，他们认为前苏联的援助是“全心全意的”。他们坚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评价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准应该是国际主义，在越南问题上尤其如此。意即北越只能以对它的援助作为制定对苏政策的出发点，而不能依据中方的观点来对待前苏联。由此可以断定，不论中国是基于什么理由，北越方面对于中国反对与前苏联联合行动以及拒绝前苏联过境运送援越物资，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第六节　中国安全战略的调整

60年代中期中国的安全形势恶化，主要是指中国同时面临来自南（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军事干涉）北（前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加强军事力量等）两方面的威胁。为应对新的安全形势，中国的安全战略在60年代中期从南重北轻调整为南北并重，即同时防止美苏的军事侵略。

从中国领导人的许多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中美关系包含着全球战略、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等三个层次的问题。在全球战略层次上，美国要称霸，以及联合前苏联反对中国和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在双边层次上主要是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和破坏中国的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其中最突出也是最严重的是台湾问题。在地区层次上，当时主要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特别是在越南的军事干涉，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对付美国的军事威胁是中国在60年代中期大力加强与北越的军事关系的主要原因。

1964年8月美军在开始轰炸越南北方境内目标的同时，不断投放无人驾驶侦察机侵入中国境内，从事军事侦察活动，从而加剧了中美间的紧张局势。美国的军事行动引起中国领导人的严重关注。在“东京湾事件”爆发前不久，由于美国不断对北越发出扩大战争的威胁，毛泽东已开始做出反应。

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毛泽东这时对形势的估计变得非常严重，在会议期间开始扭转原定以解决“吃穿用”为主要目标制订的国民经济计划，提出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而且各省都要建立军事工业。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进一步反复向其他中国领导人强调备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甚至要求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要做好应付战争的军事准备。

8月上旬，显然是受到美国轰炸越南北方的影响，毛泽东对来自美国的战争威胁的估计更加严重。8月5日，就在美空军开始轰炸北越境内目标的当天，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即受命下令有关部队和军兵种进入战备状态。第二天毛泽东甚至感到有必要取消原定的活动计划，说是因为“要打仗了”。

在8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一再强调，要抓紧时间准备应付侵略战争，他甚至提出要不要搞三线建设，就如同大革命时期要不要到农村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10月间，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一项批示中称，三线建设“是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毛泽东的决定很快便成为中国决策层的共识，并被迅速贯彻下去。

1965年3月2日美军发动所谓“雷鸣行动”,美国扩大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和加强对中国领海领空的侵犯,对中国南部边境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为打击美海空军的侵扰,1965年初中国空军奉命进驻海南岛。4月上旬,中央军委决定取消对入侵美机“只起飞监视”等规定,命令“对侵入我大陆和海南岛上空的敌机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解放军空军随后制订了与美空军作战的计划,计划包括在边境地区与美空军作战和反轰炸的方案,同时也制定了在中国本土进行长期和大规模空战的方针。

中国当时显然对美国可能对中国实施空中打击极度敏感。周恩来通过访华的外国领导人向美国方面转告,“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而战争是没有界限的”。4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认为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安全,“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中国,“要切实作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

在加紧备战的同时,中国领导人还试图利用外交途径,向美国转达中国对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的严重关切,以便尽可能避免因误解而导致与美国的直接战争。4月2日,周恩来利用访问巴基斯坦的机会,向即将前往美国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Ayub Khan Mohanmmad)系统地说明了中国政府的三点方针:“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他还对何谓美国对中国开战做了明确的定义,即美国即使只是对中国进行空中战争,也将被视为对中国开战。由于阿尤布·汗推迟访美,周恩来又利用访问坦桑尼亚的机会,于6月8日委托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Julius Nyerere)向美国方面转达中国政府的三点方针。8月20日,周恩来又向赞比亚政府代表团阐述了上述方针。

如果从更广阔的角度看这一时期中美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对抗,由于失去了中苏同盟的依托,中国抗击美国入侵,主要是抗击美国使用海空力量攻击的能力,肯定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因此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和对中国领海领空的侵扰,对中国安全造成的威胁相对来说加强了,中国也不得不采取强硬的紧急措施。这种局面无疑增加了中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就在中国高度紧张地准备应付来自美国的战争危险的同时,中苏之间的边界问题也进一步引起了中共中央对来自前苏联的战争危险的高度警惕。

中苏两国当时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界,并且曾经长期存在领土争端和边界纠纷。这种情况是由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复杂原因造成的。在历

史上，沙俄以武力、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等手段，迫使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准备以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边界的全部走向。当时的问题在于，沙俄和前苏联超越了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占有和在地图上划去了3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从而在中苏边界的东西两段形成了一些有争议地区。

60年代以前中苏友好相处的时期里，尽管两国在边界部分地带的归属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双方在边境地区基本上保持相安无事，双方的边防人员和边民也能友好相处。中苏关系恶化后，双方开始关注边界问题，它们都加强了在边界地区的武装巡逻，并开始互相指责对方制造边界纠纷。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边界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中苏敌对升级的表现形式和双方斗争的手段，特别是成为前苏联向中国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的特殊手段。

从1960年8月前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挑起第一次边界事件起，中苏边境地区便无安宁之日了。据中国方面公布的统计数字，从这时起到1964年10月，共发生1000余起纠纷。前苏联方面不仅在中苏边界制造纠纷，前苏联领导人还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特别是利用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攻击中国的对外政策，贬损中国的国际形象。

针对前苏联领导人的攻击，《人民日报》于1963年3月8日发表题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的社论。该社论在列举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时，也包括了中俄之间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等，指出这些条约从“中国的东西南北四方侵夺中国的领土”。文章提出，前苏联领导人现在提出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平等条约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第一次公开提出两国间存在的不平等条约。

1963年7月间，前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关于前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苏军开始进驻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曾经宣布，由于自己处在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已经没有必要保持常备军。而且苏军也于50年代分批撤出。苏军重新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与中国毗邻地区，显然是要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压力。

1964年2月至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双方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或谅解。很可能是针对前苏联方面在谈判中的态度和提出的观点，毛泽东于7月10日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佐佐木更三时说，沙皇俄国靠武力占领了中国大片的领土，“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笔账呢”。毛泽东的谈话被

公布以后，引起强烈的震动。前苏联方面9月初公开指责中国领导人“鼓吹一种带有深远意图的公开的扩张主义计划”。可能是为了向国际社会澄清他谈话的本意，毛泽东曾经于9月10日利用接见法国客人的机会，说明中国无意要求前苏联归还那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只是说那是不平等条约造成的，是“采取攻势”让前苏联人“紧张一下”。

但是前苏联领导人并不肯就此罢手。9月15日，赫鲁晓夫在会见日本议员时声称，谁胆敢破坏“神圣的”前苏联边界，谁就会遭到前苏联人民的“坚决反对”。中苏边界谈判结束后，前苏联决定向中苏边境地区增兵，致使双方存在争议的边界地段逐步发展为引起军事冲突的热点。

赫鲁晓夫的讲话和前苏联的军事部署引起中国领导人的严重关注。毛泽东在10月7日和9日分别会见北朝鲜的崔庸健和阿尔巴尼亚的巴卢库时，均提到要对赫鲁晓夫对中国使用武力有所准备。他在考虑部署华北大城市的防御时，特别指出“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一切都要准备好”。

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要准备战争早打、大打，“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联合打，打核战争”，“准备两面打”。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公布的最能够直接说明中国曾经有过应付前苏联发动战争的准备的文献。6月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题为《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文章，提出要反对美帝国主义“就必须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主要是由于在南面面临美国的压力，中国领导人在中苏边界谈判结束后，虽然对前苏联可能采取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抱有高度的警惕，但在处理边界问题上总的说来是谨慎的和有节制的，对边界争论采取了冻结的态度。中国当时的确严厉抨击了前苏联的对外政策，但中国领导人仍然认为，前苏联的威胁与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有根本区别，美国的扩张才是全球性的和直接的威胁。

1965年2月，毛泽东接见了访问越南途经中国的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周恩来也同柯西金举行了多次会谈。他们一方面要求前苏联方面放弃所谓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仍然希望能改善中苏国家关系，并就改善两国关系提出了6点建议。根据周恩来当时的判断，毛泽东接见柯西金“自有积极作用”，会谈即使不能解决目前的分歧，也可以为今后的交往“作一交代”。此后周恩来在会见前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拉宾时，曾向他转达2月向柯西金提出的6点建议，并说“中国政府说话是算数的”。

9月6日印度向巴基斯坦发动军事进攻，印巴在克什米尔的局部冲突

扩大成为两国间的全面冲突。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印度的军事行动"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向印度施加压力。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印度侵略巴基斯坦的同一天,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印度军队越过中国—锡金的边界,并在中印边界的西段侵入中国领土,进行军事挑衅。

中国对印巴冲突做出强烈反应同中苏关系的状况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在猛烈抨击印度的军事行动是侵略行为时,特别指出不仅美国是印度扩张主义的支持者,而且前苏联也在"为印度侵略者撑腰",并称前苏联支持印度侵略巴基斯坦同前苏联在1959年和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中的政策一样,是在"玩弄同样的手法",其目的之一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个新的反华浪潮"。

1966年1月前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条约,并向中蒙边界地区大量增兵,两国的对抗开始升级。中国领导人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3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激烈地指责前苏联企图入侵中国东北和新疆,与美国一起分裂中国。

从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失败到1968年10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标志着中国的安全战略正在出现重大的调整。这次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在面临美苏从南北两个方向威胁中国的安全时,中国国防的战略重点开始从"重南(美国)"转向"南北并重(美苏)"、并出现了再向"重北(前苏联)"转移的趋势。

思考题:

1. 中国根本改变对前苏联政策的主要原因。
2. 如何认识中苏关系恶化中的美国因素的影响。
3. 毛泽东与王稼祥等人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主要分歧。
4. 越南战争对中国安全战略的影响。

参考书目:

1. 曲星:《中国外交5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2. 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
3. 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4. 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5. 李丹慧主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天地图书公司,2000年。

第六章
中国联美反苏的战略出台
(1966—1972年)

李丹慧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工作的严重干扰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文革"初期,中国的外交工作由于中苏分裂,反帝反修,特别是反修色彩愈益浓重,以美苏划线,对美国、前苏联的盟国和与其接近的国家,或定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帮凶",或视作"修正主义的伙伴"、"赫鲁晓夫的走狗",皆为攻击的对象,外事工作推行了一条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极"左"外交路线,极大地干扰了国家外交方针、政策的正常制定与实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使中国的外交环境急剧恶化。

"文革"初期外交领域的混乱状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夺权风潮波及外交部等外事领导机构,国家外交大权一度旁落,外事工作失控。

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论点指导下,林彪及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主要成员插手外事工作,全面否定建国17年来外交工作所执行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否定外交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并把强加给外事工作的"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进一步上纲为"三降一灭"。外事部门大批领导干部遭到揪斗,夺权风潮普遍波及外交部等外事领导机构。

1966年9月9日,毛泽东在一封来信上批示:要求一切驻外机关"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中国驻外使领馆因此也开始搞"四大",驻外大使几乎全部应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国驻外机构的正常工作受到极大影响。1967年2月7日中央发电指出内外有别,使、领馆一律不准搞"四大"之后,各驻外使、领馆才基本稳定下来。

但随着1967年全面夺权的开展,全国动乱进一步升级。7月,江青等人借毛泽东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过问外交部运动之机,再次鼓动外交部造反组织夺权。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等人操纵下,北京

外国语学院和外事系统的一些造反派，在外交部大门外“安营扎寨”，静坐绝食，要求揪斗陈毅。

8月7日，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发表谈话，扬言：“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揪斗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他鼓动说：“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让我们共同努力把外交部搞成彻底革命的外交部”。

在王力等人的鼓动下，外交部系统的造反派于8月16日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查封了外交部党委，宣称夺了外交大权，进而擅自以外交部名义向中国驻外机构发号施令。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等人则被押上街头卖红卫兵小报，几乎所有大使、参赞、司局长都遭到揪斗。

国家外交大权旁落，外事领域迅速失控。8月22日晚，在北京发生了由几十个造反派组织制造的万人围攻英国驻华代办处，火烧办公楼、批斗英代办的严重事件。与此同时，还发生了造反群众砸印度、印尼驻华使馆和准备冲缅甸驻华使馆的事件。

二、热衷于搞世界革命，以中国为中心，通过全球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战争，主张一举消灭帝修反。

“文革”初期，中国推行一条唯我独革，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外交路线，“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之说风行一时，外交工作进一步走上反对帝修反的所谓“革命外交”道路。

1965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林彪署名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文章提出：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由此，“文革”开始后，中国将“正在临近”的世界革命的希望寄托于亚非拉，实施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积极输出革命，不但支持那些尚未取得政治上独立的国家进行武装斗争，而且还鼓动一些已获政治独立的国家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

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对世界革命起决定因素，“中国不倒”，“世界就有希望”，“中国一片红，就等于整个欧洲一片红”。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个讲法很欣赏，指示这个讲话的录音应放给全军人员和全国红卫兵听，中共中央并为此印发了这篇讲话。受到毛

泽东批示的鼓舞，半年后，林彪又在庆祝前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进一步提出，要把“祖国建成更加强大的世界革命根据地”。

“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的信念致使一些外事工作人员采取种种所谓革命行动，与“帝修反”进行面对面的抗争。1967年1月，中国留欧学生69人回国途经莫斯科，在列宁、斯大林墓前集体朗读毛主席语录而被苏方军警围攻殴打。国内民众闻讯群起支持，前往苏驻华使馆周围游行，一些红卫兵更跑到北京机场围攻前苏联撤回国的外交人员家属。与此同时，在北京还发生了多起红卫兵围攻捷、波、匈、保等国驻华外交官的事件；一些红卫兵还非法越过国境，到越南、缅甸等国去参加反抗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实际斗争”。

三、不顾内外有别的外事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中心任务，强加于人。

1967年11月6日经毛泽东审阅发表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把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出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宣称“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由此，外事工作一度突破了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外事活动的一项主要任务。《毛主席语录》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发行，毛主席像章也被作为革命的标志输出国外。

在中国边境地区，一些造反群众用高音喇叭向朝鲜等邻国宣传“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在一些国家并发生了中国驻外人员强迫华侨学生或外国人佩戴带毛主席像章、接受中国的政治口号和个人崇拜的做法、接受“文革”的宣传等事件，引起驻在国的忧虑和反感。

极“左”思潮的泛滥，极“左”外交方针的推行，给中国的外交环境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在1966年至1967年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先后发生外交纠纷，国家关系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在亚洲国家中，中国同印度、印尼、缅甸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东盟国家对中国更加疑虑和敌视。在非洲，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关系出现倒退。除驻埃及大使黄华外，中国驻非洲国家的许多使馆由造反派掌权，干涉驻在国内部事务，引起这些国家的严重不满，其中不少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戒备措施，有的关闭其驻华使馆，有的中断了外交关系。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和其他交往也受到影响。对欧洲国家，中国只与阿尔巴尼亚和罗马

尼亚关系比较密切,同其他建交的欧洲国家基本没有互访活动。特别是同英国的关系,降到最低点。在此期间,正式派出政府代表团访华的国家大大减少,因各种问题与中国发生争执的国家却大大增多。中国的国际形象及对外关系受到严重损害。

"文革"初期极"左"外交路线及外事领域动乱局面的形成有着深厚的中苏关系恶化的国际背景,与毛泽东的对苏认识、中苏意识形态分歧乃至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中苏分裂构成了"文革"初期中国制定外交路线和方针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其一,19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在内政外交政策上发生重大背离,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从而对前苏联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感,甚至是敌视的心理。这种情况导致毛泽东极度担心中国出修正主义,动辄将中国党内及国内出现的意见分歧定性为"翻案风"、"黑暗风",并与赫鲁晓夫联系到一起,寻找这些现象的国际背景。毛泽东越来越担心:党内已经有了赫鲁晓夫的人物,倘若他们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甚至可能被杀掉。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深入,毛泽东开始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特别强调"要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毛泽东在把对外战略的重点逐渐从反对美帝国主义转向反对前苏联修正主义的同时,也把国内阶级斗争的重点从防止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转向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的重演,进而在此理论基础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反修防修既然成为发动"文革"的主旨,自然也就对"文革"时期的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实上,毛泽东让王力过问外交部运动,就有要"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握外交大权,在外交领域贯彻其反修防修思想的意图在内。结果,夺权风潮所及,造成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极度混乱。

其二,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开始就国际共运总路线、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论争。中国党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为反面教员和批判靶子,在坚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等提法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的自行调节能力估计不足,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高,不适当地强调了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强调战争引

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过分乐观的世界革命大前景，强调国际阶级斗争。

与苏共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使中国党在激烈的论战中忽视了1950年代以来国际环境中出现的和平因素、国际局势趋向缓和的历史契机，以及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忽视了1950—19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科技、文化大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效应，局限于世界革命的认识之中，不仅在国际斗争中继续强调反帝反修，而且把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斗争提高到不应有的高度，严重扩大了打击面。

其三，由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导致的国际共运大论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乃至破裂，使中国在处理国家关系和政党关系方面，以我划线的色彩愈益浓重。在强烈的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意识下，中国党一度以自己的理论、方针、政策为区分真假马列主义的准绳，混淆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是非界限，把对中国现行路线、方针不理解的兄弟党和国家，统统划归修正主义政党、赫鲁晓夫集团，加以反对。这时在毛泽东看来，除了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走狗之外，还有赫鲁晓夫的走狗。“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了”，从而更加强化了中国“唯我独革”的观念，为挽救“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的局面，对外大力宣传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毛泽东思想。

如果说中苏分裂构成了“文革”初期外交工作混乱和失控状态的一个背景，那么，也正是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状况，促使毛泽东开始重新审视并考虑调整反帝反修、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方略。而外事领域的无序状态，显然也已不能适应中国对外战略转变的需要了。

第二节　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前苏联因素

1966年1月，苏蒙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前苏联通过与中国边界长约4500余公里的蒙古国，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中国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余公里，苏军战略军团的作战纵深则可达700余公里，完成作战任务的时限为10—14昼夜，何况中蒙边界地区地势基本平缓，尤其便于前苏联坦克机械化部队的前进及展开。

这一情况与前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相结合，使毛泽东进一步感受到了前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日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Miyamoto Kenji)时，在提到准备美国人从东海岸，上

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方打进来之后，着重谈了前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指出前苏联“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阵地，运来了原子弹和氢弹，驻扎了两个师。在中亚西亚的新疆那一边的哈萨克斯坦增加兵力。在赤塔以北的伯力、海参崴增加兵力”。并表示还要“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前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

毛泽东的担忧不无缘由，前苏联部署在其国土纵深的洲际导弹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导弹可以攻击中国全境；部署于远东战区的远程航空兵如从中国“三北”方向入袭，作战半径可达长江一线。前苏联海军实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也明显增长，四大舰队中唯一不用于欧洲的太平洋舰队特别突出，它可以从日本海直逼中国的黄海和东海，对中国大陆实施封锁和登陆作战，苏军并频繁举行针对中国的进攻性军事演习和政治性活动。尽管前苏联海军力量膨胀的主要目的在于抗衡美国，但在中国看来，它同时也带有从海上遏制中国的意图。

1968 年 8 月，前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仅用了 6 个小时就出兵占领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与此同时，前苏联在一系列声明和宣言中提出的“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利益有关论”、“大国特殊责任论”等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一套理论，为任意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依据。

1969 年 6 月，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又提出了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以后，前苏联先后派出二十多个代表团到东南亚、日本等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活动，宣传“亚安体系”，试图拉这些国家一起建立一个新的针对中国的包围圈。

面对前苏联构筑的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以及前苏联重兵压境的战略态势，毛泽东转而将前苏联确定为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最大、最现实的威胁。

此期，随着对中国军事压力的逐渐加强，前苏联开始在中苏边界不断制造事端。从 1964 年 10 月至 1969 年 3 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 4189 起，比 1960 年至 1964 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1966 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中苏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前苏联边防军一再挑起严重的边界纠纷，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 年至 1968 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冲突由口头

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殴,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8 年 1 月,苏军又进一步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 4 人,制造了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

中国对于苏方不断挑起的边界事端,有一个忍让、准备和反击的过程。七里沁岛流血事件之后,1 月 24 日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边防部队要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依据这一方针,黑龙江省军区也曾组织过针对苏军挑衅的还击行动,但没有成功。

总的来说,一直到 1969 年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中苏边界冲突程度还是严格控制的,要求边防斗争着重于政治、外交斗争,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因此,中国边防军在前苏联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都只做出了有限的反应。

1968 年末 1969 年初,前苏联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仅 1、2 两个月,苏军入侵就达 8 次之多。珍宝岛地区的形势日见紧张。

为了打击苏方的气焰,黑龙江省军区于 1969 年 1 月 25 日再度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 3 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该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并在珍宝岛附近的边防检查站设立指挥所。沈阳军区基本同意。19 日,总参谋部和外交部也同意了黑龙江省军区的这一方案。总参在给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要求要选择重点,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不予纠缠。中共中央也批准了选择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周恩来明确指示: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这样,至 2 月末,中国方面已对在珍宝岛地区进行自卫反击问题做了周密的安排。

3 月 2 日,中苏珍宝岛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终于爆发。其后,前苏联当局继续扩大对珍宝岛地区的武装进犯。从 4 日至 12 日,苏边防军装甲车和武装人员多次侵入珍宝岛及岛西侧的中国河道。7 日,中央军委复电沈阳军区,指示在 3 月 20 日化冻前仍把珍宝岛和七里沁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并再度做了军事部署。同时,周恩来召见在京参加中共九大筹备工作的沈阳军区司令员,了解反击准备情况。3 月 15 日和 17 日,苏军又出动坦克、装甲车数十辆,步兵数百人,多次向中国守岛军民发起进攻,被全部击退。

对于珍宝岛事件，苏方最初的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苏共给东欧党发出的内部情况通报指出：情况表明此事件之前中国政府已做了长时间的准备。尽管前苏联的这个通报不乏消除东欧各国在苏侵捷后产生的恐惧感的成分，但前苏联军方对中国的反击缺乏准备还是事实。不过，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冲突的双方在这次事件中哪一方有所准备，也不在于谁先开了第一枪。毕竟，珍宝岛事件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是中国对前苏联不断挑衅的反击，而且事件发生在中国所认定的自己的领土上。

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升级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中国对这次事件所做出的异乎寻常的反应。第一，珍宝岛战斗之后，中国在首都北京和全国城乡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强烈抗议前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在 3 月 4 日至 12 日不足十天的时间里，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已达 4 亿人次以上。第二，中国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前苏联的战备高潮。3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汇报时指出：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还说，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知道了。

4 月 1 日至 24 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在代表中央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决不能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4 月 28 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并说：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正是通过党的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准备打仗”的号召。

珍宝岛战斗使前苏联方面遭到相当的损失，前苏联对中国的报复几乎不可避免。6 月 10 日，苏边防军进入中国新疆伊犁州裕民县塔斯提地区两国边界的有争议地带，干涉中国牧民放牧，与中国边防人员发生武装冲突。8 月 13 日，前苏联军队出动直升飞机、坦克、装甲车和武装部队 300 余人，再次进入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的中苏边界争议地区，阻拦中国边防军人巡逻，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数十人，制造了一起带有明显报复性质的严重流血事件。同时，前苏联还通过美国新闻媒介，扬言要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两国之间的战争空气更加紧张，中国的战备工作开始进一步超出常备规模，从政治、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临战阶段。

中苏两国在珍宝岛边界发生的军事冲突，向全世界，特别是向美国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中苏两国已经走到战争的边缘，双方关系的恶化已无法挽回。据说，毛泽东在看完一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后曾谈道，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还说由于中苏分裂，美国由打“两个半战争”缩减到打“一个半战争”了，美国将根据中苏各方的利益来考虑并决定自己的外交取向。

还在1969年2月，毛泽东就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四位元帅一项研究国际形势的任务。珍宝岛事件之后，面对着来自前苏联的越来越严重的军事威胁，四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6月7日至10月进行了近20次战略务虚讨论，向中央提交了《从世界看一棵珍宝树》、《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提出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陈毅还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面对中国的一系列激烈反应，前苏联领导集团内部也是满腹狐疑，争论不已。以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为代表的强硬派，坚持中国有可能发动对前苏联远东的进攻，力主先发制人，对中国实施“核手术”，首先压制中国的核力量。而以总理柯西金为代表的温和派，则积极谋求与中方沟通，希望摸清中方真实意图，争取缓和双方关系。据此，经过前苏联部长会议批准，柯西金要求借参加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葬礼的机会，路经中国北京与中方领导人进行会晤。考虑到避免中苏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需要，毛泽东同意了柯西金提出的要求。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举行了“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协议。会谈中柯西金还提出了在铁路和航空交通、高频电话通信等方面关系正常化；建立和发展双方的经济联系，扩大贸易往来，签署当年并次年的贸易议定书，确定目前五年计划（1970—1975年）期间双方经贸合作方式，以及研究互派大使等建议。周恩来表示，将就这些建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柯西金同时还以前苏联政府的名义请周恩来向毛泽东转达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表露了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迫切心情。

9月18日周恩来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26日柯西金即密函答复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

犯、互不使用武力国家间的专项协定。这就等于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向中国做出了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正式保证。显然，前苏联这时也试图消弭与中国之间紧张的战争气氛，以避免将中国逼向美国一边。

然而，前苏联领导人的口头保证并不能减轻前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的实际压力，更无法完全消除其扬言对中国进行"核手术"给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所造成的心理影响。何况，毛泽东也不可能仅凭与前苏联的一纸协议，就更改自己调整中国外交战略方针的思路，从而造成国内和国际间认识上的混乱。因此，9 月 11 日晚 7 时柯西金刚飞离北京不久，中国外交部就电话通知前苏联驻华使馆：次日将发表的经双方商定的关于两国总理会谈的消息文稿须做一些改动，删去"会谈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一句。对于柯西金提出的诸项建议，中国方面也基本没有响应。

由于不相信柯西金的表态，担心前苏联会突然袭击或丢原子弹，中国全国对苏备战的紧张气氛依旧持续升温，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包括毛泽东、林彪在内，全部秘密离开了北京，前往南方。周恩来率留守的军事指挥系统，即"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也很快撤离中南海，转入北京西山秘密掩体中进行工作。10 月中旬，全军各部队已进入一级战备，从中央到地方都处于临战状态，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军民更是剑拔弩张。

10 月 20 日，依照机场会谈约定的日程，中苏两国代表团开始了边界谈判。由于苏方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甚至否认双方总理已经达成的谅解，中国认为苏方态度有所后退。其后至 1978 年 6 月，由于双方在边界问题立场上的分歧，谈判虽然没有中断，但均无任何实质性进展。

这一阶段的中苏谈判是在中、美、苏三大力量进行斗争的国际大背景下举行的。由于勃列日涅夫政府已经放弃了赫鲁晓夫与美国缓和的外交政策，美苏两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激烈的争夺，前苏联当然不想在这个时候与中国发生冲突而被美国利用。因此，前苏联试图通过与中国和谈，稳定双方边界的局势，以便在同美国的斗争中不致陷入被动。中国响应前苏联举行边界会谈的建议，同样也是想要缓和两国的紧张关系，尽可能谋求与前苏联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纠纷。正因为中苏双方都具有这种心态，因此这一谈判持续了 9 年，虽未获得结果，但中苏两国边界毕竟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珍宝岛事件不仅便利了中国对美苏外交战略的调整，它尤其便利了毛泽东整合国内由造反夺权、派性斗争导致的混乱、动荡的局面。除了中共中央利用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发布了一系列严厉制止各地武斗夺权的通告，有

效地刹住了各地的武斗风以外,对外交部系统的调整和整顿尤其见效。

在此之前,毛泽东对外事领域的无政府主义失控状况及其负面影响已有所警觉,并不断采取措施予以纠正。还在1967年王力"8·7讲话"之后不久,毛泽东就明确批评王的讲话是"大、大、大毒草"。鉴于王的讲话造成了外交工作上的极大混乱,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翌年1月,同样负有责任的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外事系统的动乱局势由此有所缓解,外交失控现象基本得到控制。

从1968年3月起,毛泽东又针对外交工作中存在的种种"以我为中心"的做法,做出一系列批示,要求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对"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并批评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提法。

是年8月前苏联侵捷行动,以及中苏边界冲突升级,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现状,使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中国外交陷入困境的严重后果。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第一次承认:"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进而他亲自做出修复对外关系的姿态,于5月1日晚,同周恩来等人在天安门城楼先后接见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赞比亚、瑞典、柬埔寨、刚果(布)、坦桑尼亚、几内亚等8国新任驻华大使;此后又在197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亚、非、欧4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并同一些使节进行了重要谈话。毛泽东请使节们代向各国元首问候,以此明确表示中国愿意改善和发展同各国的关系。

1970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反复谈到"文化大革命,乱子多得很","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查出来了,就是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有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集团在起作用,叫'5·16兵团'"。此后,毛泽东在会见朝鲜军事代表团时更直接点明:有些人"趁机会名为造反","在北京砸烧英国代办处,印尼、印度的大使馆也遭殃了",指责说,"那些人就是国民党"。12月18日,毛泽东又对斯诺(Edgar Parks Snow)说,"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指示,周恩来等人也采取了种种措施,集中纠正强加于人的极"左"口号和极"左"行动。1968年6月,中共中央派军队干部担任外交部政治部军代表。不久,一批外事领导干部被"解放"。1970年初,中央又正式向外交部派出了军代表。外交部革委会也于6月成立,外事工作逐步恢复正常。

1969年春节后，周恩来催促外交部改变中国驻外大使职位除埃及外全部空缺的不正常状态，指示无论新任或返任大使，要以阿尔巴尼亚、越南、法国等为第一批。根据该项指示，外交部于6月初下达了驻这三国大使的任命。至7月下旬止，周恩来先后指示和安排了14名驻外大使回任或到任。此后，中国陆续重新派出一批批驻外使节，使各驻外使领馆由大使等主要负责人回国参加“文革”运动而造成的长期出缺状况得到扭转。

1970年9月和1971年4、5月，周恩来还亲自部署外事部门批判极“左”思潮，针对“文革”以来中国同许多国家几乎中断来往，许多方面的活动停止的状况，提出现在是应该“开门”的时候了，表示反对把前17年的外交路线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不赞成到处搬用“反对帝修反”的口号；并特别指示外交部：搞外交不是坐“冷板凳”，而是“热板凳”，要积极、主动地与外界接触，自己给自己创造条件，开展外交工作。

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纠正外交工作中“极左”偏差的方针指导下，外事领导机构从1969年起，开始对以往主要由中国方面极“左”行为而造成两国关系损害的事件，或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内部接触，主动承担责任，积极恢复与修复对外关系，如修复与尼泊尔的关系，改善和恢复与缅甸的关系，修复与英国的关系，恢复并加强中朝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发展中罗、中南关系等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970年以后，中国同一些国家的关系又有了明显的改善。中国同肯尼亚、突尼斯、布隆迪、锡兰(斯里兰卡)和加纳等国，或恢复、发展了外交关系，或进行了重要访问，或开展贸易、事务往来，或致电表达相互合作与谅解的愿望。在此期间，在已建交国家中，除与前苏联、印度和印尼的关系仍较为紧张外，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或发展。至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中国实现外交局面新突破之前，亚非拉、欧洲、北美有11个 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第三节　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

毛泽东把前苏联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准备完成从反帝反修到集中力量对付前苏联的外交战略的调整，最关键的一环，就是要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但与美国缓和关系，中国必须要面对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处理正处在与美国生死斗争中的越南的关系。7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个重大矛盾现象就是，一方面坚持革命外交方针，继续援助越南反抗美帝国主

义的侵略;另一方面又开始尝试务实外交,寻求和实现与美国缓和关系。

1966 年 6 月,即中国的“文革”轰轰烈烈开始之际,美国总统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从美国和驻欧洲美军基地抽调 10 万兵马增援越南战场,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攻势。到 8 月份,直接参加战争的美军已近 30 万人之多。而是年美机轰炸北方的架次和次数也比 1965 年增加了一倍。

面对美国无视中国警告和世界舆论的谴责继续扩大战争的行为,7 月 22 日,刘少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身份发表声明,宣告:“为了支持越南人民夺取抗美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国人民准备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中国 7 亿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中国辽阔的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当日与次日两天中,北京和全国 19 个城市的 600 多万群众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准备在越南北方直接参战的决心,使美国不得不谨慎小心。美国在越南的行动一直受到限制,其地面部队始终未越过北纬 17 度线。

在美国将侵越战争进一步升级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一直密切关注越南南方战场的形势变化,并就作战计划等问题向越南领导人提供参考意见。8 月,毛泽东、周恩来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与越方共同设想作战方案。毛泽东建议越方在越南最南边的金瓯半岛发展一点主力军,以吸引一部分敌人主力。他指出:经验是打出来的,信心也是打出来的,信心越打越高。你们抓到了规律,主要的经验是你们找到的。从 1960 年到 1966 年,7 年了,逐步扩大,从打小胜仗到打较大的胜仗,再到打大胜仗。从很少的几支枪一下发展到了几十万军队。美国为什么要增兵?那还是因为你们的力量厉害。

当周恩来谈到中越双方这次设想第一期作战计划两年半,直到 1968 年底两个旱季时,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一定会打出一个名堂来,主动权已经掌握在你们手里,再有两年半我看情况会起变化。

但是事实上,在 1966 年初期和中期美国在越南南方战场发动的两次战略反攻中,面对美军现代化的装备技术和新的袭击手段,越南的一些部队已经出现了很难适应的情况。此后,随着美国不断向越南南方战场增兵,加强轰炸北方,至 1968 年初,越美实际进入到一种拉锯战的状态,双方的伤亡和损失都很大。越南方面不得不准备在持久战的基础上,争取逐步扭转南方的战争局面。为了鼓舞士气,并给美国人以教训,河内集结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于 1968 年 1 月底对侵越美军和西贡政府军队发动了春季攻势。

这次新春攻势从作战结果来看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它所显示的越南

共产党人的战斗意志和战斗能力，以及战争场面的空前激烈和残酷，却极大地动员了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的反战舆论。受到反战运动，以及兵源不足和财政紧张等情况的影响，美国对越南北方的轰炸自3月31日开始“逐步降级”。5月，经过多次试探后，越美两国政府开始正式接触，进行预备性会谈。10月31日，约翰逊政府更宣布无条件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和炮击。

越美和谈开始，美国宣布停止轰炸和袭击越南北方的事实，从客观上减轻了中国南方的压力，这为中国调整对美政策提供了条件。

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对外战略的动向，首先表现为他对越美和谈态度的变化。或者可以说，他在对越美和谈态度的把握上已经融入了战略考虑的因素。在此之前，中国方面对越南与美国和谈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的。1968年后期，毛泽东不仅不再就越南在同美国和谈的问题发表意见，而且还在11月14日听取周恩来关于与越南总理范文同(Pham Van Dong)会谈情况的汇报后指出：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3天后，即11月17日，在会见范文同时，他更明确表示赞成越南又打又谈的方针。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与他以前再三批评越南不应降格以求的意见相比较，显然有着某种变化。虽然毛泽东这时对越美和谈并不看好，但向越南人明确表示北京已决定不插手越美和谈问题，不再反对河内的让步政策，这毕竟显示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有了一些灵活性。

时隔数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也特别谈到：对帝修反的斗争要讲策略，总要有战略部署。一个时期总是要抓住一个主要的敌人和它最忠实的伙伴，集中打击它。以此进一步诠释了毛泽东这时关于对美对越关系的战略思考。此后，由于华盛顿在考虑结束越战问题时希望中国能够影响越南在谈判中让步，故而，中国方面于考虑中美和解与越战之间的关系时，实际已把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当作了一个重要筹码。

1969年初，尼克松(Nixon, Richard)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后，越美四方谈判在巴黎正式启动，越南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此时，中美双方都看到了改变以往僵硬立场的必要性，只是在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前，中美两国关系实质上仍然冻结在互不了解、互不信任的敌对状态。中国在以务实精神实现对外战略调整的过程中，尤其注意不放弃自己革命外交的原则，并以越南问题为轴心，促进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

由于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中苏关系恶化的程度，尼克松直至5月份仍然公开暗示在遏制中国方面，美苏有共同的利益和目的。这无疑加重了中国的忧虑。为此，中国重又开始对越美谈判加以批评，提醒越南领导人警惕被

美国和苏修的对越策略所欺骗,主张少把正式时间耗费在巴黎和谈上。

从1969年6月开始,尼克松政府终于注意到了利用中苏关系紧张来对付前苏联的重要性,其"联华遏苏"的战略构想逐步成型。据此,美国方面在对华关系上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更为主动的步骤。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做出战略性调整的大思路也基本确定,中国加快了寻求与美国和解的步伐,以集中力量对抗前苏联。

但是,这个时候,中美之间中断了接触,而前苏联的威胁却要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越南不听中方劝告,坚持依靠前苏联和继续越美和谈相当不满。中国领导人这时开始明确告诉越南方面,今后中国将把对越援助着重放在经济方面,并建议越南不要过于依赖其他国家的武器装备援助,应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由于越南这时与中国已经存在着相当的隔阂,中国军队在越南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能够得到高度的重视和积极的配合,因此,中方表示将不再建议越南组织大规模战役,并准备着手陆续撤出在越南的中国支援部队。这一年,中国对越主要武器装备的援助较1968年减少了近一半。

中美两国最初尝试恢复外交接触是在1969年12月间,双方因此开始恢复了大使级会谈。但是,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诚意仍然抱有怀疑态度。1970年初,中美双方在第135、136次大使级会谈虽然气氛缓和,但是当美国4月30日出兵柬埔寨,将战争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半岛之后,中国还是不惜中断这一会谈,立即旗帜鲜明地支持了以西哈努克(Sihanouk)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及王国民族团结政府。5月11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Le Duan)时再度提出越南飞机可以到中国降落,并进一步鼓动说:谈判可以谈,但是主要应该打。5月18日,中国正式将推迟与美国会谈的决定通知美方,接着,在5月20日原定举行中美会谈之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重要声明。

中国中断中美会谈,使两国和解进程实际上停滞下来,以及毛泽东在"五·二〇声明"中没有延续中共九大的提法,而是只号召打倒美帝,以此对美国出兵柬埔寨的行动做出强烈反应,显然是在给美国施加压力,其目的主要有三点,其一,向美国方面表明中方的立场:中国在做出与美和解新的务实的战略抉择时,不会放弃支持和援助印支三国人民的革命方针。美国要想恢复同中国的邦交,其前提必须是逐步减少对印支地区的介入。其二,中国要加快对美缓和的步伐,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渠道显然已不能满足这种要求,需要促进美国及早与中国进行更高层次的对话、更实质性的接触。其

三，由美方对此的态度试探其缓和美中关系的诚意和决心。

一番较量的结果是，在中美会谈中断期间，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做出了华沙这条渠道太“受约束”的结论。美国在6月中旬又重新开始寻求同中国进行接触，随着尼克松于6月30日宣布从柬埔寨撤军，中国政府也着手考虑恢复与美国的联系了。

美国军队撤出柬埔寨后，1970年7月中美双方重新寻求靠拢，就举行高级会晤问题互致口信。显然，中美之间的缓和促使中国方面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再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范文同时谈道：我看你们能进行外交斗争，你们做得不错。起初我们有点儿担心你们会上当，现在不担心了。这一年，中国对越南主要武器装备的援助与1969年比继续减少。

中美两国向着高层对话阶段前进时，1970年末，美国为迫使越南接受其谈判条件，将战争又一次升级。这次，中国没有中断中美之间的联系，而是采取了务实而不屈从、革命而有限度的更为灵活的步骤。

其一，12月11日，中国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国的军事冒险行动，并于次年3月在尼克松通过发表外交政策年度报告重申美国渴望与北京改善关系，向中国发出明确信息后，中国同越南共同发表联合公报，明确向美国做出不惜与美国一战来支持印支三国人民的警告性回复，并间接向美国重提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以此对美国施加压力；中共中央政治局还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

其二，与此同时，中国又注意为继续打开中美关系留有余地。1971年2月4日，乔冠华在同挪威驻华大使的谈话中谈到，中国了解美国政策的新动向，并表示特别希望同基辛格会晤，还特意要求他提请美国方面注意这段话。

美国方面注意到了中国方面发出的这个信息，不仅在一个官方文件中首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称呼，而且继续放宽对华贸易限制。此后不久，毛泽东导演的乒乓外交轰动了全世界。4月21日，周恩来适时通过叶海亚·汗（Yahya Khan）向尼克松发出邀请，尼克松转达了亲自访华的口信，并提议由基辛格作为特使先行秘密来华举行预备会议。中美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

中美关系的突破，促使美国不能不开始面对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联合国的许多成员国许多年来一直在与坚持阻挠恢复中国席位的美国进行斗争。如今，美国已经不能

继续阻挠恢复中国的席位了,但它同时也不想看到台湾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因此,就在确定了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日程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急忙发表谈话,声称两个中国都对中国领土拥有主权,试图用“两个中国”的办法来化解其在联合国问题上可能面对的难题。此举很快遭到中方的严辞反驳。尼克松不得不赶快出面发表谈话来做缓兵之计。他强调,他已经注意到联合国的会员在接纳大陆中国的问题上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美国将花 6 周的时间研究它在今秋举行的联合国会议所要采取的立场。

7 月 15 日,阿尔巴尼亚等 18 国向联合国提出决议草案,再度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一切合法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驻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对此,美国政府不得不做出正面反应。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发表了《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声明》,说明美国支持在今秋联合国大会上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席位的行动,同时亦反对任何驱逐中华民国或剥夺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行动。对此,中国政府于 8 月 20 日发表声明,坚持反对美国的主张,强调:“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美方随后做出妥协,提议安理会的中国席位留给北京,让台湾仍保留会员席位。此一提议仍旧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

1971 年 10 月 18 日,联合国大会第 26 届会议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进行了专题辩论。经过一周之久的辩论,由于美国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明确表态支持,其试图继续让台湾留在联合国内的努力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10 月 25 日,联合国大会以 76 票赞成,35 票反对,17 票弃权的压倒多数投票结果,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 23 国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一切合法权利,将台湾代表驱逐出联合国的重大提案。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至此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在中美两国就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进行激烈斗争的过程中,两国高层的秘密接触与磋商仍在按部就班地紧张进行着。5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即将举行的中美高层会晤,其中关于越南问题,会议报告提出: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支三国撤走;认为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必将有助于撤军和巴黎谈判,也更利于支援印支抗战。可见,中国领导人在为会谈做准备时,已考虑到要在和谈问题上帮助越方做美国的工

作。其后不久，周恩来7月5日会见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时，表示北京现在赞成召开包括非亚洲国家参加的解决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而一年多以前，中国方面曾坚决拒绝了前苏联提出的类似建议。这实际表明，中国方面此时已有意通过中美高层接触和举行国际会议，来促进越南问题的解决。

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中国一方面亮出了上述关于解决越南问题的立场，一方面又特意点明中国没有派出一个战士去印支战场打仗；同时提出中国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四点立场，[①] 提醒说，如果尼克松访华期间这些问题不解决，他的访问成果是什么？中美双方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努力方向。以这种方式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迈出与中国和解的步伐。三个月后，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中美双方就尼克松访华结束时将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的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

中美两次高层接触的结果是，其一，双方在各自的主张中看到了共同点。会谈时，美国表示从越南撤军后从台湾撤军的问题才能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则强调不会放弃援越的革命外交方针，不会为已同美国谈了15年多的台湾问题而牺牲越南的利益。两者虽然初衷不同，但客观上都已把解决美国撤军问题放到了首位。

其二，中国方面看清了美国在阮文绍(Nguyen Van Thieu)问题上不会让步，于是，为尽快结束越战，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开始转而劝说越南方面先解决撤军问题，委婉地劝越南领导人不要再坚持搞掉阮文绍。

其三，中美双方互相摸清了各自对前苏联威胁的认识，不仅明确了在反对前苏联的霸权问题上两国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事实上还通过讨论印巴冲突时达成的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的一致意见，迈出了联合起来间接对抗印度背后的前苏联的第一步。美国方面由此基本消除了对中国的猜疑和担心。中国方面则从基辛格关于美国不要求中国停止援助越南、在军控问题上不会迫于压力提出反对中国的方案，以及准备不断向中国通报关于核问题情况的承诺，增强了坚持援越抗美与寻求中美和解同时进行的信心。

为了消除河内的疑虑，基辛格离京后周恩来即秘密访越，通报情况。尽管越南领导人表露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但是中国调整外交战略的大局已定，不可能为越南的反对而改变自己的既定方针。因此，当11月22日范文同

---

① 即：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及“台独运动”；美方不再重申台湾地位未定。

在与毛泽东的会见中要求中国拒绝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回绝了。

面对越南的不满及越苏进一步接近的趋向,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妥善解决转变对美政策中的务实与革命的矛盾问题,更加迫切起来。由此,中国一方面以极其热烈和隆重的方式破格接待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在 11 月 25 日发表的中越联合公报中重申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是中国不可动摇的既定方针,肯定越南方面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两个基本点:美国必须全部和无条件撤军,必须放弃对阮文绍集团的支持。一方面以大规模援越作为补偿。是年,中国与越南签订了 7 项无偿的经济、军事援助协议,折合人民币 36.14 亿元,占中国该年度援外协议总额度的 48.67%。这个数字足以说明中国此时对援越问题的重视。

1972 年 1 月初,为尼克松打前站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Alexander M.Haig)一行抵达北京。在 1 月 4 日同周恩来的会见中,黑格转达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几点口信,其中有关越南问题的是:美国已经做了种种让步,而越南还在袭击。"对所有这些行为的解释只能是,河内努力要侮辱美国,而这种侮辱是任何大国都不能接受的。"口信还特意将越战与前苏联对华威胁联系到一起,说"东南亚战争的继续进行只能给莫斯科提供机会,使它得以加强它在河内的影响,从而发展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包围计划。"并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能力必须得到维护。"这个意见实际是在曲折地施加压力,以使中国能敦促越南对和谈条件做出让步。

对于美国向中国打前苏联牌的意向,毛泽东在听了周恩来的汇报后指出:"包围中国! 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中国的独立、生存能力都让你保护,危险得很呀!"并肯定《对美方口信的答复》说:"好,我看可以给他讲。"这些美国人啊,"你不顶他一下,他就不舒服"。在毛泽东看来,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对抗前苏联是中美双方的共同需要,而不是中国有求于美国,更不能为此放弃对印支人民承担的义务。此后,周恩来在第二次会晤黑格时,向美国方面明确表明了中国不会在外交战略的调整中牺牲越南利益,以及尼克松不能以保护者的姿态来中国的态度。

2 月 21 日上午,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周恩来、乔冠华在与尼克松、基辛格会谈中讨论越南问题时,仍然坚持不干预越美谈判的立场。而毛泽东则在会见尼克松时指出:"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毛

并且暗示：中美双方目前只有一个敌人，即前苏联，为对抗共同的敌人，两国应该求大同存小异。对于中国不向河内施加压力、不干预谈判的立场，美国方面虽然有些失望，但只要北京采取不卷入的姿态，不重新鼓励河内穷追猛打，他们也就满意了。

2月27日，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在上海正式签订了以“上海公报”著称于世的中美《联合公报》，并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公报》的内容。28日，中美《联合公报》正式发表。《公报》声明，中美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关于台湾问题，美方在公报中声明：它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中美“上海公报”的签署，使双方在台湾问题和共同反霸问题上正式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为以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后，周恩来于3月初再次亲往河内通报情况时，既迂回地表明了中美关系打开后，北京希望巴黎谈判能够谈出成果的态度，又以自我批评的姿态，检讨了中国过去反对越美和谈的作法。然而在河内看来，中国与美国结束敌对状态，即如两个兄弟，一个兄弟和别人打架，另一个兄弟却与那个兄弟的敌人握手。因此，黎笋对周恩来说：“尼克松已经和你们会谈过了，不久，他们就要更猛烈地进攻我们了。”中越之间的裂痕自此进一步加深。

3月，越南方面中断了与美国在巴黎的和谈，在越南南方战场发起了全面进攻。尼克松政府一方面采取报复行动，大规模恢复对越南北方的空中轰炸和海上布雷，一方面向前苏联和中国施加外交压力，希望苏中两国能迫使河内回到谈判桌前。面对美国的压力和越南的离异倾向，中国方面继续表明了支持越南抗战，不介入和谈问题的立场，同时继续坚持大规模援越。根据中越两军总参谋部达成的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于5月开始再次派出汽车运输部队、海上扫雷部队等，入越执行援助任务。正是在中国的帮助下，1972年进入越南的援助物资以及从越南北方运往南方的物资比1971年增加了近一倍。

此时，在越南问题上的军事行动及和平谈判都进入到最激烈、最关键的时刻。由于美苏于5月份签署了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使中国方面怀疑美苏又有接近的趋向，这将会威胁到中国发展对美关系的外交战略。另外，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的关键是台湾问题，而解决的先决条件是越南问题，这已是北京和华盛顿的一个共识。因此，中国希望美军及早撤出越南，以推动中

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进一步实现中国联美抗苏的既定战略目标。而且，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战争的结束实际将更有利于越南以后统一南北两方的军事行动。这样，中国对越南的外交方针，特别是对巴黎和谈的态度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一方面尽量满足越南的一切物质要求，为越南以后的统一战争奠定基础，一方面开始加大了劝告的力度，要求越南和美国适时结束战争。

1972 年 6 月，基辛格再度访问北京时，中国方面对实现越美停火的兴趣更大了，尽管周恩来在同基辛格的会谈中没有改变对越南问题的原则立场，但在与越南方面接触时，态度已有所不同，明确示意越南应当回到谈判桌前去。7 月 12 日，周恩来建议黎德寿(Le Duc Tho)直接与阮文绍及其代表谈。当范文同 8 月份来中国云南昆明休假时，周恩来又派人去向范文同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在南方成立左、中、右三派联合政府是对的，先让美国将军队全部撤走，联合政府可直接与阮文绍谈判，争取一个过渡时间，休整后再打，最后取胜。周恩来并于 8 月 18 日在京会见了黎德寿。

经过中国领导人的再三劝说，黎德寿于 8 月下旬在巴黎向美方代表提交了关于谈判问题的新建议，主张联合政府的建立将既包括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也包括阮文绍政权。这是河内首次表示接受西贡政权。越南方面的这种转变，显示中国方面的影响是起了作用的。

与此同时，中国也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在 10 月 25 日巴黎和谈恢复以后，由黄华带信给美方，劝告美国抓住目前极为有利的时机结束越南战争。乔冠华则在 11 月 13 日基辛格宴请他时也力劝美国做出让步。

这一年年底，为趁热打铁，毛泽东于 12 月 29 日会见越南外交部长阮氏萍(Nguyen Thi Binh)时明确提出：如果巴黎和谈成功，那么不仅越南南方，而且北方都将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时隔一天，周恩来也劝告长征(Truong Chinh)：这次谈判要认真去谈，目的是要谈成；并在翌年 1 月 3 日再次示意黎德寿，战争结束已不会影响越南下一步的统一问题。

1973 年 1 月 27 日，巴黎和平协定终于签字了，越南战争由此得以结束。中美双方从此也可以着手进一步落实联合抗苏的战略构想了。2 月初，尼克松批准美国向中国出售包括 4 架飞机等装备在内的 8 套惯性制导系统。这应该是中美之间在军事上初步合作的开始。不久，基辛格于 2 月 15 日第五次访华，再次向中国领导人强调双方所面对的共同威胁；毛泽东则在会见他时第一次明确向美方提出了“一条线”的联合反霸战略。3 月，美军开始撤出越南南方。5 月 1 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和北京互设联络处，两国共同

朝着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尽管中美关系基本上实现了正常化，但就此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实质而言，其革命性仍然是最根本的。在中美两国寻求缓和关系的过程中，中国方面始终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推迟世界大战，促进世界人民革命，实际依旧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方针。只是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开始强调既要有高度的原则性，也要有非常实际的精神，这种务实与革命相结合的基点就是，利用矛盾，着眼于人民。所谓搞世界革命，就要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壮大自己，促进革命。因此，支持越南抗战和取得民族统一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援越的方针、目标也是贯彻始终的。越战结束后，中国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完成了统一事业。

中美关系僵局的打破，以及 1971 年 10 月 25 日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自 1971 年基辛格首次秘密访华，7 月 16 日中美双方共同发表尼克松总统访华公告始，至 1973 年 5 月中美双方互设联络处，中美两国共同朝着正式建交的目标迈进一大步止，除日本外，中国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 26 个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①

第四节　中苏越盟友关系的转变

一方面前苏联与美国的对抗不断加剧，一方面中国因与前苏联交恶转而与美国为友，在这种情况下一直把美国视为自己头号敌人的越南党在中苏之间做出了倒向前苏联的重大选择。随着越苏结盟对付中美，给中国的周边环境注入了新的不安全因素。

越南倒向前苏联的过程，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就逐渐开始了。如前所述，前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后，改变对越南抗美斗争的“脱身”政策，开始不断加大对越军事援助的幅度，并且主要提供的是中国当时不能生产或生产不多的先进武器装备。1965 年 2 月初柯西金访问河内，苏越签订了关于加强对越南防御能力援助的协定。4 月，黎笋率团访苏。苏越经双方会谈，确定了包括军援在内的进一步援助的具体方式和数量。同期，河内的关键性防空区域已获得了前苏联提供的大量高射武器装备。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仅 1965 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前苏联就向越南提供了 1 亿多美元的

① 此阶段建交国共 27 个。其中 1972 年 12 月底以前 26 个，1973 年 5 月以前 1 个。

军事装备。

1966至1967年,莫斯科又进一步承担了向越南提供5亿卢布军事装备的任务。在1967年前,前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中的50%是给越南的,其中近60%是军事援助。虽然前苏联对越援助的总额还落后于中国,但其中军事援助部分却大大超过了中国。

到1968年,苏对越军援数额已达3.57亿卢布,占是年苏援越总额5.24亿卢布的2/3强。而这一年前苏联的对越援助额也已占到社会主义国家援越总额的50%,在数量上也超过了中国。

1969年初越美和谈开始,越南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后,前苏联对越军援数额虽然有所降低,但总计仍达2亿美元。从1965年到1973年,前苏联共向越南提供了10亿卢布的经济援助和20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勃列日涅夫以加强对越军事和经济援助作为加强前苏联在东南亚地位的巨大杠杆,其功效颇为显著。越南领导人曾反复强调说,前苏联的军事援助对越南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其援助的巨大数量和效果也是毋庸置疑的。越南“深深地、真诚地感谢前苏联所给予的援助”。十分明显,正是由于前苏联对越南的援助对越南抗美救国的战争帮助甚大,从而使前苏联在越南人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越南与前苏联的关系也转而趋向密切。

对于前苏联大规模为越南提供军事援助所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对中越关系的潜在影响,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中国领导人清楚地了解,赫鲁晓夫当政时,越南所以会与中国站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苏联对越援助有限。随着勃列日涅夫大力加强对越南的援助,越南对中苏两党两国的态度难免不发生变化。在毛泽东等人看来,前苏联转而改变策略,大力援助越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周恩来就对越南领导人说过:“我们总担心站在我们中间的修正主义者。”为此,中国领导人反复告诫越方:前苏联的援助不真诚,他们的目的一是孤立中国;二是进一步控制越南,以此来改善苏美关系;三是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给中国制造麻烦,也可能给越南制造麻烦。总之,前苏联就是要在中越关系中投下阴影,分裂越南和中国。因此,中国方面坚持越南没有前苏联的帮助会要好得多。

在越南方面显示出感激并倚重前苏联军事援助的倾向后,中国方面于处理对越关系问题上采取了某些强硬的态度。周恩来和邓小平在1965年与胡志明的一次会谈中,针对越南方面有人提出的来自北方的威胁问题表示:如果胡主席也认为中国威胁越南,中国就把部署在广东、广西的几万驻军撤走,放到北方去。前苏联正在威胁我们。

1965年4月17日，苏越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称："如果美国强化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前苏联政府于必要的情况下，在越南政府请求时同意前苏联公民前往越南。"对此，周恩来在10月与范文同的会谈中即明确表示反对，说：我不支持前苏联志愿部队赴越的想法。

1966年3月，周恩来在同黎笋谈到越南要求社会主义国家派出志愿飞行员时，更怀疑前苏联可能会把这个秘密泄露给敌人。称：你们从前苏联飞行员那里得到的还不足以补偿他们给你们所造成的损失。8月，他又进一步要求越方放弃接受前苏联等东欧国家志愿人员的想法，其理由是：中国在越南的支援部队是正规军，中国有权利不同意其他国家派遣志愿军到越南去。

是年4月，中越两国代表团会谈时，中国领导人再度向黎笋、阮维桢(NGUYEN DUY TRINH)发出抱怨称：越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方式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这使我记起毛泽东同志曾批评我们对越南的问题"过分热心"了。现在看来他是有远见的。这种"过分热心"是不是引起了你们的猜疑？怀疑中国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是要控制越南。因为我们有13万人在你们国家，还向边界地区派出了1万军队。不过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将立即撤走我们的军队。沿边界部署的军队也将受命返回内地。周恩来和邓小平并强烈地表示说：你们将前苏联的援助与中国的援助相提并论，这对我们是个污辱。因此从现在起，在你们提前苏联的援助的时候，不应提中国的援助。

这个时候正是越南抗美战争形势紧迫之时，中方这种强硬的表态，明显地带有施压的性质。再加上中国与前苏联之间的对抗，直接影响到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借境运输对越援助物资问题，越南党领导人自然会从自身的利益角度愈益感到不满，其对中国的离异心理越来越强烈了。

在对前苏联问题上坚持以我划线，不仅直接影响到中越关系，也进一步影响了中共与其他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比如，1966年2月底日共代表团访华，日方明确主张对前苏联的批判应当实事求是，前苏联对越南的援助无论居心如何，其效果是好的，不能加以否定，因此他们坚持在此援越抗美的关键时刻，两党公报不必点前苏联的名，并且主张在援越问题上可以建立包括前苏联在内的反美国际统一战线。对此，毛泽东非常不满，强烈地向日方表示：你们这种态度是受到苏共领导欢迎的，但是我们不欢迎。如果不能在公报中公开批判前苏联修正主义，就没有必要发表公报。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对中日两党关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1970—1972 年越南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中苏关系也由敌对逐渐转入进行政治与军事的对抗。与此相应，越南问题更加紧密地与中苏两国各自的战略利益联系到一起，这令中苏双方都开始注意在援越问题上寻找新的机会。

为了与越南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前苏联的援越方针出现了新的动向。1971 年 4 月苏共二十四大后，前苏联方面认为，越南的社会舆论已明显地朝着更接近前苏联的方向波动。虽然越南劳动党的总路线还保持与苏、中的结盟不变，但是出现了发展和巩固越苏关系的新的机遇。而前苏联牢牢地拉住越南，就能够在印度支那地区扩大自己的政策影响范围，进而影响到整个东南亚。为此，前苏联开始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对前苏联有利的情况，将短期(每年)援助向有计划、以长期合作为基础的援助过渡，包括以前苏联的军事技术重新装备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以及加强对越的经济技术援助，以使之能够逐渐摆脱来自中国的影响。

同样的情况，注意到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胡志明 1969 年 9 月去世后，越南党日益被亲苏势力所控制，出于争夺越南以确保中国南疆安全的考虑，中国方面也开始加强对越南物质援助的力度。特别是中美开始秘密接触，两国关系开始踏上正常化的道路之后，为了平息越南方面的不满，同时促使越方配合中国的国际战略，加速通过与美国的谈判解决问题，中国也需要通过加大援助力度和做出更多的善意姿态，来对越方做出一些补偿。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中国政府甚至开始改变了过去在前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上的不合作和极度猜疑的态度。这种情况使得中苏两国在大规模援越行动上的矛盾和冲突趋向缓和，前苏联援越物资从中国过境进展变得顺利多了。尤其是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 1972 年 3 月开始发动全面军事攻势以后，这种变化表现得尤为明显。

不过，尽管中苏在援越问题上矛盾冲突的激烈程度有所降低，对越南来说，所感受到的中国方面的压力也随之减轻，但越南的首要敌人是美国，中美之间的缓和无论如何让越南方面难以接受，因此，越南与中国事实上渐行渐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继续要求越南服从自己反帝必反修的外交路线，无疑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相反，越南领导人这时已经毫不妥协地对中国领导人的这类要求，表示不接受的态度了。当中国领导人提出："我们坚持反帝必反修，这两件事不能分开"时，越南领导人即表示：关于如何评定前苏联的问题，你们说前苏联正在出卖越南，我们不这么看。其他一切问题都植根于这种评判之中。他们坚持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的评判，所依据的应该是国际主义原则，而不是其他。

由于中越之间的裂痕不断增大，越南的报刊杂志这时已开始发表影射文章，宣传中国封建统治者对越南的“侵略”，对国内民众和党员干部进行亲苏疏华的思想灌输了。越南政府则开始向中国人越军队封锁越军内部情况、兵力数字、战况等军事情报，以及与美接触、探讨和谈可能性等外交行动的消息。

1971年，中国为排斥前苏联插手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提出了建立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五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的构想，越南婉言相拒；次年，当中国提出派两个师的军队去越南帮助抢修铁路和桥梁时，再遭越方谢绝。越南对中国的戒心进一步加重了。

随着前苏联对越南事务的“插手”，在越南人心目中中国援助的意义渐由物质的更多地转变为精神的了，即“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理论”。越南对中国援越作用的评价也逐渐发生变化。事实上，正如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司法部长张如磉所回忆的：党早已决定同前苏联结盟了。这个过程早在1969年就开始了。胡志明的逝世，为正式做出这项决定铺平了道路。之所以没有发表什么公开的宣言，就是因为出于战争本身的需要，还不想弄坏与中国的关系，从而可以继续得到中国的一些援助。但愈是这样，越南所感受到的中苏交恶的压力也就愈大，从地缘政治、自身利益和历史记忆的角度，对中国的不信任感愈强，由此带来的矛盾冲突也就会愈积愈多，从而给双方都造成了一些伤害，并且为以后的兵戎相见埋下了伏笔。

总之，在国际冷战格局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中，中苏围绕着越南战争这个政治舞台，既不能不顾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及其自身在国际共运中的形象，又不能不基于自身安全、国家利益和各自认定的敌我关系来确定自己的方针与行动，进而牵制甚或要求自己的盟友或被援助者站在自己的一边。重视对越南这样的国家的争夺，在中苏两个大球对抗的天平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球的滚动方向往往会使力量对比发生重要的变化，何况越南的政治取向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中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但十分明显的是，在争夺越南的这场角力中，中国没有能够取得成功。

相比较而言，70年代中美关系渐趋正常化，反映了中国外交开始从革命走向务实的一面；而中越交恶，却显示出中国外交尚未彻底抛弃激进化思维的另一面。

说中国外交开始趋向务实，这是指在面临国家安全受到巨大威胁的重要时刻，中国领导人终于重新回到务实的立场上来，不顾美国长期以来是自

己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统一和安全等方面最主要敌人的情况，大胆地利用以夷制夷、远交近攻的外交谋略，与美国缓和关系，从而得到了一个足以牵制前苏联和化解战争威胁的帮手。但与此同时，中国这时的外交本质还不是务实的。因为，无论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还是中越交恶，其中的一个重要背景，都是中国坚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把前苏联视为最大的修正主义国家，坚持认为修正主义比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政治前途，更具危险性。中国坚持以我划线，要求越南在中苏两国中间必须做出选择，坚持否认前苏联对越南的援助有利于越南的抗美斗争，宁愿越南和自己一样与它的敌人美国握手言和，也不愿看到越南在前苏联的援助下继续战争，都反映了其在外交工作中坚持意识形态划线，而尚未真正走向务实的另一面。

正是这种情况，导致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虽然实现了自己打开与美关系的基本目标，看到了联美抗苏的前景，却无法继续保持住同越南的友好关系，因而不得不在排除了美国的威胁之后，又不得不开始面对来自南方的苏越联盟的新的挑战了。

思考题：

1. 珍宝岛事件发生的原因与经过。
2. 从中苏边界冲突看内政与外交的关系。
3. 毛泽东如何从反帝反修转向联美抗苏？
4. 中国为何坚持要越南服从自己的战略利益？

参考书目：

1. Ilya V. Gaiduk,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 1996.
2.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3.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69—1979)》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
4. 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5. 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
6. 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第七章
建立反对前苏联霸权的国际统一战线
(1972—1979年)

翟强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第一节　“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

在美苏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下,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走上联美反苏的道路,显而易见把自己置于了冷战双方的美国一边。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于国家统一等各个方面,美国都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敌人,联合美国,反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这在重视理论解释的国际共产党人中间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某种混乱。除了越南以外,在反对前苏联修正主义斗争中一向站在中国一边的阿尔巴尼亚,首先就无法理解,进而与中国反目。世界各国许多原来与中国一起反对本国修正主义党,或高揭反帝斗争旗帜的革命组织,也纷纷与中国分道扬镳。一时间,原先在反对前苏联修正主义斗争中集合在中国周围,以反帝和世界革命为号召的左派阵营,迅速归于瓦解了。

与前苏联交恶,使中国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跳出了美苏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但高举世界革命的旗帜,既反帝又反修,同时反对各国反动派,却又使中国一度成为美苏共同的敌人,并且四面受敌,异常孤立。1969年的珍宝岛之战引发前苏联严重军事威胁,中苏濒临战争边缘,毛泽东终于发现中国过于孤立不是一件好事了。当他下决心与美国缓和关系,通过拉住美国来牵制前苏联,成功地遏制了前苏联对中国先发制人地搞突然袭击的危险性后,却又发现自己过去坚持的反帝革命的政治方针和现实的联美策略发生了难以克服的矛盾。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困惑,毛泽东一方面毫不客气地回击批评中国对美妥协的兄弟党,用列宁关于革命策略的说法来证明自己暂时的妥协是不错的,一方面却不能不开始重新回到过去驾轻就熟的统一战线经验中去寻找从理论上解释这一作法的新的思路。

事实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毛泽东就曾经针对中国革命屡屡

受制于美苏关系的情况，提出过一种观点，即所谓“中间地带”的思想。毛泽东的用意是想要告诉党内的同志，不要总是担心中国革命的进展会影响到前苏联。他认为，美国帝国主义在没有征服处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之前，是谈不到向前苏联进攻的。他相信，欧亚非三洲，包括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内的广大地区，都属于这个中间地带。这一“中间地带”的思想，对于解释中国革命何以能够在美苏对抗的情况下取得革命的成功，显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它也随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对立阵营的形成，中国倒向前苏联一边，而不再被毛提起。

50年代中后期，注意到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民族主义国家的大量涌现和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从反帝统一战线策略的角度，毛泽东又逐渐开始重提“中间地带”的观点了。在1957年和1958年，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提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其实还是取守势的，它目前最主要的还是以“霸中间地带为主”。而“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因此，“我们这边的人多一点，他们那边的人少一点。”

由于中苏两党关系逐渐出现问题，中国日渐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中间地带”的思想明显地失去了原来的逻辑依据。此后一些年，基于反帝反修，乃至反对一切反动派的世界革命的主张，统一战线的思想变得不合时宜，毛泽东也转而开始更多地宣传“不怕孤立，不怕战争”的观点，又不再提“中间地带”的问题了。

1964年，从反美斗争的角度，毛泽东再一次提到了“中间地带”的问题，并且指出有两个“中间地带”，第一个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大经济落后国家，一个是包括欧洲、北美、大洋洲和日本在内的不愿意受美国控制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一说法丰富了“中间地带”的思想，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毛泽东并没有能够继续这样的思路。

“中间地带”的思想之所以值得重视，根本上在于它是对强调意识形态的凡事“一分为二”、非此即彼的革命外交观念的一种修正，并且越来越多地受到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而凡是突出强调统一战线的时候，几乎从来都是共产党人开始感受到力量对比的不利，而决心转向务实的时候。因此，“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事实上多少标志着毛泽东对外交问题的考虑有些务实的意思。

10年之后，毛泽东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开始形成其“三个世界理

论”的。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同第四次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谈话时提出了一种设想，即美国同欧洲和日本加强合作，搞一条横线，连接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同时团结这条战略线以外的国家，“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前苏联霸权主义”。这一设想已经清楚地反映了毛泽东想要建立反苏统一战线的战略意图，但它显然还只是一种粗略的想法，尚未理论化。

几个月后，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时开始提出第三世界的观点。说：“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做发展中国家。”

1974年以后，毛泽东的想法渐渐地开始成熟起来了。在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时，他还在用“一条线”的观点来阐述他的设想，提出要团结这条线周围的国家，共同抵制前苏联的扩张，从而形成联合对付前苏联威胁的“一条线”和“一大片”战略。但实际上，要想划一条线把前苏联箍起来，联合这条线以外的一大片去反对前苏联，在客观上是有相当的难度。

一个半月之后，即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时，改变了“一条线”、“一大片”的说法，进一步提出了更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他指出：“我看美国、前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因为“美国、前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没有那么多，也没出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而中国自然也是属于第三世界的。“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不难看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如此清楚且实事求是地说明中国在当前国际政治格局当中的实际地位。它意味着中国自脱离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又经过10年之久在国际政治风云中颠沛漂泊之后，终于基本上找到了其在国际上应有的位置。

毛泽东这一新的理论概述，使中国放弃革命外交，实行对美缓和的做法得到了合理的诠释，因而很快得到了中国其他主要领导人的积极赞同和热情宣传。就在毛泽东讲话的第二天，即2月23日，周恩来在与赞比亚总统谈话时，也进一步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他解释说：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的杜勒斯提出遏制政策，划一条线把社会主义国家箍起来，把其他

的地方都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后来西方世界发生了很复杂的变化，西欧、日本、大洋洲国家逐渐复苏，前苏联也发生了变化，赫鲁晓夫上了台，前苏联的对外政策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开始向外扩张，和美国争夺世界，成为两霸中的一霸。在这种情况下，变化了的西方世界从那个辽阔的中间地带分化了出来，成了第二个中间地带，和除美国、前苏联、西欧、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外的那个第一个中间地带一起，成了美苏争夺的对象。它们的争夺从60年代一直发展到现在，毛泽东对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的观察分析也随之一步步深化，最后科学地归纳和概括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

4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副总理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则进一步公开地全面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他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前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邓小平的这个发言是根据毛泽东历次谈话的精神所写的，经过了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并报请毛泽东亲自审阅通过的，因而可以说是最准确地反映了毛泽东的观点的一种阐述。

三个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的提法，并不是毛泽东的创造。早在50年代中期，法国经济学家在分析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程度的时候，就从法国"第三等级"一词演绎出了个"第三世界"的提法，用以说明亚洲和非洲众多非工业化国家当时所处的地位。6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学家更进一步从政治利益关系的角度，把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包括西欧盟国和拉丁美洲等称之为第一世界，把前苏联及其卫星国称之为第二世界，把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不结盟国家，包括南斯拉夫和中国等游离于美苏势力范围之外的国家，称之为第三世界。毛泽东也曾一度接受过"第三世界"这种提法，并把它等同于自己的"中间地带"的提法。显然，毛泽东这个时候的划分不同于上述划分。

三个世界理论代表了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表现在，它在分析国际事务，区分敌我时，已不再用阶级的标准，按照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划线，用一个一成不变的公式，把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看成是铁板一块了。它注意到，在国家关系问题上，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共同利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并不能做到步调一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同样也可能出现严重的利益冲突。处理国家关系，必须根据自己国家实际状况和现实需要的情况，考虑到整个国际政治发展的现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化解不必要的冲突，同时孤立和打击对自己、对世界和平和国际无产阶级利

益危害最大的极少数国家。显然,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中国对外政策的急剧转变就可以说通了。

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就是因为他相信,前苏联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对中国和世界和平,以及对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威胁。这不仅在于前苏联和美国一样拥有能够把地球毁灭多次的大量核武器,为称霸世界大搞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他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断对他国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剥削和掠夺别国的财富,攫取别国的资源,而且前苏联还出兵占领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陈兵百万威胁中国,并且打着支援世界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旗号损害世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更是应该成为自己的头号敌人。而要成功抵制和反对前苏联的霸权主义,仅仅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必须要联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起来斗争。

随着欧洲日本的经济实力得到恢复和加强,它们已经不再对美国俯首帖耳,具有了相当的独立性。它们对前苏联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戒备的心理,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经济共同体的形式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是中国需要争取的对象。而数目众多的亚非拉各个发展中国家,由于直接受到美苏争夺的侵害,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的民族主义心态,促使它们中的相当多数不可避免地会对美苏行径保持高度的防范心理,更是中国必须要注意联合和团结的对象。

与第一世界的美国缓和下来,争取第二世界,团结第三世界,最大限度地孤立自己的头号敌人前苏联,这就是毛泽东依据统一战线的经验,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重要政策考虑。

第二节　中美建交的曲折过程

基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中国决心以美苏两霸之中的前苏联作为头号敌人,因此,它在整个70年代里都始终致力于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以达到以打美国牌来牵制和削弱前苏联的目的。

1973年尼克松连任总统后,于2月再次派基辛格访问中国。基辛格对中国领导人表示:美国设想在尼克松第二任的头两年削减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中美双方互设联络机构;而后两年则"准备走向类似日本的方式实现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即美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与台湾保持某些民间往来。

中国领导人对基辛格的访华给予了高度重视。不仅基辛格的专机破例被允许一直开到北京机场停机坪的尽头，中国外交部部长、副部长亲往迎接，而且毛泽东也破例亲自接见了基辛格，双方谈话近两个小时。中国方面主动释放了所有被押的美国人，这包括两名在越南战争中入侵中国领空而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和另一名在朝鲜战争期间乘间谍飞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收集情报被击落逮捕，并在195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中国方面并且同意在美国与台湾当局仍旧保持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中美双方各自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以便建立两国间的直接联系。另外，在基辛格访问期间，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短短四天时间里接连三次在头版头条报道基辛格的消息，充分显示了中国方面期待着这次访问能够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毛泽东主导改变对美政策，在自己人内部也不是没有疑虑的。毛泽东对此相当敏感。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他随后还借着外交部一份内部材料《新情况》所反映出来的对美苏关系的不同判断，大发了一通脾气。他在与政治局领导人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严厉地斥责了党内外的怀疑论者，称："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我们跟蒋介石妥协了两次，美国的总统要来，请。坐在这里吹了一个钟头。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咱们就是那号人物了。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周恩来在随后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着重解释了毛对美妥协的思想逻辑。他专门介绍了毛泽东引用过的列宁的一段话，说是碰到强盗，要么被杀，要么交出自己的手枪和汽车，他主张交出手枪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再把这伙强盗统统消灭，手枪、汽车统统收回。据此，周恩来明确说明，中国与美国实现缓和，是革命国家必要的妥协，不同于"入伙分赃"。而前苏联已经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美国却从朝鲜战争以来一直在走下坡路，如今更不得不从越南撤退。因此，无论是从中国自身的安全利益角度来考虑，还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需要来考虑，通过对美缓和来集中力量开展对苏斗争，是十分必要的。

1973年3月17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5月1日美国在北京设立联络处，并任命老资格的退休外交家布鲁斯(David Bruce)为联络处主任。29日，中国政府亦通过新华社正式宣布，任命驻法大使黄镇为中国驻美联络处主

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为副主任。从5月下旬起，中美双方的联络处都先后开始进行工作。中美在经济、贸易、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开始增加。两国经常通过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进行接触。此外，双方还在军事情报方面进行交流。美国政府经常将其通过卫星或其他电子手段获得的有关前苏联军事部署和调动的情报，传达给中国。基辛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两个助手，洛德（Winston Lord）和豪（Jonathan Howe），专门负责与中央情报局协调，向中国传递有关前苏联军事动态的信息。

9月22日，基辛格取代罗杰斯（Rogers，William），就任美国国务卿。11月10日，基辛格以国务卿的身份再度访问了北京。鉴于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6月间曾经访问美国，并与美国达成了防止核战争的协定，美苏关系明显缓和的情况，毛泽东在与基辛格的谈话中委婉地，却相当坚决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妥协态度。他批评美国太喜欢打太极拳，说他就喜欢直接对抗，不搞缓和。说1969年前苏联总理柯西金来北京同中国讨论想要缓和两国紧张关系，他曾经明确讲，两国之的这场斗争要进行一万年。现在看在柯西金亲自来找我们的面子上，可以减少一千年。后来一位罗马尼亚官员也来说情，我又让步，再减少一千年。但是后来罗马尼亚总统又来提出这个问题，我就不让了。他以此为例劝告美国不要对前苏联太客气，说前苏联虽然表面强大，实际上摊子铺得太大，力不从心。既要提防中国和日本，又要顾及南亚与中东，还要在欧洲投入大量的兵力，因此，它目前不仅无法进攻中国，而且也不可能直接挑战美国。只要一切受到前苏联威胁的国家联合起来遏制它，前苏联就无所作为。

在尼克松访华后的几年中，尽管中美在不少领域开展了有益的合作，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展却差强人意。先是"水门事件"丑闻的干扰，使尼克松要在其总统第二任期内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设想落空。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副总统福特（Gerald Ford）继任总统。接着，由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中美之间产生严重意见分歧，导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船在福特总统任期内，再次触礁搁浅。

福特在入主白宫后曾表示：美国对华政策不变，将在自己的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是，他在实际处理中美关系问题时，确实小心翼翼，裹足不前。在台湾问题上，他不肯接受中国提出的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特别是在中国最感到不安的对前苏联的战略问题上，福特政府明显地把外交的重心转向了谋求缓和美苏关系。

1974年11月，身为国务卿的基辛格再度访华。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了

他，周明确表示了中方的不满，认为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没有坚守双方的共同战线。他说："我们有一条共同战线，就是对付'北极熊'。""'北极熊'主要是对你们的，不像你们所估计的。"在和邓小平副总理会谈时，基辛格谈了美国的台湾政策。他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处境与别的国家不一样，一是因为美台之间有一个《共同防御条约》，二是因为美国国内存在着一股亲台势力。在谈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时，基辛格表示，美国计划按"日本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但要在台湾设立联络处。至于驻台美军问题，他说：美国将在 1977 年撤完全部驻台美军，但还没有找到解决《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办法，希望中国宣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以便美国考虑终止该条约。中方对基辛格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非常不满。邓小平当即指出：从本质上说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台"方式，在建交问题上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中国不能接受，至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根据中美联合公报的原则必须加以废除；在美国同台湾断交、撤军、废约后，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那是中国的内政，用何种方式解决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导致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摇摆不定，不愿继续向前迈进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自 1972 年美苏达成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以及 1973 年美越签订《巴黎和约》后，美方感觉来自前苏联的威胁小了，因此对改善中美关系的紧迫性减弱了。第二，福特总统本人缺乏魄力，在国内政治地位软弱，瞻前顾后，惧怕右翼亲台势力的压力和反对。

尽管福特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缩手缩脚，中方仍然坚持执行毛泽东的"一条线"战略，把国际问题放在第一位，把台湾问题放在第二位；强调利用美苏矛盾，尽量争取美国的合作，以遏制前苏联扩张的势头。1974 年 11 月，基辛格访华时曾表示：福特总统希望于 1975 年下半年访问中国。1976 年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年，福特希望通过访华来为其竞选总统捞取选票。1972 年尼克松竞选总统连任获胜，就得益于他年初对中国的成功访问。福特对此记忆犹新。对于福特访华的提议，毛泽东的看法是，福特、基辛格妄图否认前苏联进攻重点在欧洲，渲染前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他们目前的对华政策是，以前苏联威胁吓唬中国，用一些先进技术和军事援助为诱饵，套住中国为其对苏战略服务。毛泽东指出：中国必须强调前苏联的战略实际上是声东击西；对福特来访问题，中国的态度是你要来我欢迎，谈得拢可以，谈不拢也可以的高姿态，但不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重申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个原则。

1975 年 10 月，基辛格为福特年底访华做安排抵达北京。10 月 21 日，毛泽东与基辛格讨论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你昨

天说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也无求于美国。我看,部分是对的,部分不对。小的是台湾,大的是世界。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你们为什么来北京,我们又为什么接待你们和总统。”毛泽东毫无掩饰的话使基辛格颇为尴尬,他连忙解释说:“我们来北京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对手,也因为你们对世界问题的概念是我们打交道的国家中最清楚的,而且大部分的意见我们都同意。”毛泽东不相信基辛格的保证,他说:“你们的话靠不住,因为在你们的战略地位中,前苏联是第一,欧洲是第二,日本是第三。”“你们就是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现在这个肩膀没有用了。我们是第五。”很显然,毛泽东对福特政府热衷于同前苏联搞缓和,非常不满。

1975 年 12 月初,福特总统抵达北京,开始为期 4 天的访问。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他仍是采取拖延的方针。在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福特说:由于美国国内形势的需要,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须推迟到 1976 年总统选举后再依照“日本方式”进行;在此之前,美国将把驻台美军从 2800 人减少到 1400 人。他再次提出“期待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称“美国不能在预期和平演变以外的前途的情况下,抛弃老朋友”。毛泽东不满意美国的对华政策,责怪美方在中美关系上的倒退。福特赶紧重申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他提议:为了共同的目标,我们将进行共同的努力,你们从东方施加压力,我们从西方施加压力。毛泽东说:“就是,君子协定。”邓小平副总理重申,美国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必须按照中国的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进行。他再一次指出:“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中国的内政,由中国决定。”由于福特政府不愿在台湾问题上采纳中国提出的三原则,中美关系正常化在他的任期内并没有得到实现。

1976 年美国大选,卡特(Carter,Jimmy)接替福特,当选为美国第 39 任总统。尽管卡特在上台后于 1977 年 2 月 8 日就表示,将以“上海公报”作为其对华政策的指导原则,并把美中关系正常化作为政策目标,但是,他在执政初期仍旧是将美苏关系放在首位。在卡特政府内部,以国务卿万斯(Vance,Cyrus)为首的一派,主张对苏缓和,重视美苏军控谈判。他们认为,中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作用有限,美国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走得太快会不必要地刺激前苏联。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 Zbigniew)为首的另一派,则强调前苏联的威胁,主张对苏采取强硬政策。他们重视中国的战略作用,要求加强与中国的合作,遏止前苏联。布热津斯基派的观点延续了基辛格的战略思想。起初,万斯一派的观点在卡特政府中占上风。卡特总统本人所以支持万斯的立场,一是因为他希望与前苏联达成新的武

器控制协议，二是因为他希望参议院通过他的巴拿马运河条约。卡特担心，如果他马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他会得罪诸如戈德华特那样的参议院保守派议员。卡特需要这些议员投票支持他的巴拿马运河条约。

但是，卡特和万斯争取与前苏联达成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会谈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万斯 1977 年间两度访苏，都空手而回。在这种情况下，卡特政府对中国的作用又重新重视起来。5 月 22 日，卡特公开宣布："我们认为美中关系是我们全球政策中的一个中心因素，并且认为中国是保持全球和平的一支关键力量。我们希望在全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上同富有创造性的中国人民紧密合作。我们希望能找出一种能够弥合我们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的某些分歧的方案。"

8 月下旬，万斯国务卿开始对中国的访问。但是他在会谈中坚持中美建交后美国同台湾的贸易、投资、科技交流以及其他私人联系应不受影响；美国政府人员应被允许"在非正式安排下"继续留在台湾；要求中国政府不要强调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邓小平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中国反对美方提出的美国政府官员"在非正式安排下"留在台湾的建议；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必须按照废约、撤军、断交的三原则解决；中国人民有能力自己解决中国统一问题，美国不必为此替中国人担心。

1978 年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发展的关键一年。4 月巴拿马运河条约在美国参议院以一票多数获得批准，卡特总统如释重负，可以集中精力处理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更为重要是，前苏联干涉阿富汗，插足非洲之角的争端，加紧在全球扩张，使美苏缓和进程严重受挫。以布热津斯基为首的主张对苏强硬，对华合作的一派，开始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起主导作用，他们的观点得到副总统蒙代尔（Mondale, Walter F.）和国防部长布朗（Brown, Harold）的支持。于是，卡特总统终于下决心，要通过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加强美国同前苏联谈判的地位，迫使前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在第三世界的争夺中让步。这一年 5 月，卡特冲破万斯的阻力，派布热津斯基访华。

5 月 20—23 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问了中国。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布热津斯基肯定中美关系在美国的全球政策中处于中心地位，美国决心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他表示，美国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但"希望（而非作为条件）在美做出期待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明显地遭到中国的反驳。这样美国国内的困难将更容易解决"。布热津斯基还说，美国将允许中国从其他西

方国家间接获得美国技术和武器,包括红外线扫描设备,而对这些技术和武器设备,美国是禁止向前苏联出口的。随同布热津斯基访华的美国负责国际安全的助理国防部长艾布鲁姆威茨向中国官员通报美国掌握的有关前苏联在中苏边境的军事部署的情报。

中国政府十分赞赏布热津斯基的态度和提议,双方很快于7月5日在北京正式开始举行建交问题的谈判。中方代表为外交部长黄华,美方代表为美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Woodcock, Leonard Fried)。在谈判中,中方表示:一、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二、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方必须遵守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三、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国同台湾之间可以继续保持民间往来。美国还可以在台湾设立民间机构,但美国不应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四、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

1978年12月,中美双方在经过近半年的谈判后,终于达成一些协议:一、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例》;三、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在这些协议的基础上,双方于1978年12月16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中美建交谈判的结束和建交公报的签订,并没有解决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的所有分歧。主要悬而未决的分歧有两点。第一,美国希望中国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则强调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最后双方的妥协办法是彼此就这一问题各自发表声明。美国在声明中表示:它期待台湾人民将有和平未来,关心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则在声明中指出: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国的内政。第二,美国坚持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坚决反对。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歧,双方的妥协处理仍然是各自发表声明。美国政府在宣布中美建交后立即表示:它将继续卖"防御性"武器给台湾。中国政府则在宣布中美建交时重申: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不符合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不利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也将产生不利的影响。邓小平并且明确告

诉伍德科克:“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问题设置障碍,最终只能导致武力解决。”

1978年中美建交公报的签订再一次表明,尽管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还存在不少分歧,但这些分歧并没有妨碍两国在反对前苏联扩张这一共同战略利益上取得共识,并寻求合作。在两国建交公报中,根据中方的要求,特别加上了实际上是以反苏为目标的“反霸”的条款。整个70年代中美交往的历史清楚地揭示,决定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两国领导人对前苏联威胁的担心。与前苏联威胁相比,台湾问题属于次要问题。反对前苏联扩张主义这一共同的战略利益使中美两国决策者能够做到从大处着眼,求同存异,共谋安全。

第三节　推动建立世界反霸统一战线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也是中国政府着力的一个方面。中美关系的缓和刺激了日本政府谋求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愿望,而中日邦交正常化则为中美关系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后,英国放弃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暧昧态度,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撤销了其在台湾的官方机构。荷兰政府、希腊政府等也随之做出相同的选择。联邦德国政府也迅速行动起来,甚至卢森堡等欧洲小国也闻风而动。所有这些情况都促使日本政府不能不急谋对策。

由于在对华政策上难下决心,佐藤荣作(Sato Eisaku)政府被迫下台,田中角荣出任新一任首相。他上台伊始即公开表示要尽快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对此,中国方面立即做出反响,表示欢迎。两个月之后,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发表了关于田中首相访华的公告。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Tanaka Kakuei)和外相大平正芳(Ohira Masayoshi),以及二阶堂进内阁官房长官等一行,正式访问中国。4天后,中日双方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日本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两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霸权的努力。日本外相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更确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归还中国的事实。表示说: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归还中国,而日本接受了承继上述宣言的《波茨坦公告》,因此

日本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在与中国建交之后，日华和平条约即已失去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日台外交关系亦不再维持，与台湾将只保持民间的经济和文化来往。

整个70年代中国的对外政策，始终没有脱离反对前苏联霸权这个焦点。对美国如此，对日本如此，对欧洲各国更是如此。在中国当时的战略设想中，欧洲甚至是中国谋求促成反对前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中国领导人在与西欧国家官员以及在野党领导人的谈话中，都反复呼吁他们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强大的欧洲，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主宰国际政治的企图，特别是鼓动它们起来抵制前苏联的扩张。

鉴于欧洲这时内部意见分歧，英国长期不能加入欧洲共同体，中国领导人担心，这只会使欧洲更松散，给前苏联以更多的可乘之机。1972年7月10日，毛泽东对法国外交部长舒曼(Schuman, Robert)说："你们现在跟英国搞好，我赞成，要团结起来才好，有时吵架是难免的，但总应该是大团结，小吵架。"1974年5月25日，他在同英国前首相希思(Heath, Edward)谈话时说："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很高兴啊。"同年，邓小平副总理也对丹麦首相哈特林说："我们高兴地看到，西欧各国人民要求加强联合，团结自强的呼声日益高涨，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是高兴的。"1975年，他又向法国总统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 Valery)和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表示："欧洲人民可以相信，在他们维护独立和加强联合的事业中，总是能够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的，欧洲各国联合起来，这是历史的要求，团结就是力量，分散易受欺侮"；"我们希望联合的欧洲将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鉴于不少西欧政治家热衷于同前苏联搞缓和，中国领导人强调前苏联对欧洲的威胁，指出前苏联侈谈缓和的目的是要使西欧国家放松警惕，以实现前苏联在欧洲的扩张野心。毛泽东再三讲："你们还要注意，前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他举出30年代慕尼黑会议的教训来告诫西欧领导人，不要上前苏联的当。"西方有一部分舆论每天都想把前苏联这一股祸水引向中国。你们的老前辈张伯伦(Chamberlin, Neville)，包括法国的达拉第(Daladier, E.)，就是推德国向东。"希思说："如果欧洲是软弱的，前苏联就有可能实现对中国的企图。因而一个强大的欧洲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使前苏联发愁。"

为了尽可能多地影响欧美各国政府理解和同情中国反霸主张，从1972年到1975年，中国方面先后邀请大批欧美政要来华访问，如法国外长舒曼、

加拿大外长夏普(Michael Sharp)、西德外长谢尔(Walter Scheel)、英国外交大臣霍姆(Alexander Holm)、意大利外长梅迪奇(Giuseppe Medic)、比利时外贸国务秘书康皮奈尔(Kempinaire)、卢森堡外交大臣托恩(Thorn Gaston)、挪威外交大臣沃尔维克(Warwick)、丹麦外交大臣安诺生(Andersen)、瑞典外交大臣威克曼(Wakeman)、法国总统蓬皮杜(Schuman, Robert)、加拿大总理特鲁多(Pierre Trudeau)、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Whitlam,E.G)、奥地利外长基希施莱格(Rudolf Kirchshiager)、丹麦首相哈特林(Poul Hartling)、荷兰外交大臣范德斯图尔(Van Der Westhuizen)、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Tindemans)、澳大利亚外长威尔西(Welles)、西德总理施密特(Schmidt, Helmut)等。

为了扩大抵制前苏联的统一战线,中国领导人这时也同样重视做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作。与第二世界国家相比较而言,第三世界国家对美苏两大强国的依赖度相对较高,在两者之间的摇摆性也相对较大。为了团结更多的国家,中国从1970年起到1976年,就同4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同7个国家恢复了外交关系。在处理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问题上,中国的政策也是一贯的以反对前苏联霸权主义为目标。

1970年12月,巴基斯坦举行全国大选,以穆吉布·拉赫曼(Rahman, Sheik Mujibur)为首的人民同盟在东巴基斯坦获得绝对多数,东巴要求独立的呼声空前高涨。由于巴基斯坦处理不当,再加上印度插手,东巴局势很快失控。对此,中国政府最初认为这是巴基斯坦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因此未做表态。但随着巴基斯坦总统向中国寻求支持,印度紧接着与前苏联签订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进而于次年11月派军队大举进入东巴,从而迫使中国在联合国内开始公开谴责印度的做法。而后,东巴宣告独立,建立孟加拉国。中国明确支持巴基斯坦的立场,决定在印度和孟加拉国完全执行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关于停火、撤军和释放俘虏的决议之前,不承认该国,也不同意其加入联合国。1972年8月,前苏联、印度等国在安理会强行提出关于让孟加拉国进入联合国的提案,亦遭到中国的否决。直至1974年4月巴、印、孟三国就遣返全部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之后,中国才在安理会上投票同意接纳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

同样的情况也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对安哥拉冲突的态度上。70年代初,葡属殖民地安哥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如火如荼。安哥拉有三个解放组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人运),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安解阵)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起初,中国向上述三个组织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1971年7月,安人运主席内图(Neto)率代表团访华。访华结束

后,12 名安人运军官在中国接受了为期 9 个月的军事和政治训练。此外,中国军事专家还在坦桑尼亚营地为安人运培训游击队员。1973 年 12 月,安解阵领导人罗伯托(Roberto Antonio de Almeida)访问中国,中方同意向他提供军事援助。1975 年 1 月 15 日,安哥拉的三个解放组织与葡萄牙政府签订了关于安哥拉独立的协议。1 月 27 日,周恩来总理致电三派组织领导人表示祝贺。

但是,安哥拉的三个解放组织很快反目为仇,兵戎相见,使安哥拉陷入内战之中。由于安人运得到苏联和古巴的大力支持,中国转而开始着重支持安解阵和安盟,向他们提供军事援助。中国军事教官在扎伊尔为安解阵训练战士。美国、英国、法国、扎伊尔和南非也支持安解阵和安盟。由于南非军队介入安哥拉内战,中国于 1975 年 10 月底将派驻扎伊尔的军事教官全部撤回国,并停止向安解阵和安盟提供军事援助。尽管中美起初在支持安哥拉派别的问题上,立场一致,但是,两国政府并没有密切协调对安哥拉的政策,主要是因为中国反

对美国鼓励南非卷入安哥拉冲突。中国不愿因为南非而得罪大多数非洲国家。中国通过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等国提醒安人运,要他们警惕苏联的霸权图谋,防止"前门拒狼,后门进虎"。

虽然 1975 年 10 月以后,中国不再向安解阵和安盟提供军事援助,但中国不反对美国继续支持这些组织。1975 年 12 月,福特总统访华。在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会谈时,福特和基辛格提到安哥拉问题,希望中国继续支持安解阵和安盟。邓小平副总理说:由于南非已经介入安哥拉冲突,中国不能再涉足其间,但中国不反对美国对安哥拉的卷入。苏联在安哥拉采取的是针锋相对政策,美国应该警惕苏联在那里的动向。在谈到南非军队出兵安哥拉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南非的介入使安哥拉局势复杂化了,因为很多非洲国家反对南非。基辛格连忙说:美国在找到一支可以替代南非士兵的军事力量后,将尽快让南非军队撤出安哥拉。实际上,除了自己直接出兵外,美国在非洲找不到一支可以替代南非军队的武装力量,来参加安哥拉内战。

第四节　冷战背景下东亚的最后一战

在 70 年代,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终于导致中国在中越边境进行了一场自卫反击战。1973 年 1 月,美越签订《巴黎协定》,美国从越南撤军。随着美军的撤出,得到苏联支持的越南成为地区性军事大国。

印度支那战争刚一结束，越南就向中国提出了领土问题。越方明确要求划分北部湾的海上边界线，北部湾三分之二海域应划归越南所有。双方就此举行的谈判自然难以取得结果。随后，越南单方面宣布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越南领土”，“越方拥有神圣主权”。边界领土的争端渐渐由此而起，双方之间的边界摩擦也日渐升温。1975 年双方在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 439 次，1976 年增至 986 次。

导致中越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另一个重要的导火索，是中越对柬埔寨问题态度截然不同。在反美斗争中，中国始终一贯地支持以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 Prince)为首的柬埔寨抵抗力量。1975 年 4 月柬埔寨解放后，中国进一步支持柬埔寨共产党与西哈努克共同组建政府。反之，越柬两国从 1975 年开始发生武装冲突，到 1977 年越南大举入侵柬埔寨边境地区，中国对越南的不满越来越公开化。

与此同时，越南方面在南方开始以“社会主义改造”的名义没收华人华侨财产，关闭华文学校、停办华文报刊，解散华人社团；在北方大为“净化边境”通过各种高压手段逼迫华人、华侨离开越南回中国。到 1978 年 7 月，已经有几十万华人、华侨冒险逃离越南，寻求政治避难；在北方，则有 16 万华人、华侨被驱赶回中国境内。到年底时，被赶回中国的华人和华侨已达到 28 万。而这一年中越边境冲突更达到上千次之多。

1978 年圣诞节越南出动十几万军队，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向柬埔寨发起攻势，并于次年 1 月 7 日占领了金边，随即宣告成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国”。越南侵略柬埔寨引起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1979 年 1 月 10 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特别会议。恢复自由，并在中国帮助下重新回到国家元首位置上的西哈努克，在会上强烈谴责越南出兵侵占柬埔寨，呼吁联合国支持柬埔寨的正义斗争。中国亦谴责越南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的行为，要求越南在近期内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尊重柬埔寨人民的自决权，主张柬埔寨政府的组成应在联合国监督下由柬埔寨人民通过选举解决，对柬埔寨的独立、中立和不结盟地位要确立必要的国际保证。

中国的立场和建议获得大多数安理会成员国的支持。尽管苏联行使了否决权，安理会未能通过相应的决议，但在联合国 34 届大会仍以 91 票对 21 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中国和东盟等国的提案，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要求国际社会拒绝承认“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维持民主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中越两国在柬埔寨问题上公开冲突后，中越关系也急剧恶化。1978年，中越边界发生武装冲突已达到1100多起，甚至出现越南武装人员到中国一方境内埋设地雷，设置路障，以至开枪开炮的情况。

为了制止越南方面的侵犯，1979年2月17日晨，集结在中越边境上的中国军队奉命站卡自卫反击作战，从广西龙州、靖西和云南的河口、金平边境地区对越南6个省11个县发起了进攻。新华社发表声明说："中国要建设自己的国家，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不愿意打仗，但也绝不允许别人肆意侵犯中国领土；中国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要的是和平安定的边界；在给越南侵略者应有的还击之后，中国边防部队将严守祖国边界。"

中越自卫反击战总共进行了17天。在解放军先后攻占越南的高平、谅山、老街、黄连山4个省21个县，以及广宁、河宣两省的部分地区之后，中国政府于3月5日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开始从越南撤军。16日，中国军队全部撤回到中国境内。

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一方面稳定了东南亚的局势，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苏联。特别是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之际，正是苏联开始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潭之时。中国的行动使本来就越来越被动的苏联更加捉襟见肘，穷于应付。

思考题：

1. 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原因。
2. 中美建交给中国带来的利弊得失。
3. 中越自卫反击战发生的原因及其经过。

参考书目：

1. 曲星：《中国外交5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2.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69—1979）》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3. 杨福昌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
4. 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5. 李丹慧主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天地图书公司，2000年。

第八章
冷战与80年代的中国外交

牛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第一节　“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东欧国家发生巨变和前苏联解体，冷战由于前苏联阵营的崩溃而突然结束。人们完全没有预料到，二次大战以后持续了40多年的冷战会以这样的方式突然结束；人们也没有预料到，前苏联这样一个称雄一时的超级大国，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其实不少人(他们中很多人甚至预言中国不久将步前苏联的后尘)也没有预料到，同样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特别是在经历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大风波以后，能够面对天翻地覆般的世界大变局，安然度过那个可以说是内外交困的时期，从1993年再次迈开了迅速发展的步伐。

毫无疑问，中国能够稳定地过渡到后冷战时代，主要取决于中国决策层当时制订的内外政策，正是那些内外政策使得中国能够处于一种相对超然的国际地位。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发展的许多阶段一样，这一时期主导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因素，是国内政治的变化，说到底是中共中央重新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和国家发展战略，导致了中国对外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换句话说，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国内政治，来自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必须重视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影响，尤其是对外政策中包含的那些重大问题。根据中国领导人一贯的思维逻辑和理论框架，如果当时的中国决策层不能合理地和有说服力地解决诸如“时代”、“形势”、“格局”、“力量对比”、“外交基本方针”等属于认识结构中的基本问题，并提出和有效地执行相应的政策，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也是无法确定并得到广泛支持的，至少也会比后来看到的要困难得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与国家发展战略至少也是相辅相成的，对外政策中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对于制订国家发展战略同样也是根本性的。进一步说，中国决策在面对冷战突然结束这一重大的国际事态时，如果不能合理地回答和解决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基本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发展战略将难以为继。冷战结束前后中国国内有关对外政策的各种层次的讨论证明了一点。

当时由邓小平领导制定的对外政策所产生的重要和持续的影响在此不赘述。这里强调的是从历史演变的脉络看，邓小平在前苏联解体前后提出的十六字方针，即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源于8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演变及其指导思想的发展。中国能够比较从容地应付冷战突然结束所造成的相当复杂的局面，是因为经过10年的努力，以1989年5月中苏关系正常化为标志，中国已经基本告别了冷战。

当时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表明，80年代末期中国已经大致形成了可以超然于冷战的外交态势，不论是从中国外交指导思想的本质，还是从中国对外关系的状态等角度看，都是如此。甚至可以做这样的合理推论，即使冷战不像后来那样突然结束，中国也不再可能，更重要的是不会再有任何意愿，继续在美苏的角逐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中国外交与冷战的关系构成了研究80年代中国对外关系演变的一个重要视角。对80年代美苏冷战的基本问题和特征及其对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影响，已经有过很多论述。这部分只是在中国外交与国际冷战的基本关系的框架中，探讨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及其对中国外交与国际冷战之关系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80年代的一些重大外交决策不仅直接影响了这个阶段的中国外交，而且包含了中国应对冷战结束后急剧变动的国际环境的基本思路和方式，后冷战时代中国外交的基调基本上是在这个阶段确定的。

80年代美苏冷战的基本问题和特征及其对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影响，已经有过很多论述。这里要强调的是，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发展的某些阶段一样，这一时期主导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因素，是国内政治的变化。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国内政治，是国家发展战略转变的结果。

从历史的演变过程看，新时期的中国对外政策在时间上是同十年“文革”的极“左”外交相连接的，它必然是在清除极“左”外交的影响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不论当时的诸多政治观念、表述国际事务的政治术语等

等，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陌生或不可思议，它们毕竟是那个时期开始清算“极左”外交和重新认识国际事务和探讨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既然新时期的对外政策是从否定“文革”极“左”外交开始的，就有必要梳理和澄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决策层认识世界及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一些基本概念。它们大致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在理论上，对传统的“时代”学说持教条僵化的态度，对纷繁复杂且迅速变化的战后国际政治形势缺乏全面系统和具体的分析。当时中国决策层只是简单地断言，世界正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即“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否认60年代开始出现的“缓和”的意义及其巨大影响。在这个基本判断的影响下，中国决策层不承认有维持较长时间基本和平与稳定的可能性。

第二是对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的基本估计过高，对中国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估计过高。这两个估计过高在“文革”期间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中国革命中心论”，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中国向何处去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是“关系世界革命命运的一件头等大事”，等等。“中国革命中心论”反映出对当时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影响力等重大问题的战略性思考，从深层上看，也多少涉及到历史上的“中国中心观”。

第三是将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理论和现实中均否认国家利益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中的首要地位，如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明确地宣布，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文革”期间，从话语到思考的逻辑都充满了理想主义的高调，追求利益本身甚至成了罪行。这种极端的政治气氛必然要反映到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严重影响对国际事务和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的理解。

第四是标榜“唯我独左”、“唯我独革”，以反对帝、修、反为号召，搞“两个拳头打人”、“四面出击”，到处斗争，四面树敌，甚而至于对所谓的“光荣孤立”抱着自我欣赏的态度。这种对外政策在文革期间达到顶峰，给中国对外关系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了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决策层认识和理解国际事务和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框架，一个极“左”的思维框架。在这种框架中勾画出来的世界基本图景，必然是极度紧张和充满战争危险的。特别是对国际紧张局势的认知同国内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造成的紧张环境相辅相成，

互相影响,造就了当时中国特有的国家战略,即保持高度的紧张和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大规模战争或世界范围的革命形势。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此为开端,中国的外交战略开始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即为中共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服务,为中国实现"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服务。历史发展的逻辑和事实均表明,中国对外政策如果要适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大战略转变的需要,就必须根本否定上述已经形成并根深蒂固的"极左"框架,尽管这种否定是需要一个过程并具备一些主客观条件的,但它必须完成。更进一步说,对"极左"的外交思维框架的否定,也是中国发展战略本身得以确立和不断巩固的基本条件。

从后来包括冷战结束后直到现在仍在继续的有关探讨和争论看,对"极左"外交思维框架的否定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甚至可以说这个充满争论的过程,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结束。在这个过程中争论的观点纷繁复杂,但总的说来就是围绕以上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展开的。

首先是开始逐步摆脱在时代问题上的传统理论的影响,这个过程开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建国后确定国家战略的基本过程,论证新时期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必须就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作出基本的判断。简单地说,就是必须确定爆发世界战争和大规模外敌入侵的可能性的大小。

人的认识在其发展的任何阶段上,都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影响,再现历史的某些有价值的部分本身甚至就是历史的进步。80 年代初,中国领导人的基本判断不过是恢复了中共八大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即战争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是世界和平的力量超过战争的力量,争取实现一个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是有可能的。重要的是这个基本判断构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得以提出和确立的重要依据之一。到 80 年代中期,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个主题的思想。这无疑是中国领导人在认识时代问题上的一次巨大飞跃,因为"和平与发展"就是对"战争与革命"的否定,那种工整的对仗鲜明地揭示了它的针对性,即彻底否定中共党内在时代问题上长期坚持的主要观点。

尽管迄今为止仍然不能说,中国国内关于时代的争论已经结束,但关于"两个主题"的思想一直是中国决策层的主流,这是毋庸置疑的。由于时代问题的理论在中共的思维逻辑中的特殊地位,邓小平对时代问题的阐述及其影响逐步扩大,必然给中国外交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其次是对中国在当时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开始作出越来越符合实际情况的评价。当中国领导人将关注的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并以国家的发展程度作为首要的评价指标时,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评价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另一方面,随着中共中央将中国的社会发展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承认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等等,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位置。这种认识不仅使中国在冷战后期采取越来越务实的对外政策,而且导致了在冷战突然结束时,中国领导人迅速提出了“善于守拙”、“不当头”、“不抗旗”等堪称明智的战略决策。后来的发展证明,以“韬光养晦”为核心的一系列原则,在指导中国外交走出后冷战时代初期的困境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是将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强调国家利益在制定对外政策和处理对外关系中的首要地位。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是“为经济发展服务”,“为实现现代化服务”。与70年代相比,强调超越意识形态成为80年代中国外交变革的最突出的特色。

第四是中共十二大提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并成为80年代中国外交的主调。中国领导人在全面总结过去30年外交经验,也包括与美国建交后处理中美关系的主要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根据这项政策,80年代初中国在维持与美国的战略关系的同时,开始探索改善与前苏联的关系,直到1989年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在冷战结束时,中国同世界主要国家均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关系。

上述改变是根本性的,尽管表述这种转变的话语系统仍然是传统的,以致在当时(甚至现在)都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深入地探讨,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是如何展开并逐步改变中国的外交思维、外交哲学和对外政策的。

围绕上述变化展开的争论及其结果,对80年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就其表现形式而言,中国外交从此开始彻底告别“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建立反对某个国家的统一战线从此不再是外交工作的内容,中国也不再以对某一国家的态度、意识形态决定国家间的远近亲疏。到冷战结束时,中国外交已经走上“无敌国”的轨道。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80年代中国的外交是走出冷战的外交。中国尽管必须考虑美苏两极格局的客观存在,但是显然不再愿意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当然也不希望同任何一方结成战略同盟,以至于被人利用,形成同另一方的对抗。中国不再参与冷战中的

两极对抗,是中国后来能够相对稳妥地应对冷战结束后急剧变动的国际环境的关键性原因。

第二节 构筑中美关系的新基础

中美关系正常化及后来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是80年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一时期中美关系演变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塑造了当时中国对外关系的某些方面,更重要的是它对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美战略关系的建立及其局限性 80年代中美关系贯穿着一条基本线索,即两国在反对前苏联扩张领域的战略合作,始终支配着中美关系的发展,是维系中美关系的主要纽带,是支撑中美合作的主要基础。从中美建交到签署"八一七公报",再到80年代中期的中美关系迅速发展,共同对抗前苏联扩张的战略合作都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70年代初促使中美从对抗走向和解的主要因素,是对付前苏联扩张和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共同利益。随后一段时间,中国方面一直将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但是,由于美国国内政局动荡和美国推行同前苏联"缓和"的政策,中美关系一度停滞不前。直到1978年卡特政府在"缓和"政策明显失败,美国感受到来自前苏联的巨大压力和威胁的情况下,终于下决心迈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

1978年5月17日,美国总统卡特对即将访华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下达了指令:"美国的决心已下",消除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各种障碍。5月下旬美国总统特使布热津斯基访华,向中国领导人表示,美国政府已下决心要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但希望美方作出期待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明显地遭到中国的反驳。中国领导人表示,双方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中美双方从1978年7月5日起,在北京举行建交秘密谈判。

中国领导人显然高度重视中美建交谈判,邓小平尽管国内事务的议程极其紧张,仍然亲自过问每一轮谈判情况,并做出具体的指示。在谈判中,中国方面表明的基本立场是:第一、台湾问题是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是美国政府派兵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干涉中国内政造成的,"解铃还需系铃人"。第二、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须同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第三、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

可以同台湾继续保持非官方关系,但不应向台湾出售武器。第四、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

由于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有相当的距离,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邓小平在仔细分析中美会谈的情况之后,决心要加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步伐。1978 年 11 月 2 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美方想加快正常化,中方也要抓住时机。至此中国决策层确定了积极促使谈判成功的基本方针。

中国决策层的考虑反映了他们对国内外形势的基本估计。首先是前苏联明显加紧了在亚洲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在中越关系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前苏联同越南签订了同盟条约。中国领导人因此认为,中国的周边环境由于前苏联的扩张而严重恶化,中国有必要采取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威望,具体地说就是要考虑对越南采取惩罚性的军事行动。

另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中国除了迫切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安全环境,也需要与发达国家建立比较积极密切的经济政治关系,以获得必要的技术、资金和海外市场。显然,不论是安全方面的关心,还是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加强了中国领导人尽早实现中美正常化的决心。

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三次会见了美方代表伍德科克,并与他就双方争执不下的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和中美建交草案进行了讨论。由于邓小平和卡特总统的决断,中美双方最终签署了建交公报,1979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从此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中美建交后双方关系发展迅速。在 80 年代,中美保持着密切的高层互访和对话,两国在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科技等方面展开交流与合作。1983 年 6 月,美国宣布将中国从出口管制分类的“P”组列入 “V”组内,是与美国友好的非盟国一类。中美双边贸易额由 1979 年的 24.5 亿美元增加到 1989 年的 144.1 亿美元。

两国在军事和国际安全事务中进行了积极的合作。从 1983 年 9 月开始,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多次互访,探讨两军交流合作,对国际热点问题交换意见并协调行动。1986 年 11 月美国第七舰队访问青岛,标志着两军交流达到新的水平。中美在当时的许多热点问题上,如阿富汗问题、印度支那问题以及印巴等问题上,均采取合作的政策。

从历史的过程看,如果没有对抗前苏联扩张威胁的共识,中美在当时实

现关系正常化并迅速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关系，至少也是很困难的。不过也需要指出，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消除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即美国在台湾等问题上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首先是在中美建交后不久，美国国会提出并由美国行政当局批准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从中美双方在建交谈判中达成的协议看，两国在台湾问题上都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其中比较敏感的是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中国保留以后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美方则表示相信，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将会逐渐出现有利于讨论这个问题的气氛，暗示美国对台出售武器将随着这一地区紧张局势的继续缓和而减少。

问题是 1979 年 4 月，美国国会出笼了《与台湾关系法》。该法的主旨和许多条文违背中美建交公报，成为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的一个根源。《与台湾关系法》为美国以台湾安全为理由干预两岸关系，提供了法律和政治的借口。它的出台反映出美国国内仍然存在着反华势力，而且能量相当的大。由于这股势力的存在，美国在争取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的同时，仍然不肯根本放弃牵制甚至遏制中国的企图，在涉及中国重大战略利益的台湾问题上，不肯彻底停止其干预。

其次是 1981 年里根(Ronald Reagan)执政后，采取所谓“双轨”对华政策，一方面表示继续发展中美正常关系，另一方面声称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包括出售高性能的 FX 系列战斗机。里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导致中美关系严重恶化。

里根政府的行动使中国领导人断定，中美关系正面临严峻的考验，他们显然决定采取逐步升级的对抗措施，以便遏制里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中国相继取消了军事领导人的访美计划，并公开谴责里根政府干涉中国内政。邓小平在 1982 年 2 月发表谈话，就中美关系出现的危机向美国提出警告。这时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已经准备不惜采取使中美关系降级的行动。迫使里根政府改变其破坏中美关系的政策。

1982 年 5 月，中美开始就美国对台武器销售问题进行谈判。通过艰苦的谈判，双方在 8 月 15 日达成了协议，签署了“八一七公报”。美国在公报中再次声明，它无意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美国承诺，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上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并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销售，经过一段时间导致这一问题的最后解决。这里所谓的“最后解决”，根据 7 月 13 日里根给邓小平的信中所说的美国不谋求、也不

会无限期向台湾出售武器，就是最终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当然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并没有严格履行公报中的承诺。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以及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和态度，导致中国决策层在80年代初便下决心，与美国拉开距离。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坚持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中的经验和教训。所谓经验和教训主要是指，在利用共同反对前苏联扩张的战略关系促进中美关系发展时，不能对这种战略关系的作用估计过高。

有必要指出的是，应该具体理解中国在中共十二大以后的对美政策。所谓"与美国拉开距离"，包含着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即对美国的不信任，在战略上防止被美国所利用。但是，1982年"八一七公报"签署后，中美关系到80年代中期甚至有跃进式的发展。这表明，"与美国拉开距离"显然是有限制的。它主要是指在战略上使中国避免被美国利用，成为美国的"棋子"，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领导人不再重视、不想发展中美关系。而且中美关系正常化虽然是建立在对抗前苏联的战略合作基础上的，但两国建交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迅速超出了战略合作的范围，在更广泛得多的领域获得全面的发展。从客观效果看，中国领导人强调"独立自主"与"不结盟"，增加了中国的战略回旋余地，为中国处理对美关系，提供了更广阔的回旋余地，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中美关系的"转型"　上述中美关系在80年代的发展，已经涉及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几乎立即开始了一次重大的"转型"，这成为80年代中美关系发展的突出特点，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中美关系是近50年来的国际关系中极其特殊的双边关系。这首先是因为，两国除了都是"超大型"国家外，难以找到其他重要的共同之处，如：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文化背景迥异，体制难以衔接，国家实力对比悬殊，意识形态对立，等等。以往的研究充分地证明，在从和解到正常化的过程中，中美之间形成了一种"外力推动型"的关系，即双方改善关系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对付共同面临的外部威胁的需要。不过其中有两个问题被忽略了，而后来的发展证明，它们的影响的确是长期的，有时还是颇大的。

其一，如上所述，是关于安全战略关系的作用和局限性。中国领导人在70年代初决定与美国和解，主要是基于安全战略的考虑，对美政策的调整与国内的极"左"政策是背道而驰的。美国领导人同样将安全战略放在首要位置，他们甚至没有考虑，中美关系是否存在不受战略关系支配的内在价

值。事实表明,共同的战略利益只是促成了中美关系的缓和,而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与中国决定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在时间上也是完全同步的。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中美走向和解时,在各自社会内部的支持力量非常薄弱,所以双方都需要采取措施来塑造对方的好形象,以便使对方在本国公众中至少是可以被接受的。这样做的结果与中美合作必然产生的巨大震动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对对方过高的期望,并使人们误以为,只要有安全战略方面的共同利益,就足以使中美关系万古长青。这种心理状态的承受力相当脆弱,在中美关系逆转时则起到强化误解和敌意的作用。

从历史演变的脉络看,自1972年毛泽东与尼克松打开中美和解的大门,两国先是为了对付共同威胁而形成了没有内在要求的战略合作关系;然后在战略合作过程中,于70年代末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不过从80年代初开始,中美关系已经开始发生巨大但一时还难以被清楚认识到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动力是来自于中国国内政治的历史性变动,即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不仅是促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实现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主要原因,而且是推动中美关系逐步产生"内在动力"的主要因素。

这里所谓的"内在动力",是相对于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外部因素如共同对抗前苏联扩张以维护自己安全的需要等而言的,它是指产生于中美两国社会内部的对发展、扩大双边关系的需要,包括发展经济贸易、文化与科学技术交流、人员之间的交往,等等。正是内在动力的形成,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中美关系仅靠反对第三者来维系的历史局面,使中美关系经受住了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严重冲击。

综观整个80年代中美关系的发展,最有意义的是中美关系逐步从单纯的"外力(应付共同面临的外部威胁)"驱动型转变为"内力(产生于各自主要的国内政策的合作愿望)"和"外力(在全球和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合作需要)"的双向驱动型。

在"内力"和"外力"的双重驱动下,中美之间开始形成了一种全面和复杂的双边关系,它涉及到双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安全等各个领域,以及政府的各个部门和各地区,而且是不同层次上的利害关系日趋复杂。利与害并存、冲突与妥协并存、竞争与合作并存,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

80年代双边关系的发展,已经潜移默化地构筑起中美关系在冷战结束

后仍然可以维系和发展的新基础。这个新基础是以互利的经济贸易关系为核心、以贸易和安全方面的合作为支柱的，尽管它当时看上去不够坚实，但承重力之强是空前的。在此基础上，虽然受到北京政治风波、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冲击，中美双边关系中那些严重的冲突仍然得到解决或缓解，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在冷战后也得以继续。更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的变化促使双方开始以一种超越冷战的思维认识对方。

第三节　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及其意义

80 年代中苏关系的发展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这首先是因为中苏关系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作为冷战格局中的一极和与中国领土接壤并拥有 7000 多公里边界线的超级大国，前苏联对外政策的任何变化，都必然影响到中国的安全战略。换句话说，中国的安全或者说安全感，必然直接与前苏联的对外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领袖、曾经与中国有过密切的同盟关系后来又发生尖锐的意识形态争论的国家，前苏联无疑是中国制订发展战略的重要参考系，且不论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中苏之间的特殊关系决定了中国内外政策的任何变化，特别是革命性的变化，都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中国的对前苏联政策，影响到中苏关系的发展。80 年代中国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及其由此带动的对外政策调整，是导致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关键性原因之一，而 1989 年春中苏实现关系正常化，则是中国外交走出冷战的重要标志。

中国调整对前苏联政策的背景　如上所述，70 年代末中国国内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并由此导致了中国外交的一场深刻的变革，中国对前苏联政策的调整是这场外交变革的组成部分。特别是由于中苏关系的特殊性，中国对前苏联政策的调整以及由此引起的中苏关系的变化，对于理解 80 年代中国对外政策，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苏关系紧张和对前苏联威胁的严重担心，是中国决策层在 70 年代断定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和大规模外敌入侵不可避免、甚至战争已经迫在眉睫的重要原因。70 年代中国大规模、长时间的战备，就是为了应付前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而实施的。

后来的事实表明，“前苏联亡我之心不死”的估计是缺乏根据的。这种

估计的产生固然同前苏联的扩张政策有关，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对前苏联威胁的过高估计判断是同毛泽东的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等思想有密切的关系，那个时代的中苏意识形态斗争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差不多都对前苏联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怀着深刻的警惕。

观念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人们的认识经常落后于生活实践。70 年代初在中国形成并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对前苏联威胁的估计不可能迅速消退，结果是 80 年代初中国外交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是对国际形势作出了越来越符合实际的判断，相信和平因素在增长，世界战争有可能被推迟，可以维持较长时间的和平；另一方面又认为前苏联威胁严重存在，至少是没有减轻，中国仍然面临着前苏联入侵的威胁。前苏联在亚洲的扩张，特别是入侵阿富汗和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加剧了中国的不安全感。客观上使中国的对前苏联政策无法立即跟上国内政策转变的步伐。

上述情况持续到 1982 年，两个因素导致中国领导人开始有意识地改变长期奉行的与前苏联对抗的政策。首先是中美关系由于里根政府奉行“双轨政策”而出现危机。尽管经过谈判签署了“八一七公报”，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因此放松对美国的警惕，他们对中美战略合作的有限性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复杂性，有了更为直接的认识和理解。其次是在 1982 年 3 月，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就中苏关系发表讲话，表达了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他试图在三个问题上向中国领导人表明前苏联的立场，即：前苏联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并没有彻底否定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前苏联始终如一地支持中国的立场，前苏联无意威胁中国也没有领土要求。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所释放的信息就其强烈和清晰的程度而言，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在许多方面中国领导人未必感到满意。

中美关系的曲折和前苏联改善中苏关系的表示造成了中国调整对前苏联政策的客观条件，已经开始的中国外交的内在调整则是中国必然对前苏联的表示做出回应的主观依据。在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的大战略的支配下，中国不可能长期与一个作为超级大国的邻国保持对抗状态，还能够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从逻辑上说，在断定有可能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以后，仍然坚持认为还有一个毗邻的超级大国是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并随时可能入侵中国，是说不通的。调整对前苏联政策势在必行，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前苏联在 60 年代末提出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随着中苏关系不断恶化，前苏联在亚洲的军事部署日益增强。在中国看来，前苏联在亚洲的一系列战略扩张，包括布重兵于中苏边界，派军队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并于 1979 年出兵侵占阿富汗等等，对中国的安

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前苏联的军事扩张从北面、南面和西面形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围困。1979年4月3日中国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作出决定，不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方曾经尝试以此为契机，缓和中苏关系，探讨双方关系正常化的途径。但是当年底苏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中苏谈判被搁置，正常化进程从此中断两年。

1982年3月前苏联领导人发表的讲话引起中国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前苏联领导人公开表示有意改善中苏关系后，邓小平在家中召开会议，决定“采取一个大的行动”，“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当年8月，中国向前苏联领导人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改善中苏关系的高度关注。9月中国领导人在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明确表达了改善中苏关系的意向。10月中苏政治谈判重新开始。

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上台之前，中苏关系气氛不断缓和，但没有实质性进展。但就对中国外交而言，调整对前苏联政策本身就是有重大意义的。

调整对前苏联政策是新时期中国外交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对前苏联政策的调整，中国外交转变就是不完整的，甚至是难以根本完成的。更有意义的是，中国领导人从考虑改善中苏关系开始，就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在抛弃以往处理中苏关系的束缚，将改善关系的关注点放在对中国有实际意义的安全问题上，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无止境地纠缠于意识形态争论。当然，在安全事务上中国领导人不可能不继续受到70年代高估前苏联威胁的影响，但“务实”的逻辑将使中国的政策调整向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发展，是确定无疑的，也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

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虽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但中国调整对前苏联的政策的确改善了中国的战略地位，即在处理对美关系中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较多的筹码，尽管这未必是中国领导人的初衷。中国调整对前苏联政策的确迫使美国不得不在处理对华关系上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这是8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而中美关系的发展又使中国处理对苏关系时，处于有利的地位。

中苏关系正常化及其意义　邓小平特别重视历史机遇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重大作用，也特别强调要善于抓住机遇。从邓小平处理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战略性决策看，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经验。1985年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执政，在邓小平看来就是中国外交调整一个历史机遇，就如同美国的卡特总统表示下决心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邓小平看来是一

次历史机遇一样。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是前苏联内外政策转变的转折点。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很快认为,前苏联尽管在军事上显赫一时,但已经陷入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其严重性不仅在于严重削弱了前苏联的世界地位,而且关系到前苏联"社会主义的命运问题"。正是基于对前苏联面临的危机的深刻体会,戈尔巴乔夫很快便决定进行一场革命性的政治经济改革。为了保证国内政治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前苏联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必须放弃对外扩张的政策。前苏联国家大战略的转变必然会带动其对外政策随之转变,其内在的趋势就是放弃扩张性的对外政策,全面缓和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的关系。

当时前苏联领导人的确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前苏联安全战略的新理念。其内容包括: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他高技术兵器的发展,使国家靠军事手段保障安全的观念过时了,维护国家安全越来越需要运用政治手段。二、军备竞赛、特别是战略核武器竞赛,不可能给竞赛的任何一方带来政治上的利益和实质性的安全感,而且军备竞赛的无限制性将最终破坏均势,从而使战争无法避免。三、安全是互相的,单方面追求绝对安全将造成自己更大的不安全,因此应致力于实现有关国家,包括美苏之间的同等安全。

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导致了美苏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双方从尖锐激烈的对抗逐步转向对抗与对话同时进行的新"缓和"阶段。如果说70年代的"缓和"是美国的尼克松政府发起的,那么这次"缓和"主要是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国内推行改革和在国际上推行外交"新思维"的结果。1985年3月,美苏恢复了在日内瓦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在经过两轮首脑会晤后,1987年底美苏终于签订了关于中程导弹的条约。以此为标志,美苏关系进入新的缓和时期,并带动整个国际形势出现缓解。

随着包含在所谓"新思维"中的新安全理念逐步贯彻到前苏联对外政策中,必然导致其对华政策出现相应的变化。1985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契尔年科的葬礼上,戈尔巴乔夫向前往吊唁的中国副总理李鹏表达了缓和中苏关系的意愿。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讲话,对中国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条件作出初步的让步,并表示愿意认真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前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的安全关切和内外政策,开始有了比较符合实际的了解和认识。

根据前苏联新领导人的一系列行动,中国决策层明显加大了调整对前苏联政策的幅度和速度。1982年以来中苏关系虽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

是毕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气氛。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前苏联领导人频繁更换，影响到前苏联对华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但是前苏联试图缓和中苏关系的政策基调并没有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同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关系都大幅度改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的合作都有比较迅速的发展。总之，中国同前苏联和前苏联阵营的关系都在向缓和方向前行。与此同时，中国的和平睦邻政策逐步落实，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合作的限度逐步清晰。显然，中国已经造成了在对中国有利的条件下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主要条件，而且从国内外的状况看，中国都处在相当有利的战略地位。

更重要的是，中国决策层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后，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形势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1985 年 6 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不久后他又说："我们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宣布从 1985 年开始实施百万裁军计划。这一决定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决策层下决心抓住历史机遇，集中所有的资源进行现代化建设。更多地运用外交手段来稳定和改善对外关系势在必行，采取措施缓和、改善中苏关系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中国领导人在处理中苏关系上采取灵活务实的措施，突出表现在消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问题上的让步。1985 年 10 月，邓小平向前苏联方面转达，在消除中苏关系正常化"三个障碍"方面，可以不必一揽子解决。前苏联首先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采取行动，他就可以破例访问前苏联。1986 年 9 月邓小平公开重申，只要解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就可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

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变，对前苏联政策的持续调整等，使前苏联新领导人逐步认识到，中国 1979 年代以后的有关政策是基于对前苏联事实上对中国造成的安全威胁的反应，中国与美国的合作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而不是蓄意奉行所谓的"反苏"政策，因此前苏联也开始采取实际步骤改善中苏关系。

1987 年 2 月中苏恢复边界谈判，并逐步取得了双方都满意的进展，中苏边境局势迅速缓和。1988 年间，前苏联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和承诺促使越南于 1989 年底全部撤出柬埔寨。12 月前苏联在联合国宣布从蒙古撤出大部分前苏联军队。1989 年 2 月 5 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前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在北京会晤，发表了《中国前苏联两国外长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双方就解决柬埔寨问题达成了某些一

致。3 月 7 日苏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将从蒙古撤出 3/4 的前苏联驻军,包括全部空降部队,5 月 15 日开始了这一撤军过程。

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基本消除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于 1989 年 5 月 15 日至 18 日访问北京,双方发表《中国前苏联联合公报》。《中国前苏联联合公报》是中国在冷战期间同超级大国签署的第一个不针对第三方的联合公报,它标志着中苏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中苏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从中国与冷战的关系的角度看,中苏关系正常化有其特殊的意义。中苏关系正常化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相比,其突出特点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并不谋求与前苏联建立针对第三方的战略关系,新的中苏关系的基本要素包括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不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纵观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全过程,可以说中国决策层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新的外交理念,已经超越了冷战思维的一些基本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关系正常化是后冷战时代中国外交的一个起点。

本章集中探讨 80 年代中国与美国和前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80 年代中国外交是相当丰富的,其内容远不是用中国同美国和前苏联两个国家的关系就可以概括的,本章只是大致地梳理冷战后期中国外交与冷战的关系。

思考题:

1. 如何评价中美战略关系对 80 年代中国外交的影响。
2. 80 年代中国调整对前苏联政策的基本内容及其主要特征是什么?

参考书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2. 邓力群等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
3. 倪孝铨,罗伯特·罗斯主编:《美中苏三角关系》,人民出版社,1993 年。
4. 田增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
5. 曲星:《中国外交 50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
6. 杨福昌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年。
7. 罗伯特·S. 罗斯:《风云变幻的中美关系》,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

附录:大事记

1945 年

2 月 4—11 日　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会议,对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划分战后欧洲和东亚的势力范围,以及成立联合国等问题,达成了妥协。

5 月　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要争取夺取东北,建立战略根据地的设想。

8 月 9 日　苏军出兵,很快占领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

8 月 14 日　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为取得苏联支持,依照美苏秘密达成的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接受了苏方提出的外蒙古独立和租让旅顺港给苏军的要求。同时苏联也明确表示同意一切道义上的和物资上的援助都只给予国民政府。

8 月 18 日　苏军开始在千岛群岛登陆,但斯大林关于苏军应当与美军共同占领日本的要求,遭到了美方的拒绝。杜鲁门明确决定,日本由美军单独占领,不搞多国家分区占领。

8 月 20 日　美国发布盟军总命令第一号,要求日军放下武器,并规定中国、中国台湾和法属印度支那北纬 16 度线以北地区的日军,只能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军队投降。

8 月 20 日　斯大林以俄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电毛泽东,要求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前往重庆谈判和平。

8 月 28 日　毛泽东赴陪都重庆与蒋介石讨论战后国共关系等问题。这次会谈谈至 10 月 10 日达成了一项“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所谓“双十协定”)。

8 月 29 日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即刻向东北派出部队与干部,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

8月30日　由麦克阿瑟率领的美军第八军和第六军四十六万人陆续开始进驻日本。

9月3日　莫斯科举行庆祝战胜日本大会，斯大林发表演说，称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取得，使之成为苏联连接太平洋的工具，和防御日本的重要根据地。

9月13日　美军以协助遣返在华日军的名义，开始在山东青岛登陆。进而又步步北进，陆续在天津、秦皇岛等地登陆。

9月14日　苏军驻东北代表，在八路军进入东北的地方部队负责人的陪同下，乘苏军飞机飞抵延安，与刘少奇、朱德等协商在不影响苏军外交使命的情况下双方合作的办法。

9月17日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正式提出放弃长江以南的根据地，争取重心北移，以便在苏军的配合下，全力争取东北，控制热、察两省，巩固山东、太行两根据地的战略设想。

8月24—25日　苏联方面两度提出要求美、英、苏、中四国共同管制日本，均遭美国拒绝。

10月24—25日　苏军在拒绝了美军运送的国民党军登陆大连的要求后，突然搜查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等机关，并封锁了蒋介石准备接收东北的东北行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准备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11月6日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公开讲演中宣称，原子弹绝不能为一国或少数国家所独占。

11月15日　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苏联政府故意蔑视中苏协定条文、阻挠中国方面接收东北的种种努力，并蓄意将营口、葫芦岛等港口交予中共，中国政府无法完成接收东北的任务。

11月20日　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中共军队必须撤离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两侧各30里以外。同时，凡有苏军存在的地区，中共军队不得与国民党军作战。

12月15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主张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同时派马歇尔以美国总统特使身份来华调处国共冲突。

12月30日　斯大林接见蒋经国，要求国民党方面保证不得让一个美国兵进入东北。

1946年

1月10日　在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有国共两

党以及各个中间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也于本日正式召开。

1月31日　政治协商会议宣告闭幕，会议通过了五项决议，即关于军事问题、宪法草案、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问题和国民大会问题的决议。

2月8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宣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战争不可避免。苏联在战争中的胜利应当归功于苏维埃制度。只要再经过三个五年计划，苏联就可以应付一切意外事件。

2月9日　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中、苏两国政府提出照会，称苏联以日本在东北之企业为战利品，在此基础上要求与国民党在东北签订经济合作协定的作法，违反了一般国际公法。

2月11日　美、英两国政府公布了《雅尔塔秘密协定》。

2月22日　美国驻苏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致电华盛顿，提出了一整套对苏联的遏制战略。

3月5日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发表了著名"铁幕演说"，指责苏联试图在东西欧之间建立一道铁幕，以隔绝东欧国家与西方的联系。

3月13日　斯大林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宣称丘吉尔5日的讲演是在"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

4月　毛泽东在政治局领导人内部传阅其拟就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提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固然存在，但是美、英、苏之间为缓和战争危机的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妥协，故中国革命不应受其妨碍。

4月18—5月18日　国共两党为夺取东北，在四平街及本溪方向发生大规模激战。经过一个月之久的鏖战，中共军队主力被迫放弃了四平、本溪及长春等地，但仍旧得以在松花江以北地区建立了巩固的北满根据地。

8月　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中提出了他关于中国是处于美苏两大强国对抗的"中间地带"，美国必须夺取"中间地带"才能够进攻苏联的观点，和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真正的力量属于人民的论断。

9月12日　《新华日报》发表文章称，经过美国两次调处试验，中共"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了"。

12月28日　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声称尽管国共谈判已由中共破裂，但美国仍将避免介入中国内战，美国只准备考虑协助国民政府进行"其他与内战无关的计划"。

1947 年

1 月 29 日　美国宣布退出对中国内战的调处。

3 月 12 日　杜鲁门在国会众、参两院发表咨文，把世界划分为自由民主和极权主义两个对立的营垒，不指名地将苏联称为“极权政体”，并以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为名，宣布美国将支持和帮助世界上所有抵抗“共产主义威胁”的力量。此即“杜鲁门主义”。

6 月 5 日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提出了一项大规模帮助欧洲恢复战争创伤的“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强调要通过美国的经济援助，使欧洲恢复到正常经济状态并使“自由制度”得以存续。

7 月 2 日　莫洛托夫宣布，因马歇尔计划意在达到与欧洲各国人民真正利益毫不相干的另外一些目的，苏联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

9 月 22—27 日　在苏联的主持下，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成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同时提出战后的世界已经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和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即“两大阵营”理论，并以此作为各国共产党的路线和行动的根本出发点。

10 月 10 日　毛泽东拟就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的政治口号。

11 月 7 日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发表声明，正式宣告成立。

1948 年

1 月 6 日　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在旧金山发表演说，声称美国对日本政策是旨在培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使日本成为远东的工厂和防止共产主义的屏障。

2 月 10 日　斯大林与南共领导人谈话时称：希腊共产党完全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但是，中国革命不同，他们取得了胜利，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3 月 14 日　斯大林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两个阵营是完全对立的，它们之间迟早要发生冲突。为此，我们要毫不迟疑地增强我们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同时有力地支持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斗争。在这方面，中国解放运动的例子是令人鼓舞的，我们的工作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帮助我们的中国同志，直至他们能肯定地打败所有的敌人。

3 月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一份报告称：“鉴于美国要在更加重要

的战略地区努力稳定局势,美国的援华计划只能放在次要地位。”

5月17日　斯大林对即将派往毛泽东身边担任其私人代表的前铁道部长科瓦廖夫称:“为了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吝惜力量和金钱。”

6月20—28日　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举行会议,专门讨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问题。会议最后通过决议,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

7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坚决支持苏共及共产党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原则立场。

11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外交指示,强调美、英、法等国既然不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当然也不承认他们的领事。

11月20日　因为美国总领事拒绝接受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交出电台的通令,沈阳军管会进入美国领事馆没收其电台,并发出书面声明,称不再承认华德的领事身份,同时说明:“因先生等蔑视本会之命令,今后除经市政府准许外,特禁止旧美领馆全部人员与外界自由来往”。

1949年

1月10日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34/1号文件,把美国对华政策目标规定为“防止中共成为苏联势力附庸”。

1月19日　中共发出外交工作指示,规定:坚决否认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在华代表及其机关的权利,其各种电台及收发报装置一律没收,对美国武官必须“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一律不予承认,概不给以任何采访发报之权。

1月21日　蒋介石宣布下野,桂系李宗仁就任代总统。

1月25日　中共中央就19日外交工作指示提出两点变通办法,一是对平津两地外国领事馆所有的电台,包括美国领事馆在内,“暂置不理”;二是对平津两地的外国记者,连同美国记者在内,亦暂取放任态度,并可考虑经过一个时期的考察后,令所有外国记者重新登记。

1月25日　苏、保、匈、波、罗、捷6国在莫斯科发表公报,宣布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总部设在莫斯科。

1月28日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一次谈话中声称:“不管有没有军事指导,再多的援助,也不能拯救国民党政权”。并提出了“待尘埃落定”观点,称“在灾难的烟尘落尽以前,美国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3月　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思想,主张即使新政府成立,也不急于与资本主义列强建立外交

关系。

4月上旬　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提议:只要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能够正式放弃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支持,那么,中国民主政府就不要拒绝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因为这样做将有助于使美国放弃其分裂中国的计划。

4月20日—21日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向长江以南进军,并迅速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和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上海。以司徒雷登大使为首的资本主义各国外交使节均留在南京没有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

4月30日　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名义,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前提是外国政府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

5月6—7日　司徒雷登两度派其秘书傅泾波与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接触,主动要求安排与黄华的直接会面。

5月13日　黄华与司徒雷登及溥泾波在司徒住处会面。司徒雷登暗示,美国能否承认中国新政府,要看新政府是否能够广泛吸收"民主分子"参加。

6月6日　黄华与司徒雷登再度在外事处会面。司徒雷登又一次强调,如果未来中国的政府里能够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的人士参加,那么,不仅美国承认中国的问题,包括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就都好解决了。

6月19日　中共宣布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

6月28日　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了莫斯科,向斯大林等当面请教建立新政府等问题。

6月30日　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答复部分民主党派人士关于新中国应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提议,宣布新中国只能"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7月10日　毛泽东致信周恩来,提出考虑到夺取台湾的需要,应要求苏联帮助迅速组建自己的空军。周恩来随即指定刘亚楼负责筹建空军和与苏方洽商等项事宜。

7月30日　美国政府发表对华政策白皮书,为其在中国的失败进行辩解。

8月15日　英国政府向美国送交关于中国问题的备忘录,主张承认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政权。认为这样将有可能在亚洲铁幕后面保持立足点,和争取中国疏远苏联。这一主张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反对。

9月21—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0月1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同日并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10月2—3日　苏联以及东欧各国均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0月5日　英国政府致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表示愿意与新中国建立非正式关系，但没有被接受。

10月12日　艾奇逊在参议院外委会秘密会议上声称："这个中国政府是真正的俄国帝国主义的工具，这是我们考虑与中国关系的出发点"。

10月31日　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等因对中国雇员使用暴力，受到中国雇员联名起诉而被拘押。

12月11日　美国驻沈阳总领事被驱逐出境。

12月16日　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前往莫斯科进行访问，为斯大林祝寿，并准备与苏联政府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1950年

1月5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称美国无意介入中国内战，承认战后台湾已经归还中国，承认中国战后已经对台湾行使主权。

1月6日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函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宣布正式承认中国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愿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月6日　共产党情报局刊物发表文章，驳斥野坂参三主张走和平夺取政权道路的观点。毛泽东亦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共产党情报局的立场。

1月6日　中国政府下令征用美国等国驻北京领事馆根据《辛丑条约》占据的旧兵营，迫使美国关闭了在中国的全部领事馆，并撤走在华全部政府人员。

1月8日　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等，要求开除国民党集团的代表。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支持中国政府的声明，被美、英否决。苏联代表团10日受命声明，在台湾当局的代表退出之前，苏联代表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

1月12日　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演讲中提及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环形防御带"，没有把南朝鲜和台湾包括在内。

2月4日　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与毛泽东、斯大林共商了有关越南的党建、民族阵线、军事、外交和干部等重大问题。三方商定，中苏两国共同援助越南抗法战争。

2月14日　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协定》，正式结为同盟。

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

6月27日　美军宣布介入朝鲜战争，同时宣布台湾地位未定，为防止在台湾海峡发生冲突，将派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联合国亦在美国的主导下，通过了谴责北朝鲜侵略的决议。

7月7日　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会员国联合组成联合国军，以美国将军麦克阿瑟为司令，援助南朝鲜。

8月24日　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及秘书长，要求制裁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罪行。

9月15日　美国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成功地实施了仁川登陆，将朝鲜人民军截成两段，并迅速将其主力消灭于南方。

9月16日　越南人民军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制定了边界战役计划，并在本日发起了战役行动。10月10日，整个战役胜利结束。越南人民边由此占据了长达750公里的边界地区，实现了背靠中国对法作战的目的。

10月2日　根据朝鲜党的援助请求，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但会议未能通过出兵援朝的意见。毛泽东在会后口授了给斯大林的电报，介绍了会议中的意见。

10月5日　经过反复讨论，中共中央最终通过了出兵援朝的决定，并决定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

10月7日　美国不相信印度驻华大使转达的中国政府关于联合国军不得越过三八线的警告，大举越过了三八线，迅速向北推进。

10月8—13日　周恩来及林彪赴苏联与斯大林等讨论了中国出兵朝鲜和苏联提供相关援助的问题。

10月19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头部队秘密跨过了鸭绿江。抗美援朝作战由此展开。

11月20日　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讲话中宣称："我们的地图表明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不管地图不地图，这就是我们的边界线。"随后，印军在中印边界东段地区占领了麦克

马洪线以南的部分地区,并于1953年完全占领了该线以南原属于西藏的9.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11月28日　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说,控诉美国侵略中国台湾和以侵朝空军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地区,伤害中国平民的行为。

12月16日　美国宣布禁止一切美国船只驶入中国港口,并冻结中国在美一切财产。

12月22日　周恩来受命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中国不会上联合国所谓"停火"方案的当,除非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美国武装撤离台湾海峡,中国政府获得它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51年

1月13日　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提出的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中国方面于17日拒绝此一方案。

1月30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美国所提指责中国为侵略者的议案。2月2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予以强烈谴责。

6月23日　根据中朝双方的要求,马立克受命在联合国提议:朝鲜"交战双方应谈判停火与休战,并把双方军队撤离三八线"。中朝两国政府随后也相继发表了同样的声明。

7月10日　中朝两国的代表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代表开始在朝控区开城,举行停战谈判。

10月25日　一度中断的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复谈,并于11月27日就军事分界线和建立非军事区问题达成了协议。

1952年

7月22日　中央军委复电驻越南顾问团表示同意人民军下一步战役战法。

8月17—21日　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双方讨论了有关中国和苏联两国关系的重要政治经济问题,就苏联帮助中国今后五年经济建设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9月16日发表会谈公报,并公布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报》和《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

10月2日—1953年1月11日　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

10月8日　因为中方拒绝接受美国所提战俘应根据"自愿"来决定要不要遣返的原则，美国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休会。

1953年

3月5日　斯大林因中风突然去世。

3月21日　苏联党利用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机会，向中方通报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即应立即积极促成朝鲜停战的实现。

3月30日　周恩来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声明，就解决战俘问题提出一项新建议。

4月26日　朝鲜停战谈判复会。

6月8日　朝鲜停战谈判就战俘安排问题达成协议。规定：凡不愿被遣返的战俘，应于停战生效后60天内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然后由战俘所属国家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之日起十天内，派人向战俘进行解释。90天后仍不愿遣返的战俘，则交由政治会议在30天内解决。

7月26日　朝鲜停战达成协议，并于次日正式在板门店正式签字。

10月10日　中共中央任命韦国清为驻越军事总顾问，负责帮助越南人民军作战和军事建设方面的工作，罗贵波为政治总顾问，负责帮助越南地方党政建设和政策方面的工作。

11月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代号为NSC—166号的文件，认为新中国政权的出现改变了远东的力量平衡，中国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最大敌人，美国必须使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手段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确保它在亚洲的目标得以实现。

1954年

2月19日　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发表公报。建议由苏、美、法、英、中、韩、朝等国代表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期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同时并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届时将邀请苏、美、法、英、中及其他有关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

3月13日　在中国军事顾问团参预策划指导和中国军方提供炮兵、工兵等装备与技术帮助的情况下，越南人民军打响了奠边府战役。此役于日内瓦会议开会前一天结束，歼灭法军16000人，俘虏1万人，并俘虏法守军司令德卡斯特里准将。

4月　中印两国达成《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

定》,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写入了协定的序言。而印军随后却在中印边境中段进占了已明文规定为中国西藏境内对印商开放的10市场之一的边境村波林三多,进而进一步进占了中段和西段的其他一些地区。

4月24日　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4月26日　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朝鲜问题。

5月8日　日内瓦会议第一次讨论印度支那问题。

6月25—29日　周恩来赴印度访问。28日,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中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7月3—5日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广西柳州举行了三天会谈。在中方的劝说下,越南方面最终同意在印度支那通过划界的办法实现停战。

7月21日　日内瓦会议各国在前国联大厦举行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的签字仪式。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规定:在北纬17度以南9号公路稍北划定一条临时军事分界线,此线以北为越南人民军集结地区,以南法兰西联邦部队集结地区,双方部队将从对方集结地区撤退。

7月23日　《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中共中央随后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明:"提出这个任务的作用,不仅在于击破美蒋军事条约,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心,从而激发人民的热情,以推动国家建设任务的完成,并可以利用这个斗争来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学会海上斗争的本领。"

9月3日　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

9月8日　美、英、法、澳、新、菲、泰、巴基斯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东南亚条约组织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条约国有义务通过"自助和互助的办法",抵抗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武装进攻"。条约还以议定书的形式,把柬埔寨、老挝和南越划为"保护地区"。该条约次年2月19日正式生效。

9月22日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福建前线再度轰击了金门。

9月29日—10月12日　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双方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苏方将援助项目增加到156项。

10月12日　苏联和中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对美国在东南亚组织军事集团并把其范围扩大到印度支那的做法,认为这是对日内瓦协定的

严重破坏。

10月15日　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就中苏会谈问题提出报告，通过了中苏《关于将中苏石油公司、中苏有色稀有金属公司、中苏造船公司和中苏民用航空公司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售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和《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11月16日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举行记者招待会声称，美国将不惜用武力保卫台湾不受攻击。

11月23日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对两批美国间谍进行宣判，分别判处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约翰·托马斯·唐奈和约翰·诺克斯·阿诺德等22人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12月2日　美国与台湾当局宣告正式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规定台湾如果遭到武装攻击，美国将采取行动并有权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中国政府于8日发表声明斥责这是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严重战争挑衅。

1955年

1月18—19日　解放军发起了夺取浙江沿海一江山岛的战斗。这是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陆、海、空三军的协同作战。此役次日凌晨2时以解放军全歼守敌，占领全岛结束。

1月26日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交了“授权总统使用武装部队协防台澎有关地区案”（又称福摩萨决议案）。美国参众两院随即迅速通过了这一提案，授权总统有权为协防台湾使用武力。

2月7日　蒋介石宣布撤退浙江沿海大陈岛的驻军。次日，美军派出大量舰只到大陈岛，并以大批飞机护航，陆续将守岛的25000名国民党军和18000岛民撤往台湾。这一行动持续到12日。

4月18—24日　在印尼万隆召开了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就众所瞩目的台湾问题发表了声明，提出：“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4月26日　杜勒斯对周恩来的谈话做出反应，表示愿意同中国举行双边会谈。

5月26日　中国全部收回旅顺主权。驻旅顺苏军全部离开旅顺回国。

8月1日　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举行。中国驻波兰代表王炳

南和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大使约翰逊分别担任中美两国谈判的代表。

1956 年

2 月 14—25 日　苏共在莫斯科举行第 20 次代表大会。朱德、邓小平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了大会。大会期间，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时代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4 月 5 日　《人民日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提出要历史地、有分析地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所犯的错误，正确吸取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原因和教训。

8 月 17 日　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议。协议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原子能工业项目和一批进行核科学技术研究用的实验室。

9 月 15—27 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的文件认为，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0 月 23 日　应苏共中央主席团的邀请，刘少奇等飞抵莫斯科，与苏联党的领导人共同协商处理波兰、匈牙利事件问题。

10 月 30 日　英、法两国政府向埃及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埃及政府同意英法军队进驻苏伊士运河港口，并于次日出兵埃及。11 月 3 日，中国政府照会英、法两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11 月 1 日　苏联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发表宣言，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也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下，也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强调这个宣言对于改正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方面的错误，增强团结，具有重大意义。

11 月 4 日　苏联红军第二次进入布达佩斯，镇压反叛者，纳吉逃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卡达尔政府宣告成立。

12 月 29 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进一步论述正确认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问题。

1957 年

1 月 7—10 日　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应邀访苏。

1月11—17日　周恩来率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波兰和匈牙利两国。

1月17日　中共中央通报苏方，根据朝鲜方面的要求，中国决定要从朝鲜半岛撤军。

4月15日至5月26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应邀来华访问。

8月　苏联宣布成功试射了洲际导弹。10月，苏联又宣布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9月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明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共领导人不接受《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的一些论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两国关系的增进。

10月15日　中苏两国签订《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议》(简称《国防新技术协议》)。

11月18日　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发言称：现在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12月中　美国借口负责中美大使级谈判的大使另有调用，美方今后只能派代办与中方会谈，实际上是希望借此中断中美大使级会谈。

1958年

5月5日　由于南共中央3月中旬提出在共盟纲领草案中批评了苏联的霸权主义等问题，苏共中央4月3日致函中共中央，认为这是南共现代修正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的表现。《人民日报》本日发表《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的社论，展开对南共修正主义的批判。

6月30日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政府在15日内决定派遣大使级代表参加商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否则，中国政府不能不认为美国政府已经决意使中美大使级会谈破裂。

7月13日　巴格达发生军事政变。新政府上台后即宣布，废止美国主导的巴格达条约。

7月14日　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粟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旃坛寺召开作战会议，制定了在金、马一带的军事行动具体方案。

7月15日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约旦登陆。当日，杜勒斯宣布，美国不接受中国政府的最后通牒，但在改变谈判地点的条件下，美国仍愿意派出大使继续与中国方面进行会谈。

7月17日　苏联报纸公开宣布在外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开始进行由黑海舰队舰只参加的陆军和空军演习，以示声援中东革命。中共中央亦向各省市发出了《中央关于声援伊拉克和黎巴嫩人民的通知》和《中央关于声援伊拉克和黎巴嫩人民口号的通知》。

7月31日—8月3日　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秘密赶来北京面见毛泽东，就联合潜艇舰队等问题进行解释。会谈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公开了赫鲁晓夫来华的情况。

8月18日　毛泽东对广州军区8月13日请示拟在深圳方面演习事批示道："德怀同志：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东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

8月23日　福建前线解放军炮兵部队炮轰被国民党军占据的金门岛。

8月25日　毛泽东在内部讲：美国同国民党订了共同防御条约，防御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在内，没有明确规定。美国人是否把这两个包袱也背上，还得观察。这次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

8月29日　美国在西太平洋的第七舰队和在日本的第五航空队进入加强戒备状态。驻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中的"艾塞克斯"号航空母舰和四艘驱逐舰，也奉命开往台湾地区。本日，已有50多艘美国舰只，包括6艘航空姆舰和50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或已到达台湾地区，或正在途中。

9月3日　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声称美军已经作好随时介入的准备，威胁解放军不要试图强占金门、马祖。

9月4日　福建前线部队受命"暂停炮击金门三昼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亦受命发布中国政府声明，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以此来检验美国在金门、马祖问题上的态度。

9月4日　杜勒斯声明，公开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所谓"防御"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

9月5日　苏联方面公开表示："针对美国侵略性的报复封锁可能不限于台湾海峡，苏联不会无动于衷，决不会袖手旁观。"

9月5日　周恩来受命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向他说明：第一，我们不是要解放台湾，而是惩罚国民党的骚扰；第二，我们的目的是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因为美国企图独霸台湾；第三，如果美国要发动战争，中国全部承担起来，绝不会拖苏联下水。

9月9日　《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主席对于中美两国在华沙即将开

始大使级代表的谈判寄予希望。他说如果双方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的话，谈判可能会取得某些成果。

9月10日　赫鲁晓夫给致信艾森豪威尔，声明："对我国伟大的盟友盟邦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

9月15日　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复谈。

9月29日　中苏又签订《关于苏联为中国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补充协议》（简称《核协议》）

9月30日　杜勒斯在对记者的谈话中表示，希望中共和台湾当局"双方放弃使用武力"，并且公开批评台湾当局不该把那么多的军队放在金门、马祖，认为这是"不明智和不谨慎的"。

10月15日　针对苏共中央公开发表声明支持中国在台海危机中的态度，毛泽东给苏共中央去信说：对于你们为马列主义原则和国际主义而做的无私奉献，我们深受感动。我代表中共中央向你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10月21日　针对《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不适当地强调了美蒋一致，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这次杜勒斯跑到台湾去，是要蒋介石从金、马撤兵，以换取我承诺不解放台湾。结果蒋介石不答应，反要美国承担"共同防御"金、马的义务，双方是不欢而散，完全不是唱"双簧戏"。过去一个多月我们打而不登，断而不死，就是要支持蒋介石对抗美国人。

10月26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公报，宣布志愿军已于3月15日起，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回国。

1959年

1月24日　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1月27日至2月5日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

3月10日　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叛乱，中共中央下令平叛。11月，武装叛乱基本平息。

3月28日　周恩来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职权。

3月20日　印度总理尼赫鲁写给给周恩来总理，提出要中国承认将两国有争议的领土全部划归印度，包括印度已经占领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领，以及一直被中国政府管辖，从未被印度占领过的西段阿克赛钦地区的3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4月29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案，针对印军

在麦克马洪线上接迎西藏外逃人员,高规格接待出逃的达赖喇嘛,并听任其在印度进行反华的政治活动,公开批评了印度某些政界人士极不友好的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

6月20日　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称:“为不影响苏、美、英首脑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日内瓦会议的谈判,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暂缓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数据”。

8月25日　印军一个小队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线北的朗久地区,与中国边防部队在马其墩村发生冲突。

9月7日　塔斯社公开发表评论,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遗憾。

9月15日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9月17日　《人民日报》转发《红旗》杂志的署名文章,提出不应对美国存有幻想,称对美帝国主义是毫和平共处可言的。

10月2日　从美国回来即来中国通报情况的赫鲁晓夫一行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举行会谈。

10月20日　印军武装人员进入空喀山口中国境内,受到中国边防巡逻队的阻止,印军开枪打死中方哨兵一名,中印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印方事后宣布死亡17人,伤3人,另中国边防军俘虏了印军7人。

11月7日　周恩来致函尼赫鲁,提出:“中印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后撤二十公里”。尼赫鲁拒绝了中方后撤军队的要求,不承认双方实际控制线,并坚持没有就边界问题谈判的可能。中方随后单方面从实际控制线上后撤了20公里。

1960年

2月4日　康生以观察员的身份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条约组织国政治协商会议发言,不指名地告诫苏联不要在裁军问题和其他问题上代替中国承担义务。

4月19—26日　周恩来访问印度,争取缓和中印关系。

5月1日　苏联击落美国击落U-2型高空侦察机,原定16日举行的美苏首脑会谈被迫取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苏联挑衅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挑衅》。

7月16日　苏共中央因对中国向苏联专家广为介绍中苏分歧和宣传中方观点不满,正式决定召回派往中国的所有专家。中国方面决定将双方照会情况通报给所有苏联专家,苏联方面表示强烈反对,并通过其驻华大使

提出抗议。

8月30日、10月18—22日　周恩来及毛泽东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先后多次会见了美国记者斯诺，表达了中国希望与美国新政府交往的设想。

11月5日—12月8日　刘少奇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3周年庆祝典礼，并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考虑到多数党希望团结，中苏两党各自作了一些让步，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

1961年

4月　印度开始实施"前进政策"，进而于年底对有争议的中印边界领土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蚕食。

4月18日　周恩来打电报给古巴总理卡斯特罗，表示坚决支持古巴人民的斗争。20日，中国政府发表反对美国侵略古巴的声明。次日，中国北京60万人分别集会示威，声援古巴。

10月17—31日　苏共举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由于赫鲁晓夫在会上批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并决定将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提前回国，以示不满。

11月　印度陆军总部向中印边界西段的印军下达命令，要求部队向印度所主张的边界尽可能地向前推进，争取有效占领所有边境地带。据此，印军在西段300多公里的地段上全线推进，并且占领了中国军队撤出的哨所。

1962年

2月21日　美国中央情报局报告称，中苏关系因双方在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根本分歧"受到根本性的损害，中苏同盟对双方已经没有什么价值。

2月27日　王稼祥、刘宁一、伍修权致信恩来、小平、陈毅，就对外政策提出一系列建议。

4月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新疆军区部队在中印边界西段边界线恢复巡逻，并重建哨所。由于印军坚持不撤，并且相应修筑工事和哨所，双方阵地逐渐形成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毛泽东指示："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

8月　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共同分析美国特种部队开始入侵越南南方的严重形势之后，中国决定立即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枪炮。

9—11 月　美苏之间围绕着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一事发生激烈对抗，最终以苏联方面做出妥协，宣布从古巴撤出导弹结束了这一事件。中国方面对苏联与美国的对抗公开表示支持，对苏联撤出已部署的导弹一事则予以了强烈的批评。

9 月 8 日　鉴于印军在东段边界地区也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克节朗河地区，西藏军区部队为恢复巡逻，派一部进入克节朗地区观察入侵印军的位置，并建立哨所与印军对峙。

10 月 2 日　尼赫鲁在新德里发表演说，宣称印度政府决心不惜武力对付中国的入侵。次日，中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提议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6 日，印度政府答复中方照会称，只有在中国军队撤出克节朗地区，并明确同意商谈从西段撤军问题的情况下，印度方面才同意谈判。

10 月 8 日　中国向苏联通报了中印边界的情况，并说明如果中方遭到大规模进攻，将进行反击。同日，中央军委向四川第五十四军下达了动员令，要求该军将参加过平叛作战的部队调赴西藏中印边界东段，完成作战准备。

10 月 20—28 日　中印之间爆发了大规模边界冲突。战斗结果，中方在东段清除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的印军，全歼其第七旅及其他守备部队一部，俘虏旅长达尔维准将，共歼印军 1900 余人；西段清除了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部分入侵的印军。

10 月 24 日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境问题三项建议。主张双方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 20 公里，脱离接触。

11 月 16—21 日　由于印度方面拒绝中方建议，中国方面进一步发起了第二阶段作战。

11 月 22 日　中国方面单方面实行全线停火。并从 12 月 1 日起，主动从 1959 年 11 月 7 日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后撤 20 公里，1963 年 2 月 23 日全部完成了撤退计划。

1963 年

2 月 26 日　印度国防部长证实苏联正帮助印度建设飞机工厂。

3 月 8 日　《人民日报》社论公开宣称，《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等当年划分中俄边界的条约，都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6月14日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全面阐述了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

6月27日　苏联驱逐了3名中国使馆工作人员和2名中国公民，理由是他们在苏联非法散发中共中央的《建议》。中共中央随即发表声明，指责苏联是在将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7月14日　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声称苏联不能同意"中国领导关于在亿万人尸体上创造出'高出千百倍的文明'的观点"。20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苏共中央的这封公开信。

7月25日　苏、美、英草签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宣布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中共中央认为这实际上是意在限制中国发展核武器。中国政府于31日公开发表声明，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

7月31日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揭露三国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旨巩固他们的核垄断地位，而把一切受核威胁的爱好和平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要禁止就应全面禁止一切核试验并销毁一切核武器。

9月6日　中共中央开始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九评苏共中央与我们的分歧系列文章。

12月31日　赫鲁晓夫就和平解决领土和边界争端致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信，主张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

1964年

1月7日　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上书约翰逊总统，认为美国在越南的承诺是冷战时期与苏联和中国竞争的一部分。一个共产党统治的越南，将削弱美国在亚洲其他地区，"甚至是世界其他关键地区"的地位。

1月27日　中法两国正式宣布建交。

3月17日　苏共中央致信其驻巴黎大使，说明苏共中央对越南在中苏关系问题上的立场极为不满。除非越方改变立场，否则苏联不能支持其在南越发动全面起义的计划，苏越两国之间也不可能有密切合作的前景。

8月2日　越南人民军的鱼雷艇攻击了美国在公海上的舰只。两天后，美国总统约翰逊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对北越实施"报复性轰炸"。当晚11点36分，约翰逊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宣布轰炸北越。此即为北部湾事件。

8月9日　北京举行了大规模的援越抗美群众集会,并通过了致越南胡志明主席的一封信。随后各地举行的各种集会和示威共有2000万人参加。

8月中旬,鉴于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了紧邻中国边境的越南北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国防建设问题,“三线”建设问题提上日程。

9月15日　赫鲁晓夫对日本议员谈话,在中苏边界问题上表达强硬的立场。

10月16日　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向全世界政府建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

10月16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阿列克谢·柯西金任部长会议主席,列昂德尼·勃列日涅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1月5—13日　周恩来率中共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活动,主动同苏共新领导勃列日涅夫等进行接触,但是,苏共新领导人并不打算改变前此的对华政策。

11月27日　苏共中央发表声明,第一次对越南做出承诺,准备向其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1965年

2月11日　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了河内,与越南领导人讨论了苏联援越问题,并签订了关于加强对越南防御能力援助的协定。

3月8日　美国对越“局部战争”开始,首批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南岘港登陆,美军开始直接承担在南越的作战任务,侵越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

3月22日　胡志明、范文同在会见访越的苏联军事代表团时表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基本上装备的是苏联的武器和战斗技术设备。苏联新提供的这些装备大大加强了越南的武装力量,为他们建成一支现代化的正规军提供了条件和保证。

4月2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转达中方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即中方不会主动挑起战争,但是中方说话是算数的,如果美国狂人敢轰炸中国,中国决不会坐等待毙。他们从天上来,我们就要从地上行动,轰炸就是战争,战争就不可能有界限。

5月21日　周恩来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要准备战争早打、大打，“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联合打，打核战争”，“准备两面打”。

6月9日　根据中越两国签订的协议，解放军开始向越南派出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船运等支援部队，在越南北方担负防空作战、修建和维护铁路、公路、机场、通信设施、国防工程和沿海扫雷等任务，但不公开宣布。

9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由林彪署名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称：“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9月29日　陈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称：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不存在任何幻想。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那些反动派们跟他们一起来吧！我们等着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大陆，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打败它。那时战争就没有界线了。

10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本月开始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部队，进入越南北方，实行援越抗美斗争。到1968年3月止，先后派出32万余人，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1970年7月才全部撤回国内。在此期间，中国援越物资折价达200多亿美元。

1966年

3月13日　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在电视演说中提出不要把中国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三天后国务卿腊斯克也提到要避免同中国的敌对状态，扩大非官方接触。

3月16日　美国方面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表现出积极主动的姿态，强调美国对中国没有敌意，战争不会由美国引起。并重申美国希望通过和谈解决越南问题，希望中国利用它的影响把“斗争”从战场上移到政治舞台上来。

3月28日　鉴于苏蒙签订同盟条约，并向中苏边界大举增兵。

8月1—12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9月9日　毛泽东在一封来信上批示：一切驻外机关要“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据此，中国驻外使领馆即开始搞“四大”，驻外大使几乎全部召回参加“文化大革命”，中国驻外机构的正常工作受到重大影响。

10月27日　中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1967年

1月25日　中国留欧学生回国途经莫斯科时，前往红场列宁、斯大林墓前集体朗读毛主席语录被苏方军警纠缠并殴打。中国外交部就此发表声明“最最强烈抗议”。国内群众因此开始在苏驻华使馆周围游行示威，并且围攻了准备撤回国的苏联外交人员家属。由此还引发了多起红卫兵围攻东欧国家驻华外交官的事件。

1月28日　越南副总理兼外长阮维桢发表讲话提出，只要美国停止对北越的轰炸，两国就可以开始进行和谈。

6月17日　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

6月29日　中国外交部向缅甸政府提交照会，抗议缅甸反华事件。与此同时，中国允许缅甸共产党在华领导人公开活动，并公开表示支持缅共领导的武装斗争。

8月5日　印尼军警和群众袭击了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打伤了使馆人员。当日下午，得到消息的北京群众也袭击了印尼驻华大使馆，砸毁和焚烧了使馆的一些设备。

8月16日　外交部系统造反派于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夺了外交大权，进而以外交部名义向中国驻外机构发号施令。

8月22日　在北京发生了由几十个造反派组织制造的万人围攻英国驻华代办处，火烧办公楼、批斗英代办的严重外交事件。随后，造反群众更进一步冲砸了印度、印尼驻华使馆，并试图冲击缅甸驻华使馆。

9月　周恩来批评中国驻柬埔寨外交人员干涉柬埔寨内政，并接见准备撤退回国的柬埔寨驻华大使，使西哈努克国王撤消了解散柬中友协，封闭华侨报纸和撤回驻华外交人员的决定。

9月29日　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圣安东尼奥发表讲话，提出新的和谈方案，表示希望与越南进行“导致有成果的讨论”。

1968年

1月24日　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

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要求边防部队在反挑衅斗争中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3月　毛泽东一方面批准对鼓动群众夺外交部权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实行隔离审查，一方面要求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并且批评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之类的提法。

3月28—4月5日　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主持召开捷共中央全会，改组捷共中央主席团和秘书处。全会通过《行动纲领》，准备建立一个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社会。

5月13日　越美巴黎谈判正式开始，至10月15日初步达成协议，河内接受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美国政府和西贡政权在内的四方会议。

8月20日　由于苏共中央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杜布切克等人的围绕着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分歧无法解决，苏军受命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入侵了捷克，并绑架了杜布切克等人。

10月31日　约翰逊政府宣布从11月1日晚8时起，无条件停止空军、海军、炮兵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和袭击。

11月13日　勃列日涅夫在《真理报》上发表讲话，系统阐述了“有限主权论”。声称，当反社会主义势力对整个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安全构成威胁时，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

11月25日　中国向美方提出于1969年2月20日恢复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次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多年来第一次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在美国保证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其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条件下，中国政府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美国签订和平协定。

1969年

3月2日　中国方面鉴于历年来在中苏边界摩擦中屡受损失，在黑龙江省珍宝岛组织了一次自卫反击作战，打死打伤了苏军上岛巡逻的30余人。随后又在15日与苏军进行炮战，打击登岛的苏军，并打死了苏军前线指挥官列昂诺夫上校。此即为“珍宝岛事件”。

3月15日　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汇报时指出：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了。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

4月1—24日　中共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林彪在政治报告中强调：决不能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争，打核大战。

7月21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和美国公民来华旅行的限制。这是自朝鲜战争以来的第一次。

8月13日　为了报复中国在珍宝岛所组织的行动，苏联军队发动突然袭击，攻击了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进行正常巡逻的一支30余人的中国边防巡逻队。

9月11日　参加完胡志明葬礼之后，苏联总理柯西金专程途经中国北京机场，与周恩来进行了3个半小时的会晤，以求缓和因边界冲突引发的中苏紧张关系。

9月17日　《人民日报》公布国庆20周年口号，毛泽东在审阅时增加了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9月18日　周恩来就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中达成的谅解，以书面形式致函柯西金，要苏方确认，同时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

9月26日　柯西金以书面形式答复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国家间的专项协定。

10月7日　周恩来对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宣布，中苏两国政府已商定从10月20日起，就边界问题在北京举行两国副外长级谈判。

10月17日　林彪从苏州给在京的黄永胜发出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指示。次日，该指示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下达全军。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全国处于临战状态。

10月20日　中苏两国在北京开始进行边界谈判。

1970年

2月18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对外政策报告，强调中国不应该继续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

3月18日　乘西哈努克亲王出国访问之机，美国策动柬政府中的右派

势力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建立了以朗诺为首的政权。

3月19日　中国仍以国家元首的规格欢迎由莫斯科来华的西哈努克和夫人一行，周恩来、李先念等并亲往机场迎接。周恩来在随后与西哈努克会谈时特别强调："我们决心支持亲王直到亲王胜利回国。"

4月20日　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4月24—25日　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在广州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印度支那当前局势及印支三国人民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联合声明》。

4月28日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三国四方领导人会谈及其所通过的《联合声明》。

4月30日　美国军队入侵柬埔寨。5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

5月1日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4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请他们代向各国元首问候，明确表示中国愿意改善和发展同各国的关系。

5月5日　西哈努克在北京宣布成立由柬民族统一阵线领导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也发表声明，支持西哈努克亲王，并参加了民族团结政府。

5月20日　由于美国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政变，并出兵柬埔寨，中共中央决定推迟原定这一天举行的中美会谈，而是在北京举行了百万军民集会。会上毛泽东发表声明，号召"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6月30日　美国宣布从柬埔寨撤军。

10月1日　毛泽东接见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说明中国准备和缅甸恢复关系，但不会影响缅共打仗。

12月18日　毛泽东会见美国友人斯诺，提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1971年

4月6日　毛泽东做出了邀请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美国乒乓队访华的重要决定。4月10日至16日，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了北京。

4月21日　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邀请尼克松访华。尼克松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5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确定了中国调整对美政

策的基本原则。

5月29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以周恩来名义向美方发出了欢迎基辛格作为美方代表秘密来京为尼克松访华进行预备会谈的口信。

7月9—11日　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恩来与其举行了6次会谈。事后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尼克松总统在适当时候将会访问北京。

7月13—14日　周恩来秘密访问朝鲜和越南,并向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通报了中美会谈的情况。阿尔巴尼亚大使返回国内汇报后,带回阿劳动党中央的长信,强烈谴责中国与美国缓和关系,称帮助尼克松从越南抽身是和帝国主义妥协的右倾机会主义行为。

10月25日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对3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一项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10月26—29日　周恩来与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会谈,为尼克松访华进行具体安排。

11月25日　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中越联合公报,中国重申援越抗美决心不变。

1972年

2月21—28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了中国。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美国方面在公报中表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3月初　周恩来秘密访问河内,向越南党通报尼克松访华的情况。

6月19—23日　基辛格在美苏莫斯科会谈后再度访问北京,与周恩来就越南停战问题交换看法。

9月25日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外相大平正芳,以及二阶堂进内阁官房长官等一行,正式访问中国。4天后,中日双方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日本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10月25日　中国驻法国大使黄华带信给美国大使,明确责备西贡在制造麻烦,表示相信华盛顿的诚意,并劝告美国抓住目前有利的时机结束越南战争。

12月18日　美国政府在向越南发出最后通牒的同时，开始对河内、海防和整个北越进行密集轰炸。越南最终同意恢复和谈，但要求把会晤的日期从美国提出的1973年1月3日推迟到1月8日。

1973年

1月27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美国、南越阮文绍政权四方《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在巴黎签署，美国承诺60天内从越南南方撤出全部军队，不再干涉越南内政，越南南方承诺以和平方式统一越南及通过普选决定越南南方的政治前途。越南战争至此结束。

2月15—19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中国，22日发表的公报宣布，中美双方在不久的将来会相互在对方的首都建立一个联络处。

2月25日　基辛格向中方通报称：尼克松第二任期间，前两年在两国首都互设联络处，后两年实现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同台湾保持民间往来。周恩来希望中美共同关注苏联在柬埔寨的举动，互通情报。基辛格对此表示同意。

5月1日　中美双方在华盛顿和北京互设联络处。

6月22日　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的谈话中，提出中国和马里都属于第三世界，即都是发展中国家的观点。

11月10—14日　基辛格再度访华，周恩来与其多次就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问题进行会谈。会后双方发表了公报。

11月20日—12月6日　政治局接连开会，批评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提出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犯了右倾错误。

1974年

1月15日　南越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派出军舰侵入中国西沙群岛海域，侵占了金银、甘泉等岛屿。南越海军和中国海军发生激战。

2月22日　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时，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4月4—16日　邓小平副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观点。

10月26日　中越两国政府签订了1975年中国给予越南11亿元人民

币无偿援助的协定。

11月　基辛格再度访华，并分别与周恩来、邓小平会谈，并转达了福特总统希望于1975年下半年访问中国的意向。

1975年

4月19日　柬埔寨全国解放。柬共开始提出废除货币和市场，推行配给制和按需分配，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化、集体化，开办公共食堂等一系列方针政策。

5月1日　越南南方全境解放，苏联除答应再提供大量军援外，还给予26亿美元战后重建基金，勾销了抗美战争期间越南欠苏联的全部债务。

10月19—23日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度访华。10月21日，毛泽东在与基辛格谈话时表达了对美国与苏联搞缓和的某种不满。

12月1—5日　美国总统福特访华。中国方面强调，美国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必须按照中国的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进行。

1976年

4月2日　西哈努克亲王发表声明宣布退休，6日，宾努首相率原政府成员辞职。16日，民柬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乔森潘出任民柬国家主席团主席，波尔布特任总理。

1977年

8月22—26日　美国国务卿万斯访问中国。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举行会谈。万斯声称：中美关系已成为一个促进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

8月30日—9月8日　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主席铁托访问中国，中南两党恢复关系。

9月28日—10月4日　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书记、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率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

1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

1978年

5月20—23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

他宣布美国政府已授权其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同中方具体商谈有关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6月17日　苏联《真理报》发表了苏联政府关于苏美关系的声明。指责美国政府奉行加紧军备竞赛、与中国结盟、武装干涉非洲、放慢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速度、恶化同苏联关系等危险政策。

7月5日—12月4日　中美双方就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了六次会谈。中方坚持: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方必须遵守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

12月16日　中美两国在各自的首都宣布了建交公报。公报宣布:中美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基本上接受了中国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但仍坚持中美关系正常化后有权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12月25日　越南出动十几万军队,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向红色高棉控制下的柬埔寨发起攻势,并于次年1月7日占领了金边,成立了"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1979年

1月1日　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将于3月1日互派大使。

1月10日　在中国帮助下重新回到国家元首位置上的西哈努克在联合国会议上强烈谴责越南出兵侵占柬埔寨。尽管苏联行使了否决权,安理会未能通过谴责越南的相应决议,但联合国第34届大会仍以91票对21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中国和东盟等国的提案,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要求国际社会拒绝承认"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1月29日—2月4日　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应邀访问美国。

2月17日—3月16日　中国军队进行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4月　美国国会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

12月27日　苏联利用阿富汗政局动荡,于27日凌晨兵分几路入侵阿富汗,扶植了阿富汗新政府。

12月28日　卡特总统通过热线向勃列日涅夫发出强烈抗议。声称这可能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根本的和长期的转变。他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停止对阿富汗内部事务的干预。

1980年

1月4日　卡特总统宣布:美国将对苏联采取禁售先进技术和战略物

资在内的一系列制裁措施。

1月20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已成为中苏两国进行关系正常化对话的新的障碍。

7月3日　勃列日涅夫及葛罗米柯在莫斯科会见了越南领导人，对越南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政策表示理解、赞同和支持，同时指责了中国。

12月1—6日　因独立的团结工会崛起，波兰局势紧张，苏联封锁了民主德国和波兰边界以及波兰边界部分地区。3—6日，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日本先后警告苏联不要干涉波兰内政。

1981年

3月7日　勃列日涅夫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十六大上谈及波兰局势，联系当年侵捷事件，要求波兰政府反击社会主义的敌人。3月26日美国总统里根发表声明说，苏联对波兰的任何干涉"将对东西方关系的整个进程产生严重影响"。同日，英意日德也对苏联发出了同样的警告。

12月13日　波兰政府宣布波兰进入战时状态，成立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救国委员会，宣布拘捕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等人，军队进入工厂、矿山和企业，实行军管。美国总统里根当即宣布中断美国同波兰经济关系中的一切重要方面的联系，并指责苏联要对波兰局势负责，决定对苏实行经济制裁。

1982年

6月　美国总统里根在伦敦英国议会发表演说，声称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和平政治攻势"。

6月22日　在中国的主导下，柬埔寨爱国力量的三方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乔森潘和宋双在吉隆坡签署了《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成立宣言》。7月9日，三支主要的抗越力量组成了以西哈努克亲王为主席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

7月13日　美国总统里根致信邓小平，就中美就美国对台湾销售武器所进行的谈判一事，说明美国不谋求、也不会无限期向台湾出售武器。

8月17日　中美两国政府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联合公报。美国表示将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直到问题的最后解决。

1983 年

9 月 20 日—12 月 20 日　第三十八届联大召开,大会先后通过几项重要决议,呼吁越南从柬埔寨全面撤军;呼吁伊朗和伊拉克结束战争状态;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格林纳达;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等。

11 月 23—30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日本,同中曾根首相就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交换意见。双方一致同意,把中日关系三项原则扩大为四项原则:和平友好、平等互利、互相信赖、长期稳定。

11 月 25 日　中国政府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于 11 月 17 日、18 日通过一项拨款法案,制造“两个中国”一事,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1984 年

1 月 7—16 日　中国总理赵紫阳访问了美国。赵紫阳阐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里根总统表示美国将信守中美公报,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2 月 13—16 日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安德罗波夫的葬礼。

2 月 22 日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布热津斯基等人时提出,台湾问题的解决,可以搞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台湾仍旧搞它的资本主义。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也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

3 月 23—26 日　日本首相中曾根访问中国,邓小平在会见时提出应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要永远友好下去。

4 月 26 日—5 月 1 日　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双方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工业科技管理合作、科技情报合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等五项协定和协议书。

12 月 18—20 日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19 日,中英两国领导人正式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告中国政府将于 1997 年 7 月 1 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1985 年

3 月 4 日　邓小平会见日本一个访问团时说:当今世界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或者叫做发展问题。和平问题

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其中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3月12—14日　国务院副总理李鹏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领导人契尔年科的葬礼，并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会面，双方就改善两国关系表达了相同的意愿。

12月2—5日　欧盟议会在巴黎举行会议，要求各成员国在对待美国“星球大战”计划问题上要维护欧洲自身的利益，并主张大力发展欧洲同中国的关系。

1986年

3月14日　美国总统里根向国会发表题为《自由、地区安全和全球和平》的咨文，系统阐述了“里根主义”。声明宣称，反对任何形式的暴政，无论这种暴政是左的还是右的；表示要利用美国的影响鼓励进行民主改革。

7月28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讲话，阐述苏联对亚太地区的政策。宣布苏联将从阿富汗分阶段撤军，并正在同蒙古讨论撤出相当部分苏军的问题，表示准备同中国改善关系。

9月2日　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中苏实际上仍处于热点和对峙，不过方式是通过越南军队同中国对峙。如果苏联能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我愿意和戈尔巴乔夫见面。

1987年

4月13日　中国、葡萄牙签署并发表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7月22日　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准备消除部署在亚洲地区的全部中程导弹，即撤消苏联在美苏日内瓦谈判中所提出的在亚洲保留100枚中程导弹核弹头的要求，条件是美国也这样做，战役战术导弹也要消除，这个方案称为“全球双零点方案”。

11月　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外同时发行《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书中强调，“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最充分地展示出我们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认为改革的实质在于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

1988年

4月14日　在联合国秘书长的主持下，阿富汗、巴基斯坦、美国和苏联

四方代表在日内瓦签署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协议规定苏军自1988年5月15日起9个月内撤出阿富汗。中国与苏联关系中一个重要障碍被扫除。

12月1—3日　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访问苏联，期间钱其琛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就柬埔寨问题和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了会谈。

12月7日　戈尔巴乔夫在联大宣布：苏联决定在两年内裁军50万，并大量削减常规武器，减少在欧洲和亚洲地区的驻军，苏联在蒙古的大部分驻军也将撤回国内。

1989年

2月1—4日　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访华，双方就解决中国一直关心的柬埔寨问题达成了一致看法。因此，双方商定，应中方邀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15—18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2月25—27日　美国总统布什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

3月7日　苏联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将从蒙古撤出3/4的苏联驻军，包括全部空降部队。随后苏联于5月15日开始了这一撤军过程。

4月5日　波兰政府与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举行的“圆桌会议”闭幕。会议签署了波兰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和工会多元化问题的协议，国家政治体制将改为议会民主制。

4月17日　美国总统布什在密歇根发表讲话，对波兰举行圆桌会议达成协议表示赞扬。他宣布说：冷战从这里开始，也将在此结束，这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5月15—18日　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并与邓小平举行了会晤。两国于18日在北京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此举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

7月17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西方七国首脑会议15日发表政治宣言指责中国一事发表谈话称，中国政府平息在北京发生的旨在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暴乱，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绝对不能接受七国首脑会议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8月21日　布拉格群众在市中心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要求宣布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为非法行为和为布拉格之春平反。政府虽一度出动警察驱散示威群众，但终未敢动用军队，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局势因此渐趋

紧张。

8月23日　爱沙尼亚、立陶宛、拉托维亚三国人民战线组织了200多万群众排成一条长达600多公里的“人链”，要求三国独立。随后，三国先后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

8月24日　波兰议会任命团结工会的马佐维耶茨基为政府总理。12月29日，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删去有关统一工人党领导地位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提法。

10月10日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决定改称“匈牙利社会党”。18日，匈牙利国会宣布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改为匈牙利共和国。

11月9日　民主德国政府宣布开放“柏林墙”和其他边境检查站，允许公民自由出入国境。从9日到13日，就有500多万人领到了旅行签证，数十万人涌入了联邦德国。

11月20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发表关于美国国会通过制裁中国的修正案的声明，批评修正案歪曲中国政府制止动乱的事实真相，提出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措施，是恣意践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12月3日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发表声明，响应民众要求，宣布1968年苏联等国出兵捷克，破坏了主权国家之间关系准则。次日，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民主德国等5国领导人宣布，1968年他们国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对捷内政的干涉，应受谴责。至此，“布拉格之春”事件得到彻底平反。

12月9—10日　美国总统特使、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访问中国，邓小平在会见中表示：中美两国间尽管有些纠葛，但归根到底要好起来才行。希望尽快解决6月以来中美之间发生的这些问题，使中美关系得到新的进展。

12月16—28日　罗马尼亚局势发生动荡。22日晚，“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成立。25日下午4时，齐奥塞斯库夫妇被临时组成的特别军事法庭处死。28日，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罗马尼亚共和国。

1990年

4月23—26日　中国总理李鹏率团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双方签署了《中苏关于经济、科学技术长期合作发展纲要》等六个文件。

7月12—13日　苏共举行了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提出了分别代表三个派别的纲领，即《苏共中央纲领》、《马克思主义纲领》和《民主纲

领》。大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和“向市场经济过度”的方针。大会期间叶利钦等人宣布退党。

11月30日—12月1日　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应邀访美。这是1989年“六四”风波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

1991年

2月25日　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在布达佩斯开会,会议宣布:从1991年3月31日起,终止在华约范围内签订的军事协定的效力,解散华约,所有的军事机构同时停止一切军事行为。

5月15—19日　江泽民总书记访苏,并与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双方对正常化以来在政治、经济、贸易、科技等领域的交往和合作表示满意。

6月25日　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两个共和国同时宣布独立,南斯拉夫政府否认两个国家的独立宣言,并出动联盟人民军,从而引发武装冲突。随后,波黑议会不顾塞族代表的反对,也通过了《波黑主权问题备忘录》。南斯拉夫陷入到三个民族间大规模内战中。

8月19日　由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8人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了“八·一九事件”,试图“使国家和社会尽快摆脱危机”。“紧急状态委员会”仅存在64小时便归于失败,事变参与者很快遭到逮捕。

8月20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苏联局势发表谈话,称苏联发生的变化是苏联内部事务,中国政府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

8月24日　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发布一系列命令,停止俄罗斯共产党活动,并限制苏联共产党活动。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决定,暂时中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

9月7日　中国外交部长分别致电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外长,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三国独立。

10月23日　中国长期关心的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正式复会。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最高委员会的12名成员及19个国家外长与会,共同签署了《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柬埔寨恢复和重建宣言》等四个重要文件,文件对一些问题作了具体安排。

12月1日　苏联第二大共和国乌克兰就独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同时进行总统选举,结果99.85%的选票赞成独立,克拉夫丘克当选为乌克兰总统。

12月7—8日　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就苏联的前途问题在明斯克秘密会晤，并签署了《明斯克协定》。协定宣布三国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21日，除格鲁吉亚外的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在阿拉木图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议定书》，并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独联体正式宣告成立。

12月25日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并当场将核武器控制权亲手交给叶利钦。同时，苏联的镰刀锤子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升起了白红蓝三色俄罗斯国旗，苏联由此解体并不复存在。

12月25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鉴于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已宣布成立独立国家，中国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这些共和国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